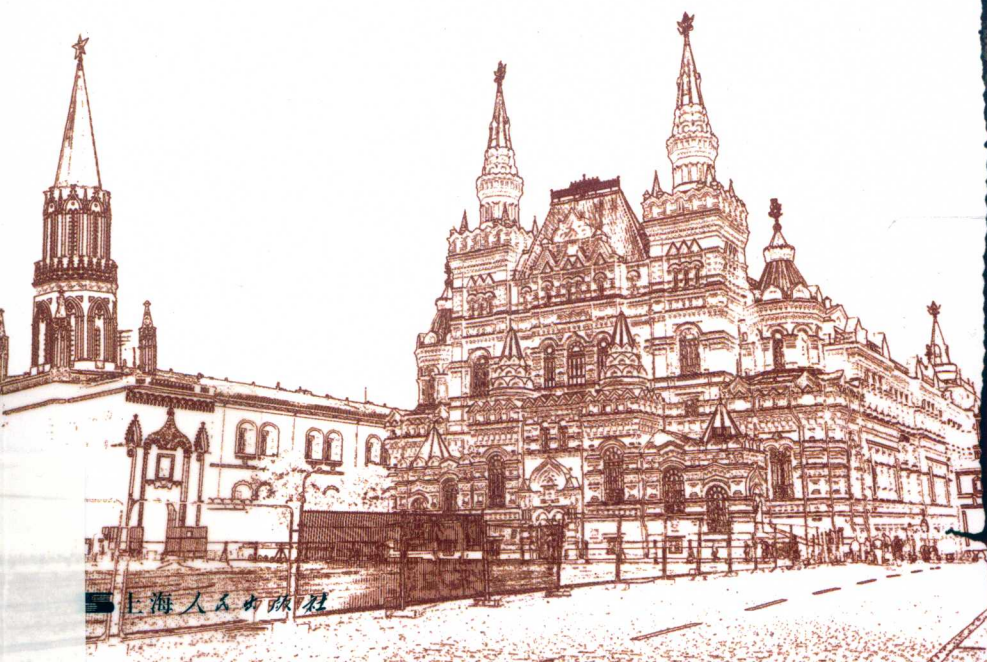


共产党宣言

革命与改良

郑异凡◎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联春秋 革命与改良

郑异凡◎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春秋.革命与改良/郑异凡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167-3

I. ①苏… II. ①郑… III. ①苏联-历史 IV. ①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9087 号

序 言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观点,任何事物都有始有终,都有一个诞生、成长以至消亡的过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完整的过程——它经过 74 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一个创立、发展、解体的过程,完成了其生命的周期。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预期,应当是夺取政权,通过过渡时期,走向社会主义,再进入共产主义;相应地,党消亡,国家消亡,进入人类的大同世界。

然而,苏联的发展却走向了另一端:十月革命,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建成”社会主义,“20 年进入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后,共产党丧权,苏联解体,恢复资本主义。恩格斯说过,历史的发展经常与人们的预期相背离。美好的设计,美好的愿望,经常事与愿违。历史有自己的规律,苏联掌权者经常自诩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指挥历

史的发展,然而社会规律并不听他们的,世界潮流把它冲击到另一端,走向了崩溃、解体。这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苏联从革命到解体,只历经了74个春秋。在这74个春秋中七个领导人依次上台执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纲领,制造下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本书主要是21世纪发表的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记叙的是在此74个春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故事,某些人物的经历、事迹,某一政策的得失,某种理论的命运,等等。这里涉及的有些内容是一般苏联史通常不写,或者不会细写的东西。

我和一些朋友早就想写一部真实的苏联史,一部摆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和框框的苏联史,一部以事实说话的苏联史。为写作这样的苏联史,苏联解体后我们从编译解密的档案入手,编译了34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然后九位作者分头写作九卷本《苏联史》中的一段历史。我承担的是撰写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这一卷中有许多以往史书没有涉及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需要从头讲起。我采取的办法是一个一个问题分头研究,分头写,对每一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写成一篇可以独立成章的学术论文,然后再整合成一卷书。这些专题研究的成果部分作为论文或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发得最多的是《历史教学问题》杂志。这样做可以让研究成果及时发表并征求意见。可以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一书多半是由一篇篇论文构成的。

不过要加以说明的是,本书所收并不都是《苏联史》中的章节,多数是独立写作的文章。我觉得独立的文章有它的优势,可以集中某一问题深入讲述或者评论,可以把几个事件串起来写,也可以把一个事件分解来讲,可以纵览历史,也可放大细部,观察历史,这是大部头的专史难以做到的。

苏联解体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了历史,成为整个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一个朝代。苏联时期出版的苏联历史著作秉承领导人的意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夸大、伪造、歪曲,抹去真实的存在,添加无端的虚构。现在出现了写前朝史的有利条件:许多曾经被严密封锁的档案文件陆续解密公布,以往对书写历史的禁令不再存在,苏联特有的意识形态干预解除了,这样恢复历史原本面貌的工作可以进行了,这一切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曾经打算撰写一部新的苏共党史并且由他本人牵头,但几经周折直到苏共解散甚至一个完整的编写提纲也没出来,可知写真实的本朝史之难——问题在于要写真实的历史,

就要纠正过去的伪造,而以往的伪造又太多了,揭发出来会直接影响到执政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因此真实的苏共党史只能留待改朝换代后的史家去写了。

写历史肯定会有史家本人的立场观点,这表现在史料的选择、观察的角度,更为直接的就是史家的评论。我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谈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指出其中的问题,某主持人接着说:缺点错误都说了,那么好处在哪里?他显然要我来表扬一下苏维埃制度或者说斯大林模式。一个人死亡了,要知道死亡的原因,当代医学的做法就是对尸体进行解剖。这里要找的是病因,而不是去论证死者身体多么健康,这是常识。本书的一些文章探讨了苏共的得失,评说了苏联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人物,目的无他,只为查明苏共丧权、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直视问题,不讳疾忌医,这样才能从苏联的历史中获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是中国史家的底线,也是本书作者多年来的追求。

* * *

本卷名为《革命与改良》,主要讲的是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终结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问题。我认为,这段历史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

1917年俄国发生了两场革命——二月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苏联历史的起点,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探讨,需要交代。

“改良”俄文为 *реформа*,本义就是改良,把事物改好,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名词,但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狠批改良,把各种改良行为贬之为“改良主义”,因此人们要的是革命-革命-革命,闻改良而鄙之。处于革命高潮的人们知道革命,却不懂改良,以至于后来实行改良的时候不敢用“改良”,而用“改革”,有了个“革”字,同“革命”沾了边,人们也就容易接受了。现在不是还不时听到“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说法吗!

其实改良是个好东西。改良者,把事物、社会、制度改得更好、更良也。人类社会就是经过不断改良延续到今天,并且今天总是比昨天好。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改良的历程。革命暴力打天下之后,还得实施改良,以克服前朝的弊病缺点,消除前朝的劣迹恶政,否则过不多久一样会被人打倒的。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而改良却是漫长的历程。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

火车头后面拉的就是叫作改良的一节节车厢。有的时候为了能够实施改良,需要先实行革命,推翻阻挠改良改善的政权,但革命不是目的,而只是开启改良的前提、手段。正因为革命是短暂的过程,某些热衷于革命的人就发明了“不断革命”、“持续革命”,要使社会永远处于革命之中。但历史证明,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可能永远处于革命状态的。革命可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建设新的国家机器还得靠改良的手段,靠暴力、靠打倒是搞不了建设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部改良的历史,它在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后通过不断改良调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关系,调整劳资关系、社会各阶层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被某些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士称之为社会主义(据说,只要加上共产党的领导即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改良使整个社会得以不断克服各种危机,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至今长盛不衰。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的争论,到世纪末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搞暴力革命起家的苏联,在其统治期间,依靠暴力,不断制造阶级斗争,人为地让阶级斗争尖锐化,在和平时期造成千百万无辜人们死亡,最后终于垮台了,而那些走渐进改良道路的国家却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成为民主国家、福利国家。

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把生产和消费集中到国家手中,由国家统一控制安排,认为这样就实现了共产主义。在城市把大大小小企业、银行、矿山等国有化;在农村组织贫农委员会,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地主富农,建立公社、集体农庄,实行粮食征收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建立在暴力强制的基础之上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实施的政策,尤其是粮食征收制把农民的粮食甚至口粮种子粮等统统被抢走,招致农民的普遍不满,引起暴动反抗,一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省。农民的反抗得到穿军装的农民的支持和响应,1921年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列宁采取紧急措施,中止粮食征收制,实行以粮食税为起点的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时候,列宁提出了从革命向改良过渡的方针。原先被批得一钱不值的改良,得到了正名,恢复了名誉。列宁写道: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

“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

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①

习惯于革命冲击的人们要静下心来采取改良主义措施是不容易的，所以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革命激进情绪，列宁警告说：“当前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②

20年代是由革命转向改良的时代，具体措施就是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取得了成功，遍及各省的农民起义平息下去了，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应该说，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三次改革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当然，问题还是不少。最主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来。经济上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而政治上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说没有搞一个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对农民让步了，农民觉得满意了，然而对其他阶层群体反而加紧施压或者镇压。1921年利用全国性饥荒，以救灾为名，强行没收教会珍宝来充实国库，打击镇压宗教人士。1922年把几百名不太听话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境，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所谓“哲学船事件”。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对仍然存在并且仍有社会影响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放心，在1922年不顾世界各国人士的强烈反对与抗议，举行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把早已关押在监狱的一批社会革命党人判处死刑和不同刑期的监禁。这种种措施显然并不有利于团结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经过几年的执政实践，列宁曾经想对政治体制实行某些改革。1921年对权力极度膨胀的镇压工具契卡（肃反委员会）进行改组，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削减其部分镇压职能，如执行死刑权。列宁在病中还考虑改革“政治制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经过五年的执政，列宁看到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拖拉，官官相护，所以列宁把官僚主义看作“三大敌人”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建议从加强党内监督做起，从监督党的领导层做起，让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委出席政治局的会议，检查政治局的文件，对政治局委员包括总书记实施监督。为加强集体领导，列宁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增补人员从没有沾染官僚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4—2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6页。

义习气的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为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望,建议把它同党的监察委员会合并,合署办公。列宁最后几篇文章的主要议题都是加强监督的。列宁建议的措施如何可以暂且不论,但他提出的加强对党内外监督尤其是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很可惜,列宁英年早逝,他的一些改良设想没有得到实施。此后党内斗争绵延不断,斯大林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登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地位。

此前党内的不同派别或者说不同意见对总书记斯大林是有所制约的,斯大林还不能为所欲为,不过这种制约并没有能够形成政治制度。列宁在推行经济改良的时候,还来不及根据几年的执政经验教训对政治体制实施改良。因此以新经济政策为主体的改良,由于没有同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良,缺乏政治体制的保护,结果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予以终止,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纵观苏联历史,在整个苏联时期有三次改革——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为起点的赫鲁晓夫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比较起来,列宁的改革是效果最明显的一次改革,发现了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经济建设的办法,消弭了农民暴动,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整个20年代尽管有种种不足,但整体看来是好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条路如果能够继续走下去,是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模式的。

* * *

我从2002年退休,此后又返聘到2005年。对我这样从事苏联史研究的人来说,退休不退休,返聘不返聘,除了待遇有所不同外,其他没有任何变化,照样研究,照样写文章,因为苏联历史还有许多谜团需要解开,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究,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由于没有行政任务,无需上班点卯,没有必须完成的课题,研究工作更加自由自在了,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抓紧时间研究自己所想知道的东西,写自己所想写的东西,不为五斗米折腰。前些时候偶然计算了一下,本世纪竟然写了一百来万字,觉得这些文字提供的信息、看法,作为一家之言还有点用处,所以就着手整理,刚好上海人民出版社周峥先生来访,答应出版,于是

着手编辑加工,把这些文字分编为三册:《革命与改良》、《大转变》和《改建与易帜》,相应地为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当今的俄联邦时期,这些文章中有正规论文,有一般文章,有书评和随笔等,一律按内容分类排列,这样对读者会方便一些。

这些文章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不同的报刊有不同的规格要求,有的文章作为学术论文需严格遵循学术规范,所引文字均有出处;有的报纸文章则大多不加注释,现在一仍其旧,按原样刊印。不同报刊的注释规格不尽相同,现在做了统一处理。关于马列经典著作需交代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各卷出版时间不同,本书的注释均不标出版时间,只交代版次。按规定经典著作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注释中略去出版社名称。

本书得到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的资助,特此表示感谢。

郑异凡

2016年2月18日于北京蓬莱公寓

目 录 | Contents

- 1 / 序言

- 1 / 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
——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过程
- 13 /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认错”
- 24 / 流行说法与对马恩列的误读
——《共产主义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与
“共同胜利说”
- 28 / “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
- 34 / 被贬低的俄国二月革命
- 40 / 末代沙皇的退位及其遇害
- 51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无需改译
- 55 / 也谈《共产党宣言》原文第一句怎样翻译
- 58 / 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
- 67 / 十月的炮声
- 72 /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

- 79 / 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
- 97 / 十月革命:理论与实践
- 114 / 十月革命是犹太复国运动吗?
- 123 / 列宁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的意义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
- 128 / 苏俄实施“公妻”的神话
- 135 / 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工人民主制
——列宁时期党内组织原则的演变
- 146 / 十月革命后俄共背离自由民主的历史教训
- 157 / 不要误读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这句话
- 160 / 在农民暴动的压力下
——新经济政策的起因之一
- 170 / 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和列宁的应对之策
——纪念列宁诞辰 140 周年
- 190 / 列宁的一次改革尝试
- 199 / 革命党到政权党——苏共不成功的转变
- 207 / 列宁论工会要捍卫工人的利益
- 216 / 农民的“布列斯特”
——列宁是怎样对农民妥协让步的
- 228 / 苏俄的大饥荒与没收教会珍宝运动
- 240 / 1922 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
- 264 /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

- 279 / 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好处
——列宁“临别赠言”之一
- 283 / “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
——列宁“临别赠言”之二
- 287 / 列宁为什么感到“尴尬”?
——从列宁一封信的译文谈起
- 291 / 列宁在 1923
- 303 / 列宁索取毒药之谜
——一个没有付诸实施的列宁嘱托
- 311 / 列宁给斯大林“绝交”信的前前后后
- 321 / 列宁和斯大林关系的历史真相
- 330 / 探索天才的奥秘——对列宁大脑的研究
- 344 / 苏联 20 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 349 / 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
——苏俄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
- 407 /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 417 / 决定苏联发展方向的二十年代
——《苏联史》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的特色

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

——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过程

国情决定革命和建设的方针路线。俄国的基本国情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列宁、普列汉诺夫以及俄国的一些革命家都一致认为,俄国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

19世纪末俄国有过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一派认为,俄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借助于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民粹派的观点。列宁则认为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实际上那时候(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不久,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正因为还不太明显,所以才会发生争论,需要写文章,甚至大部头著作,如列宁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存在,如果事实很清楚,那就无需论证,更不会争论了。

1919年俄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关于党纲问题曾有过争论,列宁主张把资本主义写进党纲,而布哈林主张只写帝国主义。针对列宁所说的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布哈林承认,确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重心转向说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旧纲领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俄国更是如此,它保存了大量的

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它们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分同时并存，而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那时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还在进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争论。但是纲领谈的主要的不是这些落后的形式，而是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到首位。

布哈林的议论也说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还处于非常不发达的状态，保存着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而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这个判断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成为俄国革命的基本出发点。

正确的判断

在民主革命期间，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是准确的，据此制定的革命策略也是符合俄国国情的。

1905年，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①这种清醒的认识使列宁非常鲜明地主张在俄国搞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所以他接着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一直主张在俄国进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写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之后，他给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仍然是民主革命，并为此批评了主张立即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人。列宁认为俄国需要民主革命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917年1月9日，列宁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谈到未来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接着表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③

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动身回国，在告别瑞士工人的时候，列宁仍然认为，俄国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离他们这些革命者还非常遥远。1917年3月中

^{①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55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33页。

旬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这样写道：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有可能“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够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①

大转折——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转折发生在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回国后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转变。正因为突然，不仅其他党派不表赞同，而且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也都跟不上。支持列宁四月提纲的只有柯伦泰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列宁不得不提出反对“老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

不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本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准备都显得不够。此前列宁一直坚持革命发展的阶段论，主张俄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在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1917年在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搞？全党不清楚，列宁本人也不很清楚，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样子。这就难怪老布尔什维克们跟不上了。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都批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普列汉诺夫说，俄国还没有磨出可以烤制社会主义烙饼的面粉，俄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

对这一批评，列宁当时没有实质性的反驳，直到五年之后，1923年初才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给以回答。不是否认“缺乏物质前提”的命题，而是提出变更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助政权的力量来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

所谓缺乏物质经济前提，指的是：(1)资本主义不发达。(2)无产阶级不发达，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90—91页。

人数没有达到国内的大多数。这两点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所公认的。

党内的反对、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且是基于列宁以前所坚持的理论的。稍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担心少数人举行起义会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临时政府解决不了三大问题:和平、土地、面包。这倒不是它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少了,只有八个月,而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下,结束战争也并非易事(回想一下,列宁为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足足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这里提出的三大问题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用彻底的民主革命完全可以解决。

这时候的列宁是革命家、政治家,他不抱着书本哪怕是他自己写的书本不放,而是根据形势的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战争失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群众反政府情绪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既然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自然应当加以利用。

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列宁的一些说法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列宁需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矛盾,所以列宁在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不得不同时强调这还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用一些模糊的说法。例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①

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断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当时的俄国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离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前提还很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服党内的反对者,就必须提出另一种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准,列宁也想出了这个标准,这就是他说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而且应当提上日程。

他在1917年4月写就的《论策略书》中说: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者从实际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58页。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①

不过,这要看是什么革命了,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形态革命?政治革命的标志确实是国家政权的转换。而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虽然也需要解决政权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具体的物质前提问题。马克思说过,一种社会形态在竭尽其潜力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潜力显然没有竭尽,借助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仅仅一个政权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现实也说明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列宁的上述论断后来派生出对国家政权的迷信,即“政权万能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于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纷纷利用手中权力,抛弃原先规定的民主改革的任务,超越阶段,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错误的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们看到“政权万能论”的实践——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能够改变一切。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

大权在握之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开始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措施,借助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分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消灭工业部门的大资本主义,实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把中小企业也都统统国有化。他们把国有化看作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化的手段和捷径。然而,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国有资产不一定是全民资产。布哈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图把通过国有化实现的社会化说圆,所以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解释说:

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也就为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②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5页。

^②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余大章、郑异凡译,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4页。

但是列宁不予以认可。

在农村实行“粮食专政”，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实行粮食征收制，名义上仅征收农民的“余粮”，实际上几乎收走农民的全部粮食，包括种子粮、口粮等。与此同时，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富农，打击中农。

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掌握在国家手中。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全国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这种免费供应的种类还逐步从食品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用品，最后发展到住房、交通、观剧等也都免费。那时布尔什维克发现用军事强制手段可以最迅速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军事共产主义反而达到高潮。

布尔什维克党把小生产看作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为消灭小生产，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大力组织公社和集体农庄。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组织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因此列宁改变提法，说组织集体农庄不是当务之急，允许个体农民的存在。

以上措施后来被列宁叫作“军事共产主义”。三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利用手中的政权，在贫穷落后甚至濒临破产的俄国，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当时的战争环境逼迫所致，还是执政党的主观认识和无视现实的超越阶段的追求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当时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消灭货币、市场，实行有计划的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设计的道路，却被布尔什维克党搬到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俄国，试图用超越阶段的办法，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借助于改变生产关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列宁后来承认，这是无视国情，犯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他多次就此做了检讨。他说：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

(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①

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②

列宁还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③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适应军事的需要,各交战国都采取一些战时措施,如把一些与国民生计关系密切的企业或军工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国家实施粮食垄断和食品配给制、粮食征收制,等等。俄国的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也都实施过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接手了这些现成的措施,贴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就变成了“共产主义措施”,后来就叫作“军事共产主义”。这些措施同沙俄和临时政府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实施国有化、粮食征收制的时候,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执行得更加坚决,更加严酷。其结果就是激发广大农民举行暴动来反抗“暴政”,导致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政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18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2—1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4页。

和经济危机。

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落后的俄国是不能超越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对国情的再认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在危机的逼迫下,列宁对俄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承认俄国资本主义严重不足,需要向后退。20年代初列宁多次谈到,俄国与其说吃资本主义的苦,不如说是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这标志着列宁对俄国实际的认识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1919年3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俄国的落后性:“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①这是从官僚主义问题切入俄国的国情,虽然还不是全面审视俄国的国情,但重提落后性表明,列宁对俄国的落后性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后来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列宁愈来愈多、愈来愈频繁地强调俄国的落后性。这实际上是俄国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新经济政策的实际依据。

俄国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表现在各个方面。

经济技术落后。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承认并多次提及的。但起初列宁认为虽然俄国经济技术落后,但迅速崛起的西方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会给予俄国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从而解决俄国的落后状态,拯救俄国革命。所以十月革命后列宁始终强调革命的国际性,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乃至策动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的革命。但是列宁的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20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进入低潮,列宁更加感觉到经济落后对苏俄实现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

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写道:

“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从中抽取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4页。

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

凭借这种认识,列宁号召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②

大家知道,即使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还多次表示反对“自由贸易”,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列宁同意实行贸易自由,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声明苏维埃政权在重建资本主义:

“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③“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④

列宁甚至认为,实际使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比关心“纯洁的”共产主义要好得多:

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那能给全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更多得多。^⑤

俄国是个小农国家,小生产如汪洋大海。按照列宁的主张,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进行,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同农村的雇农和贫农一起进行,其他的阶级或阶层是革命的对象。以中农为代表的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大敌。因此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小生产是消灭的对象。然而在当时的俄国小生产是无法消灭的,消灭不了的。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开始改变对小生产的看法,不仅予以容忍,而且对其存在的需求予以满足,反而否定集体农业组织和农村公社,最后得出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结论,认为简便易行的合作社本身就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样,小生产就从“大敌”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盟友,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之一,不是消灭小生产的农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9—22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5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0—221页。

而是利用它,发挥它的积极性,以恰当的方式让他们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列宁的合作社不同于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向小农让步,退回到自由贸易,从用国家资本主义对付小生产,到允许小农存在和发展,经商做买卖,自我发展,组织合作社,这是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得出的结论。

1922年3月28日,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

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这一切是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必须容许其存在。……如果我们怕承认这一点,那就必然要灭亡。^①

由于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且决心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由此也理所当然地开始利用一直被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市场、货币、价值规律等。广泛利用市场关系,是把列宁1921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与1918年春天的计划区别开来的新东西。列宁总结道:“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②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文化界出现一个左的激进流派——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主张抛弃以往的所有文化遗产,在空白地上创造崭新的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针对这种空想的高调,列宁声明说: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③

列宁多次公开承认俄国的文化落后,甚至缺乏资产阶级文化。他在去世前还认为,文盲是俄国的大敌之一。“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4—1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3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6—357页。

明,我们好像是一些(怎么说得轻一些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①

从1917年开始,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等反对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没有回应他们的理论挑战,没有回答反对者的责难,恐怕也很难回答。那时俄国迫切需要的是革命行动,而不是理论论争。直到1923年1月,列宁躺在病榻上反思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明确承认了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经济前提,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的这一结论,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短文《论我国革命》上。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俄国就失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列宁需要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所以他接着提出可以改变历史发展顺序的论点,认为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用政权的力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需的物质前提,赶上先进国家。

第二国际一些领袖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对此表示同意,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

列宁接着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此特殊性就是俄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文化的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列宁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②干起来再说,这有点像我国改革开放时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列宁的改变历史发展顺序的说法给予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许多国家效法俄国,跳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它们大多着眼于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致使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名无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9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0—372页。

世界历史的发展确实不是严格按照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的。在局部地区,有的超前,有的滞后,有的超越阶段,有的停留不前,有的跳跃发展,有的复辟倒退,总之,各个地区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刀切的。但是有一条是肯定不变的,这就是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力。缺乏生产力的支撑,单纯依靠暴力来改变社会发展阶段,最后一定失败。所以在某一特定阶段,改变发展顺序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及时设法补上所欠缺的东西,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行事。

列宁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①

列宁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他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从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回到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重新利用资本主义,终于走上了新经济政策这条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不过列宁身后的领导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一旦掌握政权,就恣意妄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可以无视历史规律,随心所欲,跳过发展阶段。斯大林中断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刚走出饥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声称20年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如此等等,都是无视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他们不懂得,可以暂时改变历史发展顺序不等于可以随意跳过历史发展阶段,缺的东西需要补上,历史的欠账终究是要还的。无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5页。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认错”

近年来流传一个叫作《普列汉诺夫遗嘱》的文件，其中竟然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实际上，这是一个伪造的文件。不说别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患喉结核，不能说话，怎么可能口授三万多言的“遗嘱”呢？

其实要了解普列汉诺夫的真实思想，完全可以去看他的《在祖国的一年》文集，那里有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有他就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同列宁的争论，可以看到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观点，完全可以不必求助于所谓遗嘱。

俄国革命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其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俄国是否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革命过程、建设过程中不断地遇到这个问题。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就是围绕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的。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论点：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①

十月革命的一个致命问题是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前提。

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对的少数，最多不超过300万人。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土地问题、立宪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民主化的问题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1917年,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与俄国无产阶级领袖列宁之间曾发生一场有重要意义的争论,这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它关系到以后苏联的命运。

1917年列宁乘“铅封列车”取道德国回国后,立即宣布俄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应当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他回国后喊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对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党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1917年4月3日晚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当夜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关于新任务的即席演说,其内容即不久后发表的《四月提纲》。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列宁的讲话写道:

列宁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在两小时时间里他说了许多东西……但其中缺少一点——这我记得很清楚并且非常值得注意,其中缺乏对俄国社会主义客观前提的分析、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不仅没有完整的经济纲领,而且连初具轮廓的纲领也没有。只有一个列宁后来多次重复的苗头:正是由于我国的落后,正是由于其生产力的薄弱,使它无法支撑战争所要求的其整个机体的这种极端的紧张状态,因此早于其他国家发生了革命。但这种落后性,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结构,这种缺乏组织性,这种虚弱,怎么能够离开欧洲同社会主义改造直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容,列宁对这一切都不置一词。在这种条件下代表国内微弱少数的工人和雇农苏维埃怎么能够违背多数的意志和利益而在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演讲者同样完全不置一词。最后,他的整个构想怎么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这是列宁在自己的讲演中唯一没有否定的东西)相容,也没有片言只语。这些涉及被叫作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列宁就像摧毁现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和策略那样完全熟视无睹。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①

普列汉诺夫以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为理由反对列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并就此同列宁展开论战。普列汉诺夫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指出:

^① Н.Н.Сунанов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2. М., Изд.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 1991. С.14—15.

远非在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例如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历史性灾难莫过于在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社会革命即生产方式的更换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有发展余地，还没有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是不应当去推翻它的，无产阶级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过早夺取政权将是最大的历史性灾难。

列宁当时没有就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挑战作出应对，实际上是高挂“免战牌”。但是他不能不承认普列汉诺夫说的真理。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在一个括弧里写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②长期以来，列宁在括弧中所说的这句话没有引起理论家们的注意。

话虽如此，但在有可能通过起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列宁首先考虑的不是这条真理，而是权力，是夺取政权，他要用起义创造出社会主义来！这是列宁作为政治家同作为理论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列宁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唯一论据就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中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那就可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书》中写道：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③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王荫庭、杨永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2—2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6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7页。

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夺取政权仅仅为继续和深入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作为社会革命,远远不是取得政权就能完成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俄国还有大量的民主革命任务有待完成,如土地问题,召开立宪会议问题。列宁的这一说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俄国二月革命后匆忙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国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迫不及待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提出的另一个辩护论据是,俄国一旦开始革命,欧洲先进国家会跟着爆发革命,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会来支援俄国,拯救俄国。这是从布尔什维克到托洛茨基的一贯主张。然而,历史发展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设想,欧洲并没有跟着俄国发生革命,虽然十月革命后苏俄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向西欧特别是德国输出革命,但都无功而返,到20年代初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世界革命遥遥无期,苏俄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支援。这时候,列宁又把希望转向东方。但东方革命也迟迟不来,中国大革命曾经给苏联人以很大的鼓舞,但是这场革命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下,遭到了失败,也没有能够给予苏联以支持。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是理论家同政治家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要求的是理论的一贯性和严整性,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防止过早的社会革命带来的不良后果。而列宁这时候作为政治家,眼睛盯着的是机遇给予的取得政权的机会,已经顾不上理论的严整性,他需要的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不可多得良机夺取政权,理论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虽然仓促,对下一步怎样走缺乏科学的规划,但政权是第一位的,先拿到政权再说。他在1923年初引拿破仑的话说:“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①这是列宁终身信奉的座右铭!一般说来,政治家往往是实用主义者,怎么做能达到目的就怎么做。例如列宁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国有化,认为国有化优于私有化、市有化和社会化。但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临到武装起义前夕,放弃了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借取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苏维埃政权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

到底怎样搞社会主义,列宁起初只想到两点:一、巴黎公社的措施。二、借用大战期间各国的战时措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于是出现了“军事共产主义”。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上就写上的,二月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2页。

后布尔什维克一直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然而一旦政权到手,看到自己未能在立宪会议上占多数,立宪会议不能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就悍然予以驱散。这种理论家同政治家的对峙,十多年后我们又在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对峙中看到。理论家照例是斗不过政治家的,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布哈林,失败是必然的。不过政治家可以取胜于一时,看似击败了理论家,但理论家的理论却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验证、证实。74年后苏联的解体说明普列汉诺夫当年所坚持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

斯大林没有参加这场争论,他缺乏理论功底去同普列汉诺夫争论。不过他在此前写的文章却是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一致的,不幸的是,后来又被他斯大林本人否定了。

1946年在《斯大林全集》出版的时候,斯大林特地写了《著者第一卷序言》,声明编入第一卷的著作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中“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

斯大林是很少认错的,这一次为什么突然谦虚起来,承认自己早期所犯的错误呢?

被斯大林认为陈旧的论点有二:一是土地纲领问题,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斯大林是这么说的:

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指出,这个论点“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是大家公认的”。^①

这个被斯大林否定的论点最早见于他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1907),此文表述得更为清楚: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②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4—285页。

如果说,斯大林这里讲的只是革命发生的条件,那么接下去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①

当然,斯大林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他本人研究得出的结论,他只不过是转述了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确实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列宁共同承认的理论。不仅如此,遭到斯大林严厉批判的托洛茨基也一直持这一观点。斯大林需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限,这就逼得斯大林不得不在自己的“前言”中声明这是错误的观点,需要予以修正。

斯大林怎么修正这个观点的呢?1946年写的《斯大林全集》序言中写道:

然而欧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列宁所发现的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一切都表明:这个论点已不适合新的发展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发展的最高点、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资本主义阵线却薄弱得能被无产阶级冲破的个别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②

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夺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确实说明,由于各种因素的凑合,不一定非得等到无产阶级占国内人口的多数时才能举行无产阶级革命,去夺取政权。但是,斯大林在否定这一论点的同时也抛弃了社会主义需要“足够发达的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他执政以后实践的基本着眼点是改变生产关系,凭借暴力,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去“建成”社会主义。

这样,我们在“不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到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可惜的是这个论点又被斯大林本人抛弃了。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8、31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10页。

列宁与斯大林不同,根据几年的执政教训,深切感觉到生产力欠缺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抛弃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论点,而是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来弥补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之不足,如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还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列宁就提出要搞“经济方面的政治”。1923年初,列宁更是明确提出: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①

他提出要搞“经济方面的政治”,着手制定全国电气化计划,提出搞“文化主义”,都是认识到社会主义需要物质前提。

列宁没有忘记1917年普列汉诺夫以及孟什维克对他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批评。五年的历史说明了在落后的俄国搞社会主义确实是困难的,他同意布哈林所说的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要进行建设则是困难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共执政5年,其中头3年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搞了一个“军事共产主义”,闹得全国农民起来造反。“军事共产主义”实验失败后,列宁开始重新审视俄国的现实。

19世纪末列宁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竭力论证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需要写作专著去论证其存在,这本身就说明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人们还不容易察觉。列宁做这番论证的目的是要证明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因而也就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然而,就总体而言,那时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某些发展,但还是个半农奴制的国家,是落后的农民国家,正因为如此,连沙皇体制内的人也在设法继续清除农奴制残余,因而有斯托雷平的改革。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十月武装起义,最初几年一般都叫作“十月政变”或者“转折”,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0月写的文章《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其俄文都是 октябрьский переворот,中文版《斯大林全集》译作“十月革命”,直译应是“十月转折”或“十月政变”(现在俄国某些历史学家用的就是这个词,都被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译作“十月政变”),只是后来才改称“十月革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不过不管如何称呼,重要的是实践中到处遇到俄国经济不发达这个无法逾越的问题。1919年3月,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了俄国的落后性:“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①这句话标志着列宁对俄国的国情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强调:“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②在推行新经济政策中,列宁公开号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③

1923年初列宁在《日记摘录》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还说,“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④

承认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实际上就是承认俄国缺乏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这个问题苦恼着列宁。1922年到1923年初,列宁回过来阅读抨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领袖的著作,特别是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经过五年的实践,问题又回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问题上来了。列宁认真思考了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第二国际考茨基等当年的批评,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是“无可争辩的论点”,承认了他们说的社会主义需要经济前提是“真理”。面对这些批评,列宁找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回应,这就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他写道: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9—22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6—357页。

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

从世界历史长河来看，这个方案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发展确实不是严格按照某种顺序进行的，其中会有偏离甚至背离，但总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可以偏离，可以改变发展的顺序，不过对社会主义来说有一条是必须始终坚守的，这就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坚定不移、千方百计地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所以列宁在最后时日提出搞“文化主义”，把工作重心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

这就是说，你可以暂时改变社会发展的顺序，但是你不能长期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必须把创造这个物质条件放在首位，补上这一课，否则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总的来说，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按照人为的设想来建立什么新的社会来的，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实验的失败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改变发展顺序只是历史给予的短时期的可能性，而不会允许长时间停留在落后的基础之上。执政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并记住这一点，牢牢记住本国物质条件不足，并且采取科学的合理的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物质条件不会因为你搞社会主义而自动到来。

然而，斯大林完全没有领会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否定了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的扛鼎之作《论列宁主义基础》根本不提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提新经济政策。《论列宁主义基础》共九章，分别是：1.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2.方法。3.理论。4.无产阶级专政。5.农民问题。6.民族问题。7.战略和策略。8.党。9.工作作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经济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最后一章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这里虽然提到了新经济政策，还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

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②

这里斯大林强调的还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新经济政策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即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斯大林那里是根本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2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52页。

存在的。斯大林笔下的列宁主义既然不包含经济建设的内容,这就一笔勾销了十月革命后五年的历史,特别是1921年以后的历史。

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这种“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并且认为: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①

斯大林总想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走捷径,抄小路。对斯大林来说,改变生产关系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手段就可以达到。1929年底开始的全盘集体化就是斯大林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小生产,消灭“富农”,消灭农民的运动。

他用行政手段取缔了私商,通过扫地出门、流放、枪毙消灭了“富农”,把农民剥夺干净之后赶进了集体农庄,这样国内不仅没有了剥削阶级,也没有了“时时刻刻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农民,于是斯大林就可以在两年大饥荒(1932—1933)后人们刚有饭吃的时候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它前有大规模饥荒,后有大规模镇压,绝对不是马克思预期的那种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社会主义,纯属乌托邦!

1988年邓小平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劝说他们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说:

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是可以参考的,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4页。

式解决。^①

这是从世界各国包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结论。不是社会主义不好,不是说某个国家无权搞社会主义,而是说搞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条件,脱离本国的条件,不顾本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无视国内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硬要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而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与其搞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如暂时不搞。邓小平的这一结论,可以说也对当年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随笔》2015年第2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流行说法与对马恩列的误读

——《共产主义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同胜利说”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到底表现在哪里,有时候说得并不那么准确。一个常常被举例作证的是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说法——列宁以“一国胜利论”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其根据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上的“同时发生”革命的说法,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关于“一国胜利”的说法。按照流行的说法,在列宁之前,也就是在1914年之前,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过各国革命同时胜利的主张,这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主张。这种说法始于20年代中叶的苏联,当时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一方援引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证明1914年以前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主张同时胜利论,是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一国胜利”的理论,为俄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而他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的继续。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确实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此文写于1847年,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宣言草稿,写成后恩格斯本人感到不满意,不久即和马克思一道重新起草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宣言》采纳了《原理》中的某些提法,但没有接受“同时胜利”的说法。在此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时发生”的提法。那么,恩格斯在《原理》中的说法是否影响了以后的社会民主党人呢?没有。理由很简单,恩格斯的《原理》一文当时并没有发表,文章的发表是恩格斯逝世以后的事。恩格斯逝世以后,其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于1913年在恩格斯的遗稿中发现此文并加上《共产主义原理》的标题予以发表,这就是说,恩格斯的《原理》一文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以及20世纪初并不为人所知,其中关于“同时发生”的说法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不会使这一时期流行一种“同时胜利论”。

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有过“同时发生”的提法:“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①不过,这部早于《原理》的著作当时同样没有发表(仅发表了第2卷第4章),马恩把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直到1932年联共(布)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才第一次以德文全文发表,1933年又用俄文出版。正因为如此,在20年代联共党内争论中谁也没有提到这部著作。由此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同时发生”的说法也不可能对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

当然问题还不仅仅在发表的时间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不仅表现在后人对前人的发展,也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从《共产党宣言》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同时发生”的说法,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这种表述。他们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顺序的大体看法不是“同时发生”,而是从一国开始,另一些国家继续,再由某一个国家来完成,也就是说,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一系列国家先后进行,然后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设想,起初曾指望英国开始,后来指望法国开始,然后其他国家跟上,最后由某一个国家完成。例如1892年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对欧洲革命进程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比如说在1894年,德国会立即跟上,接着法德两国无产阶级联盟将迫使英国行动起来,一举粉碎三国阴谋以及法俄阴谋。那时,对俄国的革命战争就要开始——即使俄国连一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

革命反响都没有——管他呢？”^①这里没有一点“同时发生”的影子！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人的观点是发展的，那就不应当不顾他的系统表述，而抓住其早期的某种说法不放，以片言只语来概括他对某一个问题的观点！何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这一问题的表述的真正含义也被简单化了。

在这一点上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1918年说过：“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②请看，连用语、表述方式都同马恩一模一样！

“同时胜利论”或者“共同胜利论”的说法是20世纪20年代联共(布)党内争论的产物，它既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实际，也同马恩有关著作发表的时间对不上，实有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嫌。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每篇文章或著作都交待写作和发表情况，通常放在文章的后面或题注中，不很起眼，但却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告诉我们该著作的写作背景和发表情况，写作的针对性以及所起的作用等等，这些资料也影响我们对作者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对此我们的读者、研究者不可掉以轻心！其实，不仅对经典著作，对其他人的作品也同样需要关注其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历史地看待这些著作。

《国家与革命》与十月革命

有一部电视理论片要我在片中讲一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问题并不大，我答应了。但开拍的时候，却要我讲列宁这部著作对十月革命所起的影响，说它从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云云。这就使我作难了。《国家与革命》当然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在列宁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它是否起过上述作用呢？值得怀疑。

我们知道，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8、9月份，当时列宁正被临时政府通缉，和季诺维也夫一起避难于拉兹利夫。有一幅给人印象很深的苏联油画：列宁坐在草棚外边的树墩上写作，写的正是《国家与革命》。从1916年底起列宁就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8卷，第5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9页。

写作这部著作进行准备,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有关论述,作了详细的笔记,并时时在有关言论旁写上批语。这就是著名的“蓝皮笔记本”——《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列宁在逃避临时政府追捕的时候,把这本笔记交给加米涅夫保存,交待如出现万一就请他设法出版,足见列宁对国家问题的重视。但是《国家与革命》一书却到1918年即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公开出版,在十月武装起义之前,恐怕没有人看到过列宁的这部著作。能看到或者知道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的估计最多也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同列宁一起避难的季诺维也夫,一个就是保存列宁笔记本的加米涅夫。不巧的是这两人并没有被列宁的思想武装起来,在十月革命前夕正是他俩反对武装起义!

1918年发表的著作,在十月革命前怎么能从思想上武装群众呢?这是想当然的。

实事求是地说,《国家与革命》一书表明列宁本人通过系统研究弄清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看清了他们在国家问题上思想发展的脉络,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列宁原来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并为此指责过布哈林。后来他看到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关于“炸毁”的提法,特意在旁边写道:“注意:‘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来代替它……’”^①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委托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转告布哈林,同他的分歧不存在了。

《北京日报》2003年12月15日

《博览群书》2003年第11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90页。

“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

“苏共中央的编译局?”

1970年3、4月间,中央文革给中央编译局发来文件,说由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收入“叛徒”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和注释,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即删去,并检查是否还存在类似情况。

问题的起因是,1970年初某领导干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人民出版社出的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收入了“叛徒”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序言,这是不能容忍的。该领导干部严词质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的编译局,还是苏共中央的编译局?”

1970年3月23日陈伯达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请宣传联络员负责通知人民出版社完全删去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并查看马恩列斯著作的单行本是否还有这类的事。在中国出版社和编译局出现这样的事,是不可容忍的。”

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遵照陈伯达的“指示”,编译局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各种单行本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好在除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再没有发现类似现象。

张仲实和他翻译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引发这起序言风波的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翻译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

此书的译者张仲实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家。他早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张闻天领导的翻译班从事马列主义教材的翻译工作。回国后一直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1940年赴延安,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主任,校订从英文版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在中央研究院任国际问题室主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干部必读》12种中他编译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简史》等书。1943—1946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等职,主管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1954年,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参与翻译出版三大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和《斯大林全集》的组织领导和审稿工作。张仲实历来主张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认为只有通过研究理解经典著作的内容和精神,才能翻译好原著而不走形。他常对编译局的同志说,毛泽东主张出版经典著作要写联系中国实际的序言,甚至说没有序言不准出版。

不过在中国确实没有人有能力、有胆量为经典著作做序。有关领导也都怕“佛头着粪”。这里说的当然是真正有内容、有思想见解,能够联系中国实际的序言,至于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上的前言,多半是一种主要内容的说明介绍和编辑工作的交代。

张仲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翻译出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等著作。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译的《费尔巴哈》第一版,这一版仅收恩格斯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张仲实找了几位年轻同志做助手,根据德文原文作了校订。或许是由于上述原因,鉴于自己写不了序言,就在书后附上普列汉诺夫写的序和注释,为研究提供一份珍贵资料。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12月出了附有普列汉诺夫序言和注释的第四版。这时候我国正在翻译出版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还没有人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著作。

1964年版的单行本在书末附录中收入普列汉诺夫为恩格斯此书俄译本所写的序言和注释,包括: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一版序言“译者的话”。

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注释。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一版的注释。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二版“译者序言”。

此外还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编者对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所作的注释。

普列汉诺夫何许人也

普列汉诺夫何许人也？现在的中青年人已经不很熟悉，但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和理论家对普列汉诺夫是非常熟悉的。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理论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张保卫祖国，俄国二月革命后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因而同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严重分歧，1918年因病去世。尽管如此，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甚高，尤其是他的哲学观点。

普列汉诺夫早年曾经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翻译成俄文，并在出版的时候为这些著作写了序言。例如：

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作序。

1885年为马克思的《论贸易自由的演说》作序。

1892年和1905年两次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了序言。

1902年为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第三版俄译本写序。

此外还为《恩格斯论俄国》一书写过序言。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于1888年问世，1892年普列汉诺夫把它译成俄文出版并写了序“译者的话”。他在俄译本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当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杰作的译本问世的时候，我想略为谈谈它对俄国读者的意义。”他指出，“我所推荐的这本小册子，是集了这两位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大成”。鉴于小册子写得非常简练，“我必须给他加上若干注释”。

这种既翻译,又写序作注,结合俄国的实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阐述的做法是非常好的做法。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是与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做法分不开的。一篇好的序言可以成为该著作的有机部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起到引导和解惑释疑的作用,甚至能够加深和发挥著作中某些观点。普列汉诺夫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巨大功绩。

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革命的策略和方针上确实有过分歧,但是列宁始终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认为这是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列宁尤其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中的作用。1914年6月列宁在给《劳动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说,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在同机会主义、伯恩斯坦、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斗争中做过巨大贡献的大理论家”。^①1918年春普列汉诺夫逝世前夕,列宁在审阅1914年11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新版的排样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重新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目,其中有不少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重要意义:

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列宁接着在注释中进一步写道:

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②

在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1922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议程表上,列宁在19项议程之后亲笔增加一项议程:“普列汉诺夫文集”。在这次会议上,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委托加米涅夫同志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48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92页。

捷尔任斯基同志商谈一下,将普列汉诺夫的革命著作编成一本文集出版。”^①

需要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为《费尔巴哈》写序言的时间是1892年(俄译本第一版)和1905年(俄译本第二版),普列汉诺夫这个时期的哲学著作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是第二版序,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批判了新康德主义和马赫、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哲学观点,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1908年问世的,可以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序言是其先声。

正是由于列宁的重视,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普列汉诺夫文集》,30年代出版了八卷本的《普列汉诺夫遗著》,1956—1958年出版了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70年代出版了三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1928年在列宁格勒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下开设“普列汉诺夫馆”,收集和研究有关普列汉诺夫的档案和资料。顺便说一下,该馆至今仍定期召开有关普列汉诺夫和俄国革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我就曾参加过他们召开的学术会议。

列宁说过: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家曾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写过序,做过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积累,需要了解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倒是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些序言和注释收集起来,附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著作单行本后面,对后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无裨益。顺便说一下,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普列汉诺夫遗嘱”虽属伪作,但其中提到的普列汉诺夫的若干观点倒确实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特别是他的《在祖国的一年》,对普列汉诺夫思想感兴趣的同志,与其看“遗嘱”,不如去读读他的原著。

列宁逝世后,普列汉诺夫在苏联的命运恶化。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并发表讲话,认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的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7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99页。

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他开出的批判名单中有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德波林等等。提出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这样，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出现一种全盘否定普列汉诺夫的倾向，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寻找“修正主义”和“形而上学”，否定他的著作在唯物主义史上的作用。

接力棒传到中国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普列汉诺夫是正面人物，在二三十年代，他的哲学和美学著作曾经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对中国的文艺理论产生过良好的影响。但是 20 世纪的 60 年代展开的中苏论战，也殃及了普列汉诺夫。那时为了寻找反面教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寻找“新老修正主义分子”，曾经同列宁有过分歧的普列汉诺夫就被打入“老修正主义分子”的行列，我国出的“灰皮书”中就有《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三联书店 1964 年版），他的《论战争》（三联书店 1962 年版）和《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 1980 年版）也被列入“灰皮书”。

“文革”是一个禁书焚书的时代，多少学术名著被查禁、遭焚毁，所以删除一个什么“修正主义分子”的序言和注释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风波最后不了了之——经清查，除了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其他经典著作单行本中并没有再见到他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写的序言和注释，想来除了普列汉诺夫，也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敢于给经典著作写序作注。只是对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来说倒确实是一件大事，一时搞得翻箱倒柜，人心惶惶，所谓“苏共中央编译局”云云，更给编译局的编译人员的头上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令经历此事的人至今难以释怀。

被贬低的俄国二月革命

我曾经说过,20世纪初有两场伟大的革命,一场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一场是俄国的二月革命,这两场革命,一个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个推翻了俄国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农奴制的统治,都是应当彪炳史册的。

不过长期以来,俄国二月革命被严重低估了,历来的史书,尤其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千方百计贬低二月革命的作用和意义。

人民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

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是人民对专制统治的自发反抗斗争的丰硕成果。二月革命的爆发,看似偶然,2月23日(公历3月8日)国际妇女节,由于首都彼得格勒面包短缺,妇女们上街抗议示威,由此引发了全市罢工,反对饥饿、反对战争,从而引发了二月革命。当时各政党顺应人民的要求,借用群众的力量,逼迫已经无力镇压革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这里起作用的政党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3月2日,尼古拉二世退位,传位给其弟米海伊尔,但后者不接受王位,俄国出现恩格斯所说的皇冠落地无人收拾的局面。罗曼诺夫王朝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这一事实也说明20世纪社会的进步。俄国历来是个谜,这里有残酷的三年国内战争,好像是一个暴力称霸的国家,然而历史上几次大社会变动却基本上和平解决,如二月革命,十月武装起义,苏联解体。这就像哲学家别尔嘉也夫所说的,“俄罗斯人天性很极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残酷无情。一方面

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

二月革命中的政党

立宪民主党是当时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其 1913 年通过的纲领确定：各族人民平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议会制，普选权，独立法庭，罢工权，把国有、教会等的土地无偿交给农民，立法保护劳动，普遍免费的义务初级教育等。它在逼迫沙皇退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第一届临时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也就是说是得到国际承认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有 80 万党员，孟什维克有 20 万。他们在群众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到 1917 年 4 月仅有 8 万人，它并不是像一些史书所说的领导了二月革命，那时列宁等党的领导人有的在国外，有的在流放地（如加米涅夫、斯大林），在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月革命初期采取的策略与列宁的设想不同。

变动中的临时政府

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照列宁的理论，民主革命有两种，一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从世界历史来看，是常态，符合规律。二月革命起初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第一届临时政府是由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等人主导。但第二届政府已经是联合政府，转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主导。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任总理、军事部长，政府成员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 7 人，立宪民主党 4 人，激进民主派 2 人，无党派 2 人。第三届联合政府中社会革命党 2 人，孟什维克 3 人，劳动派 1 人，“独立派”1 人，军事专家 2 人。

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和列宁一样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彼得堡大学是出领袖的大学，先后为俄国培养了克伦斯基、列宁、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等四位国家领导人！克伦斯基革命前为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作为律师曾在勒拿惨案中为受难者辩护。在二月革命期间追随社会革命党，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从第二届临时政府开始，连续担任政府总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依据传统理论,认为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自己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根据孟什维克的倡议成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多数,被视为第二个权力中心,因而有“两个政权”并存的说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利用苏维埃监督政府。其实布尔什维克中主张监督政府的也大有人在,如党的领袖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如果说政府组成还不能完全决定其性质,那么我们来看看政府执行的政策。

二月革命胜利,临时政府一成立,立即颁布法令,实施政治大赦,释放所有政治犯;宣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撤销出版事务委员会,取消书报检查;给刑事犯减刑;废除死刑和战地法庭;着手修改刑法、民法和诉讼程序;撤销保安厅,废除警察制度,建立民警;废除一切等级的、宗教的和民族的限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选举的基础上选举地方自治机关;准备在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由之决定国家管理的形式和宪法,等等。这些措施确实证明这是一个进行民主革命政府。临时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它符合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也符合司法部长克伦斯基的主张。

可以说,二月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全国实现了自由民主,公民获得自由民主的权利。列宁承认,当时的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也是这种自由的获益者。

列宁说过,俄国革命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也为革命政党提供自由活动和竞争的空间。二月革命实现了国家的自由民主化,正因为如此,列宁曾经提出的三个口号“自由、和平、面包”(起初没有提“土地”),后来根本不提“自由”口号了,因为布尔什维克不能做得更自由了。由于临时政府只存在八个月,又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之中,二月革命并没有能够使资本主义得到飞速发展,相反地,由于战乱,国民经济持续恶化。这也就是说,俄国本来就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二月革命后物质条件的缺失变本加厉。不过二月革命让俄国成为最自由的国家,这一点是可以彪炳史册的。

立宪民主党本来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这是它的基本纲领。1917年3月2日其领袖米留可夫还坚持这一主张,但沙皇退位,使这一主张落空了,3月底其代表大会表示赞同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从第一届政府开始,都把政府叫作“临时”政府,为

的是等待立宪会议的批准,使政府具有合法性。召开立宪会议是当时各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共同目标。9月1日俄国宣布为共和国。

临时政府的基本措施

对外政策中的关键问题是对待尚在进行的战争的态度。临时政府主张革命的护国主义,即仅限于自卫而不进攻。不过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后来发照会,表示要同协约国一道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因而引发第一次政治危机,导致第一届临时政府倒台。临时政府表示愿意同德国举行公正民主的和平谈判,但是并没有取得进展。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政府答应对生活必需品实施固定价格,降低国务开支,实现社会和平和社会改革,要求保持现有的土地关系,留待立宪会议作最后决定。

经济领域,实行国家调节。二月革命是粮食供应问题触发的。革命胜利后粮食问题依然存在,为应对粮食供应困难,实施国家垄断粮食买卖、粮食征收制,城市实行面包、糖、肉、粮食配给。顺便说一下,临时政府和后来苏维埃政权实施的都是“粮食征收制”,俄文均为 *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是由“粮食”和“征收”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列宁全集》译作“余粮收集制”,但临时政府实施的 *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 是绝对不能译作“余粮收集制”的。因此,我认为此词统一译作“粮食征收制”较为妥当。实际上,最早实施此政策的也不是临时政府,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沙皇政府。

二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都被第二国际承认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直到191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共处于一个党内,而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1912年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为独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党的名称后面加上一个“布尔什维克”字样,以区别于孟什维克,因此就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孟什维克则继续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

按照列宁的说法,之所以需要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前提。也就是说,让资本主义成熟起来,经济发展起来,自由民主制度发展起来,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这需要一个历史时代,决

不是从二月到十月这短短八个月所能够实现的。列宁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由,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权问题已经解决,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说法缺乏理论支持。政权更迭和社会形态更替不是一回事,政权的更迭并不一定是社会形态的更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临时政府取代沙皇政府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但不是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一直处于模糊不定的状态,直到列宁回国提出“四月提纲”才有了较为明确的行动纲领,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即使如此,党内还是存在不同的意见。二月革命后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在政局中的作用并不大,不过它在工人和士兵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争取到大量激进工人和士兵的支持。激进派的激进主张得到欢迎,这是革命热潮中常有的现象。7月,它发动了士兵和工人举行武装示威游行。这一动作即使不是夺取政权的尝试,也是一次“火力侦察”,但以失败告终,加上社会上流传布尔什维克领取德国金钱的流言,布尔什维克的声誉遭到严重打击。布尔什维克党虽然还能够公开活动,但部分领导人如加米涅夫和与布尔什维克紧密合作的托洛茨基被捕入狱,另一些领导人列宁、季诺维也夫等转入地下。

8月25日,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企图建立军事专政,恢复帝制。软弱无力的临时政府求助于布尔什维克,在左翼党派的支持下,仅3天政变被挫败,这给布尔什维克崛起提供了大好转机。科尔尼洛夫叛乱同苏联末期“819叛乱”极其相似,都想恢复旧制度,结果事与愿违,前者促使激进派布尔什维克上台,导致临时政府倒台,后者促使激进派叶利钦上台,导致苏联崩溃。这充分说明反动、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在挫败科尔尼洛夫政变中,布尔什维克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走出了困境,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赢得多数。托洛茨基当选为苏维埃主席,他在苏维埃下成立了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列宁也于10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月24日夜走出地下,来到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在他们的领导下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八个月能做些什么

临时政府一共存在八个月,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这是战乱的八个月,很难做得更多了。可以对比一下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八个月的作为。

临时政府实施的一些重要政策被苏维埃政权接受过来了,如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食品配给制、劳动义务制等,面对困难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是给这些措施披上“共产主义”的外衣——“粮食征收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以专政的暴力手段强制执行而已。

当然,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有自己的东西,它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查封几百家报刊,恢复了被临时政府取消的书报检查。第二件事是解散立宪会议。召开立宪会议是临时政府的主张,布尔什维克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召开立宪会议,不断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夺权后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在立宪会议上处于少数,就干脆予以驱散了事。第三件大事是同德国缔结割地赔款的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临时政府曾经提出缔结民主和约的主张,但没有能够做到,布尔什维克同样没有能够做到,只能签订一个屈辱的和约,此举不仅受到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也遭到党内“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顽强反对,由此可见和谈之不易。第四件事是实行银行、大企业的国有化,这是临时政府没有做的,也是唯一一项与社会主义沾边的措施。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4月14日

末代沙皇的退位及其遇害

20世纪初,接连发生了两起震撼世界的大事,这就是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这两起革命有不少共同点,最主要的是它们都是推翻封建专制王朝的革命,都以皇帝和平退位来实现。这两个特点显示,世界进入20世纪,再保持封建王朝、保持专制独裁制度已经不可能,这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沙皇专制制度的危机

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已经存在几百年,到19世纪中叶,其农奴制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试图以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为此他还在地方自治制、司法、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大量改革。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改革的进程中断。1894年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在此前后,列宁所说的俄国第三代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登场,俄国舞台上展开了新的博弈。

进入20世纪,工人运动、农民暴动风起云涌。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革命,震撼了专制统治的基础。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考虑向君主立宪制过渡。1905年10月17日(俄历)尼古拉签署了由维特起草的宣言,答应施行“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国家杜马改为立法机关,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何法律一律无效,吸收各阶层居民参加选举。这样,俄国开始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尽管杜马的选举是不平等的,但是杜马并不是由清一色的保皇党人组成,例如1906年选举的结果,杜马的代表中既有立宪民主党人,

也有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为消除农奴制的残余,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障碍,沙皇政府实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其目标是破坏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扫道路,加速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一项改革,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斯托雷平本人于1911年遇刺身亡。暗杀又一次中断了一系列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改革进程。

1914年沙俄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俄国丧失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国内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沙皇夫妇重用宠臣拉斯普廷,任命亲德派斯提尤尔美尔为大臣会议主席。这引起朝野和盟国的不安。1916年11月,米留可夫就在杜马会议上公开谴责沙皇政府背叛民族利益,暗示这条背叛的线索一直拉到皇后。沙皇被迫改任特列波夫为大臣会议主席。年底拉斯普廷被谋杀。

但是除去一个拉斯普廷并不能消除沙皇面临的危机。上层有识之士曾经多次向沙皇发出革命临近的警告。1916年12月3日,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建议尽快立宪,哪怕是成立一个得到杜马支持的政府也好。12月底亚历山大·米海伊洛维奇大公警告说,预计革命不会晚于1917年春。1917年2月10日杜马主席罗将柯向沙皇报告说,由于革命临近,这次觐见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将发生革命,出现谁也制止不了的无政府状态”。

1917年初,沙皇政府密探的报告更是详细描绘了社会政治秩序所面临的威胁:工人在工厂内外举行集会,抱怨物价飞涨、面包短缺,抱怨战争,抱怨缺少一个民主政府,他们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提供面包;各党派团体散发颠覆性的小册子和传单;民众高举红旗举行示威游行;袭击警察和哥萨克的行动此起彼伏;抢劫商店,特别是食品店;工人手中出现枪支和其他武器。他们还报告了大量的行凶、抢劫、自杀和纵火事件,等等。

1917年2月22日,沙皇离开皇村去位于莫吉廖夫的总参谋部。此前,一些大公、地方贵族、杜马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代表曾来到皇宫觐见,设法让尼古拉相信,再不进行政治改革,革命马上就会爆发。甚至军队代参谋长瓦·古尔科将军也警告沙皇:“陛下,您在有意为您自己准备绞刑架。请不要忘记那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

就在22日这一天,彼得格勒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被关闭,使36000名工人衣食无着。普梯洛夫工人以及全市其他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反对物价飞涨。

二月革命和沙皇退位

当时由于大雪铁路运输遭阻,彼得格勒市民不得不排长队购买面包。2月23日(公历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女工上街示威游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天竟成为俄国二月革命的起点,也成为国际妇女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天。托洛茨基写道:在头一天,没有一个人的脑子里曾想到国际妇女节会成为革命的第一天。各团体中没有一个人曾号召在这一天举行罢工。是纺织女工克服了自己革命组织的反对,主动地掌握了发动权,那越拖越长的购买面包的队伍,成了最后一个推动力。妇女的行动得到广大工人的支持,大学生也走上街头,这一天有约十万人走上抗议的行列,占彼得格勒全体工人的三分之一。游行的口号也迅速从“要面包”发展到“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

起初,尼古拉二世大大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警察和军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平息首都的骚乱。2月25日下午9点左右,尼古拉二世致电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我命令你明天必须停止首都的骚乱。”一小时以后,哈巴洛夫在指挥官会议上命令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来驱散人群,包括向示威者开枪。次日,他发布公告,禁止示威游行,声称将以武力实施此禁令。

25日晚上,内阁(即大臣会议)得知沙皇下令以武力恢复秩序,表示不同意沙皇的做法,认为结束骚乱的唯一办法是与杜马协商成立新内阁,决定推选两名代表去与杜马谈判。

2月26日军警奉命向示威人群开枪,导致多人伤亡。沙皇和内阁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了,尼古拉二世接受内阁建议,宣布解散杜马。然而杜马主席罗将柯于2月26日致电尼古拉,坚持认为“国家权力机构已全部瘫痪,根本无力重新恢复秩序”。

2月27日,经过一夜的思考,原先向示威队伍开枪的士兵决定倒戈,加入游行队伍。工人与士兵一起夺取军火库,解放监狱中的革命者和普通罪犯,占领警察局并纵火焚烧。市政府陷入瘫痪。

沙皇还想借武力恢复秩序,但整个政府已陷入惊慌失措,要求他作出让步。军事指挥官也开始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要求让步。2月27日午后,西南战线司令谢·布鲁西洛夫将军和北方战线司令尼·鲁兹斯基致电尼古拉二世,要求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内阁,避免以镇压手段加剧局势的恶化。与此同时,杜马主席罗将柯致电尼古拉二世,要求收回解散杜马的诏令,电文最后说:“决定您和祖国命运

的时刻已经到了,明天可能就太晚了。”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也开始反对尼古拉二世,加入恳请沙皇让步的大合唱。深夜 11 点左右,内阁首相尼·格利岑致电尼古拉二世,提出内阁全体辞职。由于害怕发生不测,未等沙皇答复,大臣们就纷纷躲藏起来。次日凌晨 2 点 20 分,国务会议成员致电尼古拉二世,提出政治折中的建议,要求组织“一个能够完全按人民代表制要求管理国家的新内阁”,他们警告说:“每一小时都很宝贵。再拖延下去或犹豫不决会造成无法预测的灾难。”但尼古拉二世仍坚持捍卫他的专制制度。

这时彼得格勒出现两个组织:一个是由三分之一杜马代表成立的“恢复首都秩序和与公开组织及机构建立关系的杜马成员临时委员会”,简称“杜马临时委员会”,一个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了新部长,并于 3 月 2 日正式称作“临时政府”。然而能够控制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过其领导人并不想亲自掌握国家政权,它只想迫使资产阶级接过政权,实行广泛的民主改革,如用共和国取代君主制,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选举立宪会议,等等。

2 月 28 日,尼古拉二世离开莫吉廖夫的大本营,打算返回皇村。但路途遇阻,改道去普斯科夫。3 月 1 日晚上,沙皇与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会见时表示,准许罗将柯组织一个新政府,但坚持各部大臣仍须向他负责,而不是向杜马负责。晚上 10 点 20 分,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给尼古拉发来一份电报,告知革命在蔓延,并附上一份在总参谋部起草的宣言稿,建议成立一个全国信任的政府,以罗将柯为首的向杜马负责的内阁。尼古拉二世准备让步了,签署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宣言。但局势的发展又把尼古拉二世的让步抛在了后面。3 月 2 日凌晨,鲁兹斯基与彼得格勒的罗将柯通过直线电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对话。鲁兹斯基向罗将柯通报了沙皇所作的让步,但罗将柯对他说:“一次最可怕的革命开始了”,您所提出的建议已不足以解决问题,“王朝问题已迫在眉睫”,“人们对王朝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军队到处都站到了杜马和人民一边,皇上让位给儿子,并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摄政这一可怕的要求已确定无疑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接到了这次谈话的电报副本,并把它转发给前线的每一个司令官,要求他们把自己的意见电告沙皇。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军队司令部的哗变。上午 10 点,鲁兹斯基把同罗将柯谈话的记录读给尼古拉二世听。尼古拉二世听完后说:“如果为了俄国的利益我让位是必要的话,我准备这样做。”这时候,各地答复阿列克谢耶夫电报的回电也到了,几

乎所有的司令都赞成皇上让位。将领们的意见是尼古拉二世所无法抗拒的。他给总参谋部和罗将柯发去电报,表示同意让位给儿子。他请求总参谋部的阿列克谢耶夫安排起草退位诏书。

3月2日傍晚,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两名特使来到普斯科夫,他们是亚·古契柯夫和瓦·舒尔金,任务是劝说沙皇让位给儿子,并由米哈伊尔摄政。然而他们不知道,此前沙皇已经从医生处得知,皇子阿列克谢的血友病无法治愈,所以决定把皇位让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尼古拉在3月2日日记中写道:“为了挽救俄国和保持前线军队的安定,需要我退位……”不过,尼古拉二世直接把皇位转让给米哈伊尔是不合法的。按程序,尼古拉二世只能传位给儿子阿列克谢,这时阿列克谢尚未成年,无权放弃王位。而米哈伊尔由于和一位平民(即离过婚的女人)结婚,已被迫宣布放弃王位继承权。然而这时候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经过商谈,尼古拉二世在退位诏书上用铅笔签了字,其中写道:

在俄国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日子里,我认为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是使我们的人民紧密团结并团结人民的全部力量以加快取得胜利。我同意国家杜马的请求,从俄罗斯国家皇位上退位并交出最高权力。我不愿与我亲爱的儿子分离,故由我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继位,并祝福他登上俄罗斯国家皇位。我嘱托我的弟弟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遵守将由他们确立的原则,并就此宣誓绝不违背。

尼古拉二世是在3月2日夜11点40分签字的,但诏书上把签字时间写作3月2日下午3点,以显示不是在杜马代表的逼迫下退位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3月3日,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开会就君主制的去留展开辩论。只有米留可夫一人主张保留帝制。克伦斯基激烈反对说:只要保留君主制就会引发进一步的骚乱。

米哈伊尔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整个杜马临时委员会以至大多数其他大公都反对他当皇帝。新任内阁首相李沃夫公爵、克伦斯基等都向米哈伊尔表示,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米哈伊尔拒绝继承王位,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接受王位,因为……”他没有说下去,他哭了。他于3月3日晚6点签署了放弃王位的声明。声明写道:

我请求俄罗斯帝国所有公民服从在国家杜马提议下产生的、拥有全权的

临时政府,直到在最短时间里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基础上产生的立宪会议做出表达民意的管理方式的决定。

这样,我们看到俄国出现皇冠落地而无人拾起的场景,应了恩格斯老人的预言。1887年12月,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的世界大战时预言,战争的结果将是“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诚哉斯言!

3月2日晚上,临时政府成立,其主要成员为部长会议主席兼内务部长李沃夫公爵,外交部长米留可夫,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司法部长克伦斯基,等等。除克伦斯基为社会革命党人外,其余都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根据苏维埃同杜马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临时政府的工作需遵循以下原则: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

至此,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正式结束,俄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二月革命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运动是自发的,彼得格勒的群众革命运动推动杜马和政府中的自由派,同时也直接影响军方的高级领导层,自由派和军方将领又对沙皇直接施加压力,逼迫他退位。正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掀起的反对专制独裁的运动迫使整个统治阶层认识到不能再维持专制制度的统治了,俄国应当顺应世界潮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俄国的专制制度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是人们所料想不到的,这也说明了时代的进步,历史毕竟进入了20世纪!这是俄国人民自己争取得来的胜利,不是皇上的赐予,也不是哪个政党团体英明领导的结果。

这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它同中国的辛亥革命遥相呼应,汇成了东方20世纪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以二月革命为开端的俄国民主革命虽然是短命的,仅仅存在八个月,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1917年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由于是让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还认为他的罗曼诺夫王朝会长存下去,所以并没有提出退位的条件问题。而米哈伊尔拒绝接受王位时,也没有考虑到以后的地位问题。所以整个皇室的命运一直是同俄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流放英国未果

临时政府中的自由派人士，本来倾向于把退位后的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庭成员作为公民来对待，首先关注的是他们的人身安全。政府中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表示，他不想充当“俄国革命的马拉”，即从自由滑向断头台。他想在对待尼古拉的态度上表现出人道的精神：“我要让他知道革命对敌人是宽宏大量的，人道的，不仅在口头上这样讲，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处在革命热潮之中的广大民众以及代表他们意志的苏维埃却有不同的想法，要求立即逮捕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

3月7日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向莫斯科苏维埃发表讲话说：尼古拉二世已经向新政府提出保护的要求。克伦斯基说：俄国革命开始了，没有流一滴血，我将不允许再发生任何流血事件。我决不会成为俄国革命的马拉。他还通报说，尼古拉二世将在最短时间内，在我亲自监督下，被送到港口，从那里离开，乘船前往英国。

克伦斯基的讲话表明，临时政府已决定将尼古拉一家流放到英国去。这是当时各界的共同选择：彼得格勒苏维埃也建议流放王室一家，尼古拉也有意去英国，只是要求战争结束后让他们返回俄国，定居克里木一里瓦吉亚。英国乔治国王是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两人的堂兄。英国政府表示同意尼古拉一家在战争期间去英国居住，但要俄国政府担负其一切费用。

彼得格勒公众听到尼古拉一家要去英国的消息后，掀起了强烈抗议的风暴，苏维埃因之改变主意，3月9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会，决定逮捕他，把他关进彼得堡罗要塞。英国政府权衡了得失利弊，也作出撤回同意接受尼古拉的决定。

3月8日，当局向前皇后亚历山德拉宣布她已被捕，并宣布了她和她的全家被监禁的条件。皇室的随从可以自己决定去留，愿留者将同样被视为在押犯人。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居住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宫，信件须经检查，禁止打电话（后改为可在卫兵的房间打电话，但只能讲俄语），等等。3月9日上午，尼古拉回到皇村，也随即被拘禁。这些禁令的执行时紧时松，皇室在一段时间里就在这里过着安静乏味的单调生活。

流放乌拉尔的托博尔斯克

但是外面的世界并不平静，公众对传闻的皇室得到优待的消息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要求严惩人民最凶恶的敌人。5月20日俄罗斯号巡洋舰水兵全体会议通

过决议,要求“将嗜血鬼尼古拉及其亲信送到喀琅施塔得关押”。5月30日尼古拉耶夫斯基海军营的士兵要求将尼古拉及其全家送交彼得保罗要塞关押。为皇室的安全,临时政府决定把他们转移到乌拉尔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去。7月11日,克伦斯基去皇村向前沙皇及其全家宣布将之转移到南方,去里瓦吉亚,因为首都不安全,皇村离首都又太近。实际上,当时已经安排好把他们送往乌拉尔的托博尔斯克。

托博尔斯克不在铁路线上,是穷乡僻壤。那里是一个地区行政管理中心,有一幢省督的住宅,适合前沙皇全家居住。而把前沙皇押送到西伯利亚去又可以使许多人感到这是一种正义的惩罚,当年沙皇就是把许多革命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的。

1917年8月1日,尼古拉全家离开皇村,在300多人的武装卫队押送下登上向西伯利亚的火车,有39名朝臣、侍从和仆人同行。他们乘坐的是舒适的卧铺,并有一节餐车。列车外面有红十字标记,并挂有一面日本国旗。车到秋明后,尼古拉一行改乘两艘船,从图拉河驶往托博尔河,于8月6日到达托博尔斯克。皇室一家被安顿在省督的住宅里。在这里尼古拉全家像过去的犯人一样拍了正面照和侧面照,并戴上身份牌。不过沙皇一家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舒适的。克伦斯基曾经指示过:“不要忘记这是前沙皇。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不应受到任何怠慢。”尼古拉及其家人甚至可以到附近的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仆人和随从可以自由出入城区,皇室成员可以同士兵聊天和下棋。让他们苦恼的倒是终日无所事事。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一段时间托博尔斯克处于革命热潮之外,老的市议会继续掌管这座城市,皇室一家仍由临时政府任命的委员会负责看守。11月下旬,当地第二步枪团成立了士兵苏维埃,他们要求对沙皇一家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1918年1月,他们自行解除了临时政府任命的看管皇室一家的两位领导人潘克拉托夫和尼科尔斯基的职务。皇室一家的待遇开始恶化。新历2月27日,卫队长科贝林斯基接到通知,尼古拉及其一家必须“按士兵标准供应”。为应对这一决定,尼古拉解雇了10名仆人,并规定餐桌上不吃黄油和咖啡之类的“奢侈品”。

使皇室不安的是1918年春位于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与位于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内部爆发的一场争夺对托博尔斯克和前沙皇全家的控制权的斗争。4月初选举出新的托博尔斯克苏维埃,其第一项决定就是将尼古拉送进监狱监禁。但遭到卫兵的拒绝,他们认为,这是国家大事,不能由当地政府决定。

还有一件令卫队担心的事,这就是当时流传的营救皇室的密谋。密谋是存在的,曾有过多起。

转送叶卡捷琳堡

沙皇的命运是同苏维埃政权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春,苏俄同德国的和谈处于僵持状态,2月下旬德奥军队向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2月21日人民委员会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此前(20日),人民委员会曾要求做好审判尼古拉的准备。2月23日,《真理报》发表文章,要求对沙皇采取“极端措施”：“必须将罗曼诺夫转移到安全地点。必须剥夺他与任何人自由接触的权利。必须将他关进监狱并立即进行审判。”

由于担心有人要营救,有人要劫持尼古拉一家,莫斯科于4月6日决定将皇室转移,并派遣瓦·雅柯夫列夫前往托博尔斯克执行,他的任务就是“把尼古拉活着押送到叶卡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的指示)。被押往叶卡捷琳堡的共三人: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女儿玛利亚。

4月30日他们乘火车抵达叶卡捷琳堡,住入一所从一名富商手中征收的伊帕季耶夫楼。皇室的其他成员和随从也于5月下旬被押送到叶卡捷琳堡。当局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前沙皇一家被营救出去。为此在住宅外面修筑了高墙,并派来契卡的一个班来守卫。住所布满卫兵,甚至卫生间旁边也站着卫兵。皇室人员受到严格监视,到达叶卡捷琳堡的时候,所有物品都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准自己保存钱币,用钱需特别申请。照相设备被没收,因为它们可能被用来提供情报。窗户被封死,唯一的一扇可打开的窗户加上了铁栏杆。严格限制在院子里散步的时间。禁止卫兵同犯人交谈。饮食也变得简单了,只有黑面包、茶、汤、炖肉、面条和肉饼。这一切显示沙皇一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囚徒。

乌拉尔不仅是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的堡垒,也是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后者一直要求逮捕前沙皇一家,把沙皇交给他们惩处,处决沙皇。保皇党人也一直在设法营救沙皇一家。为加强警卫,7月4日,乌拉尔地区副司法委员、叶卡捷琳堡安全部门负责人尤罗夫斯基被任命为伊帕季耶夫楼的卫队长。他整顿了卫队的纪律,采取了许多安全措施。

1918年春夏,布尔什维克党开始考虑如何处置尼古拉的问题,5月讨论了审判

尼古拉的计划。托洛茨基说,6月末或7月初他曾建议,鉴于乌拉尔局势不稳,苏维埃政府应立即行动,公开审判尼古拉,以揭露他在整个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审判通过电台向全国转播。列宁赞同公审的想法,但担心时间不够,有大量的其他迫切的事情要做。

沙皇一家遭处决

1918年5月捷克兵团发动叛乱。6月,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叶卡捷琳堡处于危险状态,前沙皇有落入反革命手中的危险。1918年6月末7月初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戈洛晓金曾赴莫斯科与中央领导商讨乌拉尔的军事局势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处置尼古拉的问题。

7月16—17日夜,尼古拉一家被从楼上转移到一间地下室里,卫队长尤罗夫斯基宣布,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枪毙他们。尼古拉还没有反应过来,枪手们立即朝他们开枪。被处死的共11人:尼古拉夫妇,他们的4个女儿和1个未成年的儿子。此外还有博特金医生,两个仆人和一位厨师。

起初打算把尸体掩埋在废弃的矿井里,但都不太成功,最后埋在了一条马路下,尸体经过焚烧和硫酸毁容。

7月17日2时列宁收到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电报,说“尼古拉·罗曼诺夫于7月16日夜根据[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的法令已被处决。他的家人已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同日21时,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别洛博罗多夫致电人民委员会秘书戈尔布诺夫称,“请转告斯维尔德洛夫,全家的命运与家长同,正式的说法为全家在撤退时死亡。”7月18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确认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决定是正确的”。

枪毙尼古拉一家到底有没有中央的命令或指示,迄今没有文件可证。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中曾经引述别洛博罗多夫的如下说法:

“杀死沙皇是斯大林的主意。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将王室安置在叶卡捷琳堡,而斯大林怕的是,只要尼古拉二世还活着,他就会引起白卫军之流的注意。1918年7月12日,斯大林已经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好了。7月14日,他使戈洛晓金参与他的计划。7月15日,戈洛晓金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意图给负责看守王室的政治委员别洛博罗多夫一封密电。7月16日,别洛博罗多夫给莫斯科发

一个电报说,叶卡捷琳堡在三天内将要陷落。戈洛晓金去见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将别洛博罗多夫的报告放进口袋内,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沙皇落到白卫军手里。’这句话等于是死刑的判决。”^①

1935年4月9日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叶卡捷琳堡失守之后他回到莫斯科,曾问过斯维尔德洛夫:“沙皇在哪里?”斯回答说:沙皇及其全家都被枪毙了。这是“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列宁]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尤其是在目前这艰难的条件下”。

有历史学家认为,托洛茨基的说法是无可置疑的确证。但这只是间接的证词。

不过按理说,如此大事,在存在电报这种快捷的通讯工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不会不请示中央而擅自行事的。何况那时离叶卡捷琳堡失守的7月25日还有几天时间。

平 反

1991年前沙皇一家的遗骸被发现(阿列克谢和玛利亚的遗骸是2007年发现的)。1998年7月17日遗骸被迁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在迁葬仪式上叶利钦总统发表讲话说:

“今天是俄国历史性的一天。自从杀害俄国最后一位皇帝及其全家以来已经过去80年了。我们多年避而不谈这一可怕的罪行,但应当说出真相:叶卡捷琳堡的镇压是我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们安葬被无辜杀害者,是为自己的祖先赎罪。……安葬叶卡捷琳堡悲剧死难者的遗骸,这首先是彰显人类正义的行为。……不管属于何种政治观点、宗教和种族,我们要用忏悔与和解来结束对俄国来说那血腥和无法无天的世纪。”

2000年,俄国东正教会尊沙皇一家成员为殉教圣徒。

2008年10月1日,俄联邦最高法院主席团认定尼古拉及其全家是政治镇压的牺牲者并予以平反。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月1日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7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无需改译

最近，拜读了高放先生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可否改译》（载《北京日报》3月17日以下简称“高文”），文中提议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我认为，这句世界性的历史口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译文上都改不得。理由很简单，译文本身是准确无误的，而这一改动，其含义就变得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了。

“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含义是不同的， 《宣言》中所说的只是“无产者”

高文提出“无产者”改译“劳动者”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无产者’与‘劳动者’基本上是同义语”。但实际上，“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含义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宣言》中，强调的是“无产者”，而不是“劳动者”。无产者是劳动者的一种，但劳动者并非只有无产者。在人类社会中劳动者是一直有的，原始社会不用说，奴隶社会有劳动者奴隶，封建社会有劳动者农民，但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宣言》号召联合起来的人。这一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得很清楚，“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世纪下半叶发生在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出现于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开始得到发展壮大。所以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或者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①那时候有些概念恐怕还容易混淆，《宣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0页。

不嫌麻烦地对有关名词加了说明,例如:“它(资产阶级)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①

无产者是与资产者一道登上现代社会的舞台的。《共产党宣言》用整整一章来论述资产者和无产者。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专门加了一个注说:“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②这个定义把所有其他劳动者,如农民、手工业者排除在外了。在《宣言》里,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③“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④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旦降到无产阶级的队伍来之后,也就变成无产者,成为雇佣劳动阶级中的一员,而不再是农民或者手工业者了。

《宣言》号召联合的对象只是“无产者”,而不包括其他劳动者

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者看作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是它们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靠单个的力量是不行的,资本是国际力量,因此宣言号召他们联合起来,这样才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他们这里号召联合的对象只是无产者,而不包括其他劳动者。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⑤可以把这里的无产阶级替换为“劳动者阶级”吗?显然是不行的。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不是一般劳动者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一旦去掉“无产者”或者“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整个《宣言》就无立足之地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3页。

因为资产阶级失去了它的对立面。

1864年马克思用英文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因为是工人协会，所以较多用工人阶级这个名词，而少用无产阶级。章程谈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劳动的解放”。确实，这里是把“工人阶级”和“劳动”等同起来的，但是这里的“劳动”不是指一般的劳动，而是指“雇佣劳动”，因此这里说的是雇佣劳动的解放，正因为如此，在德文版中“劳动的解放”一语用的是更为明确的“工人阶级的解放”。^①

讲了基本概念之后，可以来谈谈翻译问题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翻译是准确的。这个口号的德文是：Proletarien aller Lander, vereinnigt euch! 德语 Proletarien 只能译作“无产者”，没有别的含义和译法。恩格斯认可的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中的“工人”毫无疑问指的是“现代工人”，即无产者。由于《宣言》对这个概念界定得很清楚，不会发生疑义。

至于“全世界”一语的翻译同样是准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要强调的恰恰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共性，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他们之间的民族属性或利益的差别，共性才是联合的基础！

“《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高文提出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译文的修改问题（因为译文本身是正确的），而是对《宣言》的基本内容进行修改的问题。

那么，《宣言》的内容是否全都正确？《宣言》可不可以修改？回答是肯定的，其中一些过时的不适应新的条件要求的原理、公式、口号，可以也应该予以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对《宣言》的以后的各种版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序言，加了许多注释，指出哪些提法、主张不准确，哪些已经过时，需要修改。顺便说一下，在纪念《宣言》发表160周年的时候，非常希望学者们来继续马恩的这项工作，结合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好好研究一下《宣言》提出的各项原理和主张，看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已经过时，这对我们的事业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过马克思恩格斯有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9页。

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1873年德文版序言所说的:“《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①也就是说,宣言的正文,不管是对是错,不能修改,就是原作者也无权修改。这是对历史文献的科学严谨的态度,是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是非常值得效法的。

而高文提出的修改或重译的理由,概括起来就是要使《宣言》中的这个口号适应当前的需要,让口号“与时俱进”。但是要这样做,办法不应是改译口号,或者修改口号本身,而是另提口号。可以举一个例子,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蓬勃兴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显然已经不够,需要扩大联合的对象。1920年9月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它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保持了连续性,但不是对这一口号的修改,而是另行构思一个新的口号,加进了新的内容。

《北京日报》2008年4月21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9页。

也谈《共产党宣言》原文第一句怎样翻译

《共产党宣言》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开始,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写得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仅仅这一头一尾的两句话就不断引起译界的争论,其最后一句话的译法现在还在争论之中。

不久前王学东同志的《〈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的几种译法》,介绍了这句话各种翻译方案,很有意思。经典就是经典,译文要准确传达原意殊为不易,多少精通外文的专家,对这么一句话出现这么多的不同译法,翻译真是一桩需要呕心沥血的苦差事!就这第一句话的翻译而论,它是否就准确无误,尽善尽美了呢?依鄙人看来,也未必!

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 *Gespenst*,一个是 *umgehen*,前者出现多种译法:怪物,魔怪、巨影,怪影,幽灵,等等。后者也有多种译法:徘徊,游荡,踟蹰。

中央编译局的最后定稿的译文是: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幽灵”,这个译法问题不大,在统治者的心目中,这是感觉得到却摸不着的可怕“存在”,很好地表现了各国统治者惶惶不安的恐惧心态,与此同时,也表现出共产主义被妖魔化的事实。怎么妖魔化,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当时的报刊了,不过从宣言对某些言论的驳斥可见一斑:消灭个性和自由,共产共妻,消灭家庭,消灭私产,不要祖国,废除宗教,不要道德,等等。在统治者看来,当时的欧洲确实出现了一个“妖魔”,共产主义的妖魔!妖魔化的结果是都用“共产”这个名称来骂自己的对手、敌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给对方戴“红帽子”,这种状况迫使统治者们联合起来,所以相应地,《宣言》最后要无产者也联合起来。“妖魔化”是现在大家都理解的

常用术语,所以如果把“幽灵”换成“妖魔”也颇贴切。

不好翻译的是后一个词 umgehen。这个词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德汉词典》的释义是:(谣言、流感)流行,流传;(幽灵)出现,作祟。俄文译作 бродить,《大俄汉词典》解为:1.徐行,慢走;徘徊游荡。2.(某种思想、表情等)模糊地出现、掠过。《宣言》某些译文中“徘徊”、“游荡”的译法明显有俄文的影响。

现在来看看《现代汉语词典》对这几个词的解释:

“徘徊”:1.在一个地方来回走。2.比喻犹豫不决。

“踟蹰”:徘徊的 1 解。

“游荡”:闲游放荡,不务正业。

按照这种解释,“徘徊”和“游荡”两词带有“犹疑不决”之类的含义和语气,用来表示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在欧洲的活动并不准确,甚至会引起误解,总不能说共产主义幽灵“犹豫不决”、“闲游放荡,不务正业”吧!

其实,umgehen 同神灵联系在一起时,除“出现”、“作祟”之外,还有一个译法:“出没”。记得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学德文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看到科技出版社 1956 年出版的《德华标准大辞典》中此词用在神怪时作“出没”解。

“出没”,按《现代汉语辞典》解为:“出现和隐藏:出没无常”。在 19 世纪中期,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状态就是这种“出没无常”的状态,正因为出没无常,各国统治者都担心自己身边突然会有“共产主义”冒出而惶惶不安。这就像说此地有大虫出没,有强人出没,有游击队出没一样,闻者不免胆战心惊。

近日读沈昌文先生的《最后的晚餐》,发现沈公当年学德语首先学的也是《宣言》:

我们一帮在五十年代中期活跃的年轻人,曾组织自学德语小组,当时觉得一个革命青年不学马恩的语言是一种耻辱。课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于是,我的德语,不是先学“人”这个词,而是先学“幽灵”一词。不是先学人“出现”的德语词,而是先学幽灵“出没”的德语说法。

沈公这里无意中说出了 umgehen 一词的贴切译法,可惜这位大出版家没有把他的重要发现及时贡献给中央编译局。

关于翻译,还有几句话要说。我历来认为翻译的标准是“等值”,即把原文词义、语气准确地如实地传达出来,不增也不减,做到“信、达”。“雅”不是必须的,搞

不好可能是译者附加的东西。如果原文粗俗不堪,译者就没有义务把译文变得高雅圣洁。记得60年代赫鲁晓夫的某些讲话的中译文,是根据他的讲话录音翻译的,把其中的吭吭哧哧、哼哼哈哈都一一翻译出来,这当然是故意出他的洋相,不足为训,任何人的讲话录音最后都要加工整理的,就是速记记录也要得到本人的审阅认可,例如20世纪20年代俄共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就是这样做的。

一篇译文应当设法还其原貌,原文文雅或粗俗、简洁或啰嗦、流畅通顺或佶屈聱牙,译文都应当如实传达给读者,翻译的难度恐怕就在这里。

我曾反对修改《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译文,不是因为这是“经典译文”,而是因为译文准确传达了《宣言》的原意。没有人敢宣布他的译文是“经典”,动不得。问题只在于改动是更加接近原文的原意文风呢,还是译者添加了自己的什么“新东西”。就《宣言》的第一句而言,不同的译法大多只是表述得准确与否,或者说译者的理解不同的问题,不同译法不会使内容发生原则性的变化。如依愚见,宣言第一句话也可译作:

“一个妖魔,共产主义的妖魔,在欧洲出没。”

不过,这仅仅是笔者一得之见,一家之言,写出聊供识者一噓,改与不改,无关宏旨。

《北京日报》2009年8月31日

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

人们一般只知道十月革命有三个口号：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三个口号促使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这个说法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给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干革命、洒热血，是盼望结束战争，想要获得面包和土地。”^①

但是，细想起来，干革命只是为了“和平、土地和面包”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而言。

工人、农民在和平环境下吃饱就行了吗？这仅仅是解决一个生存问题，但是作为人，作为劳动者，仅仅能够生存是不够的。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就提出比生存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人权、人的自由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举自由的大旗，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最终目标，庄严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列宁对自由的意义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1905年写道，社会民主党的宗旨是使全体劳动者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没有政治自由，既不可能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阶级斗争，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政治培养和团结。正因为如此，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把坚决为充分的政治自由而斗争，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作为自己的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任务。”^①列宁指出，不仅无产阶级要求政治自由，而且资产阶级也需要政治自由，它的代表人物早就举起了自由的大旗，主要出身于这个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曾为自由而英勇地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任务之一，就是“在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中起先锋队、先头部队的作用”。^②

无产阶级需要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其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一个自由、民主的宽松环境来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理应在革命斗争中高举自由的大旗！

沙皇俄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它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各种自由权利。工人的罢工、农民对农奴主和地主的反抗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1905年革命失败后，沙皇政权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和镇压，大批的革命者被判刑、流放和处死。专制政权的迫害迫使大批的革命者流亡国外，对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缺乏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列宁本人对缺乏言论自由尤为深恶痛绝，他在写作时不得不顾及沙皇政府的各种各样的禁令，他的许多著作不得经过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他说过，俄国的报刊是“戴上笼嘴”的。^③他不得不用“伊索式语言”、“奴隶的”语言写作。1917年4月列宁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写的序言通篇都是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控诉。他写道：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其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害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作“合法”著作时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式的——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重读小册子里这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④

他把书报检查机关叫作“可耻的机构”，是“令人发指的蒙蔽国民的政策，是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5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5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4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24页。

人发指的地主企图使国家倒退的政策。”^①

这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一场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最终目标的革命，仅仅“和平、土地、面包”显然是不够的。就算当时处于长年的战争，农奴制残余严重的俄国，这三个口号也是不够的。

实际上，苏联后来的宣传隐去了十月革命时期曾经大书特书的一个重要口号，这就是“自由”的口号。严格地说，引导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完整口号是四个，这就是“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顺便说一句，“土地”的口号起初没有提，是临近武装起义的时候才加进去的。

关于存在要求自由的口号，有列宁的著作为证，在列宁 1917 年的著作中曾频繁出现。

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远方来信》中直接把和平、面包和自由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写道：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以取代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然后再争取唯一能够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还应当给各族人民以自由！

1917 年 3 月，列宁在《告被俘同志书》中明确写道：

工人的要求是：面包、自由、和平。

工人要求面包，这是因为在俄国，也像在几乎所有参加这场掠夺性战争的国家一样，人民在挨饿。

工人要求自由，这是因为沙皇政府利用战争的机会把整个俄国彻底变成了一所大监狱。

工人要求和平，这是因为俄国工人也向其他国家比较觉悟的工人一样，不愿再为一小撮富人的利益卖命，不愿再进行这场由戴皇冠的或不戴皇冠的强盗所发动的罪恶战争。^③

临时政府也提出过这三个口号。但列宁认为：临时政府“即使真心诚意想给人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4 卷，第 28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2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77 页。

民和平面包和自由,那也不可能办到”。^①列宁在自拟简介《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中指出,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要求和平、面包和自由,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②

自由的口号不是列宁个人的主张,它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191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其中写道:布尔什维克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它的红旗上写着:‘面包、和平、自由!’”“为了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了和平事业,为了自由事业,需要世界各国工人的相互支持……”^③

可见,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俄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给人民的许诺。

十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之后,首先通过的法令是“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但鲜为人知的是苏维埃政权还通过一个由列宁签署的法令,这就是后来史书很少提到的直接涉及自由权利的“出版法令”。

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等等的自由。言论自由是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出版自由。

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临时政府同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要求,“实行所有形式的自由,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④3月5日临时政府宣布取消沙皇的报刊检查机关——出版事务总委员会。5月16日发布《临时政府公告》宣布:“出版和出版物买卖自由。不许对它们实行政处罚。”当时战争还在继续,七月事变以后临时政府赋予军事部查封号召前线士兵暴动和不服从军令的出版物,同时开始同异议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出版物遭查封,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处于半地下状态。

1917年9月15日列宁在《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中着重谈了出版自由问题。他说:“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苏维埃形式的国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65页。

③ 《苏共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03、501页。

④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徐天新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分配。”^①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立即查封了一批报刊，引发了各界的强力抗议，所以在胜利后的第三天，1917年11月9日（10月27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出版法令》。法令不长，现全文援引如下：

出版法令

1917年11月10日

在变革的艰难的决定性时刻及其随后的时日，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针对不同色彩的反革命报刊的措施。于是立即从四面百方传来叫喊声，说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做就违背了自己的纲领，侵犯了出版自由。工农政府请居民注意，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幌子下掩盖着有产阶级占据绝大部分报刊的自由、不受限制地毒害群众的意识、在他们的意识中制造混乱的自由。谁都知道，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新政权，工农政权刚刚巩固的危机时刻，不能把这个武器完全留在敌人手里，在这种时候，其危险不亚于炸弹和机关枪。黄色和绿色报刊用这些东西来诬蔑人民刚刚取得胜利，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临时的非常措施以制止造谣诬蔑这些污水浊流的缘故。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人民委员会认为，即使在危机关头，只有在绝对的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对出版实施限制，兹决定：

出版总则

一、应予查封的只有下列报刊：1. 号召公开反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 用明显歪曲事实的手段制造混乱者；3. 号召采取明显的犯罪行为，即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者。

二、暂时或永久查禁报刊只能由人民委员会决定。

三、本总则具有临时性质，随着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来临将通过特别命令予以废除。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0—231页。

^② 《真理报》1917年11月10日。转引自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27—28。

这就是说，“出版法令”认为只有在绝对的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限制出版，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

这个法令可以看作是新政权在文化领域的基本方针，其维护的基调是出版自由，其他的所有各种有关禁令都只具有临时性质，属非常措施。它是继《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之后的第三个重要法令。

不过后来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没有严格履行出版法令中的诺言。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就封闭或因其他原因停刊了470家反对派报纸。由高尔基主编的，发表过他所写的“不合时宜的”系列文章的《新生活报》也被查禁。

国内战争时期，红白两军对垒，因军事需要、意识形态需要而禁书禁报是常事。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转向国内和平，言论自由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在经济上实行了退却，政治上怎么办？是否也应当有所松动？1921年4月11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兼特派员瓦尔金给俄共中央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送去报告，建议给予“社会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左派”集团，提供包括出版方面的合法活动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马尔托夫（孟什维克领袖）的《社会主义通报》不是在柏林，而是在莫斯科出版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他还主张让其他政党自由参加苏维埃的选举，“我认为让‘所有政党’而不是‘一党’参加苏维埃选举极其重要，我们在苏维埃中需要有反对派。非党工人反对一党专政指的是在苏维埃中缺少能够经常反映他们职业的和日常生活的，而不是阶级的利益和需要的政党”。与此同时，他主张“拉紧缰绳”，“我们应当告诉我们的敌人：先生们，在我们的法律范围内，你们是自由的。谁要煽动内战、鼓动罢工和破坏我们的法律，我们就要对他绳之以法。”他主张按宪法办事，因为宪法并没有禁止其他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他提醒说，当年沙皇政府一方面流放布尔什维克去服苦役，同时也容许杜马中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团，因为它“要顾及俄国‘议会制度的要求’，顾及自己宪法的要求”。瓦尔金主张用政治的方法同其他政党斗争，把斗争纳入宪法的轨道上去，从而避免使用镇压的方法。4月14日，政治局否决了瓦尔金提出的在莫斯科选举前释放被捕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不过，在4月底还是有10多名孟什维克经过选举进入莫斯科市苏维埃。5月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出席了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并且在会上多次发言。

5月初,1906年入党的老党员米雅斯尼科夫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书,其中建议在国内实行高度民主以提高党的威信,从而加强党对工人和农民的思想影响,他说:“我们在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并建立国家唯一的政权之后,在镇压了高尔察克之后就应该立即废除死刑,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谁都是未曾见过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措施来加强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广大群众中以及全世界的影响。”报告书递上去之后没有得到回答。7月27日,他把题为《伤脑筋的问题》的文章交给布哈林,供《真理报》发表。文章进一步发挥了报告书的思想,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进化。需要制定能保证和平进化,首先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规。有人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只能在经济好转之后实行,米雅斯尼科夫反驳说: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振兴经济,而言论和出版自由恰恰是调动他们积极性所必需的。还有人认为,一旦实施言论自由,国内的一些混乱现象如罢工等会传出去。米雅斯尼科夫反驳说:“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还许多混乱现象而害怕言论自由的话,那么混乱现象并不会因为不实行言论自由而有所减少。”何况即使报纸不报道各种事件,人们也会通过目击者了解到的。而这种保密带来的结果只有一个:人们不相信我们的报纸。他说:“在我国所处的艰难条件下,谁想使疲惫不堪的工人跟我们走,谁想使我们的力量对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的影响增强,他就应该说,只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做到这一点。”

8月5日,列宁给米雅斯尼科夫写了详细的答复,赞同他关于“国内和平”取代“国内战争”的提法,认为这是“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列宁承认“‘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但是列宁否定米雅斯尼科夫关于出版自由的议论,认为“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米雅斯尼科夫指望借助于出版自由来揭发各种弊端:“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而列宁主张“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①列宁主张的这种党内监督的办法在列宁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4—90页。

期也许是有效的,但从20年代末开始就明显失效了:独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存在了,党的报刊成为斯大林的一言堂,它们失去了监督的作用。

列宁在写作此信之前曾于8月1日给米雅斯尼科夫去信,认为他的文章“开头写得很好,有道理”。但可能存在隔阂,希望能同他当面谈谈,要求他写封简短的回信。^①8月22日,米雅斯尼科夫回复列宁说,他建议的言论自由只给予工人阶级和农民,他们中间存在着“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观点”。他认为,“公开性将比监察委员会能更多地消灭这种(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行为”,但公开性应在言论和出版自由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撒谎、诽谤、号召不执行某个法律——都应受到法律的惩治,但法律不应惩治那些为了向政府、报刊和社会各界等施加影响而说出想法的人”。不过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对他施加组织措施了。7月29日俄共中央组织局开会讨论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活动。1922年2月20日,米雅斯尼科夫被开除出党。^②

列宁这时候强烈否定“出版自由”,一个原因是列宁把报刊(俄文“出版”和“报刊”是同一个词)等同于政治组织,这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20世纪初在俄国建党的时候,《火星报》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所以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两个中心即两个并行的党中央:一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是《火星报》编辑部。因此列宁对刊物的作用非常敏感,保持高度警惕。另一个原因是这时候苏俄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仍把“贸易自由”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在经济上已经被迫对资本主义作了如此大的让步,就想用政治上加强控制的办法来维持和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列宁担心实行出版自由会给反对党提供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反而加强了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镇压。

从这以后,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出版自由的议论,这个问题成为禁区。苏联共产党越来越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书报检查越来越制度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所以也就不再提十月革命之初通过的“出版法令”中所给予的承诺了,而在谈到十月革命的口号时闭口不提“自由”这个重要口号!《列宁全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151页。

② 本文有关米雅斯尼科夫的资料引自IO.格兰德:《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斗争综述》,原载[苏]《旗帜》1990年第3期。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

俄文第5版有一本“主题索引”卷(中文第2版的“主题索引”卷基本上是以它为蓝本的),主题索引的编制办法基本上是不管上下文的意思,只要该页出现相应的名词,就标出该页的页码,以至于主题索引中往往有许多页码毫无实际内容。但在“自由”条目下面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分条中一共只有两个页码,而1917年著作中涉及“自由”的内容一概阙如,就像1917年列宁根本没有提到过“自由”似的!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竟然害怕“自由”,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期

十月的炮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中国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一句话。

对于十月的炮声，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出的是空炮，有的说是实弹，并有弹壳作证，有的说，整个起义期间就发过这一炮，有的说发了好几炮，有的甚至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是在攻取冬宫后发出的庆祝礼炮……如此等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事实上，十月的炮声这段历史还真有点曲折。

1917年10月10日和10月16日(本文均用俄历)，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实行武装起义。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0月21日，选出五人组成的常务局，其中三人是布尔什维克——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萨多夫斯基，两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基米尔和萨哈尔科夫。这个机关后来就成为组织和实施武装起义的机关。

10月24日一早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央委员之间作了分工，分派一些中央委员负责同铁路、邮电局联系，安排粮食的储备，监视临时政府的动向，保卫报社，派人同莫斯科联络，等等。会上决定不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任何中央委员都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加米涅夫建议一旦斯莫尔尼宫被摧毁，就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建立据点，托洛茨基提出在彼得堡罗要塞建立后备指挥部——这时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彼得堡罗要塞已经完全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一边了。24日晚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宫的时候，起义实际上已经开始，列宁敦促立即逮捕临时政府成员，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当时对立双方的两个中心是：起义的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临时政府占据冬宫。

到10月25日白天，起义者已经占领彼得格勒各要害机关和部门以及市内战略要地，开始准备夺取临时政府的最后据点冬宫，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往冬宫方向集结，实施对冬宫的包围。

25日下午2点，从喀琅施塔得驶来一支由巡洋舰奥列格号率领的五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停泊在涅瓦河。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它们传达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它们参加包围冬宫。阿芙乐尔号因等待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而稍微耽搁了一些时间。晚6点，冬宫已经完全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军队包围。军事革命委员会战地司令部成员：波德沃伊斯基、丘德诺夫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布勃诺夫、叶列梅耶夫、布拉贡拉沃夫，在彼得堡罗要塞开会，确定攻打冬宫的详细计划，决定缩小对冬宫的包围圈，如果对方不投降，不晚于9时发起进攻。

7点左右，安东诺夫和布拉贡拉沃夫签发给临时政府的最后通牒，内称：“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要求临时政府及其所辖军队投降。将逮捕临时政府、总司令部官员和高级军官；解除士官生、士兵和服务人员的武装，这些人在查验身份后将予以释放。”给予20分钟的期限。

在期限到达的5分钟前守卫冬宫的部分士官生宣布投降，但临时政府还在坚持。军事革命委员会派丘德诺夫斯基作为军使进入冬宫，敦促临时政府投降，丘被冬宫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下令逮捕。一些士官生表示反对，要求予以释放，丘德诺夫斯基得以走出冬宫，这一部分士官生也随同出走。

8点，丘德诺夫斯基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派再次进入冬宫，号召士官生和突击队员缴械投降，守卫的士兵中间出现混乱，部分士兵动摇交械，并打算撤出冬宫，但被扣留。不过军官们感到扣留的做法有危险，就放他们走了。冬宫的守备力量就这样逐步瓦解了。

整个城市是平静的。这边武装起义在热火朝天地进行，那边在彼得格勒民众馆里还在上演著名歌唱家谢里亚宾主演的《鲍里斯·戈东诺夫》，一支起义部队路过并暂停在民众馆旁，一些士兵还悄悄地进去听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向冬宫进发。

冬宫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宫，和它连接在一起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有大量无价之宝，攻打这样的建筑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否则就会玉石俱焚。攻打冬宫的

军事领导由波德沃伊斯基、丘德诺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三人负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彼得堡罗要塞政委布拉贡拉沃夫约定，一旦完成对冬宫的合围，就在要塞的旗杆上升起红灯，阿芙乐尔号看到信号后发射空炮以威慑一下，迫使临时政府投降。如果被包围者继续顽抗，就用轻炮向冬宫实弹射击。如果冬宫还不投降，阿芙乐尔号再用六英寸口径的大炮实弹射击。安排这个顺序的目的是，尽量减少牺牲和城市的损失。

然而，执行时却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困难。

首先在彼得堡罗要塞找不到红灯，找到红灯后把它挂到旗杆上并让各方都能看到也很不容易。

其次要塞只有一座用于中午报时的午炮，是从炮口装火药的，要实施炮击的话，需要把野战炮抬到要塞的城头上去。到中午时分这段计划得到了实施，6门大炮对准了冬宫。但炮手却不好找，驻扎在这里的炮兵连在七月事变中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不太可靠，临到行动的时候，准尉却报告说：大炮生锈，压缩机缺油，无法开炮。

安东诺夫获悉后发疯似的乘快艇赶来，他和布拉贡拉沃夫一起找到炮位，炮手们还是说生锈之类的话。安东诺夫只好命令从海军射击场调几个炮手来，再由午炮发射信号。

阿芙乐尔号在等待彼得堡罗要塞的信号。阿芙乐尔号政委别雷舍夫后来写道：从冬宫方向传来机关枪和步枪声。一艘小艇驶到阿芙乐尔号，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联络员送来命令说，临时政府应在9点投降，如果拒绝，彼得堡罗要塞将发出红色信号。这是阿芙乐尔号发射空炮的信号。我上到前甲板，那里有水兵守候在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旁边。岸边传来射击声，但彼得堡罗要塞却没有声音，已经9点35分，还没有看到红色信号。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求派了几名海军炮手来到彼得堡罗要塞。他们虽然技术不很熟练，但都是布尔什维克，准备用生锈缺油的炮来开火。这时候炮声显然比瞄准更为重要。安东诺夫下令开炮，号炮发出一道暗红色火光。

看到要塞发出的信号炮，9点40分，阿芙乐尔号政委别雷舍夫发出开火的命令。于是炮口发出一道闪光，隆隆炮声响彻涅瓦河和冬宫广场的上空。革命军事

委员会委员、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弗列罗夫斯基写道：“要塞的信号炮发出之后，阿芙乐尔号怒吼起来了。空炮的轰鸣和火焰亮光比实弹还厉害。”别雷舍夫命令给大炮装上实弹，以防不测。

炮响之后，冬宫的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不知从哪儿拿来一块弹片给部长们看，海军上将维尔捷列夫斯基一看就承认弹片是自己海军的，是从阿芙乐尔号发射的。不过后来多方面证实，阿芙乐尔号发出的确实是空炮，并且只开过一炮，目的是威慑一下，也不是总攻的信号。

由于冬宫还在顽抗，彼得堡罗要塞那边接着开炮了，这次是实弹，但不密集，击中的更少。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内共发射了 35 发炮弹，结果只有两发击中，仅损坏了墙面，其余的炮弹飞过屋顶，没有给城市造成任何损失。彼得堡罗要塞同冬宫只隔一条涅瓦河，射中冬宫这样的庞大目标并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没有命中显然不是技术问题。

深夜，起义士兵和赤卫队队员从冬宫广场和涅瓦河岸两边的大门进入冬宫，士气低落的卫兵还以为来者是杜马代表。一时宫殿挤满了人，双方都武装到牙齿，但没有开枪，也没有扔手榴弹，因为敌我胶着在一起，分不开。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回忆说：我们和丘德诺夫斯基率领进攻者进入冬宫内部。我们进入的时候士官生已经不反抗了，我们自由地进入宫殿各处寻找临时政府成员。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遇到了冬宫卫队长帕尔钦斯基，帕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各党派已经达成协议，以普罗柯波维奇为首的市杜马代表正往冬宫走来，以结束对冬宫的包围？我们问他：临时政府在哪儿？他指了指某个方向。这时候传来喊声：“这里，这里……”我们穿过一个房间，看到有几个士官生在站岗，我和丘德诺夫斯基走向士官生，要他们投降，他们略有犹豫，交出了步枪。又遇到帕尔钦斯基，他想向我们提什么警告，但丘德诺夫斯基抓住他的袖子，把他推向进攻的人群，高声喊道：“我逮捕了彼得格勒的总督！”士官生放下武器。在一个房间我们发现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他们坐在桌子旁边。我宣布：“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宣布，你们被逮捕了。”这时已经是 26 日凌晨 2 点 10 分。被捕的部长共 16 人，只有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早在 25 日上午 11 点逃出了彼得格勒。顺便说一句，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朋友告诉我，起义军在冬宫内的进攻路线并不是《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条路线，那是为了使情景好看而拍摄的。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进攻路线。

25 日夜 10 点 45 分第 2 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26 日凌晨 3 时许,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攻占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就此写道:大炮在远方不断地轰鸣,苏维埃的代表们不断地争论……新俄罗斯就是这样在大炮声里,在黑暗、憎恨、极端恐惧、忠勇的气氛里诞生的。

《万象》2008 年第 6 期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十月革命是由一个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完成的。其实不然。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完成的，参与领导起义工作的有两党的众多领导人，而斯大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历来宣传的那么大。

人们一直认为，苏联有史以来只存在一个革命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都是反革命政党。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写道：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①

所谓“小资产阶级党派”主要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我们且看看这两个党派的情况。

1917年的社会主义政党

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俄国有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是社会革命党。这两个党逐渐分化各形成两个派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出现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和温和的孟什维克，在社会革命党内也分化出激进的左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9—620页。

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温和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此后两派分分合合,但并没有达到彻底分裂的地步。多年来有一个误解,以为1912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曾决定把孟什维克开除出党,其实当时开除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所以并不是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这时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政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后面加上“布”字,以区别于孟什维克党。事实是,直到1917年初,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仍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两派,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政党是1917年7月的事。这就是说,尽管两派存在分歧,但一直共处于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一党之中。

1917年5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代表会议时其成员约有10万人。^①8月19日至2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孟什维克统一代表大会,约有党员20万人。会上分为四派:以波特列索夫为首的极端护国派,以策列铁里和唐恩为首的革命护国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以一些拥护《新生活报》的人(苏汉诺夫等人)组成的左翼国际主义派。其中的马尔托夫的国际主义派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主张极其相似,所以曾经有两派合并的打算。此外,普列汉诺夫派在5月底成立全俄社会民主党统一组织。普列汉诺夫不同意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其社会主义组织的性质。

社会革命党是由俄国民粹派演变而来的政党,该党创建于1905年,其纲领规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即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消灭阶级和剥削,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实现土地社会化,等等。这个党是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的成员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成员达50多万,另一说法达百万,在苏维埃中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在农村和外省,而且在一些大城市也拥有巨大影响。

二月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策略和政策上接近,都认定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支持并参加了三届临时政府。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由于苏维埃的支持,临时政府才得

^①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以存在。列宁一度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就是说,全部政权转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之手!显然,这时候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并不是反革命政党。

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内的左派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建立“左派组织局”。他们反对同临时政府合作,主张政权归苏维埃。1917年9月,该党左翼领袖斯皮里多诺娃声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政权的态度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唯一可以挽救俄国的办法是将权力转交苏维埃。”^①12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召开代表大会,成立独立的政党。在1918年年中约有党员8万人。该党同布尔什维克党密切合作,促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列宁认为这是代表农民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1917年9月27日列宁给斯米尔加的信中说:“……马上实现开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够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②

被认作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1917年才同孟什维克实际决裂的。但是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比起来,其人数不多。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仅有24000人,其中彼得格勒约有2000人,莫斯科600人。^③召开4月代表会议的时候有8万党员。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约有24万党员。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区联派合并,增加了一批知名人士,壮大了力量,但人数增加得并不多。这样,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少数就不足为奇了——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700—800名代表,而布尔什维克只有100多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些著名人物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部存在不同的派别,他们之间的政策主张也各不相同,即使党内有人参加了临时政府,也不能说这个党整个就是反革命政党。例如,社会革命党就整体来说,在战争与和平、土地问题及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上都同临时政府存在分歧。斯皮里多诺娃甚至曾建议在国内建立社会革命党的一党政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自己的妥协行动帮助和支持了立宪民主党,但是

①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60页。

③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数字是40000—45000人,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4页。

没有根据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党。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夺权

历来的说法是,十月武装起义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工人和革命士兵发动并取得胜利的。但是准确点说,武装起义应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中的两个激进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发起和组织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当然,布尔什维克起了关键作用。

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到20日组建完成,共有80多名委员,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军事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人民兵、彼得格勒农民代表苏维埃、赤卫队、芬兰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以及其他革命民主组织的代表。其委员中有53名布尔什维克,2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名无政府主义者,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这是十月武装起义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机关。10月21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常务局:3名布尔什维克(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 A. Д. 萨多夫斯基)、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巴·叶·拉基米尔和 Г. Н. 萨哈尔科夫),主席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基米尔,后来是波德沃伊斯基。^①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不甚了了,从以上组成看来,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主的、组织和实施武装起义的机关。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会上有人向托洛茨基提问: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怎样看待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托洛茨基回答说:“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常务局中有五人,两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基米尔和萨哈尔科夫同志。他们在那里工作得很出色,我们同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分歧。”^②

^① 《十月革命——问题与回答》,莫斯科1987年版,第248页。

^② 沃尔科戈诺夫:《托洛茨基政治肖像》第1卷,莫斯科1997年版,第153页。

关于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问题,除军事革命委员会外,历史上还提到两个。一个是1917年10月10日(23日)成立的“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①这是个有点让人不解的组织,其一,两个反对武装起义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竟然被列入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机关!其二,这个机关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竟然没有被提及,真是有点不可思议。^②另一个是“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其成员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③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文件记载该总部的实践活动。赫鲁晓夫时期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只说“当时决定,党中央的革命军事总部是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没有提它的领导作用。^④10月24日起义当天上午召开的是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加米涅夫主持,听取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⑤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个“实践总部”。并且迄今为止在有关十月革命史的各种著作中对这个总部的活动也没有任何记载。^⑥

那么谁是起义的组织者呢?1918年11月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是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分不开的,在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⑦

在1967年出版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文献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起义期间的斯大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3页。在中央委员会记录中斯大林名列第五,在季、加、托之后。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86页。

② 有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个组织是后来斯大林伪造的。本文不可能展开这一问题。

③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4页。在中央委员会纪录中叫作“军事革命总部”,规定“该总部加入革命的苏维埃委员会。”实际上应当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04页。

④ 《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页。

⑤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19—121页。

⑥ 关于政治局问题见本书《斯大林伪造政治局》一文。

⑦ 斯大林:《十月变革》,转引自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中央编译局收藏的《真理报》这一天的这一篇文章被剪去,所以只能转引。

林。他第一次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出现是在10月31日,这时起义已取得胜利。他的名字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在军事行动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①《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的作者沃尔科戈尔诺夫写道:我所查阅过的有关十月革命的这些历史性的日日夜夜的档案资料中,没有一份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②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件《告俄国公民书》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发布的,其中写道:“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③

1917年10月25日22点40分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大会开幕前共有代表649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93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后,仍有179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④),孟什维克约80人。另外还有一些波兰社会党、乌克兰社会党人的代表等。^⑤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宣读了不承认代表大会拥有全权的声明后退出大会,到市杜马大厦那里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团中有14名布尔什维克^⑥,7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孟什维克,1名国际主义派。

10月26日(11月8日)代表大会召开晚间会议,选出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还留下一些名额规定以后由新选出来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和军队组织代表补充之。退出大会的诸党派也有权按照比例选派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⑦后来在11月召开的全俄农民

① 见《史家争论》,莫斯科1988年版,第9页。

② 沃尔科戈尔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 此文件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页。

④ 这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尚未成立单独的政党,而是社会革命党内的左翼一派,为方便起见,本文不分时期都叫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⑤ 另一个说法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有670名代表,代表1700万选民。其中布尔什维克有代表338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00人。

⑥ 这14名布尔什维克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斯克良斯基、克雷连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仑泰、穆拉诺夫、斯图契卡。

⑦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郑超麟译,春燕出版社1948年版,第268页。

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选出 108 人组成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81 人),加入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了部分领导工作:阿尔加索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领导外埠局,卡霍夫斯卡娅和沃洛达尔斯基一起领导鼓动局,普罗相和乌里茨基一起主管民族问题,而著名革命家斯皮里多诺娃领导农业部,等等。

会上成立了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组织政府的时候,曾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在等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回来,所以没有参加政府,于是出现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使这样,有些政府部门也留下空位,等待其他党派的人选参加,例如交通人民委员就暂缺,留待与铁路工人组织协商。所以列宁在 10 月 29 日(11 月 11 日)的中央会议上曾反复说明: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

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声明,他们愿意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①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武装起义至少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两个党派^②联合举行并取得胜利的。在胜利之初这两个党派都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虽然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但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本意,它是准备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 年第 1 期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30—31 页。

^② 这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正式组成“左派社会革命党”。

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

斯大林的两个论断

人们一直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一党夺取的政权，其余政党都是反革命的政党。既然布尔什维克一党夺取了政权，天经地义，也应当由它一党来执掌政权。

此论来自斯大林。我们且来看看他的两段话：

斯大林在其《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这个政权，一个阶级的政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结合成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①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斯大林提出另一个论断——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俄国的各种政党在历史上都是反革命政党。他写道：

党的历史教导我们，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不战胜这些党派，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就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的统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打垮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党派,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建成社会主义。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①

这后一段话是对不能分掌政权这前一论断的提出的历史论证。这就是说,俄国历史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的革命政党,而其他所有政党都是反革命政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理所当然地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独掌政权。

1917年俄国各“小资产阶级党派”是“反革命政党”吗？

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主要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我们且看看这两个党派的情况。

直到1917年初,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样,一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派,这两派并没有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政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布)”字以示区别,不是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那样是1912年的事,而是1917年才采取的措施。这就是说,尽管两派存在分歧,但一直共处于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党之中,不可能是反革命政党。

1917年5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代表会议时约有10万人。^②8月19—2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孟什维克统一代表大会,约有党员20万人。会上分为四派:以波特列索夫为首的极端护国派,以策列铁里和唐恩为首的革命护国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以一些拥护《新生活报》的人(苏汉诺夫等人)组成的左翼国际主义派。其中的国际主义派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主张极其相似,所以曾经有两派合并的打算。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9—620页。

^②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此外,普列汉诺夫派在5月底成立全俄社会民主党统一组织。普列汉诺夫不同意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但并没有反对十月革命。

社会革命党是由俄国民粹派演变而来的政党,该党创建于1905年,其纲领规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即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消灭阶级和剥削,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实现土地社会化,等等。这个党曾经是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的成员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成员达50多万(另一说法达百万),在苏维埃中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在农村和外省,而且在一些大城市也拥有巨大影响。在不同时期党内也分裂出不同的派别,1906年就由右翼分裂出来人民社会党。^①

二月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策略和政策上接近,都认定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支持并参加了三届临时政府。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由于苏维埃的支持,临时政府才得以存在。列宁一度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就是说,全部政权转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之手!显然,这时候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并不是反革命政党。

1923年马尔托夫在国外逝世。《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3年第3—4期发表了著名党史学家弗·涅夫斯基的悼念文章。文章写道:

马尔托夫逝世了,与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左翼派别、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发自同一渊源的孟什维克流派中残存的那一部分优秀的东西也随之消逝了。马尔托夫逝世了,孟什维克流派中残存的与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真正革命的派别的最后联系也随之消逝了。……他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真正廉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诚心实意地思考过他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所指明的道路。^②对孟什维克的杰出代表人物的这一评价自然是同反革命扯不上的。

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内的左派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建立“左派组织局”。他们反对同临时政府合作,主张政权归苏维埃。1917年9月,该党左派领袖斯皮里多诺娃声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政权的态度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唯

^① 人民社会党,又称劳动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盟。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1918年解散。

^② 《政治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一可以挽救俄国的办法是将权力转交苏维埃。”^①12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召开代表大会，成立独立的政党。在1918年年中约有党员8万人。该党同布尔什维克党密切合作，促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列宁认为这是代表农民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

被认作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1917年才同孟什维克实际决裂的，这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上“布”字作为区别。但是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比起来，其人数不多。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仅有24000人，其中彼得格勒约有2000人，莫斯科600人。^②召开4月代表会议的时候有8万党员。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约有24万党员。后来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区联派合并，增加了一批知名人士，壮大了力量，但人数增加得并不多。这样，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少数就不足为奇了——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700—800名代表，而布尔什维克只有100多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些著名人物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部存在不同的派别，他们之间的政策主张也各不相同，即使党内有人参加了临时政府，也不能说这个党整个就是反革命政党。例如，社会革命党就整体来说，在战争与和平、土地问题及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上都同临时政府存在分歧。斯皮里多诺娃甚至建议在俄国建立社会革命党的一党政权。当时反对革命的政党是有的，这就是立宪民主党，而同此党联合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妥协党，他们用自己的妥协行动帮助和支持了立宪民主党，但是没有根据认为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党。

列宁在《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比较了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写道：

（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赞成社会主义，但认为考虑社会主义并立即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来实现社会主义为时尚早。

（布尔什维克）。赞成社会主义。认为工人等等苏维埃必须立即采取切实

^①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②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说是40000—45000人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4页。

可行的步骤来实现社会主义。^①

可见这里的分歧根本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歧,而是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的分歧。

十月武装起义——两党联合夺权

历来的说法是,十月武装起义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工人和革命士兵发动和取得胜利的。但是准确点说,并不尽然。武装起义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准确说,是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因为那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尚未正式成立)共同发起和组织并最后取得胜利的,当然,布尔什维克党起了关键作用。

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到20日组建完成,共有80多名委员,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军事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人民兵、彼得格勒农民代表苏维埃、赤卫队、芬兰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以及其他革命民主组织的代表。其委员中有53名布尔什维克,2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名无政府主义者,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这是十月武装起义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机关。10月21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由5人组成的常务局:3名布尔什维克(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A.Д.萨多夫斯基),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巴·叶·拉基米尔和Г.Н.萨哈尔科夫),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基米尔,后来是波德沃伊斯基。^②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不甚了了,从以上组成看来,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主的组织和实施武装起义的机关。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会上有人向托洛茨基提问: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怎样看待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托洛茨基回答说:“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常务局中有五人,两人是左派社会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91页。

^② 《十月革命——问题与回答》,莫斯科1987年版,第248页。

党人：拉基米尔和萨哈尔科夫同志。他们在那里工作得很出色，我们同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分歧。”^①

关于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问题，除军事革命委员会外，历史上还提到两个。一个是1917年10月10日(23日)成立的“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②这是个有点让人不解的组织，其一，两个反对武装起义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竟然被列入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机关，他们怎么在政治上领导起义！我们知道的是，会后11日他俩发表了反对起义的通告信《论时局》。其二，这个机关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竟然没有被提及，真是有点不可思议。^③另一个是“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其成员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④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文件记载该总部的实践活动。10月24日起义当天上午召开的是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加米涅夫主持，听取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⑤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个“实践总部”。并且迄今为止在有关十月革命史的各种著作中对这个总部的活动也没有任何记载。

那么谁是起义的组织者呢？1918年11月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是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分不开的，在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⑥

① 沃尔科戈诺夫：《托洛茨基(政治肖像)》第1卷，莫斯科1997年版，第15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3页。在中央委员会纪录中斯大林名列第五，在季、加、托之后。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86页。

③ 有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个组织是后来斯大林伪造的。本文不可能展开这一问题。见本书郑异凡：《斯大林伪造政治局》。

④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4页。在中央委员会纪录中叫作“军事革命总部”，规定“该总部加入革命的苏维埃委员会。”实际上应当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04页。

⑤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19—121页。

⑥ 斯大林：《十月政变》，转引自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宣告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件《告俄国公民书》，就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的。由列宁起草的此《告俄国公民书》中宣布：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①

1917年10月25日22点40分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大会开幕前共有代表649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93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后，仍有179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②），孟什维克约80人。另外还有一些波兰社会党、乌克兰社会党的代表等。^③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宣读了不承认代表大会拥有全权的声明后退出大会，到市杜马大厦去了，在那里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团中有14名布尔什维克^④，7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孟什维克，1名国际主义派。

10月26日（11月8日）代表大会召开晚间会议，选出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还留下一些名额规定以后由新选出来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和军队组织代表补充之。退出大会的诸党派也有权按照比例选派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⑤后来在11月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选出108人组成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人），加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了部分领导工作：阿尔加索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领导外埠局，卡霍夫斯卡娅和沃洛达尔斯基一起领导鼓动局，普罗相和乌里茨基一起主管民族问题，而著名革命家斯皮里多诺娃领导农业部，等等。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页。

② 这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尚未成立单独的政党，而是社会革命党内的左翼，为方便起见，本文不分时期都叫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③ 另一个说法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有670名代表，代表1700万选民。其中布尔什维克有代表338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00人。

④ 这14名布尔什维克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斯克良斯基、克雷连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仑泰、穆拉诺夫、斯图契卡。

⑤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郑超麟译，春燕出版社1948年版，第268页。

会上成立了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组成政府的时候,曾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在等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回来,所以没有参加政府,于是出现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使这样,有些政府部门也留下空位,等待其他党派的人选参加,例如交通人民委员就暂缺,留待与铁路工人组织协商。所以列宁在10月29日(11月11日)的中央会议上曾反复说明: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享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

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声明,他们愿意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政策。至于不同意新政府的纲领这一点,他们连提也不敢提。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由于成了少数才退出的。……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出于苏维埃之外。^①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武装起义至少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两个党派^②联合举行并取得胜利的。在胜利之初这两个党派都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虽然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但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本意,它是准备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的。

布尔什维克愿意同其他党派分享政权——关于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争论

这场争论既涉及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涉及其他政党。

还在成立政府之初,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有人认为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基础太小,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要求组成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参加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领头人物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

与此同时,党外关于组织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呼声也非常高,其代表是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全俄铁”)。全俄铁是在1917年7月成立大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0—31页。黑体为引者所加。

② 这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正式组成“左派社会革命党”。

上选举产生的,成员中有 14 名社会革命党人,6 名孟什维克,3 名人民社会党人和 11 名无党派人士。

10 月 29 日全俄铁就政权问题发出紧急电报,说“国内不存在政权……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员会只依靠一个党,不能得到全国的承认和支持。必须建立新的政府……”它要求建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由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政府。为此目的,它以举行罢工、停止铁路运行作威胁。

1917 年 10 月 29 日召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未出席),通过扩大政府基础的决定(第 1 条),同时否决了让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其他政党集团进入政府的建议。会议记录如下:

1. 表决议案:中央认为必须扩大政府的基础并可以改变其组成。(一致通过)

.....

3. 表决提案: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并对其负责。(通过)

.....

5. 表决提案:我们对所有苏维埃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一事不提出最后通牒。7 票赞同,3 票反对。

6. 表决提案:同意对各党派候选人有相互提出异议的权利。通过:5 票赞成,1 票反对,3 票弃权。

提议对第 5 条进行记名表决并征询缺席中央委员的意见。(通过)

第 5 条记名表决:

赞同:加米涅夫、米柳亭、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

反对:越飞、捷尔任斯基、文特尔、柯仑泰、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

7. 由各退出代表大会的政党按人数比例增补进中央执行委员会。

8. 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有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代表。^①

同日,全俄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各党派的 30 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122—123 页。

党人派出其党内所有派别集团的代表：孟什维克护国派唐恩、艾里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亨德尔曼和雅可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柯列加耶夫和马尔金，孟什维克瓦因施泰因（代表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等等。还有全俄农民代表委员会、国家机关职员联合会以及其他组织的某些代表。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委托，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以及梁赞诺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叫作“制定各党派和组织间协议特别委员会”，以准备关于政权成员和关于中止国内战争的措施的建议。

10月30日该委员会开会。出席委员会会议的有唐恩、瓦因施泰因、加米涅夫、梁赞诺夫等。委员会通过“关于立即停火和向敌对双方发出停止军事行动的号召”。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梁赞诺夫投票赞同这一决议。同日（上午11点和晚上）还在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10月30日晚克伦斯基军队在普尔科沃附近失败。在晚间会议上，加米涅夫重申必须成立由布尔什维克直至人民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10月3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一致同意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在已经成为新政府立法机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各有1名代表。^①列宁和托洛茨基缺席。

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提出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出新政府和不承认10月25日的起义的要求。

11月1日出席委员会的加米涅夫等三人同意成立“人民会议(совет)”，即取代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的预备议会。他们没有坚持列宁必须留在政府，反而同他们讨论提名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作为总理的人选问题。^②

1917年11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中央会议，列宁和托洛茨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于是会议的调子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加米涅夫在同全俄铁的谈判中基本上是采取对话、调和、妥协的立场，总的目标是设法建立一个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这立场大体上也是此前中央的决定。

这次中央会议明确了几个必须坚持的立场：无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在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必须占多数。托洛茨基强调：如果我们得不到多数，那就没有必

① 《柳比莫夫全集》第6卷，第22页（阿·伊·柳比莫夫：《1917年革命：时事纪实》，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转引自《革命的良心》，第105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271页。

要举行起义。我们必须拥有 75%。其次,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位置不能让出。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都表示不能让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职位,其他人选则不必坚持。托洛茨基声明,“我们不能让出列宁的主席职位”。关于同全俄铁的谈判,会上多数认为不能中断谈判,以多数票通过不中断谈判的决定(10 票对 4 票)。主张谈判者担心,如果中断谈判,各党派就会离去,布尔什维克党会处于孤立的境地。李可夫声明,“如果我们停止谈判,那些支持我们的集团就会离开我们,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加米涅夫进行的谈判是完全正确的”。梁赞诺夫指出,在彼得格勒甚至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而在苏维埃手中,不能回避这一点。如果离开谈判的道路,我们就会孤立无援,完全孤立。我们已经犯了错误——去领导政府并以命名使问题尖锐化,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中级官员集团就会跟我们走。其次,他提醒,再过两三天我们会面临只能发 1/4 磅面包的局面。如果我们今天拒绝妥协,我们就会失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失去一切,就会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欺骗了群众,原先我们曾经答应给他们一个苏维埃政府。列宁没有直接反对谈判,但认为加米涅夫的政策必须立即停止。现在不必同全俄铁对话而是需要把军队派往莫斯科。列宁强调:“谈判应当是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会议表决是否中止谈判问题时,有 4 票赞成中止,10 票反对。可以看出,谈判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会议最后通过如下决议:

根据先前谈判的经验说明,妥协党进行这些谈判目的不是建立联合的苏维埃政权,而是旨在在工人和士兵中制造分裂,破坏苏维埃政权并最终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拴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上。

中央决定:鉴于已经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准许我党党员今天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所谓清一色政权的最后尝试,目的是最终揭露这种尝试无法成立,并最终停止关于联合政权的进一步谈判。^①

决议实际上等于否决了继续谈判以谋求建立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可能性。组建政府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个严重政治危机。11 月 4 日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季诺维也夫和诺根等五名中央委员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李可夫等 10 名人民委员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

加米涅夫五人在声明中指出: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124—130 页。

只有按照我们规定的条件立即达成妥协,才能使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有可能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巩固新的阵地和积聚力量以继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认为,必须建立这样的政府,以避免继续流血和防止临近的饥荒,防止革命被卡列金的军队所摧毁,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和切实贯彻第二届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所通过的和平纲领。^①

李可夫等部分人民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表声明说:

我们坚持必须由所有苏维埃政党组成社会主义者政府的观点。

我们认为,除此以外只有一条路:用政治恐怖的手段维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不能也不愿走这条路。我们看到,这导致把大量无产阶级组织排除出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导致建立不负责任的制度和毁灭革命和国家。我们不能对这样的政策负责,因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人民委员的称号。^②

在声明上签名的有 10 人:工商业人民委员维·诺根、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弗·米柳亭、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梁赞诺夫、出版事务委员杰尔贝舍夫、国家印厂委员阿尔布佐夫、赤卫队委员尤列涅夫、劳动部冲突司司长格·费多罗夫(工人部主席)、劳动人民委员部法规司司长尤·拉林。此外还有劳动人民委员亚·施略普尼柯夫表示赞同对形势的分析但不辞职。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高级领导人员中共有 13 人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甚至为此不惜辞去所担任的职务。11 月 4 日,中央多数派发给少数派最后通牒,在上面签名的有 10 人。^③这实际上就是当时党内两派力量的对比。

在 11 月 2 日通过的关于党内反对派的决议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重申:

6. 中央委员会确认,它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外,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135 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纪录》,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13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3—45 页。

8. 中央委员会提请注意,由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并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表示苏维埃要增补前线来的士兵和各地来的农民,因此,硬说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对同农民联合,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相反,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实际证明,布尔什维克有极大的诚意,愿意实现同俄国居民大多数的联合。^①

11月4日列宁在回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询时说明: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加入新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团自己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合作……^②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提法:布尔什维克愿意同其他党派分享政权,曾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新政府,愿意同俄国居民的大多数联合。尽管存在分歧,但全党在以上几点提法上是一致的。

由于全俄铁的主要人员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此同全俄铁的谈判和争论,实际上是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争论。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存在分歧,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列宁实际上并不想同其他政党建立联合政府,而只是利用谈判作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另一方面,其他党派要价太高,企图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出政府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谈判的破裂是必然的。当然,如果联合政府得以成立,有可能把更多的持社会主义取向但有不同政治主张和策略主张的政党及其拥护者联合到一起来,无疑有助于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存在多党相互制约和监督,也可以避免一党独断专行,出现像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悲剧。而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革命之初,他们经常处于少数或者不多的多数的地位。例如,1917年11月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在选出的由108人组成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占81人,他们加入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12日选举立宪会议代表,选出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人获得绝大多数选票(412人),布尔什维克党获得1/4选票(183人)。这样,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随心所欲地在立宪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2页。

会议上贯彻自己的主张,这是导致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党驱散立宪会议的根本原因。

即使联合政府的设想当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作为原则列宁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分掌政权,这是确定无疑的。以后不久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1917年12月10日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安·卢·柯列加耶夫担任农业人民委员、普·佩·普罗相任邮电人民委员、伊·扎·斯泰因贝格任司法人民委员、弗·叶·特鲁托夫斯基任地方自治人民委员,费·亚·卡列宁任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阿尔加索夫和布里利安托夫获“无任所人民委员”的待遇,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他们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拥有表决权。在新的契卡中,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分别担任了正副主席。

从总体上说,直到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时为止,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相互配合是不错的。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内部甚至讨论过将两个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联合起来的问题。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争论和一党执政局面的形成

与组织政府问题时一样,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又面对党内外反对:在党内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党外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的共同论据都是为了实现世界革命反对同德国单独媾和。社会革命党领袖卡姆柯夫宣布:“世界革命将由于我们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起义而爆发。”^①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之举,其本意也是为了以这种挑衅行为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可见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对抗,而是不同策略方针上的分歧和矛盾。社会革命党人因此而退出政府,结束了联合执政的局面。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联合执政中,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参政党,而是有其自身纲领和政策方针的执政党之一,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竞争党、对手党。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政府的措施提出质询,甚至提出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当然其力量和作用远远比不上布尔什维克党。至

^①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于以后又出现从左派社会革命党分化出来的革命共产党和民粹派共产党,虽然存在过一段时间,但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相比的。

革命共产党是1918年9月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政党,他们主张同布尔什维克党共事,承认苏维埃政权。其纲领承认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认为在过渡时期应当建立劳动者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其领导人为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其代表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10月俄共中央决定接受其2000名党员。

民粹派共产党是1918年9月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分裂出来的又一个政党,它不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冒险主义政策,拥护苏俄政府的政策措施,但同俄共存在策略分歧,其领导人P.Д.查克斯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2月解散,其党员加入俄共。

由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政府。但他们的代表仍然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工作,并且不断地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粮食政策、农民政策提出批评,反对“粮食专政”的做法。在他们的反对意见中不乏合理有益的成分。

刺杀德国大使事件最后转变成叛乱,当时正在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全体成员被捕。这又引发了社会革命党的内部分裂,其中的一部分人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有的宣布退党。但该党仍然存在,在1918年11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还有一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1918年10月斯皮里多诺娃在狱中给其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信中写道:“当我们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时,决不能忘记他们已经干出了伟大的事业,在国外,全世界都站到了他们的旗帜下;决不能忘记我们和布尔什维克有共同的敌人和朋友。”^①1918年底该党宣布停止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对抗,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已经不可能。

1922年6月莫斯科开始举行右派社会革命党审讯案。当时在国外的高尔基曾写信向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提出警告说:判处死刑一定会引起“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俄国实行道义上的封锁”。他还给法国作家阿·法朗士写信,说这次审判

^①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准备杀害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真诚服务的人们”，他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府“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您的有力的呼声也许能保全那些社会主义者宝贵的生命。”^①结果该党领袖郭茨、东斯科伊等 15 人被判死刑但暂缓执行，1924 年 1 月将死刑改为剥夺自由 5 年。1923 年 3 月社会革命党人开会，宣布社会革命党解散。这样，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多党并存，甚至参加政府的局面终于彻底结束。

小 结

1. 1917 年二月革命以后的苏维埃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党派参加，所以布尔什维克虽然在苏维埃里甚至处于少数，还是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果认为在苏维埃内的政党都是反革命政党，那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归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是不会提出这样的口号的。

2. 十月武装起义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这两个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胜利的，当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起了主导作用。

3. 起义胜利后国内出现多党联合执政的可能性，这个局面由于一部分党派退出苏维埃而打破，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组成。党内出现的分歧在于是否成立一个由参加苏维埃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政府——人民委员会。

4. 那时列宁并没有提出一党专权的理论，相反地，理论上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党内和党外的分歧是实际操作性质的。由于在谈判中双方都不愿过多让步，无法达成妥协。

5. 十月革命前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是有成效的，两党的合作促使武装起义顺利地取得成功。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政党，在城乡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三个口号中，土地问题是借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来解决的，应当说两党具有共同语言，即合作的基础。很可惜这种合作因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最终破裂了，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决裂是可以挽救的，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同样存在分歧，并且导致相当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但通过适当措施最后还是取得了一致，避免

^① 《政治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3 页。

了分裂。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关系是否也可以通过继续协商予以解决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6.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分歧和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偶然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有一个基本理论:主张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由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农民一起完成,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村贫农和雇农进行的革命。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俄国的无产阶级无力单独取得胜利,因此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仅仅被看作世界革命的序幕,都必须得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他们在军事共产主义期间没有把农民看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也就不会把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看作自己的同盟者,虽然胜利之初借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

7. 在俄国这个落后国家里,进行革命必须分清敌我友,联合居民的最大多数。无产阶级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党也是少数,所以党内有一部分人总是觉得力量不够。如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联合孟什维克,至少是其中的国际主义派,党外联合社会革命党人,至少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的联合阵线马上就会在俄国政坛构成多数,成为既代表无产阶级,也能代表广大农民的组织。任何联合都会有问题、矛盾甚至对抗,问题是如何谨慎妥善处理。同党外党派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在党内:如政府组成问题、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等等。其次,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本身就存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这时候列宁强调专政是不依赖法律的政权。对布尔什维克的夺权之举其他各党派是不服气的,一直看作是少数人的政变,它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立宪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也一直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起义的口号之一就是召开立宪会议。但是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出乎布尔什维克的意料,它处于少数,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于是出现驱散立宪会议的一幕。

8. 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当时寻找的唯一支持。这就导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寻找和处理国内的各种可能的同盟者,而是千方百计地到国外去策动革命。直到列宁患病之时,列宁才看到这个希望不现实,虽然他至死没有放弃世界革命,但是已经改变对农民的看法,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联盟上,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9. 驱散立宪会议之后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代表沙皇的保皇派的力量、资产阶级力量并没有在二月革命和十月武装起义中被消灭。但是如果处理得当,在国内战争中敌人可能少一些。在国内战争中除白卫军外,站在苏维埃政权对立面的还有不少农民,特别是在国内战争的后期,农民起义蜂起,这不能不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失误所致。那时是把所有拥有余粮或粮食、在黑市(当时没有合法的市场)出售粮食的农民统统当作投机倒把的敌人,甚至把整个小生产者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敌对阶级。在政党和阶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树敌过多。尽管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过高,正因为如此,在取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不但不能庆功,反而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出现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军事基地(喀琅施塔特起义)暴动、党内争论这种空前困难的局面。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的合法性的又一个重大措施,它得到国内多数居民的认同。但是多党并存局面的消除,党内又缺乏健全的监督制度,这就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3期

十月革命：理论与实践

革命历来不会是按照事先的设计、设想进行的，而是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摸索，不断修改，逐步推进。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各种纲领，各种预案，各种设想，都在实践中经受检验，有的证明是幻想，是空想，有的证明大致正确，但仍需不断修正。有的许诺得不到兑现，或许兑现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有的设计证明是不现实的，有的构想则纯属空想。

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可以作为革命借鉴的只有几个近似的先例。

一个先例是发生在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这是此前最激进的革命。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有不少文章是研究法国这场革命的。列宁尤其推崇其中的雅各宾派，把它作为效法的对象，他的著作中经常出现雅各宾派同泥潭派的对立。1917 年 6 月列宁宣称：“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过时……”^①雅各宾派是法国革命中的激进派，在法国革命的上升阶段，一派比一派激进，后一个激进派把前一个激进派送上断头台的事例屡屡出现。俄国革命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第二个先例是 19 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巴黎公社，它被看作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从 1905 年革命开始到 1917 年二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向巴黎公社求教，《国家与革命》中有大量篇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这个存在 72 天的革命政权及其措施成了后来苏维埃政权的榜样。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274 页。

第三个先例是俄国自己的1905年革命,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创建了苏维埃。一个普通名词“委员会”(совет,苏维埃)通过1905年革命变成“崭新”的政权机关,与西方议会对立的机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一度是布尔什维克争取的目标。

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写道:

不研究法国大革命、19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1905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①

不过,十月革命仍然显得有点仓促上阵。这是因为,在二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一直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使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从而创造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前提,同时造就无产阶级大军,为推翻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力量。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列宁对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阶级力量、领导权等问题有过充分的论述。然而,究竟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则所论不多。只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谈到过俄国应当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以社会主义革命去顺便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都受到过列宁的批评。

1917年1月9日,列宁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重申以往的说法:俄国革命“仍然是未来欧洲革命的序幕”,欧洲会发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起义,会以剥夺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②二月革命后,列宁在1917年3月写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说得很清楚:“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③这就是说,直到返回俄国前夕,列宁还没有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直接提上日程。至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其他领导人,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当列宁回国后宣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要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的时候,立即受到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激烈反对,以致列宁不得不开展反对“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所谓“老布尔什维克”就是坚持在俄国继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列宁的“四月提纲”以及其他言论之所以曲高和寡,甚至遭到反对,原因就在这里。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32—33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90页。

也许是因为党内反对者众，所以列宁的某些论述并不是非常清楚明确，而是显得模棱两可。但是要在俄国搞革命的意向是很清楚的。1917年9月10—14日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直接为社会主义辩护，在“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这一章中反驳俄国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为时过早，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调，指出“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①这简直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宣言！

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到底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一时是无法给出完整答案的。为适应新的革命需要，列宁加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国家问题的研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是布哈林。列宁不同意布哈林的某些结论，特别是关于“炸毁”国家的提法，甚至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观点。从1916年底开始，列宁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整本详尽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国家与革命》的专著。列宁把重点放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上，得出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巴黎公社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结论。列宁在1917年间所提出的主要措施几乎都是与巴黎公社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四月提纲（1917年4月4日和5日）中列举了如下需要采取的措施：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苏联工人的平均工资；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等等。^②

现在我们把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前的纲领主张和革命后的实施情况，即从纲领与实践，图纸与工程，空想与现实，设想与实施，许诺与兑现的视角，作一个简略的考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218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4—15页。

立宪会议与苏维埃

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各主要政党的共同目标。在争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都曾力主召开立宪会议。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①

1917年4月4日列宁在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说:“要是明天就召开立宪会议,我是很高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唯一能召开立宪会议的政府。”^②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告——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1917年10月25日)中明确许诺:“新政权将立即建议签订公正和约,把土地交给农民,召开立宪会议。”^③

召开立宪会议,也是二月革命后各党派的要求。临时政府之所以称“临时”,是表示这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的政府,是临时的政府。甚至十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也有“临时”二字,叫“工农临时政府”。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0月25日)《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写道:“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④其发表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说“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⑤

可见,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本来也打算通过立宪会议取得自身的合法性的。但是在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中,和预期相反,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取得多数,从而失去了对立宪会议的控制权。^⑥果然,1918年1月5日,在立宪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就以237票对136票否决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宣言。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好用武力来“更正”票箱。他们驱散了立宪会议,也打破了各主要政党几十年的梦想。

实际上,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本来就是不能并存的。列宁早就认定苏维埃是新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9—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8页。

③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徐天新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8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2页。

⑥ 选举的结果在707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占370席,布尔什维克175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0,立宪民主党人——17,孟什维克——16。

的政权组织,从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8日)写道:工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专政,“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个类型的政权,其基本标志是:1. 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就是直接‘夺权’”。^①布尔什维克既然通过武装起义获得了政权,当然无需立宪会议的授权,也不会允许立宪会议来取代自己。列宁早就说过,专政是不依靠法律的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需要的是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机构,即使是苏维埃也是如此。如果说,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苏维埃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那么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苏维埃逐步变成一种贯彻布尔什维克党旨意的橡皮图章。1918年在同德国单独媾和问题上党内外发生严重分歧。在俄共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通过媾和的方针之后,苏维埃代表大会只剩下履行批准的手续了。尽管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竭力反对,也无济于事。在取缔了所有反对党之后,苏维埃更加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言堂,会上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如果说西方的议会是“清谈馆”,不管怎样多少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那么苏维埃会议除了对现成的决议加盖橡皮图章外,就是对党和党的领袖歌功颂德。

列宁非常欣赏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兼管行政和立法”,认为这取消了资产阶级议会“清谈馆”。但是执政之后其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开始时有两个并行的立法机关,除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外,人民委员会也拥有立法权,经常发布各种法令。让人民委员会立法,是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存在反对党,布尔什维克的法律草案往往无法通过,于是就绕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人民委员会直接发布法令。这种“议行合一”,这种立法与行政职能的混淆造成令出多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还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之间把立法与行政职能分开了。

国家机器中除了立法和执行,还有一个监督问题。对这个问题,列宁只提到官员随时可以撤换,以实现官员的监督。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制度和程序的保证。苏维埃政权没有设立独立的监察机关。在人民委员会中有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院),这是1920—1934年间的国家监察机关,其任务是在经济和国家管理的一切领域进行监督,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监督国家法律的执行情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9—20页。

况等。但它不是独立的机构,而是人民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并且这个机关的工作一开始就很糟糕,列宁多次表示不满。

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问题是列宁卧病期间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看到工农检察院不称职,起不了监督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作用,而更严重的是俄共作为执政党缺乏监督,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政治局不受监督。为此列宁建议,为提高工农检察院的威望,把工农检察院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党政监督机关。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人数,监察委员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提出质询、检查文件。列宁特别强调: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们“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实施监督。总书记云云,显然是指斯大林。不过列宁的方案并不解决问题。列宁逝世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确实扩大了,但是由于斯大林掌握组织大权,因此进入这两个组织的新成员并非列宁所要求的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工人和农民,而是斯大林的亲信,不仅不起监督作用,反而成为斯大林一手操纵的有力工具。在它们的帮助下,斯大林击败了各个反对派,最终实现了大权独揽。到了30年代斯大林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党的决议的执行,这样就根本谈不上监督政治局和总书记了。

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是党政关系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布尔什维克从掌权之时开始,党政就是不分的,1921年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还说:“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①

由共产党一党领导一切,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预见到的。后来列宁发觉到这种做法存在危险:一方面降低党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抑制国家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于1922年3月提出党政分开的主张,他在的一封信中写道:“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1页。

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①然而，列宁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实施，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不久苏联就出现了“书记处专政”。

纵观苏联历史可以看到，苏联由一党政府发展成一党制，由一党制演变成个人独裁制。

巴黎公社原则与苏维埃政权

列宁的四月提纲，特别是《国家与革命》，简明扼要地列举了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准备实施的措施，这些措施大部分来自巴黎公社的经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取代议会制，废除警察、常备军队，用全民武装来代替，组织“廉价政府”，废除官吏，一切官员由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公务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等等。

那么在新的苏维埃政权下，这些革命措施有几项得到实施和落实呢？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十月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成立了新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接管了临时政府的全部职能。到1918年5月列宁已经宣布，关于“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器，“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②

这个估计简单了一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质上就是要消灭旧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这个任务用革命的冲击办法是难以实现的，一个新国家机器的运转单靠改换名称和任命新的领导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批工作人员来使之运作起来。革命之初大量旧职员的罢工和怠工就给新政权造成过严重的威胁，使国家机器无法运转。而这些人一时是无法取代的。这就迫使在各级机构中保留了大量的旧职员，他们成了新的官僚的组成部分，至于从落后的俄国因袭来的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无人负责等官僚主义弊病，更是比比皆是，以至于到革命的第五个年头，列宁把当时的党政机关说成是“毫不中用的机关”，说“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38页。

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因此“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①这就等于承认，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任务尚未完成。

国家的管理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认为在现代社会管理国家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需要的仅仅是“登记、记录、检查”。^②在这种情况下，“厨娘”也能够管理国家。这里显然把国家的管理事务看得过于简单了。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也许仅靠登记、记录和检查等极其简单的手续可以管理国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国家。而像俄国这样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无论是统计还是监督都是非常困难的。苏联 20 年代的统计数字往往失实，其原因不是主观随意性，而是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尽管当时有不少旧俄留下的高水平的统计学家。后来列宁看到，管理国家、管理经济需要文化知识，在最后的文章中强调，需要普及文化知识，扫除文盲，学习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的原理。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

废除常备军、警察，实行全民武装

巴黎公社原则的重要一条是废除常备军和警察，代之以全民武装。这里的实质就是使国家不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而是由人民的大多数去镇压他们的压迫者。

十月革命后，军队没有解散，只是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由它们反映和代表士兵的利益并直接参加苏维埃政权。这时候废除常备军是不现实的，一则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苏俄政府的媾和建议未能得到各国的响应，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从旧政权接受过来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无法抵挡德军的进攻，1918 年春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工农红军。其二是国内存在反革命暴乱，必须镇压剥削阶级的武装反抗。在阶级对立仍然存在的社会里全民武装是不可能的。

在苏维埃政权下，除了镇压资产阶级以外，到国内战争后期已经动用正规红军去镇压反对粮食征收制的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了。喀琅施塔特水兵暴动是被正规红军镇压下去的。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仍然不存在全民武装。这时候存在更加庞大的强力部门，去镇压党内的反对派（哪怕是过去的或潜在的或臆想的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2、341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148 页。

反对派)、国内的异议人士以及不听话的少数民族。对内的镇压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加强了。斯大林提出,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强化国家机器,这就把他的实践上升为“规律”了。

选举制和罢免制

一切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罢免,这是列宁在革命前根据巴黎公社经验作出的多次承诺。革命胜利后这个诺言没有得到兑现。第一届政府是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但此后就没有什么选举可言了。1918年中期国内战争爆发,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所有的官员都由上级任命,党内也实行“战斗命令制”。巴黎公社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实施选举制的,而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环境下取消了选举制,自然也使罢免制化为乌有。高度“集中化”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1921年在内战基本结束的时候,俄共十大曾决定取消“战斗命令制”,实行“工人民主制”,即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在决议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进行党内批评;排斥一切委任制,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要成为一种制度,等等。^①这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折关头又一次转向巴黎公社经验的尝试。可惜决议通过之后从来没有得到实施。1923年秋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争论的时候又一次提出实施工人民主制,实施选举制,但毫无结果。

苏联的党政官员历来是上级选拔任命而不是下面选举的。正因为上级机关拥有干部的选拔权,所以掌管干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总书记斯大林手中集中了无限权力,众多比斯大林有威望有能力的政治局委员纷纷败在斯大林手中。各种选举都是一种摆设,例行公事而已。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不是通过全党的选举,也不是像有人认为是那样通过指定接班人的办法产生的,而是少数人幕后暗箱操作的结果。

廉价政府

廉价政府是巴黎公社的一个重大创造。十月革命前列宁多次强调,官员的工资应当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曾经坚持过这一原则,在粮食配给时期,各级工作人员所领取的配给份额是大体一样的。但是领取工人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4—57页。

平均工资的规定很快就打破了。1918年春开始给予专家以高薪,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列宁承认“这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①事物的发展是有自己的逻辑的。既然资产阶级专家领取高薪,那么党内专家是不是也应当领取同他们的水平相当的薪水呢?而管理他们的领导的薪金自然也不能低于专家。于是高薪逐步普及到各级官员,某些社会阶层的收入与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随着建设事业的开展,管理人员也越来越多,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官僚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留用的旧职员,人数达数十万之多。一种是苏维埃政权自己培养和提拔的干部。托洛茨基写道:“500万红军的复员,对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指挥官,在地方苏维埃、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于是群众便被排除出国家领导工作之外。^②十月革命后不久,鉴于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列宁曾多次提出精简机构的要求,但结果是越精简部门越多,职员越多。据1918年8月统计,在莫斯科的中央和地方职员共有231000人,而经过“精简”,到1922年10月反而变成243000人。当时中央各种委员会有120个,列宁认为真正有必要的只有16个。在18个人民委员部中,列宁认为工作不行的不下于15个!^③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察院负有改善国家机关工作之任务,但其自身就庞大不堪,有12000人,又干不了实事,列宁甚至认为没有比它更糟糕的国家机关了。

列宁逝世后,情况变本加厉。据官方统计,1933年11月1日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约为55万人。而据托洛茨基估计,苏联和各共和国的上层领导集团人数为40—50万,这不包括一般干部。在其下还有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人数达200万的金字塔。此外,在苏联经济部门有86万以上的行政人员和专家。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的党政主管人员在100万以上。这些人加在一起构成一个阶层,人数在500—600万之间。^④这些人的物质待遇明显高于被管理的人员。这样,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到20年,所谓“廉价政府”的理想已经荡然无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3页。

②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4页。

③ 见郑邦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④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8—100页。

十月革命的口号

大家耳熟能详的十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这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告诉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干革命、洒热血，是盼望结束战争，想要获得面包和土地”。^①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口号它没有说，这就是“自由”。严格地说，引导十月革命获胜的完整口号是“和平、土地、自由和面包”。关于自由的口号在列宁1917年的著作中不断出现。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远方来信》、《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等文章中都明确无误地提出“自由”的要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要求和平、面包和自由”^②，“工人的要求是：‘面包、自由、和平’”，列宁解释说：工人要求自由，这是因为“整个俄国彻底变成了一所大监狱”^③。可见，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俄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给人民的许诺。

十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之后，首先通过的法令是“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但鲜为人知的是苏维埃政权还通过一个由列宁签署的第三个法令，这就是后来史书很少提到的“出版法令”。

言论自由是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言论自由的保障是出版自由。

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3月5日临时政府宣布取消沙皇的报刊检查机关——出版事务总委员会。5月16日发布《临时政府公告》称：“出版和出版物买卖自由。不许对它们实施行政处罚。”当时战争还在继续，7月事变以后临时政府赋予军事部查封号召前线士兵暴动和不服从的出版物，同时开始同异议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出版物遭查封，被迫转入地下。

1917年9月15日列宁在《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中着重谈了出版自由问题。他说：“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分配。”^④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首先通过两个法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紧接着于1917年11月9日(10月27日)通过《出版法令》。“法令”承诺，“一旦新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6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7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0—231页。

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人民委员会认为,即使在危急关头,只有在绝对的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限制出版。^①

这个法令也可以看作是新政权在文化领域的指导方针,其维护的基调是出版自由,其他的所有各种有关禁令都只具有临时性质,属非常措施。它是继《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之后的第三个重要法令。只不过后来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履行法令中的诺言,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就封闭或因其他原因停刊了470家反对派报纸。从20年代初起,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越来越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也就不再提这个法令了。而在谈到十月革命的口号时删去了“自由”这一口号。

土地问题

布尔什维克在土地问题上一贯主张土地国有化。在《四月提纲》中列宁还重申:“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②但是土地国有化对农民来说不具有吸引力,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直接要求。

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更受广大农民的欢迎。为争取农民的支持,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拿来主义,在“土地法令”中直接搬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方案: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一切土地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由立宪会议来最终通盘解决土地问题。列宁就此说明:“我们既然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用谁的纲领并不重要,“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也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③

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农民因此获得1.5亿俄亩的新土地,每年免除交纳5亿金卢布的地租。

^① 《真理报》1917年11月10日,转引自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27—28.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5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351—352页。

但是，农民是否享受到这些好处呢？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全国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粮食征收制和粮食的国家垄断，这是一项非常严酷的政策，完全禁止农村的自由贸易，征粮队所到之处几乎收走农民的所有粮食。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布尔什维克党把小生产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最危险敌人，消灭小生产成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是他们收获的粮食却要全部被征走，这样，他们要土地何用！所以到国内战争后期，农民纷纷举行暴动，反对“自己的”政权，其顶峰就是1921年3月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被常备军所镇压。

列宁曾经指责临时政府说：“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但是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对农民的，逼得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①如今，苏维埃政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列宁是明智的，他承认苏维埃政权遭遇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于是立即改弦易辙，中止军事共产主义，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从而挽救了苏维埃政权。列宁由此得出结论，不能对农民施加暴力，不能剥夺农民，应当用农民所熟悉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不过不到十年时间，斯大林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

消灭私有制，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

在各项许诺中，这一条是得到认真实施的。革命胜利后，起初实行银行、大工厂企业的国有化，不久在军事共产主义下又没收了中小型企业，对富农实施剥夺，这样一来，私有制就消灭得差不多了。1918年实行粮食征收制后，禁止粮食买卖，而在城市实行食物配给制。这样苏维埃政权就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统一管起来。1921年10月，列宁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②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348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74页。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证明取消商品货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生产和分配、国民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还是得通过货币和市场机制来实现。然而,从1921年开始,执行不到十年,1929年斯大林就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从而扼杀了向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斯大林通过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从而消灭了农村的私有制。然而,私有制的消灭和全盘集体化的实现并没有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苏联的农业一直停滞不前,直到50年代初粮食产量才达到沙皇时期1913年的水平!

从多党制到一党制

二月革命后,政党开放,从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至无政府主义组织等,都获得了合法地位。这就为各种政党提供了开展活动和自由竞争的空间,可以用自己的纲领和行动来争取民众的支持。

十月革命实际上不是布尔什维克一党夺权,具体组织武装起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左翼激进派联合实施了这次武装起义。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22点40分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大会共有代表649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93人,孟什维克约80人,另外还有波兰社会党、乌克兰社会党人的代表等。大会选出的主席团中有14名布尔什维克,7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孟什维克,1名国际主义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宣读了不承认代表大会拥有全权的声明后退出大会,到市杜马大厦那里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10月26日(11月8日)代表大会召开晚间会议,选出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6名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派,3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和1名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①还规定一些名额留给以后新选出来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和军队组织代表。退出大会的诸党派也有权按照比例选派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②后来在11月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选出108人组成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

① 《十月革命——问与答》,莫斯科1987年版,第291页。

②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郑超麟译,春燕出版社1948年版,第268页。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81 人),加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到 1918 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委员 378 人,其中布尔什维克 182 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111 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派 13 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 4 人,“乌克兰社会主义者”4 人,社会革命党人 2 人,孟什维克 1 人,无政府主义者 1 人,人民社会主义者 1 人,格鲁吉亚联邦派 1 人,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 1 人,波兰社会党代表 1 人,无党派人士 12 人,还有 44 人的党派不明。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担任了部分领导工作:阿尔加索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领导外埠局,卡霍夫斯卡娅和沃洛达斯基一起领导鼓动局,普罗相和乌里茨基一起主管民族问题,而著名革命家斯皮里多诺娃领导农业部,等等。

会上成立了新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组成政府的时候,曾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由于他们还在等待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回来,所以没有参加政府,于是组成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有些政府部门留下空位,等待其他党派的人选参加,例如交通人民委员就暂缺,留待与铁路工人组织协商。所以列宁在 10 月 29 日(11 月 11 日)的中央会议上曾反复说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①

当时党内国内都有人主张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大型工会组织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简称全俄铁)要求成立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并以罢工相威胁。布尔什维克党派出以加米涅夫为首的代表团同全俄铁谈判,加米涅夫是主张妥协的。但是全俄铁要价太高,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这自然不会为布尔什维克党所接受。

不管怎么说,革命初期在俄国出现的是多党联合执政,当然起主导作用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在联合执政中,社会革命党人是有其自身纲领和政策方针的政党,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竞争对手。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政府的措施提出质询,甚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30—31 页。

至提出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当然其力量和作用远远比不上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期间,孟什维克组织继续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存在并进行活动。1919年11月其领袖唐恩曾应邀出席全俄苏维埃第7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阵线,来抗击反革命和掠夺成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进攻”。他还表示,尽管他们不赞成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策,但是“只要事关保卫革命,我们党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①

1921年3月15日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

“富农的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政党,在俄国,这些政党是在几十年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对它们都很熟悉。这里要选择的,不是让不让这些政党发展,因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这些政党;我们要选择的,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只是集中和联合这些政党的行动的形式。”^②

列宁在这里提出了关于阶级和政党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只要存在阶级,就自然会产生代表该阶级的政党,对此无法禁止,能够做到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只是如何联合这些政党。

1921年苏维埃政权出兵占领格鲁吉亚后,3月2日列宁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写道:“极其重要的是,寻找适当的妥协方法,同饶尔丹尼亚或像他那样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因为他们在起义以前并不绝对反对格鲁吉亚在一定条件下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想法。”^③

这就是说,到1921年俄国实际上存在不同的政党,而且列宁还想同他们合作。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的一党独占的理论,是斯大林后来提出的公式,正是他把一党制上升为共产党执政的规律。《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写道:“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④

托洛茨基有不同的看法,他在30年代写道:

①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印,第129—1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78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至于取缔其余的苏维埃政党，那么这决不是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理论”而来的，而是一个四面八方为敌人所包围的落后贫瘠的国家里保卫专政的措施。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清楚，这一措施（以后还加上取缔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小派别）预告了极大的危险。然而，危险的根源不在于学说或策略，而在于专政在物质上的薄弱，在于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困难。革命即使仅仅在德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其他苏维埃政党的必要性就会立即消失。说一党统治在法律上成了斯大林主义极权制度的出发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在于作为临时的军事措施的对其他党派的取缔，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失败。

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也同样如此。在英雄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和真正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其中的许多人被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了。本文作者曾不止一次同列宁讨论过下述可能性：即在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下划给无政府主义者一定的地域供他们进行无国家的实验。但是国内战争、封锁和饥饿的环境给这类计划留下的余地是太少了。^①

革命不能按照蓝图进行，理论的指导也会变形，在革命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变动，甚至与原先的设想大相径庭。这种变动有的修正了原先的错误设计，有的偏离了原先的设想，有的背离了事先的承诺。倒是不在计划之列的新经济政策，成了苏联时期最好的一种经济模式。这告诉我们，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必须顺应规律行事。偶然因素、恶的力量，在历史上是有作用的，它会阻扰良好的愿望和设计的实现。在国家和经济管理中不仅需要借鉴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而且需要借鉴整个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这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不断摸索换来的，是人类共同财富，不应轻易否定和摒弃。

十月革命过去90年了，它所创建的苏维埃国家也垮台了，今天我们在纪念它的时候，有必要冷静地考察和总结它所走过的道路，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

2007年4月28日稿^②

① 《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69—70页。

②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2007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讲。

十月革命是犹太复国运动吗？

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最近再版了。对于这样一本由一位作家凭想象撰写的著作在我国引起如此关注，是颇出意料的。中国上年纪的读者对十月革命的历史还没有淡忘，都知道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实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卡尔波夫对此并不认同，他以作家的丰富想象力，为俄国革命编写了这样一个剧本：

一个叫做托洛茨基的犹太人，娶了一个富翁的女儿，获得一大笔资产，这成了他以后的活动的资本。托洛茨基的财务赞助人是某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得知俄国即将爆发革命的消息后，立即命令托洛茨基回国，同时命令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五纵队”支持和服从他。于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得以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按：应是“彼得堡”。指出这一点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为历史著作应当具备的严谨）。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又组织托洛茨基在欧洲旅行讲演，以提高他的威望。“他们”为未来的革命培养自己的领袖并慷慨地资助托洛茨基的司令部和活动。1916年托洛茨基被法国驱逐，老板们把他们的宠儿介绍给美国的同行，托洛茨基开始在美国出版《新世界报》，当然用的是他同族的银行家的钱。另一个反对列宁的人布哈林也开始同托洛茨基合作。（按：《新世界报》是俄罗斯人布哈林先在美国创办的，犹太人托洛茨基是在这以后抵达美国的，所以创办这份报纸用的不是托洛茨基的钱，与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无关）。俄国二月革命后，“他们”立即命令托洛茨基“迅速返回俄国，掌握革命领导权，以便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图”。途中托洛茨基在加拿大被捕，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

亲自出面请求,托洛茨基才得以获释。作者认为,“这有力地表明,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的主子是同一些人。”(按:这就是说,克伦斯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过到底是哪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资助并领导了托洛茨基,卡尔波夫始终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清楚。我们只能说,这是作家的想象或者虚构!)

布尔什维克党成了犹太党?

为了替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论提供论证,书中竟然出现这样的说法:

“可以这样有把握地指责托洛茨基,说他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代理人,因为1917年他从美国归国,而在美国时他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交往,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指示和资金。托洛茨基与列宁以及后来与斯大林争夺权力的斗争进行得很顺利,包括贯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图。”(按:没有见到有人提出托洛茨基拿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钱回国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指控!托洛茨基受到指控被关进监狱也不是因为拿了外国人的钱。说托洛茨基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指示和资金”,“历史学家”卡尔波夫应当说出他的根据来!)

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按:这时候应叫“彼得格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为同德国打仗,所以把带有德国味的“彼得堡”改名为纯俄语的“彼得格勒”)组建了自己的党,“但不久他(托洛茨基)确信布尔什维克控制了革命形势,便忘掉了多年同列宁的分歧,申请加入俄共(布)。”(按:所谓托洛茨基组建的“党”是一个叫作“区联派”的小派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在托洛茨基回彼得格勒之前已经存在,托洛茨基加入了这个派,而不是组建了这个派。托洛茨基的区联派不是“申请加入”,而是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的,当时不叫“俄共(布)”,而叫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合并是在1917年7—8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实现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远远没有能够控制局势,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逃避临时政府的搜捕而转入地下,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入狱。托洛茨基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因为他是区联派的领袖,且在1905年革命中曾短期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在彼得格勒颇有声望,最重要的是那时他的基本主张与列宁是一致的。这同什么“血统相同的人”即犹太人的支持不相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曾经有一个犹太人组织,叫“崩得”,托洛茨基与之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不是犹太党!)

布列斯特和约问题

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发严重的分歧。卡尔波夫是这样叙述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维埃代表团来到布列斯特，他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关于无论如何都要签订和约的指示。（按：托洛茨基率团和谈的时候，中央委员会没有明确的指示，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的多数是反对媾和的，如果有指示的话，也是反对媾和的。托洛茨基出发之前列宁的意见是尽量拖延谈判，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签订和约。托洛茨基在谈判初期的做法得到列宁的肯定。分歧发生在德国人发动进攻之后，托洛茨基仍然坚持“不战不和”的立场。）卡尔波夫说，最后“列宁带领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被迫签订了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按：大作家在这里是信口开河了，列宁没有去布列斯特，更没有“带领代表团”去签订和约！）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托洛茨基还是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他公开承认错误，并保证与列宁无保留地合作”。（按：这是斯大林时期的思维，一个人既然“犯了错误”，自然应当被撤职，还要公开悔过，保证永不再犯。但列宁时期的逻辑不是这样的。托洛茨基不是被撤职，而是主动辞职的，列宁还多次表示挽留。人们也没有看到他的“承认错误”的声明。恰恰在这以后，托洛茨基担任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军人民委员。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是在“统一血统的弟兄们的支持”下得到的。如果像卡尔波夫所说的，“他对战略战术问题一窍不通”，那就很难理解，列宁和俄共中央怎么会把事关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军事重担交给这样一个“草包”的，而苏俄红军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草包”的领导下取得国内战争和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的。事实是刚刚组建的红军绝大多数是农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知道怎么打仗，在战场上不堪一击，为改变这种状态，托洛茨基提出使用沙俄的军事专家的主张，为防备这些专家倒戈，托洛茨基又提出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制度，监督那些军事专家。在那些转向苏维埃的旧军事专家的指挥下，红军学会了作战。托洛茨基这一做法，保证了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而反对使用军事专家的恰恰是斯大林这位后来的大元帅！关于托洛茨基的军事才能，高尔基曾经记录了列宁的一段评价：“你说，还有谁能够在一年内组建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且赢得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什么都有。所以会出现奇迹。”）

托洛茨基的“犹太复国主义”

卡尔波夫写道,1935—1938年的法庭审判揭露并证实卡普兰行刺列宁和杀害沙皇全家都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进行的。(事实是,这两件公案迄今为止仍然是悬案,俄国史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而30年代的那三次大审讯完全是捏造的冤假错案,则几乎是一致的看法。)卡尔波夫还把矛头对准也是犹太人的斯维尔德洛夫,认为他受了托洛茨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书中写道:“要是托洛茨基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没有毒害斯维尔德洛夫的话,那么斯维尔德洛夫留给人们的印象就会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和杰出的组织家。”1918年9月2日,为报复对列宁的行刺,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俄国的军官、神父、官员、作家纷纷被杀害。只能把执行犹太复国主义关于从俄国土地上清洗俄罗斯人,肉体上消灭、处决哥萨克人的行为称作种族灭绝”。(按:对红色恐怖到底如何评价,可以暂且不论,但是把红色恐怖同犹太复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倒是卡尔波夫的一大发明。)

“总之,托洛茨基在其一生的各个阶段(革命前和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之后)都是反对派分子,都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确切些说是为夺取俄罗斯而斗争。托洛茨基的整个活动清楚地显示了他直接听命于豢养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财政上和政治上的主人。而且连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由其犹太骨干实施)也与犹太复国主义控制俄罗斯的意图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在这方面两者之间可以画上一个大大的等号”。(按:这样,在卡尔波夫笔下,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所主张的世界革命理论也成了由“犹太骨干”实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

卡尔波夫引丘吉尔1919年11月5日在下议院的讲话为证:“没有必要夸大犹太国际主义无神论者在缔造布尔什维主义和真正参加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仅如此,主要的鼓舞力量和动力来自犹太族的领袖们。在苏维埃机关中犹太人多得出奇。在肃反委员会实施的恐怖体制中犹太人(某些情况下还有女犹太人)起了主要作用……”(按:资产阶级人士爱怎么说可以怎么说,但是难道可以把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鼓舞者归之于“犹太族的领袖们”!)

书中所透露出的反犹情绪太多了,卡尔波夫不得不声明:“有必要指出,我从来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严格区分反犹太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按:他当然知道,反犹太主义是种族歧视,是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出来的。但是如果把反犹太主

义改称反犹太复国主义,那就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反犹太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错误理论和实践造成的后果。”)

用犹太复国主义解释苏俄党内斗争

关于 20 年代的党内斗争,卡尔波夫同样用犹太复国主义来解释。“犹太复国主义向包括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政党和政治运动派去了密使,当时的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和改造中都加入了可以明显觉察到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腔调,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争夺权力的斗争就带有这种性质。”(按: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密使”,卡尔波夫同样指不出名字来!)

“由于列宁患病,托洛茨基主宰政治局”。(按:完全不符合事实。列宁卧病期间和去世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政治局的是为反对托洛茨基而联合起来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实上,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能够“主宰”政治局。)

“根据列宁时代确立的传统,政治局会议都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主持。”(按:错误。列宁生前政治局确实是由列宁主持的,但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是他的不言而喻的在党内的领袖地位。那时,如果列宁缺席,则由加米涅夫代为主持政治局会议,加米涅夫从来没有担任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逝世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可夫,但没有资料说明由他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一段时间内仍然由加米涅夫主持。可见并不存在这种传统。)

1924 年 1 月列宁逝世。卡尔波夫写道:由于托洛茨基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斯大林就成了与党的领袖告别仪式上的第一人。虽然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有声望。”“1 月 26 日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史称‘宣誓’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成了独特的党的纲领性文献和斯大林毕生的个人誓言。”(按:托洛茨基没有赶回来参加葬礼,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失策,他没有看到,“王位空缺”时刻是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卡尔波夫关于斯大林“宣誓”的评价是后来炒作的结果,我国年长一些的人也许还记得苏联影片《宣誓》,正是这部影片给斯大林画上列宁接班人的光环。查 1924 年 1 月 27 日的《真理报》,上面刊发了关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追悼会的消息,依次报道了大会各人讲话的摘要:加里宁(主席)、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蔡特金,最后

是加米涅夫的讲话全文。斯大林的讲话只用几句话一带而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直到1月30日，才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各人讲话全文公布。可以看出，这时候斯大林还不是“告别仪式上的第一人”。斯大林的誓言共六条，这里不准备全面评论这些誓言得到信守的程度，至少最后一条所说的“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斯大林并没有做到，他亲手解散了共产国际！)

列宁是国际主义者，当时参加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外国人，其中有人还担任重要职务。例如，捷尔任斯基是波兰人，担任了要害部门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列宁周围的领导人中有不少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当时最高层次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且地位都在斯大林之上。列宁同他们合作共事得很好。

托洛茨基的“犹太敏感症”

托洛茨基在革命中是非常注意自己的犹太出身的，担心自己的出身被敌人用来损害革命事业，在承担要职时主动提醒列宁注意这一点，以免授人以柄，此事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曾多次谈及。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要托洛茨基领导内务部门。托洛茨基提出异议，他写道：

在列举的许多理由中，我提到了民族因素：如果让敌人抓住我是犹太人这一点作为补充武器，这是否值得？列宁几乎生气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国际革命，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半开玩笑的争吵。“革命倒是伟大的”，但我回答说，“但傻瓜还是不少。”“但是我们总不能向傻瓜看齐吧。”“我们倒不是向他们看齐，但有时候难免要向愚蠢做一点让步，我们何必一开始就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

托洛茨基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接着说：“如果说在1917年及以后，我有时提及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作为拒绝某些任命的理由，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299页。

托洛茨基在另一个地方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他写道：

革命胜利的第二天，我以种族因素等为理由，拒绝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在军事方面，这个问题似乎比民事管理问题引起更多的纠葛。结果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在革命高涨的年代，这个问题是无足轻重的。诚然，白军企图在红军里利用反犹主义进行鼓动，但一无所成。在白卫报刊上可以找到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证据。

托洛茨基指出：“只有在开始对我施加政治迫害后，我的犹太籍问题才起作用。反犹主义是和反托洛茨基主义同时展开的。两者的根源是相同的，都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的反动。”^①

斯大林有没有反犹情绪？

不过，反犹主义活动始终是悄悄进行的，没有明目张胆地打出这面旗帜。

斯大林本人有没有反犹情绪？卡尔波夫竭力为他申辩。他的一个论据就是“斯大林的许多战友娶了犹太人为妻，他要是反犹主义者的话，凭他的权势，完全可以禁止他们这样做。”（按：斯大林倒是没有禁止他们结婚，他们结婚的时候斯大林也还未必拥有“禁止”的权力。不过后来却有权拆散他们——例如，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犹太人）、加里宁的妻子洛尔别格（犹太人）都被斯大林关进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加里宁、曾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犹太人妻子。至于加米涅夫的妻子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妹妹）的命运，那就不必说了。不知道这算不算反犹行为？）

众所周知，苏联在集体化过程中大搞强迫命令，使用暴力措施。卡尔波夫是怎样为斯大林开脱的呢？他写道：“反对派分子除了组织大规模暴动外，还在农民中开展挑起不满的广泛运动。”“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镇压富农，而且还镇压中农和贫农。”“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全国各地的居民实行了种族灭绝。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被投进监狱和劳改营。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的人至今提起集体化仍极为气愤，而这应该由反对派分子负责。”（按：卡尔波夫这里承认了集体化期间曾经实行过“种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15—316 页。

族灭绝”，引起民众的气愤，但认为不应当由总书记斯大林负责，而应当由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存在的反对派负责。或者退一步——“在实施集体化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犯下的错误应当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担。”不过，要知道，在斯大林进行全盘集体化的时候，托洛茨基已经被驱逐出国。集体化的“成绩”肯定与他无关，已经不在国内的托洛茨基怎么能为斯大林分担错误呢？)

可以总结一下卡尔波夫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说法：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和派遣犹太人托洛茨基回到俄国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托洛茨基不负重望，不仅打入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在苏维埃政权中爬到第二把手的位置，纠结一帮犹太人如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把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变成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列宁让一帮犹太复国主义者进入党的政治局，篡夺党政大权，多亏斯大林明察秋毫，看穿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拯救了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乃是一场斯大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斯大林确实同各种反对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像卡尔波夫所描绘的那种斗争，恐怕连斯大林本人也不敢认同，至少在《斯大林全集》中是找不到此类言论的。

但是卡尔波夫还是高度评价了所谓斯大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认为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明白了以‘世界革命’为旗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并且敢与之作斗争”，“斯大林拯救了国家，打退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他的这一胜利可以与战胜1941—1945年德国入侵的胜利等量齐观”。（我们见过托洛茨基犯有“N宗罪”的指责，但卡尔波夫加之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罪，则是头一回听说；我们见过歌颂斯大林伟大功绩的各种说法，但是歌颂斯大林“战胜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功绩”，并且认为其意义等同于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还是第一次。读者应当感谢这位大作家的“伟大发现”！卡尔波夫更伟大的发现是把十月革命后列宁推行的“世界革命”变成“以‘世界革命’为旗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

文化界班头睁眼说瞎话

这样一部“崭新”的俄国革命史，苏维埃国家史，读者能够相信吗？然而，就是

这样一本书在我国曾大吹大擂地说成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客观地描写斯大林的作品”。最近《大元帅斯大林》再版了。某院长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写了一篇《还历史以真实》的书评，“郑重推荐《大元帅斯大林》一书”。想来这位院长也在“郑重推荐”卡尔波夫的这一奇特的十月革命观！

卡尔波夫在斯大林时期曾遭逮捕的一段插曲成了他客观公正书写历史的一个“证据”。卡尔波夫确实坐过斯大林的监狱，但是不要忘记他很快得到了平反，不仅如此，他还担任了苏联作家协会的第一书记。不要轻视这个职位，这是文化界的班头，是“在册权贵”。他享受了一个“在册权贵”所应享受的一切，他享有一般文人所无法享受的特权！评价一本书的好坏不能依据作者本身的经历，而应当考察作品本身的优劣，作为一本史书，更应当考察所举事实是否有根据，是否符合历史实际。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达尼洛夫林对此书有一个说法：“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中对斯大林及其全部活动的颂扬是不能用无知来解释的。他在卫国战争期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但是任何称号都不能为这位眼睁睁地说谎，不惜伪造文件的作者开脱。”^①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7月3日

^① 达尼洛夫：《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社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1期。

列宁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的意义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①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伟大目标，也是多年来无数被剥削人民的善良愿望。但是，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指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这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下，俄国的十月革命第一次开始了人类的这一光辉灿烂的事业，使几千年来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劳动人民变成真正的人，使他们变成历史的自觉创造者。

像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要实现这一理想是有很多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文化落后。十月革命前后，曾经有不少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俄国文化水平太低，无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坚决驳斥了这种论调。他指出正因为落后，所以要立即实行革命，用革命手段取得提高文化的前提，以便迅速彻底地改变落后面貌。俄国、中国的经验证明，要想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是不可能的，在那里文化知识为统治阶级所垄断，人类文化的一切成果只是他们进行残酷剥削的工具。资本家给工人一点起码的科学常识也只是为了让工人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利润。在谈到俄国文化落后时列宁指出：“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这样的粗野不是偶然的，这在地主的压迫下是不可避免

^① 我1959年底到中央编译局工作，1960年适逢列宁诞辰90周年，姜椿芳副局长要我写纪念文章，我写了三篇交差。第一篇就是本文，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值得纪念。另一篇是《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这篇文章由于讲阶段论太多，不合时宜，被毙了。第三篇不记得什么题目了。

的……”^①这里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民落后愚昧的根本原因,因此不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精神文化生活上也是永无翻身之日的。

但是列宁紧接着指出,如果说文化落后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落后就是大敌了。不是偶然的,1921年列宁在一个报告中把文盲当作当时的三大敌人之一。随着政治变革的完成,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必然会提出提高广大人民文化水平、实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列宁说:“我们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任务以后,又面临着另外一些任务,即所谓‘小事情’的文化任务。”^②这是个必然的规律。毛主席一再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高潮在我国已经到来,文化革命正在我国蓬勃展开。

文化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实行文化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解决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物质生活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必须把他们从几千年来的落后愚昧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享受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培养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新的社会,新的生活。因此我们的文化革命与以前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有根本的不同。启蒙运动者也提出普及知识、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但是,他们只是把知识赐给群众,他们幻想仅仅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来把群众救出贫困落后的苦海,这当然是极不现实的。而列宁一直认为我们的文化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必须由他们自己动手,由他们自己解放自己,而这解放是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密切相关的。我们文化革命的特点是广大群众对文化的自觉要求。在1918年列宁就及时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已经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受到挫折就是因为缺少教育,现在要使大家都能真正受到教育,全靠他们自己。”^③目前我国广大群众对文化知识如饥似渴的要求,完全证明了列宁以上论断是正确的。

① 《列宁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版第28卷,第70页。

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普遍提高,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首先,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它必须促使人们在精神生活上也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在旧社会,统治阶级给予人民的是愚昧迷信,是宣扬剥削制度的万世长存。为了这目的,他们动员了一切文化宣传工具来毒化人民的思想意识。显然,这一切是与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必须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以便使广大群众与传统的偏见习俗作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列宁认为要达到这目的,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列宁说:“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因此他一再强调:“要进行政治教育就无论如何要提高文化。”^①因为只有在这基础上,无产阶级政权才能通过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等向广大人民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

其次,革命以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这样,他们必须担负起管理庞大的国家机器、管理复杂的生产的任务,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固然,在革命初期,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权迫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劳动人民作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家。列宁认为不这样,人民就不能真正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最后战胜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保证,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列宁认为“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否则是不可想象的。而为了掌握它,首先必须继承过去的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列宁多次教导说:“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②要继承这些遗产就必须好好学习。但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远远不只是继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还必须建设起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来。在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些人所能杜撰的之后,列宁说,无产阶级必须在继承过去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化”。^③这是一个极其艰巨而又非常必要的任务。

① 《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59、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83页。

文化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列宁在谈到此问题时经常把它和消灭城乡对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联系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城市文化总是高于乡村,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应该帮助乡村、工人应该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而这一切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消灭城乡对立。还在1901年列宁就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的任务,他说:“认为这样做就是抛弃科学艺术的宝藏,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为了使这些宝藏成为全体人民都能享受的财富,为了消灭千百万农村人口同文化无缘的现象,为了消灭马克思正确指出的‘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①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进一步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在文化革命中明确地提出了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的任务,指出要实现文化革命就必须实现工农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任务。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正由于以上原因,还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就向广大青年提出学习的任务,并且认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在谈到从哪儿学起时,列宁指出,首先必须学习读书和写字的本领,必须扫除文盲。文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敌之一,他说:“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解决,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很可笑的。”^②要继承过去的文化,要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都迫切要求迅速扫除文盲。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马上开展了扫盲工作。第一个步骤是实行文字改革。1917年12月23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了改革俄文拼写法的指令。俄文虽是拼音文字,文字和语言大致相适应,但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已沿用了几百年,有些字母符号已经与现代口语脱节。因此指令规定去掉那些不必要的字母,使文字更接近于口语,更便于工农学习。接着在1919年1月,列宁签署了《关于扫除苏俄人民中间的文盲》的命令,规定8岁至50岁的公民都必须学会阅读和书写俄文或其本民族语言文字。同年,根据列宁的倡议,开办了大学预科,以后又先后成立了“全俄扫盲特别委员会”、“志愿扫盲协会”。列宁盼望有一天会出现文盲绝迹的奇迹,他说:“我们无论在军事方面或其他方面都创造了奇迹。我认为,如果能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本身彻底扫除掉,那就是这些奇迹中最大的奇迹。”^③他一再强调,

① 《列宁全集》第1版第5卷,第132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55页。

在一个文盲的国家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苏联人民遵循列宁的指示,在1940年彻底消灭了文盲,做到了人人知书识字。正因为苏联人民首先走了这一步,所以才能继续跃进,才有今天走在世界最前面的苏联科学文化。

我国人民现在也正面临着巨大的文化革命的任务,解决这一任务对广大人民来说第一步也必须是扫除文盲。我国众多的文盲是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的结果,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困难之一。我国扫除文盲碰到的困难要比苏联多。他们用的是拼音文字,怎么讲就怎么写,而我国汉字却是难认、难记、难写的象形文字,这是造成我们文盲众多的另一原因,这是我国扫盲中的特殊困难,但是,这难不倒我们。解放后,我国人民正像列宁所形容的那样迫切要求文化知识,人民公社的建立为消灭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中的文盲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都是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中国的汉字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通过几年的实践,已经摸索出改革的几个初步步骤: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措施的实现大大便利了扫盲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各地的经验证明,用拼音字母注音的办法来帮助扫盲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捷径。

当然,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要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还必须作更大的努力,还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但是,为了攀登高峰,就必须先迈出第一步,就必须会读能写。

困难会有的,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一旦当了家作了主,一旦认识到知识对他们的重要性,那么他们一定会表现出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排除一切阻挠,攀登科学的顶峰,为人类创立前无古人的辉煌的文化。列宁给我们指出了道路,苏联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更好地学习列宁的教导,以最快的速度改变文化经济落后的面貌,赶上并走到世界先进文化的最前列。

《文字改革》1960年第8期

苏俄实施“公妻”的神话

1918年春，萨拉托夫市的街头巷尾粘贴着一个文告，此文告模仿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的形式，叫作《萨拉托夫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取消私人占有妇女的法令》。《法令》全文如下：

萨拉托夫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取消私人占有妇女的法令

迄今为止存在的合法婚姻无疑是在苏维埃共和国里必须予以根除的那种社会道德的产物。迄今为止的合法婚姻是资产阶级手中同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这种武器使所有漂亮的女人成为帝国主义资产者的私有财产，从而破坏人类正常的生育延续。有鉴于此，萨拉托夫省人民委员会获省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批准决定：

1. 自1918年1月1日起废除长期占有17岁至39岁妇女的权利。

注：妇女的年龄根据出生证、护照确定，如缺此类证件则由街道委员会或领导根据外貌特征确定。

2. 本命令不适用于有五个或更多子女的已婚妇女。

3. 原占有者（丈夫）有优先使用自己妻子的权利。

注：如果原丈夫抗拒该法令的实施，则剥夺其享受本条文之权利。

4. 适用本法令的所有妇女不再是私人长期占有物，而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5. 主管转让妇女的机构是省、县和村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

6. （缺）

7. 男公民使用妇女的权利每周不得多于4次,每次不得超过3小时,并需遵守以下规定。

8. 每一位劳动人民必须从自己的工资中扣除2%作为人民基金。

9. 每一个想要享受人民财富女性者必须提交工人工厂委员会或者工会出具的其属于劳动阶级的证明。

10. 不属于劳动阶级的男人如欲获得享受转让的女人的权利,必须按照第8条每月给基金缴纳1000卢布。

11. 所有被本纲领宣布为全民财产的妇女每月从人民基金领取周济金280卢布。

12. 怀孕妇女免除其义务(直接的和国家的)4个月(生育前3个月和产后一个月)。

13. 出生后一个月的婴儿交“人民托儿所”抚养,在这里接受教育到17岁。

14. 生育双胞胎者奖励200卢布。

15. 传播花柳病者将由革命法庭判定其应负的法律責任。

(Арх. УФСБ Орл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дело № 15554-П)

“法令”公布的日期是1918年2月28日,规定从1918年5月1日起实施,并由萨拉托夫的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执行。

这份以萨拉托夫省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布的“法令”,实际上是“俄罗斯人民联盟”成员米哈伊尔·乌瓦罗夫伪造的文件。乌瓦罗夫是萨拉托夫市一家茶馆的老板。其动机是什么,是为了抹黑苏维埃政权还是要嫁祸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现在已无法查考。

“俄罗斯人民联盟”成立于1905年,中心在彼得堡,各地有500多个分支,是一个黑帮保皇组织,持沙文主义、反犹、反议会制,支持统一不可分割的俄国的立场,二月革命后被查禁,但其党徒仍在各地活动。

这项法令在该市引起轩然大波和各界的强烈抗议。1918年3月初,萨拉托夫一群愤怒的人,主要是妇女,包围了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所在的交易所大楼,他们高喊“恶棍!”“流氓!”“无耻!”,冲击紧闭的大门,要求进入大楼。最后人群破门而入,冲进俱乐部,砸烂遇到的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从后门四散逃窜。

1918年3月初《萨拉托夫苏维埃消息报》刊载一条消息称,一帮匪徒抢劫了米

哈伊尔·乌瓦罗夫的茶馆，杀死其老板。不久，3月15日，该报又刊载了一篇短文，说杀乌瓦罗夫的不是匪帮，而是约二十来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支队，其任务是搜查茶馆并逮捕其老板。支队的成员杀死了乌瓦罗夫，他们解释说，乌瓦罗夫假借无政府主义者名义发布色情的《妇女国有化法令》，由此引发市民来捣毁无辜的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杀他是为报复而采取的“复仇和正义行动”。他们认为把这个“俄罗斯人民联盟”成员、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监狱里“既危险也没什么用处”，所以一杀了之。萨马拉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还粘贴公告对所谓“妇女社会化”进行辟谣。

处死乌瓦罗夫并没有终结此“法令”的历史。“法令”迅速在全国各地流传，被多家报纸转载。一些报纸转载此法令是作为谈资取乐，另一些报纸则是为了败坏苏维埃政权以及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声誉，转载这种东西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例如，在维亚特卡，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维诺格拉托夫从《乌法生活报》转抄了此《法令》，以《不朽的文献》为题刊载在《维亚特卡边区报》上。4月18日维亚特卡省执行委员会决定查封该报，与转载此文件有关的人员被送交革命法庭。同日，问题被提交省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会上所有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党派——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都强烈谴责发表此谤书，认为其目的是毒害无知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取消省执行委员会查禁报纸的决定，认为决定过于严厉，责成执行委员会给编辑以警告处分。

4月底至5月上半月，经济破坏和粮食短缺加剧了苏俄国内形势。许多城市发生工人和职员骚乱，“饥民”暴动。而报纸刊载《妇女国有化法令》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苏维埃当局对刊载此法令的报纸采取了严厉的惩处措施。然而，当局未能完全控制其流传。开始出现不同的版本。例如传到弗拉基米尔的“法令”变成18岁以上的妇女国有化：“所有达到18岁而没有出嫁的少女为免于惩罚必须到自由爱情局登记。给予登记者选择19至50岁的男人作为同居者或夫妇的权利……”在边缘地区的农村，某些热心的无知领导把此伪造的“法令”当真，打算将之付诸实施。

苏维埃政权对此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1919年2月，列宁收到库梅斯尼科夫、巴伊马诺科夫、拉西莫娃三人对库尔梅什县奇姆别列夫镇梅季安内村的贫农委员会的控告信。他们写道：贫农委员会控制青年妇女的命运，“把她们交给自己的好友，而不征得其父母的同意，也不顾及正常的理性要求”。列宁立即打电报给辛比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和省契卡：“立即严

格检查,如得到证实,逮捕罪犯,应当严厉迅速惩处恶棍,并通告全体居民。请电告执行情况。”(В. И. Ленин и ВЧК, 1987. с.121—122)辛比尔斯克省契卡进行了调查,确定梅季安内村并未实施妇女国有化,契卡主席于1919年3月10日电告了列宁。两周后,辛比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吉莫夫给列宁打电报肯定了契卡主席的报告,并补充报告说,“库梅斯尼科夫、巴伊马诺科夫住在彼得格勒,梅季安内村谁也不认得拉西莫娃”。(同上,第122页)

国内战争期间,白卫军方面也利用此“法令”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说其作者是布尔什维克。1920年1月高尔察克被逮捕时,在他的口袋里曾搜出此“法令”的文本。

1919年4月4日邓尼金签署了关于成立“俄南方武装力量总司令属下调查布尔什维克暴行委员会”的条例。一年后邓尼金倒台,委员会改由白军司令弗兰克尔领导。根据条例,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向整个文明世界揭露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的破坏活动”。委员会拥有询问受害者和证人,进行视察、搜查、查抄等权力,委员会所作的记录具有证据的效力。

1991年苏联《祖国》杂志刊登了该委员会的一些调查案卷,其中第18案卷为“关于叶卡捷琳娜达尔市根据苏维埃政权的证书实施少女和妇女社会化的侦查文件”。其内容如下:

1918年春布尔什维克在叶卡捷琳娜达尔市发布法令,该法令刊载在《苏维埃消息报》并张贴在街头,其中规定16至25岁的少女应予“社会化”,想享受此法令者可向有关革命机关提出申请。此“社会化”的发起者是内务委员犹太人勃朗施坦,由他发放此“社会化”证书。发放此证书的还有他属下的布尔什维克骑兵队长科布泽列夫、司令伊瓦谢夫以及其他苏维埃当局,证书上盖有“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的图章。证书发给红军战士和苏维埃官员,例如卡拉谢耶夫,他是勃朗施坦住所的管理员,根据此证书有权“社会化”10名少女。证书样式如下:

证 书

本证书持有者卡拉谢耶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琳娜达尔市社会化由卡拉谢耶夫同志选定的10名16至25岁的少女。

总司令伊瓦谢夫

盖章处

红军战士根据此证明抓了 60 多名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和当地学校的漂亮年轻的少女。有些人是红军在市公园围捕时抓到的,其中 4 人就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遭到强奸。其他约 25 人被带到勃朗施坦的住所,其余的人被带到科布泽列夫的“老商宾馆”和水兵居住的“波利斯托尔”宾馆,她们在这些地方遭到强奸。有一些被捕者后来获释,例如一名遭布尔什维克刑事侦查警长普罗科菲耶夫强奸的姑娘获释,其余被交给红军战士,她们以后的遭遇不明。最后,某些人遭受各种残酷折磨后被杀害,扔到库班河和克拉松河中。例如一名叶卡捷琳娜达尔中学五年级的女生在 12 天内遭受一批红军战士的连续轮奸,然后布尔什维克将她捆绑在树上,用火烤,最后予以枪毙。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受害者的名字没有公布。

此材料由特别委员会在遵守刑事诉讼法条例之要求下搜集到。

1919 年 6 月 25 日写于叶卡捷琳娜达尔市

这就是苏联解体后被多方引用来证明苏俄实行过“妇女社会化”的苏联《祖国》杂志 1991 年第 10 期所刊载的资料。不过,这份“侦查文件”显然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事件:一种是所谓“妇女社会化”,另一种就是通过暴力实施的强奸罪行。此文件开始说的是“妇女社会化”,而所举的例证则是军人的强奸暴行。后者不足以证明出现过“社会化”的事实。此外,这里的“证书”显然是从当时社会流传的不同版本的“妇女社会化证书”抄来的,证书上虽然有名有姓,但没有盖章,并非有效证件,只是展示一种“公文”的示意图。文件所列举的围捕和强奸妇女的暴行同“社会化法令”无关,没有“社会化法令”军人照样可以实施此类暴行。这种暴行应当受到谴责,但不能证明实行“公妻制”。

“妇女社会化”的说法也流传到国外,说布尔什维克消灭家庭和婚姻。1919 年 2—3 月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讨论俄国情况时,在参议员金格和从苏俄回来的美国人萨蒙斯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金格:我见到过某些苏俄法令的俄文本和英文译本。他们实际上是在消灭婚姻和实施所谓的自由恋爱。关于此事您知道点什么?

萨蒙斯: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纲领。在我们离开彼得格勒之前,他们(如果相信报纸上的报道的话)已经确定了相当明确的调节所谓妇女社会化的条例。

金格：直截了当地说，布尔什维克红军和布尔什维克自己可以抢夺、强奸和枪毙随便多少妇女？

萨蒙斯：当然，他们在这样做。

对话全文载入于1919年公布的参议院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但是从萨蒙斯的证词看，他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因而举不出任何一件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实施“妇女社会化”的具体事实！

对共产党人主张“公妻制”的指责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就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予以驳斥。他们写道：

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已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①

顺便说一下与“公妻制”直接相关的“一杯水主义”。人们往往把它同“妇女社会化”联系起来，作为“妇女社会化”的思想道德基础。实际上，这是两码事。所谓“一杯水主义”说的是否定爱情，把男女性关系归结为需要“无条件地得到满足的”本能的性要求，作爱犹如喝一杯水那样简单，这很像我们社会出现的所谓“一夜情”。“一杯水主义”在苏俄初期曾经流行一时，但同“妇女社会化”无关，它恰恰是女权主义的产物，反对把妇女当作男人的附属物、工具，因此同所谓“妇女社会化”不沾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0—291页。

列宁对“一杯水主义”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他同蔡特金的谈话中说,你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种“一杯水”主义已经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简直发狂了。这种理论是许多青年男女的恶劫。信奉这种理论的人硬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谢谢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吧……我认为这个出名的“一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在性生活上不仅表现出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而且也表现出文化的特征,不管它们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①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对“妇女社会化”和“一杯水主义”都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布尔什维克在历史上自然犯过不少错误,但是不能把什么罪恶都强加于他们,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

^① 《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工人民主制

——列宁时期党内组织原则的演变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谈过民主集中制

《共产党宣言》在谈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写道:在未来的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需要自由和民主是应有之义。在苏共存在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有关党内民主的争论,但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党内状况,争论每一次都是以集中制或高度集权的方针占上风告终。

有一个说法,认为民主集中制源自马克思恩格斯。这是苏联时期理论界制造出来的概念。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即中文第1版)名目索引中单列了一条“民主集中制”,但没有标出具体的卷次页码,而是“见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按图索骥,找到无产阶级政党条内的“组织原则”,按其中所指各卷页码查阅,始终没有发现“民主集中制”一词,看到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章程的一些论述。但那里说的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例如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中写道:“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照这样的民主制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1847年12月8日最后通过。”^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51—252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倒可以看到对“集中制”的否定。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草案中规定实行集中制,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致施韦泽的信中批评说:“至于章程草案,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①

看来苏共马列研究院的专家们,把马恩所谈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民主制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混为一谈了,他们需要从马恩的论述中找到列宁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根源,或者说,从老祖宗那儿找到根据。这是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的一种学术风气。

集中制以及围绕集中制的争论

“民主集中制”一语源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过最初出现的名词是“集中制”。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针对俄国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针对党内的分散的小组习气,针对党内有人要求实行“联邦制”的主张,列宁坚决主张建立一个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内实行由铁的纪律来维护的集中制。列宁在《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一直强调要建立严格集中制的党组织,强调秘密工作和职业革命家的作用。这里的集中是针对分散而言的。列宁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有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1899年,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②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指出:《火星报》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之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③他在《怎么办?》一文中反对在党内实行“广泛民主原则”,他认为实施“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④而这两点在沙皇专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55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3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31页。

制度的压制下是做不到的。

然而当时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托洛茨基等人都不同意列宁的“集中制”方针,他们担心,这种集中制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少数人的独裁。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企图建立“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德把这种集中制叫作“官僚的集中制”、“机械的集中制”。^①

对集中制提出系统的批评意见的是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一文。她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制”,指出这种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而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②这是“布朗基式的密谋主义的集中制”。

她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党的核心和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卢森堡担心,这样的集中制有可能变成把工人阶级降低为委员会执行工具的“官僚集中制”。^③

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一文中也强调,必须防止集中制变成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下,工厂实行的是兵营体制,然而“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或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因为,当无产阶级能够

① 阿克雪里罗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见亚·阿谢尔:《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印,第53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17页。

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这是非常清楚的。”^①托洛茨基相当有预见地指出:“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办法将导致下列结果: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之间”展开公开的竞争,工人阶级不会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②

那时有人提出,如果中央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列宁承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认为只有“同志式的影响”才能防止。“开始时可由各个分组作出决议,随后由它们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直到最后(在最坏的情况下)推翻完全无能的当权者。”^③由于那时还没有真正碰到这种问题,列宁显然把问题想得简单了,后来的历史证明,对于这种因高度集中制而大权在握又滥用权力的人,“同志式的影响”是无济于事的。

反对者的主张,简而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实行民主制,发扬民主,发挥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极端重要的。但他们在关注未来的危险时,却忽视了俄国当时的环境与迫切任务,这就是在反动的俄国夺取政权的任务。

“民主集中制”的出现

列宁主张集中制,他认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则”,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针对反对者的指责,列宁指出,他所主张的集中制不是“官僚的”集中制,而是“民主的”集中制。这里,“民主的”是相对于“官僚的”而言的,其基本落脚点仍然是集中制。

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革命的压力下,沙皇发布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公民享有全部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这就开始改变了革命者活动的社会环境。由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肯定了“民主集中制”。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唐恩等人也都认为,只有一个严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40、80页。

② 丹尼尔·史密斯:《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9页。

格集中的组织才能成功地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所以反而是孟什维克在1905年11月首先使用了“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以区别于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

1905年12月召开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其第1条写道:

“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决议还认为,二级选举制“不符合完备的民主制的做法”,只有存在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容许。^①

这里确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包括:选举制、选出的机构可以更换、公开性、报告工作制以及选出的机构的领导权。就实质而言,这与民主制并无多大差别。

1906年4月召开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参加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中有一项为“党组织的基础”,其中写道,“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在目前条件下虽然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是可以实行的,因此建议: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予以贯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由选举机构遴选,等等。^②

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入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大会后列宁就大会决议写道:“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③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就是说,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两大派已经达成一致。

这时候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开始谈论民主、选举、公开性,是因为经过1905年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争得了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用列宁的话说,“赢得了一半的自

① 参见《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19页。

②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3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62页。

由”。“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①社会民主党也确实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尝试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1907年由列宁本人编辑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收入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删去了近一半的过时内容。^②1907年9月列宁重申,“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③可以看出,组织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环境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

不过由于1905年革命的失败,沙皇反动镇压的加强,昙花一现的“民主”随即烟消云散。由于反动当局的高压,国内不存在公开活动的可能性。1907年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再也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存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大派别,而在不同时期每一个派别内部又存在若干个小派别,党内根本不存在统一的纪律,各派自行其是,既无民主,也无集中可言。不过作为党内一派的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始终实行高度的集中制。也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保证了它所领导的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国内战争中的“战斗命令制”

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走出地下,成为执政党,按理说可以实现广泛的党内民主了。事实不然,不久苏俄爆发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宣布全国为“军营”,而作为这一军营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实行党组织的“军事化”,在其内部实行“战斗命令制”,即“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的集体机关的紧缩”。按照这种战斗命令制,党的领导机关发出的战斗命令,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公开性根本谈不上,定期报告工作制无法实施,等等,这一切是战争环境使然,是保证胜利的需要,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8页。

② 删去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斗争和中央机构人选斗争的部分,对其他各节也作了某些压缩。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97页。

布哈林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这种制度有几个特点:极端的集中制,冻结党组织的一切集体机构,取消各种争论,等等。在国内战争期间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军事集中制,工作方法是战斗命令制”。^①一切服从于军事需要。这是“集中制”或者“民主集中制”的最极端的表现。

不过即使这样,在列宁领导下还是尽一切可能来运用民主机制,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性,例如在战争岁月每年按期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还不断召开中央全会。重大的问题都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最后是由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拍板的。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1919年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各项迫切的问题之外还列入了看起来并不那么迫切的党纲问题,在会上就党纲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种做法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战斗命令制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国内战争时期,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化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命令制变成了压制的形式,必要的战时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借,党机关的必要紧缩削弱了党内的精神生活,等等。用列宁的话说,集中制变成了“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以,一俟战争基本结束,实行党内民主问题马上提上了日程。

“工人民主制”及其命运

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家开始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这时候一些党内人士和派别提出需要根据形式和任务的变化,废除“集中制”和“战斗命令制”,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具体讲就是“工人民主制”。

党内出现一个“民主集中派”,强烈要求改“集中制”为“民主集中制”,实行“工人民主制”,加强党内民主。“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人物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曾长期主张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每一次都否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民主集中派的另一位领袖奥新斯基撰文指出:我们早就主张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他解释“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说:这种民主要求:1.把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第226—227页。

尽可能多的问题的讨论、决定和贯彻执行,集中在广泛的开放的委员会,而不是集中在狭小的封闭的委员会内,或者甚至集中在个别人手中。2.如把执行权同立法权分开的话,那么执行机关应切实对广泛开放的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3.一切经选举产生的机构都要经常改选、向选民报告工作、吸引群众参加这些机构的实际工作,等等。4.政权机关要接受工农舆论的监督,为此,这些机关的会议应公开进行,工人和农民应当有可能在报刊上或在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还提出,要使党内派别合法化,“没有各种意见的交锋,没有各个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他的根据是,国内没有反对党,作为替代,党内应当有派,它们应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受任何迫害。“只有这种合法化能够保证实行执行机关报告工作制和负责制,才能保证我们实行共同的监督,如果没有这种监督,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工人民主。”^①他们对“无产阶级民主”、“工人民主”的呼唤是颇有代表性的。他们关于反对派合法化的要求现在听起来似乎离经叛道,然而就在提出这个要求后不久,党内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就合法地出现许多派别,甚至列宁也参加了一个叫做“十人纲领派”的派别。

1921年春天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下举行的。会前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反对粮食征收制的农民暴动,有工人群众对军事共产主义不满的罢工风潮。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作为革命堡垒的喀琅施塔得爆发了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要求之一就是实施“工人民主制”,实行选举制。而在此前党内又爆发了把高层领导人统统卷入的工会问题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在农村废除粮食征收制,一个是在党内抛弃军事命令制。面对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十大不得不匆忙宣布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

大会讨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通过了一个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代表中央作报告的是布哈林。他说:“现在我们在党内应当实行工人民主制,它可以表现在选举制、广泛的争论,等等。这符合党的自我教育

^①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101等页。

任务。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局势要求解决的任务,是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必须建立工人民主制来解决这一任务。”谈到关于党的建设的提纲时,布哈林说:“在制定提纲时我们的出发点是,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都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从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不能认为某种组织形式或者相应的工作方法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是最优秀的,最合适的,最可以接受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这些组织形式也好,工作方法也好,都取决于党工作所处的那时刻的条件,党在该时刻所面临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①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决议的导言写道: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

根据这一重要观点,十大作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议。决议认为,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等。工人民主制度的工作方法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决议对党内生活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从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要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要把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作为一种制度,普通党员可以出席这种会议。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报告工作。上级党的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一步做出的指示或指令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等等。^②

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阶段的时候,打算中止建立在集中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工人民主制”,从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第231、218页。

②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9—63页。

应当说,这是苏联共产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好的一个决议。贯彻这一决议无疑能够防止个人专权,可以做到集思广益,广泛调动全体党员积极地创造性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然而与此同时,代表大会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是针对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党内派别林立的情况作出的决定。决议规定禁止一切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织成的集团。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决议的第7条规定:如果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①

列宁和大会代表意识到此决议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担心会被滥用,所以对涉及中央委员的第7条作了特别限制,规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全会,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需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同时还规定,决议第7条不公布。列宁在1921年3月16日的一个简短的发言中,三番两次地强调,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不希望动用。他解释说:“我们提议不公布第7条,是希望不用这一条,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列宁严肃指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②然而,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中央全会开除中央委员几乎成了惯例,成了家常便饭。

这涉及中央委员会同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自然无权开除自己的委员。

由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俄共十大代表的选举是按不同纲领进行的。在讨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时,梁赞诺夫曾建议对草案作如下补充:“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任何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地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这又涉及代表大会的权力了。列宁不同意这种提法,他反驳说:“这次代表大会对下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如果出现像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的意见分歧,那又得按不同纲领进行选举了。这是无法禁止的。“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3—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97页。

法实现的。”^①列宁是非常注意党内民主的程序和准则的。

俄共十大本意是要根据已经出现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扩大党内民主,使党的生活走上正常的道路。这是同经济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同步的措施。只有党内生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国内生活民主化则是社会主义本身所要求的。然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通过,大大冲淡了民主的气氛。在以后的宣传中只提禁止派别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而根本不提“党的建设的决议”,以致很长时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十大还有一个主张实行“工人民主”的决议。“禁止派别”变成了压制批评,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借口。

结果,俄共没有能够为经济上的改革准备好一个较为民主自由的环境,没有能够使俄共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后来列宁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他口授的“政治遗嘱”即最后书信和文章中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建议。^②然而这时候列宁已经重病不起,他的建议始终停留在文本上,而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10月第13卷第5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0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7页。

十月革命后俄共背离自由民主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需要自由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东西,自由是民主的前提,要有表达的自由,表示赞同、反对或弃权的自由,争论的自由,才有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作出正确的或较为符合实际的决定。言论自由是各种自由的基础,没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众口一词,舆论一律,就没有民主的可能,那是“一言堂”,是独裁政治。扼杀民主必然从扼杀自由开始。

俄共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多年里逐步取消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教训。

对农民的让步与“最后的斗争”

1921年,在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党放弃粮食征收制,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以粮食税为起点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农民的巨大让步,史称“农民的布列斯特”。这一让步意义巨大,促使布尔什维克党走上承认并利用商品、货币、市场机制的道路。

但是政治体制并没有随之改变。心有余悸的俄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并不放心,特别是实行贸易自由之后。列宁在1921年、1922年多次说过“最后的斗争”是同农民的斗争:

要是问究竟我们今天是同谁进行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那么唯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同我们自己家里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斗争。^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30页。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处于绝对少数的国家。以两三百万无产者统治一亿多农民,而这个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管理水平又不高,所以实际情况是,由人数不多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来代替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管理国家的大权集中到少数领袖手上。这是列宁公开承认的事实。1922年3月他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承认,“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党]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列宁强调,“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的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①在俄国落后条件下这是难以避免的,但这种状况本身就隐藏着蜕变成少数人以至一人独裁的巨大危险。

在革命初期,这种情况并没有导致个人独裁的出现,主要因为那时候党内领袖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党内可以就各种问题展开争论,即使列宁也不可能做到个人说了算。例如1918年春,布哈林不同意列宁的同德国人媾和的主张,所以成立“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列宁展开公开争论。最后列宁的主张胜利了,事情也就此结束,没有人去追究什么“反列宁的罪行”。其次,列宁个人的作风比较好,能容纳不同意见,能比较好地处理领导层中的各种矛盾和意见分歧,能够团结这个领导班子。然而,这两点都不是制度建设的结果,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一个防止独裁出现的民主制度。因此,列宁去世,斯大林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个人品质作风就不能不影响到大局。列宁曾经警告过,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一般共产党人相互关系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为此列宁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列宁颇有先见地指出,这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②不幸而言中,斯大林粗暴的性格及其所作所为果然变成影响大局的大事。他先是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取得党政大权,然后采用残酷的手段消灭异己,列宁所说的“老近卫军”在30年代被消灭殆尽,于是个人独裁出现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扼杀言论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和平、面包”。“自由”被放在第一位,“土地”的口号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但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查禁各种报刊。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取消了书报检查,实施了言论、信仰、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的自由,被列宁誉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现在却又退回到沙皇统治下的言禁时代了。由于各界的强烈抗议,1917年11月10日苏维埃政权发布由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保证这种查禁只是临时措施,“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人民委员会认为,即使在危机关头,只有在绝对的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限制出版”。这是革命作出的郑重许诺!

此后不久爆发了国内战争。内战中出于军事保密的需要,实行了军事检查制度,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问题是内战结束、社会稳定之后,书报检查制度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固定化、制度化、扩大化。在20年代逐渐形成一套严密的无所不包的书报检查制度。当局先后成立了国家出版局、图书管理总局来负责书报检查,对报刊、图书、文学、戏剧、电影、舞蹈等实施审查。不少作品遭到查禁,而事实证明,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审查从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界定发展到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为标准,于是唯心主义、宗教著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在查禁之列。发展到最后,唯一的标准就是领袖的言论和著作,斯大林的话。

不过书报检查是一把“双刃剑”,也会伤及自身。例如列宁卧病后,他本人的著作也受到或明或暗的检查和删改。他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中写道:“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中央监察委员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针对列宁的这篇文章要不要发表在高层就有不同意见,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甚至提议单独印一张刊有此文的《真理报》去应付列宁,而在《真理报》1923年1月25日正式刊出的此文中,删去了上述指明总书记的字样(即用黑体标出的语句)。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对列宁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编辑加工”,删去不合斯大林胃口的文字、名字。列宁著作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

人的著作就更不必说了。

从党内党外限制言论自由、限制民主,逐步向个人集权演变,最终出现斯大林的个人独裁,这是历史的逻辑。

关于出版自由的争论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经济上运用市场机制不同,政治制度建设走的是相反的方向。20 年代初,作为对农民让步的补偿,在政治上逐步收紧。1918 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如集会、结社、信仰和言论自由,而 1924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只字不提公民的这些政治权利,却明确规定了城乡不平等的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比例:城市 25 000 人选一名代表,而农村要 125 000 人才能选举一名代表!

1921 年,国内战争结束,转向国内和平,新秩序得到巩固,该是兑现出版自由的许诺的时候了,党内出现了言论出版自由的议论。在经济上实行了退却,政治上怎么办?是否也应当有所松动?

1921 年 4 月 11 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兼特派员瓦尔金给俄共中央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送去报告,建议给予“社会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左派”集团,提供包括出版方面的合法活动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社会主义通报》不是在柏林,而是在莫斯科出版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他还主张让其他政党自由参加苏维埃的选举,“我认为让‘所有政党’而不是‘一党’参加苏维埃选举极其重要,我们在苏维埃中需要有反对派。非党工人反对一党专政指的是在苏维埃中缺少能够经常反映他们职业利益和日常生活利益,而不只是阶级利益和需要的政党”。不过瓦尔金并没有主张放任自流,而是要求“拉紧缰绳”,“我们应当告诉我们的敌人:先生们,在我们的法律范围内,你们是自由的。谁要煽动内战、鼓动罢工和破坏我们的法律,我们就要绳之以法。”他主张按宪法办事,因为宪法并没有禁止其他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他提醒说,当年沙皇政府一方面流放布尔什维克去服苦役,同时也容许杜马中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团,因为它“要顾及俄国‘议会制度的要求’,顾及自己宪法的要求”。瓦尔金主张用政治的方法同其他政党斗争,把斗争纳入宪法的轨道上去,从而避免使用镇压的方法。

4月14日,俄共政治局否决了瓦尔金提出的在莫斯科选举前释放被捕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不过,还是有10多名孟什维克经过选举进入莫斯科市苏维埃。5月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出席了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且在会上多次发言。

1921年5月初,1906年入党的老党员米雅斯尼科夫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建议在国内实行高度民主以提高党的威信,从而加强党对工人和农民的思想影响。他说:“我们在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并建立国家唯一的政权之后,在镇压了高尔察克之后就应立即废除死刑,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谁都是未曾见过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措施来加强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广大群众中以及全世界的影响。”报告递上去之后没有得到回答。7月27日,他把题为《伤脑筋的问题》的文章交给《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供报纸发表。文章进一步发挥了报告中的思想,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进化。需要制定能保证和平进化,首先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规。有人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只能在经济好转之后实行,米雅斯尼科夫说:“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振兴经济,而言论和出版自由恰恰是调动他们积极性所必需的。”还有人认为,一旦实施言论自由,国内的一些混乱消极现象如罢工等会传出去。米雅斯尼科夫反驳说:“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还许多混乱现象而害怕言论自由的话,那么混乱现象并不会因为不实行言论自由而有所减少。”何况即使报纸不报道各种事件,人们也会通过目击者了解到的。而这种保密带来的结果只有一个:人们不相信我们的报纸。他说:“在我国所处的艰难条件下,谁想使疲惫不堪的工人跟我们走,谁想使我们的力量对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的影响增强,他就应该说,只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做到这一点。”

8月5日,列宁给米雅斯尼科夫写了详细的答复,赞同他关于“国内和平”取代“国内战争”的提法,认为这是“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列宁承认,“‘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但是列宁否定米雅斯尼科夫关于出版自由的议论,认为“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米雅斯尼科夫指望借助于出版自由来揭发各种弊端:“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

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而列宁主张“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①

列宁主张的这种党内监督的办法在列宁时期也许是有效的,但从30年代初起就明显失效了:独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再存在,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成为监督执行党的决定的机关,党的报刊成为斯大林的“一言堂”,它们完全失去了监督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的作用。

列宁在写作此信之前曾于8月1日给米雅斯尼科夫去信,认为他的文章“开头写得很好。有道理”,但可能存在隔阂,希望能同他当面谈谈,要求他写封简短的回信。^②8月22日,米雅斯尼科夫回复列宁说,他建议的言论自由只给予工人阶级和农民。他认为,“公开性将比监察委员会能更多地消灭这种(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行为”,但公开性应在言论和出版自由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撒谎、诽谤、号召不执行某个法律——都应受到法律的惩治,但法律不应惩治那些为了向政府、报刊和社会各界等施加影响而说出想法的人”。

不过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对他个人采取组织措施了。7月29日,斯大林领导的俄共中央组织局开会讨论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活动。1922年2月20日,米雅斯尼科夫被开除出党,后来又遭逮捕。他最后的下场是被枪毙。^③

列宁这时候强烈否定“出版自由”,一个原因是列宁把报刊(俄文“出版”和“报刊”是同一个词 *печать*)等同于政治组织,出版自由等同于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他认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④这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20世纪初在俄国建党的时候,《火星报》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所以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两个中心,即两个并行的党中央,一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是《火星报》编辑部。因此列宁对刊物的作用非常敏感,保持高度警惕。另一个原因是这时候苏俄虽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仍把“贸易自由”看作“资本主义自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4—9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151页。

③ 本文有关米雅斯尼科夫的资料转引自 Ю.格兰德:《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斗争综述》,原载[苏]《旗帜》1990年第3期。

④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46页。

由”。在经济上已经被迫对资本主义作了如此大的让步,就想用政治上加强控制的办法来维持和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列宁担心实行出版自由会给反对党提供发挥社会影响的机会。

从这以后,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出版自由的议论,这个问题成为禁区。共产党越来越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书报检查越来越制度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所以也就根本不提十月革命前的“自由”口号和起义胜利后颁布的“出版法令”中所给予的承诺了。人们只知道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曾提出三个口号:“和平”、“土地”、“面包”,而不知道还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口号:“自由”!

俄共十大的两个矛盾的决定

在实施粮食税的同时,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两个关于党建的重要决定。

一个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定,这个决议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合辩证法的论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够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适合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这就是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根据具体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为由“民主集中制”或者“集中制”向“工人民主制”过渡提供论据。

正是这一决议决定党内改行“工人民主制”,其内容包括取消一切委任制,从上到下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等等。决议指出,工人民主制的工作方法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决议通过之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而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执行。决议还对贯彻工人民主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召开有普通党员参加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决议指出,实行工人民主制的目的是“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要废除先前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因为这种制度最后的落脚点是集中,它适用于革命和战争时期,而不适用于和平的建设时期。决议说,内战时期实行的“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化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变成了压制的

形式。^①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议实质上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回归,它标志着新时期新的党内组织形式的出现。

与此同时,俄共十大还通过另一个决议,即“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项决议禁止党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其第7条还规定了纪律措施,可以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降为候补委员,甚至开除出党。这是一项违反民主原则的措施。对此列宁自己也说,“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②正因为如此,列宁建议第7条不要公布,希望备而不用。

这两个决定是相互矛盾的。要大家充分展开自由讨论和争论,又要禁止派别言论,而所谓派别言论是非常难以界定的,在以后的实践中,党内少数提出的不同意见总是被打成派别言论,结果在党内争论中,少数派总是担心被打成派别活动。布哈林在1923年同托洛茨基争论时写了非常严厉的《真理报》社论《打倒派别活动》,而到1928年他自己反对斯大林政策的时候,不得不处处设防。十大决议的第7条成了以后斯大林打击各种反对派的撒手锏,不仅公布,而且不断付诸实施,成为党内持有不同意见党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禁止派别措施一出台,一个生动活泼的政党就变成了“一言堂”,党的代表大会再也不能就党政大事进行畅所欲言的争论。到了30年代,党代表大会变成了斯大林一人报告,众人附和、欢呼和鼓掌的大会。

1923年关于“新方针”的争论,是苏联时期党内争取民主的最大一次争论。1928年布哈林等人反对斯大林针对农民的“非常措施”,其实质是反对以暴力对待农民以至普通老百姓的斗争。可惜,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努力被斯大林各个击破了。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后才由赫鲁晓夫等重新提出民主自由问题,即所谓“解冻”。

监督缺失的社会

在禁止党内言论自由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其他“异己”阶层和团体不断实施压制以至镇压。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6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97页。

1. 镇压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十月革命后,除布尔什维克党外,苏俄事实上还存在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它的正式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们不同意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也曾经进行过武装反抗,但1919年公开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并获得苏维埃政权的大赦。然而,1922年俄共为了彻底消除它们的政治影响,违背大赦的承诺,举行了一场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同时取缔孟什维克党。此后国内再也没有其他政党的声音了。

2. 打击教会势力。俄国80%以上的居民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在居民中有广泛的影响。俄共借1921—1922年饥荒之机,以救灾为名,没收教会珍宝,公开镇压教会的神职人员,从而引发同教会及教徒的冲突。与此同时,加强无神论的宣传,禁止宗教读物的出版发行。为争夺影响,当局不仅查禁了东正教的救灾组织,而且解散了由高尔基倡议成立的由社会名流组成的救灾委员会,逮捕了委员会的领导人,也迫使高尔基流亡意大利。

3. 压制和镇压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制造“哲学船”事件。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难以迅速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其意识形态,他们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学术观点,同时也难以忍受所处的政治地位和艰难的物质状态。但知识分子仍然拥有社会影响,特别是在高校和学术机构,为消除他们的影响,1922年当局决定把几百名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用轮船送往国外,史称“哲学船”事件。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被流放到国内的边远地区。

4. 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典型的事件是1922年底至1923年对不听话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压制。成立苏联的时候,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要求让格鲁吉亚作为独立的成员国加入新成立的苏维埃联盟。为此受到斯大林的打击,被组织处理(撤职或调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改组)。他们的主张虽然得到列宁的支持,但这时候列宁已经重病在身,无能为力。此后任何少数民族,只要发出一点点异议就会被打成“民族主义”而受到惩罚。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以上几股力量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能够对苏维埃政权,对布尔什维克党提出批评、实施监督的社会力量。如对粮食征收制,他们就曾经不断提出批评,并提出取消的建议,其中有的还被布尔什维克党所采纳。对他们的镇压造成的后果,就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再也听不到社会上比较有分量的、有根有据的批评的声音,失去了社会监督。当然,工人农民的批评和申诉还是

有的,但相比之下,较为分散,往往局限于具体问题,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分析。要知道,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内有不少像马尔托夫那样博学的有素养的社会主义理论家。

取消党内的自由民主,实施以上各项镇压措施,加上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在20年代逐渐达到舆论一律,到20年代末,整个苏联社会就只剩下斯大林及其亲信的声音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经党中央和政府的讨论决定,一个人就擅自宣布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实施“全盘集体化”,并进而宣布取消新经济政策,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而联共中央只好被迫事后追认斯大林所宣布的东西。到了30年代,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其任务不再是监督中央和中央政治局,而是监督中央决定的执行。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人的自由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也好,社会主义社会也好,都应当是向自由社会发展的社会,是逐步接近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其各种措施都应当为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要求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立即实现普遍的自由民主,但应当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在十多年时间里,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限制自由民主的办法,借此巩固并加强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地位。从短时间看,它似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苏维埃社会从一党执政导向个人专权——苏联20年代所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制度为斯大林在30年代的个人独断专行准备了条件,那些帮助斯大林获取党政大权的人,在遇到斯大林实施全盘集体化剥夺农民的时候,在遇到斯大林实施大规模镇压的时候,就像布哈林给未来一代领导人的信中所说的,在恶魔的机器面前都感到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在20年代还仅仅是一个一个的单项措施,到30年代已经形成为一套完整的体制,面对这种强有力的斯大林体制,任何个人都变得无能为力。这种体制可以做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像布哈林所描绘的内务部那样:这些“神奇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齑粉,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这个机关也会立即找到证据。布尔什维克党自己培育了扼杀自由民主的斯大林体制,而这个体制一旦形成,就能够主宰这个国家、这个党,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对党实施“斩首行

动”——消灭全体列宁近卫军的时候,这个党无能为力。斯大林是这个党扶上台的,但最后是斯大林控制了党,而不是党控制了斯大林!这个党没有有效的民主机制能够制约斯大林这位领袖。这个教训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难看到,其开先河者则是苏联。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

不要误读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这句话

长期以来,在谈及什么是爱国主义这个问题时,列宁有句关于“爱国主义”的话,往往被误认为是爱国主义的经典定义而广泛流传。这句话是:“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实际上,这句话并不能作为列宁对“爱国主义”所下的肯定性定义。列宁是位伟大的爱国者,但在这句话里,他对这种爱国主义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

这句被广泛引用的话来自列宁写于1918年11月的《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现在把列宁的话多引一些: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①

头一句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中译作:“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个译语极易被误解为列宁给爱国主义下了一个肯定的定义。《列宁全集》第二版对译文作了校订,说明这是因各自的祖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87页。

国彼此隔绝而形成的感情,这就符合列宁的原意了。这里说的是:小生产者千百年来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经济关系之中,局限于狭小的天地之下,根本不知道外面还有广阔的世界,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知国际主义为何物。所以列宁接着指出:“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格格不入的,列宁对千百年形成的这种感情、这种爱国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

几个月之后,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把他的想法讲得更清楚:

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资产阶级比小私有者更国际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多么惨重)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这种爱国主义。^①

这里涉及一个历史事实。1918年春苏俄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失地赔款。党内外有不少人强烈反对签订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们打出的旗号之一就是“爱国主义”,反对“投降”。而列宁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强调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为了保存苏维埃俄国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必须不惜任何牺牲作出妥协,让出空间(土地),赢得时间,以谋求东山再起。

说得再远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纷纷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要求保卫自己的祖国。那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反对这种爱国主义,高举国际主义的大旗,针锋相对地提出“失败主义”的口号:“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由于第二国际各党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行为,投票赞同给本国政府以战争拨款,列宁宣布“第二国际破产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是一样的。列宁坚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的立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工人不应当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各国工人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国际资本的统治。所以《共产党宣言》强调,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1页。

如此说来,是不是列宁就不爱国了,就不是爱国者了?当然不是!列宁既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深爱他的俄罗斯民族,深爱他的祖国,但是,他的这种爱是有条件的。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针对各种指责,列宁写了一篇题为《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的文章,说“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绞架和刑讯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十足的奴颜婢膝”,“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正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的觉悟提高到民主主义者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感到无比痛心”,“所以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的大俄罗斯工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

由此可见,列宁把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同压迫人的、滥用暴力的、专制主义的、农奴制的、普遍饥荒的俄罗斯严格区别开来,他为前者自豪而痛恨后者。列宁在沙皇专制统治的祖国与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之间划出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是“护国主义”的反对者,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则是“革命的护国主义者”了。1918年2月,面对德国军队的进攻,列宁亲自起草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号召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在这关头,口号仍然是两个:“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按照列宁的看法,国家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对压迫和剥削各国人民、各族人民的国家,他是不爱的,他爱的是文明、自由、民主、共和的祖国,社会主义的祖国。

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向列宁请教。但是,我们在向列宁请教,引用列宁话语的时候,需要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列宁的思想,更仔细地阅读列宁的著作,了解列宁著作前后文的逻辑联系,了解列宁写作的历史背景,吃透列宁所要表达的意思,这样也许可以减少误读和误引。

《北京日报》2010年3月15日

在农民暴动的压力下

——新经济政策的起因之一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和粮食征收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纯粹出于战争的需要,或者说战争所迫。早在1917年9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①可见,革命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如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等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有力手段。

实际上,粮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早已实行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引发了广大农民的不满,反对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这是导致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农民根据土地法令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有**一起暴动就叫作“叉子起义”**)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02页。

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做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但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作“盗匪活动”,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作“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引发暴动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苏维埃的“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下面举几次较有代表性的暴动为例。

安东诺夫暴动

这是1920年8月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因领导人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安东诺夫而得名,在苏联史书上叫作“安东诺夫叛乱”。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

其纲领叫作“劳动农民联盟纲领”,内容如下:1.全体公民不分阶级,政治上一律平等。2.结束国内战争,建立和平生活。3.竭尽全力协助同外国列强建立巩固的和平。4.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原则召开立宪会议。5.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由参与同共产党人斗争的各联盟和政党在地方和中央选举临时政权。6.言论、出版、信仰、结社和集会自由。7.全面实施原立宪会议通过的土地社会化的法令。8.通过合作社满足城乡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首先是食品的需求。9.调节国家管理的工厂中劳动和产品的价格。10.部分工厂实行非国有化,大工业、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应当掌握在国家手中。11.对生产实施工人监督和国家监视。12.允许外国和俄国资本参加国内经济生活的恢复工作。13.立即同外国列强恢复政治和商务经济联系。14.原俄罗斯帝国内各民族自由自决。15.为恢复小农户提供广泛的贷款。16.手工业生产自由。17.学校中自由讲授,普遍的识字义务教育。18.目前还在活动的有组织的志愿游击队在召开立宪会议及其解决常备军问题之前不得解散。^①

^①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14—1945 М., 1996. с.255—256.

除第5条排斥共产党人外，很难说这是一个反革命的纲领，至少其中许多要求是合理的。

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1920年9月有4000名武装人员，约万名手持叉子和镰刀的农民。到1920年底，有军队15000人，而到1921年5月达50000人。这是一支农民军队，有自己的纲领口号，良好的指挥，其建制和红军类似，也设有政治委员，在士兵和农民中开展政治工作。据历史学家M.库巴宁统计，坦波夫省有25%—30%居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①暴动最后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红军所镇压。

伏尔加流域的恰潘战争^②

1921—1923年全俄死于饥饿的人数超过200万。伏尔加河流域是高风险的农业地区，每隔几年就会发生旱灾，因此农民不得不储备谷物和粮食以防荒年。当局虽然对此非常清楚，但仍然没收他们能够找到的一切。这就逼得农民揭竿而起。伏尔加河流域是临近红白战线的地带，苏维埃政权强制动员参加红军，也引起农民的反感和反抗。

暴动于1919年3月中在中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开始。据调查暴动的专门委员会主席彼·格·斯米多维奇报告，参加的人数达15万，面积迅速扩大到有百万居民的土地。这也许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暴动。暴动者只有几百支步枪和几挺机枪，多数人只能用斧头和自制的长矛武装。暴动者在几天之内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和军事机构，首先组建人民农民军，在各村镇建立其指挥部和其他协调机构。暴动者自己选举指挥员，改选苏维埃，选出向村会(сельский сход,或译作村民大会)报告工作的代表。选出新的斯塔夫罗波尔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暴动者在报纸上写道，他们不喜欢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喜欢布尔什维克的“独裁”。起义的唯一目的是中止掠夺性的粮食征收制，保卫苏维埃政权，防止“在共产主义伪装下吸血的寄生虫”。《消息报》写道：暴动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只反对暴君、刽子手和掠夺者的政权，这些人就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

① 见网上资料。

② 恰潘(чапан)——农民穿的长襟外衣。

他们用机枪杀人,杀死人以后抢走私人的粮食和牲口,烧毁圣像。

西西伯利亚暴动

西西伯利亚暴动的人数众多(10万以上),遍及广袤的土地。

西伯利亚有大量的猎人,以狩猎为生,不从事农耕。他们通常以猎物交换粮食以及其他必需品,但在粮食征收制下失去这种可能性。这些狩猎合作社社员没有自己的田园,因此就处于没有粮食的地步。而如果他们把猎物运出森林,就会像其他农产品一样被征粮队没收。然而,这些猎人是武装起来的,他们熟悉大森林,这是进行游击战的理想场所。因此,在西伯利亚具有举行武装反抗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大量富有的西伯利亚村庄(有时有几千名居民)远离城市。虽然他们离不开同城市的交换,但它们经济和政治独立的程度比别的地方高。这种状况促使农民养成自我组织和互助的习惯。在沙皇时期、布尔什维克时期,他们都不大需要中央政府。1920年秋西伯利亚当局加速征收粮食,在伊希姆县(后来成为暴动的中心)甚至把农民的种子粮也收走了。据1920年实际上领导该县粮食征收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无政府主义者”雅科夫·迈耶尔斯说:“留下的粮食甚至不足以播种一俄亩土地。”总的说来,秋明省的粮食征收制是总体性的,正因为如此,该省成为暴动的主要发源地。暴动前农民的消极状态使布尔什维克作出错误判断,1920年12月4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甚至取消了西伯利亚的戒严状态。然而,1921年2月1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致电莫斯科说:“农民共产党员不可靠,有的地方公开反对粮食征收制。”他认为,领导起义的是农民联盟,“农民共产党员会同它们联合起来”。果然如此,农民们(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劳动农民联盟成员、复员军人、狩猎合作社社员和黄油制造合作社社员联合成强大的起义队伍,截断了西伯利亚的粮源。他们的口号是:取消粮食征收制,要求自由支配粮食的权利,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

苏维埃的思想在西伯利亚深深扎根,所以他们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把“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看作是非集权化的手段。形式上西伯利亚不存在村社制度,但实际上,村会^①成了农村社会生存的重要机制,还在革命

^① 西伯利亚没有村社。译作“村社”的俄文为 се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村社大会”为 сельский сход。

前合作社和协作社就承担了互助和集体使用生产工具的职能,成了“村社的代用品”。例如,西伯利亚黄油制造合作社还在革命前就把私人生产者排挤出了市场。正如恰潘暴动一样,村会组建了司令部,改选了苏维埃。

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

构成苏维埃政权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事件,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前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乱。1921年冬,虽然战事基本结束,但人民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引起工人的严重不满,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粮食定量减为半磅,同时,巡查队到处拦截私人向城里运送的粮食。由于缺乏燃料,一些工厂停工。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起因都是粮食定量减少。电缆制造厂、制钉厂、第一国营卷烟厂、军械厂等工厂纷纷召开会议,通过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自由转厂的决议。

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回答是暂时关闭这些工厂,其工人只发一半定量的口粮。1921年2月11日,一些彼得格勒企业宣布3月1日前停止生产。其中有普梯洛夫工厂、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三角”工厂等大型企业,这样就有近27000人被抛上街头。某些企业的党员领取了新的一份衣服和鞋,而其他人却穿得破烂不堪。这种明显的不平等引起工人的愤慨。被关闭的工厂劳动集体召开会议,但被当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2月22日制管工厂爆发自发的罢工,他们的要求相当温和:增加口粮,分发现有的鞋子。彼得格勒苏维埃继续持强硬态度,断然拒绝谈判,调动军校学员去对付罢工者,他们朝天空开了枪。此举激化了矛盾。为表示抗议,又有5个工厂参加罢工。2月24日俄共彼得格勒委员会常务局举行会议,商量对策,决定“以执委会的名义宣布戒严”,2月27日罢工继续扩大。季诺维也夫组建的防务委员会命令罢工者立即返回工作。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同盟歇业”,实际上就是置罢工工人于饥饿的绝境。28日普梯洛夫工厂加入罢工。罢工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出现传单,批评禁止劳动集体集会的做法,要求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

彼得格勒的首脑季诺维也夫不去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反而声称,现在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2月28日季诺维也夫致电列宁,称“喀琅施塔

得的两艘最大的军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并作出了社会革命党黑帮决议。彼得格勒工人的情况仍极不稳定,大工厂均已停工,预计社会革命党人方面将作出加快事态发展的决定。”^①

由于一般的威胁已经不起作用,契卡开始大规模逮捕罢工工人,当局已经不能指望彼得格勒守备部队的忠诚,而从外省调入精选部队。

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塔得流传彼得格勒罢工的消息,水兵决定派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全体船员作了报告。全体船员会议通过决议,声援罢工者。3月1日在亚科尔纳广场召开大会,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参加,听取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代表的报告。与会者对彼得格勒当局反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为表示愤慨。当时正在这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舰队政委库兹明宣称,彼得格勒的罢工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水兵的决议是“反革命的”。他们的发言被打断。与会者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官僚。

从暴动人员的组成、领导机构和纲领要求来看,这是驻扎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该市的工人构成的反抗事件,是针对时弊的。

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形成一种宣传口径,凡有坏事都归咎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势力。这次也不例外,3月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发表号召书,认定舰队通过的决议是“极端反动的社会党的决议”,“这次站在社会党分子后面的是沙皇将军”。为此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宣布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不受法律保护。^②

原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是旧俄军事专家,时任要塞炮兵司令,还是托洛茨基任命的。这是国内战争中常见的一般军事专家,对水兵和工人谈不上什么影响,他本人也过问政治。科兹洛夫斯基在喀琅施塔得陷落后说过,“共产党人提我的名字是为了把喀琅施塔得的暴动说成是白卫分子的密谋,因为当时我是要塞唯一的将军”。

3月10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喀琅施塔得没有白军:“那里不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② 1921年3月3日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喀琅施塔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24页。

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①当局一直设法调查起义同敌对势力的联系,但始终得不到证实。

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这样一个小孤岛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是注定要被镇压下去的。一部分暴动者逃往芬兰,留下的被扣押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②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列宁对农民暴动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和临时政府政权的垮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的执政根基。1917年9月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写道:“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③

1917年9月29日,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中说:“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竟举行起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基京和格沃兹杰夫以及代表资本、代表地主利益的其他部长们!共和政府居然采取军事手段来镇压这一起义,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④

1917年10月26日,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再次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⑤不过,列宁当时开出的药方中还是包含了后来导致农民不满的措施,他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4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1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72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页。

说：“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和武器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①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实施粮食垄断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起义的问题。

在1920—1921年间农民不满的根本问题是粮食征收制。实行征收制就难免使用强制和暴力，派遣征粮队，一些征粮队抢走农民的所有粮食，在农民看来无异于强盗匪帮。有时候征收来的土豆运不出去，就地堆放以致腐烂，而农民却在挨饿。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1917年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三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继续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们又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导致执政党信任度的缺失，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对水兵暴动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暴动爆发之前或之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过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不必说，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也就是说，代表大会提出了后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但那时党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这种政策的必要性，拉林本人反而因此失去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职位。

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土地和粮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02—303页。

食政策的提纲,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建议:1.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进所得实物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2.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①

这个建议在政治局被否决。这就是说,当时多数最高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现行政策的必要性,认识落后于现实。这样到农民举行起义的时候就感到突然,从地方到中央不知所措。特别是对起义农民提出的废除一党统治的口号不能容忍,于是采取镇压的办法,把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动叫做“剿匪”。当然军事的办法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在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同时,不得不立即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这一政策同1920年初拉林和托洛茨基提出的方案基本相同。而他们提出改革方案的时候,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已经是进行改革的有利时机了。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从这里可以总结出一个教训。执政党应当学会及时发现问题、矛盾,把它们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到出现全国性的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当然,亡羊补牢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好。这就是列宁比后来的斯大林高明的地方。

列宁在去世前同布哈林的谈话中谈到同样的问题,他总结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中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了。这时候,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吸引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

在1928年对农民实行非常措施的时候,布哈林曾经根据以往的教训,在中央7月全会上就各地的农民风潮提出过警告:“请大家想一想吧,你们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权,但这个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这样你们就会有庄稼汉的起义,富农则让庄稼汉承担责任,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起义反对无产阶级,给以迎头痛击,结果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你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

可惜!当时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对此充耳不闻,更没有从20年代初的农民造反

^①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改革,特别是重大的改革,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在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下,共产党人指望通过对全国生产和分配的控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里的着重点是控制现有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发展生产力。其结果不仅没有促使经济的发展,反而使本来已经被战争拖垮的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这项政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开始考虑改革。农民和工人的普遍不满以至武装暴动,直接威胁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给尚在犹豫的苏维埃政权击一猛掌,促使它采取决断措施,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暴动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起因之一。

《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0期

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和列宁的应对之策^①

——纪念列宁诞辰 140 周年

关于苏维埃政权,以往的史书通常只讲凯歌行进,无往不胜,对于革命领袖,也只讲丰功伟业,英明领导。对两者都讳言失误,不谈“走麦城”。然而,不管是政权,还是领袖,实际上既有辉煌的业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失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考察历史中的失误以及对失误的检讨和纠正,比单纯的歌功颂德,对后人会有更大的教益,更多的启迪。

1921年春,列宁就公开宣布苏维埃政权遭遇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这时候苏俄红军击退了外国的武装干涉,打败了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理当庆功,庆祝苏维埃政权站稳脚跟,怎么会遭遇最严重的危机了呢?难道还有比德国割去苏俄大片土地,榨取大量赔款,白军逼近莫斯科等更为严重的危机吗?

从列宁嘴里发出这样的警告,显然不是故作惊人之论,吓唬国人,而是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危险形势。

^① 本文如副标题所示是为纪念列宁诞辰 140 周年应编辑部的约稿而作的。我认为纪念领袖的文章可以不仅仅是歌功颂德,也可以写写领袖对失误所作的教训总结以及纠正错误所采取的措施,这样的纪念也许更有意义,所以写了这篇长文。也许编辑部不认可这种写法,没有按照所约刊载在纪念列宁一栏,而是改刊在“旧史新论”栏上。对作者来说文章发表就好,不过就纪念文章的写法而论,不妨改一改习惯的套路,放开一些!

军事共产主义的危机

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

长期以来,列宁主张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前提。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列宁还认为自己不会见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列宁回国后,改变了一贯主张,提出俄国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把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直接目标。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在俄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原定的公式,社会主义革命依靠的阶级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贫雇农,其他阶级和阶层都是革命对象,在农村革命对象是富农,但在实践中经常把中农和富农“一锅煮”,把对付富农的办法用到中农身上。这种错误的做法直到1919年3月召开俄共八大时才予以纠正。俄国的无产阶级本来就处于人口的绝对少数,即使加上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还是少数。这样,在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农村就树敌太多,打击面太大,使自己在农村陷于孤立。这种做法缩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实际上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

俄共实行的粮食政策是反农民的。1918年5月初(这时国内战争尚未爆发),苏维埃政权宣布实行粮食垄断,施行粮食专政,把全国的粮食分配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做法就等于在农业中实行了类似工业中的国有化。此后步步收紧,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名义上征收的是农民手中的余粮,实际上征收的几乎是农民手中的全部粮食,某些地方征收的甚至包括口粮、种子粮,等等。

实施粮食征收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有各城市自行组织的工人征粮队,有粮食人民委员部组织的征粮军,还有防止“背口袋的人”往城市倒卖粮食的截拦队。这些征粮大军把整个村庄洗劫一空,甚至挖地三尺搜查粮食。家有藏粮者,即当作富农处理。搜查出来的粮食,例如马铃薯往往很难运走,就任其腐烂在地头。在农村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工人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从农村取得粮食,而农民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保卫自己的粮食,于是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两大劳动阶级之间就发生了为生存而展开的殊死斗争,红军和工人征粮队员往往被农民打死,而农民也因暴力抗征而遭枪杀。粮食征收制导致城乡分裂。

征收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苏维埃国家第一年征收了37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增至11000万,第三年为26000万,第四年(1920年8月1日开始)规定征收

余粮 45 000 万普特,其中国家预期获得 30 000 万—36 000 万普特。粮食征收制、直接产品交换等被多数人看作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而不是战争迫使的措施。然而,在战乱中农业生产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处于衰落状态,而当时成立的各种公有程度极高的农业组织如“农业公社”并没有能够提高生产,为国家提供需要的粮食,而是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状态。

尽管农村已经出现民不聊生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列宁还是认为,农村的农民手中有粮,生活得比城市工人好得多。直到 1921 年列宁才改口承认农民的生活非常困难。

不错,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后,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实行土地的社会化,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规定“一切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此写道:“农民根据这个法令从社会主义革命总共获得了 15 000 万俄亩以上的新土地,这些土地从前都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皇族和教会手中。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 5 亿左右金卢布的地租。”^①

然而,这里所说的农民得到的只是统计数字上的好处,事实上农民并没有得到实惠。因为在粮食征收制下,几乎拿走农民所生产的全部粮食,同时禁止粮食和农产品的自由买卖,甚至农民为交换生活必需品而出售农产品,都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投机倒把行为,要受到严惩。根据当时的理论,小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打击消灭的对象。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并不能归自己支配,而要被国家全部收走,这样的土地有什么意义呢?农民实际上等于国家的“农奴”,他们的生存得不到保障,这就逼得他们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

经济濒临破产

军事共产主义的特点是抓分配,抓有限资源的分配,以应付战争和城市的需要,而不是首先抓生产,发展生产。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工业生产连维持现状都不可能,勉强开工的工厂只能靠库存的原料和现有的陈旧设备维持。

指导思想,当时认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须消灭市场,消灭商品和货币。苏维埃政权大量发行纸币,使货币变得一文不值,从而消灭货币的交换功能,达到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32 页。

最终消灭的目的。消灭市场的办法是,用城乡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来取代商业性质的市场交换。然而,那时候工厂根本生产不出用于城乡交换的工业品,所以城乡的实物交换只是一句空话,这就造成城乡交流的脱节。

1920年内战基本结束,然而这一年恰恰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顶点。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全部中小工业企业国有化,12月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给居民无偿发放粮食制品”的法令,12月17日发布“关于向居民无偿发放日用品”的法令,12月23日决定“取消所有燃料的付费”。住房、自来水、排水和净水、煤气、电报、电话、电气、无线电话的收费都被取消,还准备取消货币税。未来的院士斯·斯特卢米宁和叶·瓦尔加建议用劳动单位或者能量单位“труд”和“энергед”进行结算。布哈林提出立即消灭货币。

拉林在《真理报》上这样写道:在胜利的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努力下,商品制度的千年基础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垮台。我们的儿子长大以后只有靠记忆来认识货币,而我们的孙子只有通过历史教科书上的彩色图画来认识货币。

然而,交换、买卖是居民生存的需要,在内战期间就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买卖人——“背口袋的人”,他们穿行在城乡各地区之间,把农产品背进城,又把工业品背到乡下进行倒卖,满足城乡各阶层民众的需要。“背口袋的人”被看作投机倒把分子,抓住是要枪毙的。但是生存的需要往往战胜死亡的恐惧,这是百姓为生存而自发采取的自救措施。正因为如此,“背口袋”的买卖禁而不止,苏维埃政权的禁令也没有能为自己赢得居民的好感。

农民暴动蜂起

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在国内战争中作出巨大的牺牲,但他们一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为了生存他们只有举行暴动,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红”“白”战争,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到后期,就转变成“红”“绿”战争,即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战斗,那时农民军自称“绿军”,而当局则称之为“匪帮”。农民暴动导致解散在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贫农委员会和取消单纯依靠“农村半无产者”的做法。农民战争的主要场地是产粮区:1919年春中伏尔加河流域的恰潘战争和顿河的韦申暴动,1920年春中伏尔加河流域的“叉子起义”,接着是1920年秋黑土中心地带的马赫诺运动,西西伯利亚的暴动延续到1921年底,有的地方到1922年。农民暴动得到穿军装的农民的支持,最

后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严重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的统治,迫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得不迅速取消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

以坦波夫农民暴动为例。1918年秋,产粮的坦波夫省已经感受到粮食专政和为粮食举行的“十字军讨伐”的重担: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切列波韦茨以及其他城市的50支工人征粮队在此征粮。有4万人参加反对暴力征粮的农民暴动,领导人是安东诺夫,他从1905年起参加革命斗争。从1920年8月拒绝交粮和解除征粮队武装时起,开始了作为群众运动的安东诺夫运动。暴动者有良好的组织,采取同红军类似的建制,设有政治委员从事政治工作,以森林作掩护,采用游击战术。安东诺夫运动是典型的农民暴动,成立了独特的农民共和国,对苏维埃政权造成严重威胁。

布尔什维克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农民暴动,为暴力镇压提供的论据是百万人的饥饿和内战的实际条件,为粮食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斗争,农民的反抗是富农的反抗,武装反抗是“盗匪行为”。这些说法进入1918—1922年的官方语言和所有苏维埃文献。他们动用正规红军,使用飞机大炮,甚至使用毒气来对付躲进大森林里的叛乱农民,通过枪杀人质,迫使农民交出武器,交出“匪徒”。

然而暴力镇压并没有能够制止农民暴动的浪潮,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到1920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有农民暴动。

列宁非常清楚农民暴动对政权的致命危险,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利用了农民对临时政府的不满,利用了农民起义的危机形势,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多次严厉抨击了临时政府的农民政策。

1917年9月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中写道: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①

1917年9月,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继续写道: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竟举行起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基京和格沃兹杰夫以及代表资本、代表地主利益的其他部长们!共和政府居然采取军事手段来镇压这一起义。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16页。

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①

1917年10月26日,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对临时政府指出:

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政府本想用铁和血来镇压起义,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武装扫除了。^②

列宁当年对临时政府的指责言犹在耳,如今,布尔什维克党自己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农民又起来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了,其对苏维埃政权所构成的威胁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破产。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后,企图借助军事强制手段,超越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事实证明,这条捷径是走不通的,在物质极端匮乏,小农占人口多数,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不可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生活也绝对不能叫作什么共产主义。

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对水兵暴动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可以扑灭某一地区的叛乱,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列宁的应对措施

以粮食征收制为核心的军事共产主义并非长久之计,从其实施之时起,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过,不仅党外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断提出批评,而且党内的一些了解情况的领导人也逐渐认识到其危害,提出改进建议。特别是在1920年,即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第三个年头,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而粮食征收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关头,党内纷纷提出不同意见,主张用粮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页。

税来取代粮食征收制。例如,托洛茨基在1920年初考察了西伯利亚,深感强征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它严重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向中央提出建议:“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进所得实物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①

这个建议以11票对4票被否决。

在这前后,还有不少人提出过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各种建议。例如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Ю.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同年底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建议在交纳了严格规定的国家赋税之后,农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应的价格进行自愿的商品交换。但是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党的决策层接受。

此前1919年党的八大通过一个实质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纲领,或者说,浸透了军事共产主义精神的党纲,1920年军事共产主义的推行更是进入了高潮,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没有看到酝酿待发的严重危机,指望通过这些军事共产主义措施迅速进入共产主义。提出废除粮食征收制的人士的着眼点是改进经济领导,促使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1920年9月5日奥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业下降的原因是粮食政策,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活下去。那时很少人感觉到严重危机即将降临。

给军事共产主义最后一击的是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暴动。喀琅施塔得军港本来是革命的强大堡垒,其水兵在革命中是一支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突击力量,谁也没有想到在内战结束的关头却带头发动了叛乱。他们的口号之一是“按照农民的愿望,给农民以全部土地的完整的权利”,取消粮食征收制。他们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政权,结束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这就从根本上威胁到俄共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

喀琅施塔得暴动震撼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这时候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

^① Л.Троцкий. *Новый курс*. Изд.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Москва. 1924. с.57—58.

业工人数 1917 年为 242.88 万,1920—1921 年只有 118.86 万,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包括穿军装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①本来还犹豫地进行的修改粮食政策的讨论不得不加速进行,转移了全党注意力的工会问题争论不得不中止,在 1921 年 3 月召开的俄共十大上匆匆忙忙地通过了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的决定。这个决定没有经过怎么讨论,这是死亡威胁下的决策,对许多原先着迷于军事共产主义的人来说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举手同意。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

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仍然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认为:“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②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列宁认为,农民纳税后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剩余粮食的自由经济流转是适当的,但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影响增长。这时候列宁对合作社是不放心的,他采取了灵活的表述:自由的小经济流转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

列宁提出一个改革的重要方针——“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成立委员会来研究积累的经验。^③

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第 1 条写道: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6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50—6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67 页。

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决议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的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①

由于形势紧迫,列宁提出:“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②

两个月后,5月26—28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新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在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死气沉沉,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对发展农业不感兴趣,结果是我们失去了经济基础。现在的任务不是去研究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③

代表会议认定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其基本手段是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要把商品交换集中到合作社手里,但不排挤正常的自由贸易。会议还大致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向,其中表示支持中小企业(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允许把国营企业租赁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赋予地方经济机关自行解决租赁关系的具体问题的权利。还修改了大工业的计划,加强日用品和农民用品的生产。扩大每一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质资源中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105—10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99—300页。

会议赞同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①不久，此委托书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地方。它要求采取措施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且不要限制地方流转的范围，在可能的地方转向货币交换形式。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说法。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完整设计的纲领，或者一开始就是一个系统的完备的政策。它的各项政策措施是逐步发现，逐步采取的，是顺着事物的逻辑发展而逐步完善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

按照粮食税政策，农民交纳了规定的赋税，剩下的粮食就归自己支配。农民除了自身的消费，如果有剩余，就出现如何投放市场进行交换的问题。起初，列宁担心放手自由贸易会产生资本主义，因而试图把流通限制在局部范围，限制在地方的范围之内，把交易限制在实物交换上，以便于控制。这时候，列宁连“商业”这个词也不想用。但是，经济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农民的农产品交换很快就突破了列宁所设的防线，实物交换变成了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

我们来具体看看列宁是怎样一步步地完善新经济政策的。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 1918 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 1918 年春已经确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 年春的政策同 1918 年春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 1921 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 年）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②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③

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结为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跃进。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在商品货币基础上恢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 120—12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221 页。

③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2 页。

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贸易自由”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看作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1920年11月30日列宁致谢·叶·丘茨卡耶夫的信中写道:“从货币向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是毫无疑问的。为使这一过渡胜利完成,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①

实施粮食税之初,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还把“贸易自由”看作是“反革命”的口号,“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起初设想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做买卖的合法的合法化,还是停留在“产品交换”上。他曾这样解释过:“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②

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作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而是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但是人为的限制是行不通的。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住自己的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结果出现了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这样就有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

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③

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35—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68页。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①

经济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在报告中说:

“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②

所谓“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实质上就是经济规律本身比我们强大。故此列宁得出结论说,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③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一些传统的提法也作了修改,例如关于“投机倒把”的提法。长期以来,苏维埃政权一直把农民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行为宣布为投机倒把,甚至视为反革命行为而予以惩办。现在既然允许农民完税以后拥有余粮,那么他们处置自己的农产品的行为就不能再叫作投机倒把了。1921年3月3日列宁在致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就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出售一事写道:依我看,应当允许带得更多。你们对投机倒把怕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们单个地换粮食,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东西带进贫困的俄国应当给予鼓励,而不应当加以阻挠。^④

1921年4月21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明确指出:“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他主张“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这样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6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另见第50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2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52页。

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①这样就逐步承认了农民的商业行为的正当性,不再当作投机倒把论处了。

新经济政策表现在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资本让步。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但成为党的纲领任务,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承认了市场关系的作用,它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粮食税的数额比余粮收集制时少一半,并且主要负担落在富裕农民身上。个体农民提供 98.5% 的农产品。在城市允许私人租赁小企业和商业企业。到 20 年代中,资本主义成分约占 20% 的工业项目,生产 5% 的产品。在零售商业中,私人企业集中了商品周转的 53%。

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25 年谷物的总收成超过 1909—1913 年年平均产量的 21%。一年后畜牧业也超出此水平。工业也缓慢恢复。1926—1927 年产品的基本品种达到战前的指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据某些评估,食品消费超过革命前的俄国。

这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改革,改革的实施是很不容易的,一靠外力的逼迫,二靠列宁的威望。有人说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措施如果换另一个人提出,此人就会被立即枪毙。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列廷诺夫从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后来任副农业人民委员)那里听说,党内很少有人支持列宁。他写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时的艰辛:

完全同意他(列宁)的也许只有克拉辛和瞿鲁巴;其他人或者沉默,或者顶牛。在一次会议上(斯维杰尔斯基没有说明是哪次会议,我也没有问),列宁说:“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全体似乎同意我,说是,而我一转身,你们就不说。”你们同我捉迷藏。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同你们玩一种通行的议会游戏。如果议会对政府首脑表示不信任,他就辞职。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你们对我表示不信任,虽然现在连傻瓜都懂得我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你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又对我表示不信任。为此我采取通行的议会做法,向两个最高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会提交辞呈。不担任人民委员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224 页。

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在《真理报》和其他苏维埃出版物上写作的普通政论家。

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喊道,对那些怎么也不愿意摆脱地下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必然要同农民决裂的人,他已经厌倦了同他们争论。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立即摧毁了許多人表示的反对意见。例如坚决反对列宁的布哈林,在24分钟内由反对者变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狂热捍卫者。^①

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检讨

毋庸讳言,列宁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主要设计者和推行者,那时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都是列宁提出或者得到他的同意的。但是列宁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能够根据形势的要求否定自己制定的政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采取措施弥补错误所造成的损失。

新经济政策发展到承认商品买卖,承认商品货币市场的作用,再加上苏维埃政权采取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但是尽管生活已经引导经济按照其本身的规律运行和发展,广大干部,包括上层领导干部,对向农民让步,运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仍然想不通,他们仍然怀念平均主义的、行政命令的军事共产主义,认为只有那样,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

因此要贯彻新经济政策,使新经济政策成为长期的认真的政策,还必须认真总结过去的教训,对军事共产主义作一番认真的检讨。

军事共产主义一词,过去多认为是列宁在总结国内战争的政策时首次使用的。实际上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之前,已经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亚·亚·波格丹诺夫已经使用这个名词,并且警告过不要搞“军事共产主义”。他说,1917年6月,他在《国家一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

^① Н. Волент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 California. 1971. С.31.

详细论述。^①“1918年1月,那时我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在《新生活报》上写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开端,而是军事共产主义。”^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工厂企业都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军队,而且军人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份定额。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因此,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开始把这种制度叫作“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列宁的设想和后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来自一战期间各国政府的措施。例如粮食垄断,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之前,列宁已经注意到并打算作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措施提出。

1917年9月7日,列宁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道:

俄国的情况是:战争带来的空前负担和灾难,史无前例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这一切本身就暗示了出路,指出了出路,不仅指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③

1917年9月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重申: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和武器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④

由此可见,军事共产主义的主要措施,如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还在夺得政

① 《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问题》中的一节。而《社会主义问题》是1918年出版的书中的一章。此书的第一册后来收入亚·波格丹诺夫和伊·斯捷潘诺夫著《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卷。

② 参见郑异凡:《波格丹诺夫和“军事共产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6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02—303页。

权之前列宁已经设想好了,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只是,列宁把这些措施同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成了共产主义的措施!这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爆发国内战争,列宁也会采取这些措施的。

因此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的教训的时候,需要联系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上清除军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列宁最早使用军事共产主义一词是在1921年4月写作的《论粮食税》一文中。这是列宁唯一一次谈到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

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须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

应当说我们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为怕引起误解,列宁随即强调指出“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办法”。^①

列宁在这里强调“特殊”、“临时办法”,是针对当时许多干部把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看作是无产阶级执政的正常政策,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的。

过不多久,列宁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错误。1921年10月14日,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说: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②

错在什么地方?就错在“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承认,即使没有完整明确的计划,至少也曾经“设想过”这样做,这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08—20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偶然的失误。

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

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①

列宁坦承这一错误带来的严重过后果,他说:

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②

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在莫斯科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接着谈这个错误: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我们用“强攻”办法即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1—1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4页。

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①

在一个月內,如此反复、密集地谈自己的错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后果,这在列宁的一生中是罕见的。

一年以后,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时候,列宁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回顾1921年的严重危机,把它当作俄国革命的一个重大教训来告诫全党和全国,他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说:

但是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但是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②

列宁的检讨是空前绝后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再也没有见过如此检讨错误的领导人了,列宁承认以往政策的失败,承认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探寻错误的思想根源,指出错误的严重后果,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议论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始终用的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我们”,用“我们”这个词表明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教训是深刻的,一个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党,由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采取了走捷径的办法,用军事强制的手段去实施“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为此压制甚至剥夺广大农民,从而引发农民、工人以至军人的严重不满,起而造反,酿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对苏维埃政权的这个严重失误,列宁是认真对待的,他不仅思考这一问题,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5—2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8页。

且公开承认,把这一切当作全党的教训和财富。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通过三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这种“共产主义”已经深入许多干部的脑海,他们把这一套做法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这一套军事命令做法简便易行,已经变成一种领导作风。要纠正这一切,必须反复讲,经常讲。列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列宁不怕承认错误,不怕承认失败,他教育全党要从错误中学习。他说:“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都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①

得罪农民,也就是得罪广大人民群众,引发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是使列宁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教训,列宁在最后时日留下“遗言”就包括这项内容。《工商报》副主编瓦连廷诺夫曾经记述了列宁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的“临别赠言”:

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②

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③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26页。

② Н. Волег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С.186.

③ 尼古拉耶夫斯基谈布哈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出逃的斯大林秘书(也是政治局秘书)波·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列宁秘书格利亚谢尔和福季耶娃关于列宁最后思考的一段话,列宁曾对他们说:

当然,我们是遭到了挫败。我们本来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直就像童话一样,随便要什么,就会有有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党不至于丧失灵魂、信心和斗志,我们必须向全党提出,作为某种暂时退却的做法,要重新采取交换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们世世代代所形成的生活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尝试以暴力把居民赶进新的制度,但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个全俄绞肉机中我们是否能够保住政权。^①

不能对农民发号施令,不能对农民施加暴力,不能把国家变成“绞肉机”,这是列宁总结沙皇政权、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这是一个涉及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

相对说来,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农民的黄金时期。第一,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属性的看法改变了。不再把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看作是资本主义根源,而是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盟友,决定同农民一起前进,尽管速度要慢很多。第二,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在分给他的一小块土地上自由耕作,在缴纳了事先规定的农业税之后,剩下的农产品归自己支配,可以上市。第三,列宁提出用做买卖的合作社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不再对农民采用强制暴力手段,甚至允许土地租佃和雇工,号召农民“发财”。

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能够说服所有的人,特别是他身边的某些领导人。在他逝世之后,党内上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斯大林最后击败了所有对手,于是立即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退回到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为半个多世纪后苏联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① 见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洪刚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列宁的一次改革尝试

苏联历史上有过三次改革。1921年列宁实施的以新经济政策著称的改革,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和9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列宁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改革,也是苏联历史上取得成效最好的改革,但不幸在1929年被斯大林中断,个中教训值得记取。

列宁以辞职迫使改革行进

大体说来,历史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被迫的,都是形势逼迫的结果,太平盛世下统治者是不会冒风险去改革变法的!

列宁的改革也是被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国内战争,使整个俄国疲惫不堪,经济破产。更为严重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粮食征收制,几乎收走了农民所有的粮食,引发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在内战后期,农民暴动遍及全国,提出不要共产党人的苏维埃口号。城市工人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大量工人逃离城市,工厂机器老化、磨损,开工率严重不足。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本来就少,现在就更少了,就是留在城市的工人,有许多也“丧失了阶级性”。1921年春,革命的堡垒喀琅施塔得水兵举行暴动,直接威胁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正是这时候,列宁承认全国处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改革,停止军事共产主义,废除不得人心的粮食征收制。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事先规定农民应缴纳的税额,完税后剩余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这是对广大农民的让步,被叫作“农民的布列斯特”,是新经济政策的开端。这是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改革,农民有了余粮,就要进行交换,于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恢复了曾经被严格禁绝的市场交易,恢复了货币、交换、价值、市场机制的运用,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把市场引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在被迫的改革中,有人自觉理性地接受,有人被迫被动地接受。这样,对待改革的态度就不一样。在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实行粮食税的决定,列宁多次说改行新经济政策是一致通过的。但是知情人披露,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在回忆录中有一段相当生动的记叙:

在一次会议上,列宁说:“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全体似乎同意我,说是,而我一转身,你们就说不。你们同我捉迷藏。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同你们玩一种通行的议会游戏。如果议会对政府首脑表示不信任,他就辞职。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你们对我表示不信任,虽然现在连傻瓜都懂得我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你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又对我表示不信任。为此我采取通行的议会做法,向两个最高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全会提交辞呈。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在《真理报》和其他苏维埃出版物上写作的普通政论家。”

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喊道,对那些怎么也不愿意摆脱地下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必然要同农民决裂的人,他已经厌倦了同他们争论。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立即摧毁了许多人表示的反对意见。例如坚决反对列宁的布哈林,在24分钟内由反对者变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狂热捍卫者。^①

由此可见,当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虽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党内高层许多人对此缺乏理性的认识,他们之所以赞同只是因为:一、形势所迫,二、列宁威望的压力。这两个因素,在短期内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从长期看是远远不够的,长期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坚定的改革队伍。

^① Н. Волент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 California, 1971. С.31.这段话后来戈尔巴乔夫公开引用过。

列宁在最后时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 20 年代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施改革,但包括列宁在内,当时并没有从政治体制的角度考虑改革问题。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由于向长期被看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农民作了让步,作为补偿在政治上反而朝加强专政的方向发展。

在党内,俄共十大通过禁止党内派别组织的决定,结果党内只能有一种声音。在国内,禁止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

1921 年 6 月,契卡拟定了关于在 1921 年下半年和 1922 年上半年消灭白卫组织的工作计划,打算肃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党派残余,同黑帮神职人员作斗争,等等。6 月 4 日,计划报到列宁处。列宁虽然压下没有批准,但此后基本上是照此计划行事的。在此期间,实施了三项措施:

1. 打击宗教势力。俄国有 80% 以上的居民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在百姓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构成严重的威胁。十月革命后成立了各种无神论组织,宣传无神论,反对宗教。1921—1922 年苏俄发生严重的饥荒,这是天灾人祸交互作用造成的。和后来保密的做法不同,国际社会都知道苏俄发生饥荒,美国救济署伸出援手,提供援助。国内以高尔基为首的一些社会名流组织了赈灾委员会,号召国内外捐款,东正教也成立赈灾委员会,打算献出非祭祀所需的珍宝。但布尔什维克党畏惧社会各种势力影响的扩大,对国内的民间救灾组织采取封杀措施,不仅查禁了此类救灾组织,并且逮捕了为首者,连高尔基也被迫流亡国外。对东正教会,则以救灾为名,制造事端,打击宗教势力:一方面直接没收教会的珍宝,充实国库,同时逮捕和镇压教会首领,禁止宗教图书的出版和传播。

2. 举行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十月革命后,除布尔什维克党外,苏俄还存在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它们长期从事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样,社会革命党也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是俄国人数最多的革命党,在农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列宁称之为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党;孟什维克则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别。十月革命后,这两个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和做法,但社会革命党在 1919 年宣布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获得苏维埃政权的大赦,此后,他们的党员曾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各种组织,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实施新经济政

策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害怕他们影响的扩大,在1922年组织了一场精心安排的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把他们的首领判处死刑和刑期不等的监禁(后来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做了从宽处理)。受审的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早已被关押在监狱,所以问题不在于判刑,而是要消除他们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农民中的影响,把他们搞臭。

3. 布尔什维克党要打击的第三股势力是那些不听话的、不赞同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把他们驱逐出境。大家知道,列宁多次说过,没有专家和知识分子就不能发展经济和文化,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过列宁重视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并不包括在内,他赞同对“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专家采取严厉的措施,把不听话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于是1922年夏,当局把数百名高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世界级的学者。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用轮船把他们运送出国,故名)。与此同时,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建立并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

这一套措施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同各种社会力量争夺影响的斗争,而不是同什么反革命的斗争。其结果,虽然压制、打击、消灭了异己力量,实现了一党独大,一党专政,国内似乎稳定了,但出现一个致命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和俄共从此不受任何社会监督,也听不到批评监督的声音,共产党人可以随心所欲,官僚主义、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开始侵蚀这个执政党。由斯大林领导的专为改善国家机关而设立的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很不得力,列宁甚至认为没有比它更糟糕的机关了。

列宁在最后时日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病中提出建议,要求加强对党的监督,克服官僚主义。他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文章,建议“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他把着眼点放在党的高层,建议改组工农检查院,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增加工人和农民委员的人数,加强对最高领导机关,特别是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监督。由于担心斯大林的粗暴导致党内分裂,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的建议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局部性的办法,第一,没有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体制着眼,没有触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第二,列宁这时已经重病在身,他的建议遭到搁置,一些领导人对之采取敷衍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有的建议即使被采纳了,实际上也已变味。例如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果只是增加

了斯大林的人马。列宁试图通过内部的监督来解决国家的监督问题,没有奏效,也不可能奏效。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扩大,被斯大林掌握之后,便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棍子。列宁逝世后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就是要在党内斗争中保证斯大林一派的多数地位。

这样,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整个时期,政治体制基本没动,而是朝着加强一党专政道路发展,加强了专政的镇压职能。而由于斯大林在党内斗争取胜,控制了整个党,一党专政就很容易地演变为领袖集权、个人专政。

经济改革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的保护。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应当通过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应当有宪制的保障。改革之初,曾经采取某些措施,向法制轨道前进,例如享有非常特权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取消其司法外的审讯权;取消革命法庭,恢复检察机关和律师的活动;通过劳动法典、土地法典、民法典,进行司法改革的准备。

但是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法制”观念依然未变。按照这种观念,法令必须与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法律必须严守阶级观点。在制定民法时,列宁指示:“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①

基本观念没有变,因此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影响政治体制的大局。1922年2月20日,列宁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去信说,必须扩大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②同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戈尔布诺夫又向库尔斯基转达列宁的更为明确的口头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应该成为整治私人贸易的战斗机关……要没收其90%的利润,要不就使他沦为乞丐,让他至死不忘。要捕捉、盯梢、设置陷阱和圈套。”^③在这种观念下,虽然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但是私人经济得不到法律的保护。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应对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运用刑法对付有粮不售的农民,以投机倒把罪予以严惩。农民自己种的粮食不卖给国家,怎么是投机倒把呢?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7页。

^③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第5全宗,第1目录,第360卷宗,第1张。转引自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1918年通过的宪法剥夺了下列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获取利润而使用雇佣劳动者，靠资本利息、企业收入等非劳动收入为生者，私商和商业中介，宗教神职人员，等等。此宪法一直实行到1924年。这样，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所谓“耐普曼”、“富农”都被剥夺了选举权。1918年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如集会、结社、信仰和言论自由（虽然有许多限定），而1924年通过的宪法只字不提公民的这些政治权利，却明确规定了城乡不平等的选举比例，城市25 000人选一名代表，而农村要125 000人才能选举一名代表。

在新经济政策下城市出现所谓“耐普曼”（由“新经济政策”和“人”两词组成），这是利用政府给予的政策，通过市场发家致富的商人和企业主，他们的出现是合法的，合乎市场规律的。但是，他们被定性为新生资产阶级，对他们采取限制、压制以至消灭的方针。在农村，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雇工和出租土地，一些善于经营的勤奋的中农，甚至贫农，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和优惠，变得富裕起来，但是在一些左派领导人看来，这是新生的富农，定期剥夺他们。搞得农民不敢富，不敢扩大生产。某些领导人始终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是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危险成分，必须予以压制并最终消灭。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等于党专政。“党专政”被写入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中：“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证。”^①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胜利后其作用逐渐消退，一切都由党来决定，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1921—1922年的大饥荒引发群众的不满，为得到群众的支持，开展了“复兴”苏维埃的运动，吸收劳动群众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并未实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各级苏维埃组织如同党组织一样实行的是上级任命制，选举仅仅是走过场。

粮食税是要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然而一些领导人想的却是如何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大的利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1923年7月16日发布第394号命令，号召国家托拉斯和辛迪加获取最大利润，结果工业企业大幅度提高工业品的价格。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价值规律，结果是工农业产品之间出现严重的“剪刀差”，农民买不起价格高昂的工业品，造成大量工业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251页。

品滞销,出现所谓“销售危机”。为了消除危机,只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压低工业品的出厂价,以消除“剪刀差”。结果,造成危机也好,消除危机也好,都是越过市场,通过官方的行政命令来解决的。这些做法都是与新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的。

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斯大林提出集体化的方针,强制农民加入公有化程度极高的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剥夺和消灭全体农民,把农民变成了“国家农奴”,而不仅是所谓消灭“富农”阶级。

改革和改革者为何失去保护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使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民主化,使全体公民享有民主自由,共同管理国家。

任何改革,虽然代表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的倡议和创举需要得到保护,各项改革措施需要政治体制的保护,甚至改革者的人身安全也需要得到保护。

20年代的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它很快平息了农民的暴动,广大农民开始安居乐业。有统计说,1923年基本恢复播种面积。1925年谷物总收成超过1909—1913年的20.7%。开始出口农产品和原料。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工人阶级人数与1920年(170万)相比增长4倍。这样的成绩在苏联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然而,改革的成果并没有保持下来。

1922年4月,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政治局正式委员7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3人: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在这10人中,坚定支持新经济政策只有4人,即列宁、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构成多数的其余6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经济政策。这个力量对比,注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布哈林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坚决维护者,他不遗余力地阐述和发挥发展新经济政策。1925年鉴于新经济政策在农村遇阻,他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要求放开手脚,允许农村雇工和租佃土地,号召农民“发财吧”。他反对剥夺农民,反对为获取工业化资金把农村当作殖民地剥削。他主张执行列宁的合作化方针,反对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他主张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反对片面发展工业和重工业。他提出发挥国营、私营、个体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互相繁荣、相互促

进,等等。他的这套主张同党内的左派激进主张发生冲突,掌权的三驾马车中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势的托洛茨基等都反对他的主张,把布哈林作为攻击对象。当时斯大林曾为布哈林辩护。斯大林借助布哈林等人的力量打倒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后,立即转过身来反对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者抗争了一年多时间,终于被斯大林击败。《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被撤消党内外职务,排除出领导核心。

布哈林等人虽然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也没有明确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即使这样斯大林也不能容忍。经过这一“斩首”行动,国内党内再也没有能够挺身捍卫新经济政策的力量了。

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主要是担心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危及社会主义。斯大林则是要加强对农村的控制,以更方便地获取更多的农产品,供出口换取外汇,解决工业化所需的资金问题,所以他反对市场机制,而要求恢复更为简便易行的严格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

以“中派”面貌出现的斯大林,先是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击败托洛茨基,然后联合布哈林等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最后集中力量打败布哈林集团。无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布哈林,都没有及时认清斯大林的真面目——这是一个深藏的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他在组织上获胜之后,立即于1929年底,未经中央决定,迫不及待地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从而终结了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行政计划管理体制。

斯大林不是靠高超的理论,也不是靠法律手段获胜的,他依靠的是组织力量,凭借的是打倒列宁的战友后所获取的党的最高权力。这样他就可以不经党和政府的集体决策,个人擅自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中断列宁开始的改革,回到已经被否定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上去。

中断新经济政策之后,斯大林立即实施他的全盘集体化方针,超高速度的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当时坚决反对自己、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李可夫,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此前托姆斯基被迫自杀)。他的大清洗消灭了列宁的近卫军,残杀了无数的社会精英,杀害了大批党政干部和军队指

挥人员,这直接导致卫国战争初期的败绩。苏维埃国家变成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国家。他的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的农业大幅度倒退,直接造成 1932—1933 年的大饥荒,粮食产量直到 50 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俄的战前水平,并且在以后的年代,农业一直成为困扰苏联的问题。被一些人赞颂的工业化让一代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

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同舟共进》2011 年第 5 期

革命党到政权党——苏共不成功的转变^①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大派别。布尔什维克派在列宁领导下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政党,准备在俄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的落后的农民国家,无产阶级要推翻沙皇统治,列宁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由少数革命家组成的、有铁的纪律、有严密组织的、高度集中的革命政党,这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实际上重点在集中。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在俄国开展斗争,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之后,利用当时的特殊形势,发动武装起义,夺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赢得国内战争,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验。虽然在沙皇政权的残酷镇压下,这个党缺乏民主和公开性,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证明,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对于革命和夺取政权,对于赢得国内战争是必要的,是有战斗力的。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政权站稳了脚跟,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党面临一个根本性的任务——从革命党向政权党转变。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党取消了原先承诺的选举制,在党内实行的是各级干部任命制,“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工作方法上的“战斗命令制”。这种制度是一种军事动员制度,符合战争的军事需要,但不适于正常状态下国家和党的建设的

^① 这是提交“第五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社会转型与政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18—21日在济南)的论文。我想把“执政党”与“政权党”作一区分。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后自然成为“执政党”,但它仍然照闹革命的方式,抓阶级斗争,用军事手段进行统治,而没有成为“政权党”,即成为按照常规依法治国的政党。

需要。集中化发展了官僚主义化,而战斗命令制变成了不必要的压制形式。为了向政权党转变,必须对党和国家进行一番改造。

20世纪20年代初有三项举措标示着向政权党的转变:列宁提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党内向工人民主制转变,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这种转变没有完成。

党本身的转型

1921年3月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其中在“总的前提”一节中写道:

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适合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①

民主集中制的重心是集中制,所以能很方便地转变为军事命令制,它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21年内战结束,中止军事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与此相应,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提法,不再使用“民主集中制”,而决定实行“工人民主制”(рабоч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这种改变的实质是从集中制转向民主制。其具体内容包括废除干部任命制,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向选民和下级(而不仅仅是向上级)报告工作,在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上讨论党的一切重要问题,在决议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通过以后,必须遵守执行。领导机关的会议公开,使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监督。这是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政权党转变的自身准备,不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政权党。因为如果执政党内部都不能实行民主,不能实行选举制,那么整个国家就谈不上民主了。

采取工人民主制是布尔什维克党向政权党转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在俄共十大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党内一切派别组织,其第7条规定中央委员搞派别活动可以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出党。但是,在实践上很难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9—50页。

把派别活动同正常的意见分歧分清,往往会以禁止派别活动为借口来压制不同意见。所以工人民主制自提出之后就没有实行过,1923年秋冬关于“新方针”的争论是党内最后一次争取工人民主制的斗争,随着托洛茨基的失败,苏共就再也不提“工人民主制”了。

政权党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这个问题在苏联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革命前由于处于地下状态,几乎不存在监督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一段时间里国内存在多个政党,包括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等,它们有时处于合法状态,有时处于半合法状态,但多少有可能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措施提出批评甚至反对意见,这是一种党外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过作用。例如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包含有孟什维克当年针对军事共产主义提出的纲领主张。在20年代初,列宁对孟什维克党合法化问题有过犹豫,曾设想让其合法化,但是经济上的退却,使列宁担心政治上的让步会动摇苏维埃政权,终于走上禁止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道路,使苏俄成为一党统治,“一党专政”(диктатура одной партии)的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从统治上来说显得方便了,再也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了。但是失去外部的监督,造成了官僚主义滋长,党员干部滥用权力,这使列宁大伤脑筋。列宁在最后时日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问题,在缺少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加强党内监督,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把其监督职能扩大到对政治局以至总书记的监督上——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检查政治局的文件。列宁同时提出改组工农检察院,让作为政府部门的工农检察院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提高其威望,实施监督职能。

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党内的监督并不可靠。由于斯大林掌握人事大权,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的结果是进入大批与斯大林观点一致的人,党内监督机关变成了为斯大林服务的工具。20年代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并不是党内民主的需要,而是为了使斯大林能够形成自己的多数,压倒反对派。到了30年代本来还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其任务不再包含监督中央各级领导机关,而仅仅是监督下级机关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随着党内反对派被击垮,斯大林逐渐拥有不受任何监督的独裁者的地位,“一党专政”变成为斯大林的个人专政,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如大清洗)不受任何监督。在整个苏联存在时期内,监督问题始终是个没有得

到解决的问题。

列宁多次提出党政分开的主张,主张党只管大计方针,而不要陷入琐碎的具体行政事务,党的任务是“对所有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①列宁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实现。由于国内只存在一个政党,这个党就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核心部分,党政合一,国家的一切决定和决策都由党来决定,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人民委员会是党的执行机关。不要说一般平民百姓,连党员和党员干部,都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发言权,民主成为写在宪法上的装饰品。党政合一的结果是机构重叠,在苏维埃和政府各部门之上还有领导它们的相应的党的各种机关,公职人员所领取的工资远远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947年斯大林给自己定的工资是1万卢布,而清洁女工的工资为200卢布),这种做法造成国家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人员和资金浪费,巴黎公社所追求的“廉价政府”理想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在职责不清的情况下,国内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得由党来承担责任,也应当由党来承担责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要存在阶级、阶层和不同的群体,就需要有代表其利益的政党,一个阶级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政党代表其不同阶层的利益。“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是符合社会实际的。然而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各种政党都被取缔。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党,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党,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国家机器。一旦党国融为一体,党也就再也起不了政党的作用了。一党专政,演变成个人专政、个人独裁。斯大林个人独裁能长期存在,集生杀予夺之权于一身,苏联共产党难辞其咎,这个党开始是助长和纵容,后来就是想制止也已无能为力了。这就证明这个党不是一个正常的党,不是一个集体领导的党,不是现代的党。

国家性能和职能的转变

政权党是国家的领导者、管理者,它不能仅仅代表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理应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代表和维护全体居民的利益,这应当是它的一切政策和措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4页。俄共十一大和十二大的决议一再重申党政分开的方针,见《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51、182、250—251页。

施的出发点,在无产阶级占居民少数的国家这一点尤其不可掉以轻心,这对于履行国家的正常职能来说非常重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占居民人口的多数为前提的,所以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对少数的专政。然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的国家里实现的,这里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对多数的专政,代表的是少数的利益。

1920年12月10日,列宁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谈话,由于是内部谈话,就很坦率。

代表团问列宁:“您认为称作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时期的现阶段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过渡到那个工会、出版和个人都享有完全自由的制度?”

列宁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自由,我们只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遵循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来实施,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在我国占少数,于是专政的实施就是为了这部分少数人的利益……”^①

这就是说,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国家一旦仅仅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必然同多数居民发生矛盾和对抗。在苏联的历史上就曾把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当作敌人,农业的集体化就是以消灭农民为目标的,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主要是靠农民缴纳的粮食和税金来实现的。

国家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专政的工具,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它还应当缓和阶级矛盾和对抗,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防止整个国家因阶级对抗而毁灭。^②列宁赞成“国内和平”(公民和平)的口号,布哈林接过这个口号论证了列宁关于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方针,以便把国内阶级矛盾和对抗降到最低限度,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和平稳定的环境。在一个动乱、不稳定的国家是无法展开经济文化建设的。而在一个落后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利用已经取得的政权去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或前提。靠煽动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的。

^①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0页。

列宁在最后时日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得出结论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①短短数语实际上是革命党向政权党转变的宣言。

然而这只是列宁本人认识的转变,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更没有成为全党的方针。在执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一些党的领导人仍然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耐普曼”和“富农”为打击目标,生怕“资本主义”的复活。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断言社会主义成就越大,阶级敌人的反抗就越激烈。他不是设法缓和矛盾,而是人为地加剧国内的阶级矛盾,不断加强国家的暴力镇压功能。农民本来在国内已经处于同工人不平等的地位,选举权只及工人的五分之一,即工人 25 000 人一票,而农民 125 000 人一票,而在全盘集体化中不仅侵犯农民的政治权利,而且直接剥夺广大农民的财产、土地。集体化不仅消灭了所谓富农,也消灭了农民。集体化过程,乃是斯大林发动的针对农民的一场国内战争。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把镇压的矛头对准国内的其他阶层和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最后发展到消灭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在他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国内不再存在剥削阶级之后,反而在国内开展了更大规模的镇压,大量无辜人员被杀害。

作为政权党的共产党的活动应当立足于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之上,依法办事。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党专政”或者“领袖专政”。重要决策由党内少数人甚至一人作出,然后由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去贯彻执行。苏联历史上没收教会珍宝,驱逐知识分子,实行非常措施,实施大镇压等,都是按照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决定进行的。在这些问题上,决策过程实行的不是“工人民主制”,仍然是集中制,个人独裁制。

名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或者党内少数领袖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施的专政。1919年7月,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承认:“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②国内战争结束后,一党专政并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6页。

有取消,1923年党的十二大重申:“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专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证。”^①然而,不幸这种专政正如卢森堡早在20世纪初预言的,最后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在30年代的镇压中,广大工人也未能幸免,许多大型工程是由包括工人在内的大批劳改犯建成的。在苏联的历史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全盘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人为制造出来的饥荒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饿殍,大规模镇压造成的千百万受害者,都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无可避免的成本,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我们常把“性价比”作为评价一个产品的指标,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有“性价比”这个衡量的指标。不惜任何牺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同社会主义应当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背道而驰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的后继者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称,随着国家镇压剥削阶级的职能的消失,“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全民组织的过程开始了。无产阶级民主已经日益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相应地,“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②如果承认1936年斯大林宣布的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那么在25年之后宣布“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就是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结论使苏共向政权党转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这一进程并没有完成,这最多只是向苏联人民作出的一种许诺,表示不再把专政的矛头对准他们了,而在其他方面,苏联社会和苏共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官僚主义、以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为代表的特权阶层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虽然不再提“党专政”、领袖独裁,但仍然是总书记(第一书记)说了算,共产党及其领袖仍然不受监督。国家减少了镇压的职能,但仍然不容异见,国内出现大量“异见者”。名义上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实质上仍然是少数人操纵的国家,代表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党。这个党已经积重难返,难以改造。戈尔巴乔夫干脆抛开这个党,宁当国家总统,不做党的总书记。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51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5、276页。

实施由革命党向政权党转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共产党曾几次实施向政权党转变的机遇,这就是20年代初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关头,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之后,80年代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时候,但是,苏联共产党没有把握住这些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进行有效的改革,没有能够实现从革命党向政权党的转变,其后果就是苏共丧权,苏联解体。

2007年11月10日稿

列宁论工会要捍卫工人的利益

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

1920年底到1921年初,俄共高层就工会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争论是由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工会的定位问题引起的:工会到底应当干什么?

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内运输业处于瘫痪状态,托洛茨基被派去抓交通运输工作。他运用军事管理的办法迅速整顿了铁路交通,使全国的交通运输业在短期内大有起色,他由此起意,要把军事办法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把工会变成可以实施强制的国家机关。用军事办法整顿工业企业,自然要同工会发生冲突。为排除工会的阻力,托洛茨基就提出整顿工会,“整刷”(抖落)干部的口号,要求改组工会。另一方面,进入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工会也面临自身工作性质的转换和定位问题,在经济建设中,工会到底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呢?任务不明,就引发了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那时就有一种说法,党管政治,工会管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管文化。因此,在转变时期,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争论得很激烈,但是各方的观点差别实际上并不很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工会国家化,由工会来管理生产;一种认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革命前工会的任务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保卫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共产党也利用工会这个公开的群众组织进行合法斗争。革命胜利后,剥夺了资本家,对工厂企业实行国有化,工会反对资本家的任务不再存在。革命前很有影响的工会该干什么呢?这就成了问题。在一段时

间里,给工会规定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生产,使工会国家化,成为一个国家机关。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工会几乎是当时能够并且应当担负组织生产和管理企业的工作的唯一机关。

但是不久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和生产建设,这就挤占了工会的工作,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工会同国家的经济管理机关平行地共同管理生产和经济。

托洛茨基坚持工会国家化,但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此前俄共的一贯主张,是写进了有关决议的。1918年1月初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道:

目前,工会工作的重点应当转到组织经济方面。工会……应当担负起参加组织生产和恢复我国被破坏了的生产力的主要工作。

1919年通过的俄共纲领认为: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同时,工会应当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俄共九大决议写道:工会“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来完成这些任务”,“工会应当逐步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辅助机关”。

俄共十大肯定了上述提法,以上“这些规定现在仍旧是完全适用的”。当前整个局势迫切要求工会更直接地参加组织生产。“现在工会已经在执行某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分配工作服,等等)。在苏维埃国家里,工会的这些国家性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①

俄共十大反对的不是工会国家化本身,而是反对“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速度的做法”,认为“迅速使工会国家化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②

列宁主张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工人学习管理的学校。这似乎与工会国家化无关,实际上其目的也是要通过工会这个学校学会管理,最终去管理生产和经济。

在激烈的争论中,布哈林试图缓和一下,提出工会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2—74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7页。

另一方面又是经济机关。这种说法被批判为折中主义，布哈林被斥为“缓冲派”。实际上他的说法反映的是当时的现实情况。以后的实践表明，苏联的工会始终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提法，在苏联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落实。

工会的重要任务是保护工人的利益

争论中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反而没有引起各方的重视，这就是工会像过去一样应当保护工人的利益。

著名理论家梁赞诺夫提出，工会应当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有人质问，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国家是工人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呢？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谁的侵犯呢？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苏维埃工联主义”。

列宁反对扣这种帽子，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的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没有工会，能够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①

因此“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②

在苏维埃国家，“工会虽然失去了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但是从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来说，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说，以及从其他方面来说，工会却永远没有失去——而且，很遗憾，在很多年之内都不会失去——非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③

由于这时候处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前夕，国内只存在国营企业，没有资本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0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04—20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98—299页。

所以列宁说的是“非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由于实行粮食税,农民有余粮进行交易买卖,国内出现私商,承认并开始利用商品市场关系,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实行租赁制出现私营企业,实行租让制引进了外资。不久国内开始出现劳资关系的多样化,由过去的国有企业单一的工人对行政管理人员,变成工人对国营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业主的劳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保护工人,防止国家的侵害,还要防止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侵害,在这里工会的任务同革命前类似。所以到1921年底,列宁已经承认在劳资之间存在阶级利益的对立。

不只是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列宁认为即使在国营企业也存在劳资间的某种对立。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之后,“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衷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①

这样,列宁就明确指出无论在私营企业还是在国营企业,工会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要把这一任务公开地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并且列宁特别强调,工会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指的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

1922年3月,俄共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时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了一年时间,劳资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共产党和工会面前。大会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中写道:

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续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是可以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调节即使十分有效,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尽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组织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作斗争。^②

列宁的主张现在变成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成为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67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5页。

罢工历来是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问题是在苏维埃国家是否允许罢工。在俄共十一大上就有过争论。当时有人认为,只可在私营企业举行罢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在大会所做的关于工会的报告中说:米柳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认为,在私人企业可以罢工,而在国营企业不允许罢工。该抛弃这种对待罢工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了。出现罢工不是因为允许还是不允许,而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在罢工问题上不能双重标准,而应当是统一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确定罢工是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斗争方法。

他指出,私人企业中的罢工是经济问题上的冲突引发的。资本家企图越出苏维埃政权规定的范围,竭力利用苏维埃的行情来恢复旧的劳资关系,这就与工人阶级发生冲突,事情发展成罢工。所以需要坚持一点,即我们不允许恢复旧的劳资关系。国营企业中的罢工并不是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管家,他们没有领会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摆脱了监督,不懂得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在这里,无产阶级需要制止自己的管家并将之纳入无产阶级轨道。莫斯科每月有30—40起罢工。99%的罢工与政治无关,只涉及可以解决的具体的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不禁止罢工本身,没有法律禁止罢工。如果工人没有采取罢工这种斗争方式,那不是因为法律禁止,而是因为出于阶级觉悟。俄国的工人阶级总体上是关心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因为不发展生产就不可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

托姆斯基说,我们能不能说,在国营企业不能罢工,而在私人企业可以?你们问问工人,他会说:“如果通过罢工可以改善状况,那为什么不让学生在国营企业罢工?”

托姆斯基不是鼓吹罢工,而是把罢工当作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一种手段。他说,如果我们认为罢工作为斗争方法在某一具体场合不适于解决冲突,那么在这种场合工会的任务应当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冲突,即通过调解室、仲裁法庭或者别的什么途径来解决。而只有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对国营企业来说是不会发生的),可以在上级工会组织的监督下举行罢工。^①

列宁支持罢工这种斗争形式。他说:“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被铲除,阶级

^① Оди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1. С.237—239.

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我们还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①

列宁不是一般地谈谈保护工人利益,而且还提出具体建议来维护工人权益,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设立罢工基金。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中写道:

(实行国家调节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项任务应当公开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工会的机构应当作相应的改组、改变或扩充,应当设立,或者确切些说,应当着手设立罢工基金等等。^②

设立了罢工基金,工人为维权而进行的斗争就有了物质保障,工人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当然,列宁也并不是一味鼓励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罢工是因存在官僚主义机关、存在劳资冲突而不得不采取的斗争形式,按照他的设想,正常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投诉国家机关”。他说:“无论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决不能忘记,而且也不应当向工人和劳动群众隐瞒: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解决劳资之间、受雇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冲突,应当愈来愈多地采取由劳动者直接投诉国家机关这种正常的方式。”^③令人遗憾的是,投诉国家机关往往遭遇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使斗争转向罢工。

保护工人利益,归根到底也是保护无产阶级国家,维护国家的稳定,保障生产的稳定发展。所以列宁说,要利用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在一个劳资冲突尖锐、罢工频发的国家或地区,是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的。工人安心生产是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最起码的条件。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主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67—3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6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68页。

历史的实际——20 年代苏联的劳资冲突

列宁在市场机制恢复之初,私人企业刚刚恢复的时候,就敏锐地提出保护工人利益的问题,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在以后的几年里,果然出现大量的劳资冲突。

解密的联共中央情报部的材料“关于工人群众的情绪及其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揭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劳资冲突的情况。

当时普遍存在的劳资冲突中,工人不满的原因处首位的是提高工作定额、降低单位工资、没有及时发放工资、裁员、劳动条件恶劣、行政命令行为,等等。工人对工资和工作定额的不满有一个共同点,不仅是因经济管理中存在缺点,而且还因不断开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因为工人的工资并没有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

工人闹事的地方相当多,整个苏联到处都有——远东、民族地区(卡尔梅克、布里亚特、中亚)、俄中部和乌克兰工业省份都有工人罢工。罢工人数夏天比冬天增加了1—2倍,因为有季节工人参加。1924—1927年罢工有增长的趋势。1926年6月15日至7月6日有43起罢工,1927年7月26日至8月15日有63起罢工,其中22起在企业,41起在季节工工种——建筑业、泥炭采掘、林木采伐、装卸等。在冬季,1924年12月有21起罢工,而1926年1月有41起,1926年6月有139起。罢工在中部经济区(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斯克涅先斯克省)以及大工业中心列宁格勒、下诺夫哥罗德省较集中,夏季月均10次罢工。罢工经常同沉重的劳动条件有关,如冶金、矿山、纺织、林木采伐,等等。千人以上的整个工厂停工不多见,但也存在,一般都是个别车间闹事。形式有“磨洋工”数小时,故意迟到或者托病请假,“意大利式罢工”——工人上岗,但不工作。多数罢工不超过一天,通常都和平解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答应要求,如重新签订集体合同,或者退回到原先的定额。也出现过最坏的情况,这就是解雇工人和接着实行清党和清洗工会。

在此期内大规模罢工之一是布良斯克1925年1月11日在“工会国际”工厂举行的罢工。因厂方降低计件工资的报酬引起自发骚乱,有2000人参加,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工厂支部会议成功地采取措施解决了问题。布良斯克区另一家机器制造厂,在几个月内一直有工人闹事,有时这一车间、有时另一车间停工。1924年12月因定额太高有120名翻砂工拒绝工作,结果有62人被解雇,其余工人或去上工,

或到南方另找工作。1926年列宁格勒红色普梯洛夫工厂出现类似现象,因降低工资出现几次风潮,其中最大的一次有950人参加,延续2.5小时。1926年在卡斯林斯基铸铁厂有1800人(占3个浇铸车间工人的92%)参加罢工,引发罢工的原因也是提高定额、降低工资。1926年6月列宁格勒省和诺夫哥罗德省的泥炭开采场有5000名工人罢工,要求降低定额和提高工资。

工人反对搞各种各样的运动,例如纺织工人反对从看管两台机器改为三台的运动。图拉省传动轴车间工人召开秘密会议,要求实行计件工资和发放合法的额外工资。那时为支援国外工人的斗争,往往扣工人的工资,作为援助基金,该厂工人公开反对扣除1%的工资去援助英国工人。会议通过致评议调解委员会和五金工会的呼吁书,甚至选出代表赴莫斯科“上访”。

不及时支付工资是激烈冲突的一个原因。弗拉基米尔省的“劳动”工厂由于不发放工资和提高定额引发长达2周的罢工,并导致工会重新登记。在利佩茨克县私营木材加工公司由于迟发工资和缺乏工作服而发生罢工,破坏机器。1924年7月18日至8月4日,由涅察耶夫承租的“觉醒”工厂发生罢工,得到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支持。

工人同行政管理人员的关系不和常常导致工人闹事,变成罢工或者发出威胁。萨马拉装运工举行5天的罢工,殴打管理人员,期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争取增加工资,有共产党员积极参与。一些工厂工人同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工人发出让工程师和领导人去“推独轮车”的威胁。西伯利亚边区一家矿井的冲突,最后以让矿井经理去推独轮车结束。冲突也往往造成悲剧事件,例如柳季诺沃工厂发生冲突,一名迫害工人的工长被打死。^①

本文详细介绍20年代苏联劳资冲突和工人罢工的情况,是想让读者知道,苏联那时的形势同中国现时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在市场机制下发生劳资冲突和出现罢工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劳资双方各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这就会造成劳资冲突,问题在于如何及时妥善解决矛盾,从而保持大局的稳定。20年代的工潮说明,工会的首要的迫切任务是保护工人的利

^① Сводки Информотдела ЦК РКП/ВКП(б) за 1924—1930 годы(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2).引自 www.ab.ru/~kleio/aik/bullet/22/33.shtml.

益。尽管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名义上是工人当家作主,但工人作为个人,或者作为一个单位的群体,无论面对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外国企业,都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一个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替他们说话,代表他们同资方谈判,还需要有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对抗资方的压制,这就是列宁肯定的罢工,在工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罢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既可以对资方施加压力,又可以防止工潮失序,保障社会的整体稳定。在劳资冲突中,工会如果无所事事,甚至替资方说话办事,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会被迫自己组织起来,不可避免地自发形成“山寨”工会。如果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的话,那么其首要的任务就应当是教会工人如何进行斗争,合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苏联在20年代有工潮,但没有出现社会的动乱,这同工会和党组织积极介入,合理解决矛盾分不开。

20年代末,斯大林在所谓反右倾集团的斗争中获胜,主张捍卫工人利益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李可夫一起被打倒,工会的作用发生急剧变化,失去保护工人的职能,成为单纯为生产服务的组织,其唯一的任务就是组织生产突击队,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保障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对广大工人来说,不要说罢工维权,就是私下发牢骚,也会大祸临头。大量的工人只因为迟到几分钟或者其他轻微的违反劳动纪律,就被送去劳改,成为建设大型工程如建设地铁、开挖运河的无偿劳动力。在大清洗中,工会的各级领导人自身且不保,遑论维护工人的权益了。

苏联20年代劳资冲突的历史,列宁关于工会应当保护工人的利益的论述,对我们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工会干部需要好好学习列宁的言论,在当前劳资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理直气壮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只有这样,工会才会得到工人的信任,工人的合法利益才能得到维护,社会才能得到稳定。工会要在维护工人利益和社会稳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农民的“布列斯特”

——列宁是怎样对农民妥协让步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妥协让步，一次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强大的德国军队的压力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订屈辱的割地赔款的和约，否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丧失的危险。第二次大规模妥协让步是对造反的农民的让步，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次让步被叫作“农民的布列斯特”。

“粮食专政”下的农民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使用军事强制手段来推进革命，维护苏维埃政权。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推崇军事暴力手段，把暴力强制当作万能的工具，在各个领域普遍运用。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特征。

被施加强制、暴力的重要对象是广大农民。

农民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列宁说过：“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党不仅依靠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而且是依靠全体农民取得了政权的。”^①也就是说，十月革命是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的结合取得胜利的。“全体农民”是什么意思？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然而没过多久，1918年6月11日，苏维埃政权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取代苏维埃，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富农成了革命对象，遭到剥夺，同时也殃及中农——针对富农的打击往往也落在中农身上，这招致广大中农的严重不满。

1918年5月13日，当局颁布法令，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实施“粮食专政”。1919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9页。

年1月11日开始实施粮食征收制(一般译作“余粮收集制”,不确切),明令规定农民上交所有余粮,而实际上征收的不仅是余粮,往往把口粮、种子粮等凡是能找到的粮食统统没收。

“粮食专政”是“专”谁的“政”呢?首先就是农民——农民的全部粮食必须交给苏维埃政权,有粮不交者、把粮食拿到黑市交易者,均被当作反革命论处。从这以后,粮食人民委员部、城市各工厂企业纷纷组织征粮队,下乡征收粮食。征粮队的人数,1918年11月为72000人,1919—1920年为55000人至82000人。除了征粮队,还组建了粮食军,它建立于1918年5月宣布“粮食专政”之后,1918年11月有29000多人,1919年10月为45500人,1920年9月达77500人。^①这支庞大的队伍一齐涌向农村,抢夺粮食。

征收粮食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从苏维埃政权来说,这是使军队和城市工人有粮可吃的唯一办法,而对农民来说,保存自己的粮食,是维系自身生命的需要,也是再生产的需要,粮食对双方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农民因被查出有粮不交而被当作政权的敌人,被判刑甚至处死。也有不少征粮队的队员遇到农民的暴力反抗而牺牲,尤其是那些滥用权力、作风粗暴的队员。

农民的武装反抗

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存在白军的威胁,农民对征粮的反抗往往是局部的、个别的。但到了内战的后期,在红白两军对抗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农民同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凸显出来,农民再也无法忍受饥寒交迫的日子,纷纷拿起武器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

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几乎遍及全国。最有代表性的是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的西西伯利亚起义(人数达10万以上)、坦波夫省农民战争(到1921年5月人数达5万)、伏尔加河流域的恰潘战争(参加人数达15万)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15000人)。据统计,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暴动。有一起暴动叫“叉子起义”,农民没有武器,就

^① И.С.Ратьковский, М.В.Ходя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етербург. 2001. С.70—71.

以叉子做武器,同官兵对抗,这是名副其实的“揭竿而起”。引发暴动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普遍的饥荒,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苏维埃的“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等等。

列宁的最终选择——妥协让步

面对蜂起的农民起义,布尔什维克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实行铁血政策,坚决镇压,一种是实行妥协,向农民让步。

内战行将结束,当局完全可以调动大部分红军用来集中镇压农民的暴动。起初苏维埃政权也确实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暴力镇压,动用了飞机大炮,甚至毒气,扣留并处决人质。不过用镇压的办法对待拥护苏维埃政权但不满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群众,不是上策。而像扣留并处决人质、施放毒气对付自己的人民,更不是共产党人所应采用的措施。像坦波夫省几乎所有成年男子都参加了暴动,能把他们斩尽杀绝吗?!从暴动的农民和水兵的主张来看,他们的要求并没有超越布尔什维克本身的革命要求,当然有一点是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容忍的,这就是“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的口号。镇压虽然可以平息局部地区的暴动,但农民暴动的浪潮此起彼伏,全国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是平安无事的。如果这样打下去,势必使整个社会瓦解崩溃,就像恩格斯说的,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这就需要走另一条路,这就是妥协,对立双方找到妥协、达成协议的方法。

要达成妥协,需要对形势,对双方的情况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这有一个过程。在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时候,列宁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城市工人和军队在挨饿,而农民却生活得很好,“吃饱喝足”,蓄意不把余粮交给苏维埃政权。1920年上半年列宁多次说过:

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工人过去每年平均得到11普特粮食,现在只有7普特。而农民现在每年却有17普特。^①

西伯利亚农民握有余粮……农民握有余粮而又不愿把它给挨饿者,是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65、284、339页。

实现资本主义关系。……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态度就是同他们开战。^①

不知道列宁所举的数字从何而来,但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农民每年拥有 17 普特粮食的说法只是一种数字游戏,那时的统计很不严谨,并且在战乱中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就算农民平均有 17 普特的粮食,但在无偿没收全部“余粮”的情况下,他们实际拥有的连 7 普特也不到。征粮数量是逐年增加的:1917—1918 年度征购了 5 000 万普特的粮食,下一年度是 1 亿普特,再下一年是 2 亿普特。这就是说,征收的粮食成倍增加,而在战乱中农民生产的粮食是不可能成倍增加的。由于当时的苏维埃纸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获,说是收购,实际上是征收、掠夺。后来列宁坦承:“我们承认欠了农民的债。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②那时城市的工人还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供应保障,而农村是没有人关心他们最低限度的需要的。

列宁的这种乐观的估计后来有了根本变化。1920 年底列宁承认,战乱加旱灾已经使“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③他在一个报告中说,希望同志们告诉 1 000 万至 1 500 万非党农民,“决不能无止境地忍受饥寒”。^④

1920 年 10 月在莫斯科召开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会上相当多的与会者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粮食征收制不满,许多人“强烈地想要把中央骂一顿”。列宁说:“当然,这是有益的,我也有责任听取大家对政府及其政策提出的意见。”他承认,“大多数农民深深感到地方上的情况极其严重。大多数农民深深感到饥寒交迫、捐税过重。(鼓掌,喊声:‘对!’)大多数发言人直接或间接责骂中央最多的就是这一点。”^⑤

列宁承认:我们同农民的联盟到现在为止是军事联盟(红军,国内战争),但“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没有经济基础,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⑥“如果现在农民更疲惫了,更痛苦了,或者确切些说,他们自己认为更疲惫了,那么我们就要对他们作更多的让步,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走共产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8 卷,第 208 页。

②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第 14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第 148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第 361—362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46 页。

主义道路。”^①

对农村状况估计的变化是实行妥协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这实际上承认了造反“有理”，这个“理”就是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他们对粮食征收制的反抗，得到穿军装的农民——军队的支持。而城市工人虽然有一份口粮，但很难果腹，这种状况在短期里是可以忍受的，但不能长期如此下去，何况许多城市工人同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就形成由多种力量结合的对政权不满，甚至反对的力量。

正是看到这种情况，列宁惊呼“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最大的政治危机”。他说：“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②列宁得出的结论是：“或者是农民和我们达成妥协，而我们在经济上向他们让步；或者斗争……而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能得到支持和巩固，我们可以作任何让步。”^③

1921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不开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用革命的办法改变政策，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把征粮制改成了实物税。”^④

实行粮食税——农民的“布列斯特”

从1920年初起，俄共内部已经有人陆陆续续提出废除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一类的建议。例如这一年2月托洛茨基考察了西伯利亚之后向中央提出建议：“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取代没收余粮（一种累进所得实物税），使较大的播种面积，或者较好的耕作有利可图。”^⑤这个建议被否决。此后党内外都有人提出过改行粮食税的建议，但都没有得到最高层的赞同。到1921年初，形势已经相当紧张，但高层对改变政策仍然犹犹豫豫，举棋不定。直到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喀琅施塔得水兵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12—31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7页。

⑤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暴动,这才下决心改变现状,立即修改政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废除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农民事先知道自己应当缴纳的粮食税数量,完税后的余粮可以自己支配,用于改善生活,或者交换。

这是对农民的重大让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政府一直实行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终于结束了,农民有了支配自己产品的自主权,这是一次大解放,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对农民的重大让步,是妥协让步、同农民达成协议的结果。这个协议就是:当局给农民以处置自己产品的自主权,农民则放弃武装反抗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政权下发展农业生产,交纳规定数额的赋税。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税的举措,被叫作“农民的布列斯特”。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措施,国家得到稳定和粮食,农民获得经营和支配产品的自主权。

当然,对习惯于革命、专政、进攻、战斗的人们来说,实施妥协让步是很难的。当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党内有左派共产主义者,党外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这一次同样如此,党内有不少人反对实行新经济政策。

据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说,完全同意列宁的也许只有克拉辛和瞿鲁巴,其他人或者沉默,或者顶牛。在一次会议上,列宁气愤地说:

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全体似乎都同意我,说是,而我一转身,你们就不说。你们同我捉迷藏。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同你们玩一种通行的议会游戏。如果议会对政府首脑表示不信任,他就辞职。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你们对我表示不信任,虽然现在连傻瓜都懂得我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你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又对我表示不信任。为此我采取通行的议会做法,向两个最高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全会提交辞呈。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在《真理报》和其他苏维埃出版物上写作的普通政论家。

列宁不是说着玩的,他是非常严肃地声明的。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喊道,对那些怎么也不愿意摆脱地下工作心理状态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必然同农民决裂的人,他已经厌倦同他们争论了。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立即摧毁了許多人表示的反对意见。^①

^① Н. Волег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С.31.

继续让步

实施粮食税,是国家对农民的第一个重大让步,然而事实表明,仅仅这一步是不够的。农民有了余粮,就需要与他人交换,以取得日用品和工业品。在实行粮食税之初,列宁是坚决反对自由贸易的,认为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实施新经济政策后,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担心商品交换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作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而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用布哈林的说法,这是一种寿命极短的“经济的蛞蝓”,是通向正常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上的一小步。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是没有商品、市场机制的经济政策。但是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的交易行为很快就突破了人为的藩篱,实物交换变成了货币买卖。“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住自己的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结果出现了多少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也就是说,先开放一半,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然后再开放一半,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①

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指出:“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②

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③1921年4月21日,他在《论粮食税》中说:我们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综合,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356页。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63页。

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①因此,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②谁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更多得多。^③

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他在报告中说:

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为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④

列宁认为还需要后退,退到经商作买卖。^⑤正式肯定“商品买卖”,这是向农民作出的第二个有重大意义的让步,这个让步使布尔什维克党走上承认商品、货币、市场机制的道路,这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虽然苏联后来没有把这条道路走到底,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去。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完整的新经济政策。虽然不能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归结为让步退却,但让步退却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一步,由于有了这一步,才引申出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后续举措。

对农民作的第三个让步是停止组织公社等公有化程度极高的集体农业组织。在国内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按照党纲规定的方针,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把重点放在建立公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20—22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另见第506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229页。

现这些公有化程度极高的公社效益极低,并不能激励其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列宁得出结论,“建立公社应当最后考虑,因为建立人为的假公社,使个别人脱离群众是最危险的事情。”^①“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②国营农场“有时起了很坏作用”。^③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了彻底的改变。在俄国的历史上从事合作社运动的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以十月革命后,列宁一直把合作社看作是培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是培植反革命的温床而予以否定。新经济政策运用了市场机制,列宁发现“做买卖的合作社”是最能吸引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组织。他在最后的文章之一《论合作社》中写道:“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原则作了让步;正是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合作化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它实现了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结合,这种“做买卖的合作社”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的组织。列宁得出结论:“文明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④

正是由于对农民作了一系列的让步,广大农民满意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和敌意消除了,他们对新政权的回报就是停止武装反抗,扩大农业生产,按照粮食税的规定缴纳应缴的粮食(后来是货币)。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农业发展得最好的时期。

辩证法——用“国内和平”口号取代“国内战争”的口号

1921年8月,列宁肯定了用“国内和平”口号取代“国内战争”的口号,认为这是“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⑤“国内和平”俄文为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мир,也含有“公民和谐”之意,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终于达到了这种和平或和谐。1922年11月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7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8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2、36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4页。

13日,列宁高兴地宣告:“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①

这是列宁的由衷之言,他深知农民反抗的厉害。还在十月革命前,1917年9月29日,他在《危机成熟了》中曾经严词指责临时政府说: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竟举行起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基京和格沃兹杰夫以及代表资本、代表地主利益的其他部长们!共和政府居然采取军事手段来镇压这一起义。

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②

很不幸的是,几年后布尔什维克政权也遇到了农民暴动,并且其规模大大超过临时政府时期。这就值得深思和检讨了。在俄国,得罪农民也就是得罪广大人民群众,引发他们的不满和反抗,从而危及苏维埃政权,这是使列宁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教训。列宁晚年曾经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留下“临别赠言”,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赠言”:

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8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72页。

同中农友好相处。^①

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②

出逃的斯大林秘书(也是政治局秘书)波·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列宁的秘书格利亚谢尔和福季耶娃关于列宁最后思考的一段话,列宁曾对她们说:

当然,我们是遭到了挫败。我们本来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直就像童话一样,随便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党不至于丧失灵魂、信心和斗志,我们必须向全党提出,作为某种暂时退却的做法,要重新采取交换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们世代所形成的生活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尝试以暴力把居民赶进新的制度,但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个全俄绞肉机中我们是否能够保住政权。^③

这些在《列宁全集》中找不到的话是可信的,它们可以相互印证,也可以在列宁的正式文章和讲话中看到此类思想,虽然不像私下谈话说得那么坦率和直白。意思很清楚,用暴力是无法把人们赶进新制度的,处理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最好的办法是妥协,以求得双方的让步和取得双赢。一味迷信暴力,以为暴力可以摆平一切,那就会出现列宁提出的问题:“在这个全俄绞肉机中我们是否能够保住政权”?

恩格斯说过:“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

① Н. Волент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С.186.

② 尼古拉耶夫斯基谈布哈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③ 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洪刚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往往只看重国家的镇压职能、专政职能,在实践中往往倾向于使用镇压的手段,而忘记了国家还有“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重要作用。而这“缓和冲突”的职能恰恰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妥协让步是达到缓和、稳定的有效途径,列宁在处理农民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0页。

苏俄的大饥荒与没收教会珍宝运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政权打败了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守卫住了苏维埃政权。然而这时候布尔什维克政权还面对数种威胁。

第一,农民因不满粮食征收制而采取的武装反抗,农民暴动蜂起。他们的反抗得到军队的呼应,终于在1921年春爆发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在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逼迫下,布尔什维克党取消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农民的布列斯特”,从而基本上平息了农民暴动的浪潮,不过对农民这个小生产者的恐惧依然存在,害怕从小生产者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列宁多次提到“最后的斗争”,其目标依然是农民。

第二,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威胁,这主要指的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正式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些政党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对过苏维埃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布尔什维克政权,它们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的某些批评,如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批评,对粮食征收制的批评,实践证明是有道理的,因而赢得社会的某些支持。对这些政党,列宁虽然曾经考虑让其合法化,但担心其潜在危险,最后还是决定采取镇压措施,在1922年举行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公开审判,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其影响。

第三,知识分子的抗拒。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被看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许多知识分子由于对革命不理解,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反感,对新政权往往抵制、怠工。这部分人员不容易屈服于暴力,往往坚持自己的认识和信仰,尤其是思想上难以认同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党也认为这些人难以改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祸害”驱逐出国,阻断他们对国内的影响。

于是 1922 年在审判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同时,采取措施把数百名高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这就是史称“哲学之船”的驱逐事件。

第四,俄国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在革命前东正教是国教,在广大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同持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革命后通过了一系列针对东正教的措施,如政教分离,使学校教育摆脱教会的影响,成立各种宣传无神论的反宗教组织,但收效不大。东正教及其大牧守在群众中仍然存在广泛的影响。为消除东正教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政权利用 1921 年发生全国性大饥荒的机会,以救济灾民的名义,没收教会珍宝,暴力镇压东正教会,以获取一箭双雕之利:既打击了东正教的实力及其影响,又为国库取得一大笔资金。

本文谈的就是 1921—1922 年的饥荒和救荒工作,以及苏维埃政权没收东正教教会珍宝的历史。

大饥荒与救灾活动

1921—1922 年苏俄的饥荒是苏维埃政权时期的三次大饥荒之一(1921—1922 年饥荒,1932—1933 年饥荒和二战后的饥荒)。俄国幅员广大,天灾年年有,有些地区经常发生旱灾、歉收或者颗粒无收。在正常年景,农民都有备荒粮,然而在粮食征收制和粮食税交替之际,他们家里一无所有,所有粮食都被征收走了。

1921 年,俄国发生严重的干旱,史称“伏尔加地区的饥荒”。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一地区,它遍及主要产粮区: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北高加索,涉及阿斯特拉罕、察里津、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等省,还有鞑靼自治共和国、楚瓦什自治区,乌法、维亚特卡省和马里自治区的一部分。此外政府还宣布下列地区因歉收而免税:吉尔吉斯(哈萨克)共和国、巴什基尔共和国,乌拉尔、奥伦堡、阿克莫林斯克、古里耶夫、库斯塔奈和彼尔姆省,还有克里木、乌克兰南部以及其他几个地区。饥民达 3 000 万至 3 500 万。饥荒最严重的是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南部。造成饥荒的不仅仅是天气,还有粮食征收制的消极后果。由于战争、农民暴动、富农经济被彻底摧毁、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等原因,同 1913 年相比,1920 年的播种面积从 10 500 万公顷减少到 9 730 万公顷,收成从每俄亩 50.3 普特降为 35.8 普特,粮食的总产量从 385 000.2 万普特降为 221 300.9 万普特,减少将近一半。而 1921 年的春播地(除乌克兰和土耳其斯坦)仅达 1920 年的 $\frac{3}{4}$ 。大牲口仅达战前水平的 71%。

迄今为止,统计学家对因旱灾引起的谷物收成的损失没有统一的看法。多数认为在10亿—12亿普特之间,即这一年比中等年景少收1—4成的谷物。旱灾受害最严重的是产粮区的农民:1919年1—2月至1920年1—2月,根据收支数字计算,他们每口人需要16.3普特粮食(一年,折算成谷物),而1921年2月—1922年2月只有8.2普特,减少了一半。在遭灾地区食用谷物和播种用的种子都没有。^①在饥荒的同时,还暴发瘟疫:伤寒、疟疾等。

布祖卢克保卫儿童非常委员会主席发往莫斯科的电报称:

我们县出现可怕的局面。饥荒猖獗:饥民吃猫、狗和动物尸体。开始吃死人的尸体。存放待安葬尸体的板棚夜里被盗抢分食。饿死者的坟墓被盗掘。从12月25日到27日埋葬了681人,其中509名儿童。饥民中发生恐慌,在绝望中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从死亡中自救。请理解这种绝境。请尽一切力量散发这份电报。请敲响警钟。请敲响警钟。帮帮忙!否则全县将荒无人烟。^②

据统计学家П. Н.波波夫统计,1921—1922年人口减少520万。如果考虑到每年的出生率,那么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700万。历史学家A. K.索柯洛夫认为,有600万农户实际上消失,人口减少约800万(约占人口总数的6%)。^③

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对这场饥荒作了形象的记叙:

东俄旱灾非常之甚。俄国产麦最多的北方,除乌克兰及西伯利亚外,本部向来要算黑壤区,向来运输关系上乌克兰及西伯利亚离中央太远,全靠大俄本部黑壤区的出产。今年却刚刚是这一区旱灾,灾区非常之大。值此劳农政府努力于提高农工生产力之时,又受一大大的打击。革命战祸连年以来,饥寒交迫,今年又是如此,真可见俄国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

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都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有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赈助。

① Белоу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II.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ю к нэпу.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2000. С.328.

② АиФ, 1988, № 19.

③ 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 С.113.

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载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吃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真是惨不忍读。政府茹苦含辛派遣火车去办移民，一切一切……”^①

人民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在地区之间重新调拨谷物和马铃薯。这不能不同立法发生冲突。还在春天，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法规稳定了农业税额。而人民委员会为增加救济饥民的粮食，多次提高无灾地区马铃薯生产者的税额。这严重破坏了关于农业税的法令。经过尖锐争论，考虑到局势的非常性质，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限于谴责政府行为并警告下不为例。中部地区不坏的马铃薯收成帮了点忙。

克拉辛回忆说：列宁制定的外贸的基本原则是：“只购买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尽量少买消费品。”但是，“1921年灾难性的旱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伏尔加河流域和其他几个省的饥荒，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原则。当我在1921年夏天由伦敦返回莫斯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时，我看他焦躁不安，不时抬起头来仰望阳光灼热、溽暑蒸人的天空，渴望能看到期待已久的云雨。他多次问我：‘我们能从国外买到粮食吗？协约国会允许把粮食运入俄国吗？’我们的整个进口计划被推翻了。在我再次去英国以后，我们不得不大规模购买粮食和种子（当然只能动用黄金储备，因为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出口贸易）。”^②

为救济灾民，国内外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建议，设法援助。1921年6月，高尔基倡议并牵头，会同普罗科波维奇、库斯科娃等社会名流向政府建议成立赈济饥民委员会，利用他们的影响，在国内外募集粮食救灾。列宁很重视高尔基的建议，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原则上同意高尔基同志的建议”，允许“社会活动家”参加。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赈济饥民委员会，加米涅夫任主席，著名作家柯罗连柯任名誉主席，李可夫、克拉辛、卢那察尔斯基，各界名流参加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要求组团出国以争取国外的援助并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要求苏维埃政府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

苏俄领导人对此意见不一。熟悉国外情况的契切林和克拉辛表示支持组团出

①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32页。

② 《回忆列宁》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9页。

国,认为派团出国不仅有利于募捐,还有利于向西方借贷、租让等工作的开展。克拉辛给列宁写信道:“我们不必给自己设置障碍,既然有人想出了普罗库基什委员会,那就让他去弄几百万吧。”改变政策“不仅对赈济募捐,而且对借贷问题及有关租让的谈判,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①泰奥多罗维奇给政治局的信中指出:“不能忽视所谓‘社会力量’所给予的实际帮助。据我所知,许多乌克兰农民就是看在柯罗连柯这个名字的份上才把粮食捐给饥民的。”^②委员会的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大批援助物资源源运往俄国。法国作家法朗士把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捐献给俄国灾区。但是多数领导人害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影响,洛佐夫斯基甚至认为该团是“反苏反共的自由民主联盟”,不能派这样的团出国,而应当让苏联工人阶级直接同西方打交道。^③政治局最后拒绝了派团出国的要求,8月27日解散了赈济饥民委员会,并且逮捕了委员会成员并予以流放。10月16日高尔基也被迫移居国外“疗养”。

高尔基还呼吁西方给俄国提供援助。最早响应者之一是美国救济署,1921年7月26日救济署署长胡佛通过无线电广播答复高尔基,同意提供必要的援助,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求释放关押在俄国监狱中的美国人。8月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洛佐夫斯基关于供养100万儿童的建议应予通过,即使通过谈判不能改变它提出的先决条件。”^④8月10—20日,苏俄代表李维诺夫同美救济署代表布朗在里加就美国给予俄国饥民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结果于20日签订了27条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救济署于1921年10月1日至1923年6月1日在苏俄进行救济饥民的活动,美方派遣必要的人员来苏俄,俄政府保障其人员的行动自由和来去自由;为进行工作可以建立必要的机构,俄政府不干涉其工作,但有权派中央和地方的代表参与。美救济署的工作严格限定在救济工作,不得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12月19日美救济署建议,由美方出资2000万美元为俄国饥荒省份购买粮食和种子,条件是俄政府同时出资1000万美元通过美救济署购买粮食和种子。12月22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沈志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普罗库基什委员会即赈济饥民委员会,由普罗科波维奇、库斯科娃和基什金三人的姓组成。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219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223页。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152页。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接受这一建议,给克拉辛发电报说:“我们接受布朗向您转达的美国的建议。由于饥荒日益加剧,请确定粮食送达的最近期限。”^①12月30日在伦敦签订了美国为俄国购买粮食和种子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关于美救济署提供价值2000万美元的粮食、种子和谷物,并在俄灾荒地区的成人中分配的协定。协定规定,8月20日签订的文件条款适用于美救济署在俄国范围已经扩大的工作。

美救济署的救济工作对缓解灾情发挥了良好作用。在获得苏俄政府同意之后,8月21日美国各慈善组织召开代表会议,11个组织签订了关于在美国救济署的领导下共同赈济俄国饥民的协议。据胡佛给总统威·哈定的报告,初步计算共筹得善款594980000美元,共运出784659吨的粮食、牛奶、油脂、白糖和药品。到1922年年中,美救济署为苏俄采购了40万吨的粮食,所办的食堂为325万儿童和530万成人提供了食品,为居民提供了医疗服务。胡佛称,由于救援措施“与饥饿有关的死亡曾一度中止”。^②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共和国驻国外援俄组织代表卡·兰德尔关于美救济署工作的报告中也说,“这些救济对我们有好处”。

但苏俄当局对美救济署的活动始终不放心。^③苏维埃政府对美救济署人员的活动保持高度警惕,派契卡人员严密监视。1923年4月1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美救济署问题,决定自1923年6月起停止美救济署在苏联的工作。1923年6月21日,政治局决定,“由人民委员会作出致谢的决议,并以恰当的形式授予哈斯科尔”。^④

1922年7月10日,移居国外的高尔基致信美国亚当斯女士,高度评价了美国的救济工作:

美国有权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他们在辽阔的战场上,在传染病肆虐的、孤独的和人吃人的环境中,如此无畏而出色地工作。这件工作除了具有拯救数百万即将饿死的居民的直接任务外,照我看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在俄国人民心中唤起被战争扼杀的人性的感觉,恢复已破灭的各国人民友爱的理想,实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166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172—175页。

③ 1921年8月8日中央全会就消除饥荒问题指出,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征收粮食税,向农民解释,帝国主义分子建议提供粮食援助旨在奴役苏维埃政权。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182页。威·赫·哈斯科尔是美救济署俄国分部主任。

现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愿望。^①

苏维埃政权还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救援。1921年8月2日列宁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书》，说俄国一些省份发生了饥荒，这次饥荒“只是略轻于1891年的灾荒”，呼吁国际无产阶级提供援助。^②成立了国际工人饥民救济会，在其帮助下从不同国家向苏俄发送了价值25 000万—30 000万金卢布的1.2亿普特的粮食。^③1921年9月2日，列宁在《关于欧洲工人的捐款》中写道：“中央委员会特别重视在欧洲工人中大力开展的捐献一天工资的宣传鼓动工作，认为这是救济饥民的最好形式之一。”^④

与此同时，国内也组织了大规模的救济运动。8月2日列宁发表告乌克兰农民书，说：“今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大丰收。但伏尔加河流域却在闹饥荒，那里的工人和农民正遭受比1891年的大灾荒差不了多少的灾荒，他们期待着乌克兰农民的帮助。”^⑤

向最严重的地区提供了1 200万普特的种子作秋播用，3 150万普特供春播用。折合成谷物，国家给饥民提供2 200万普特粮食。苏维埃社会团体给灾区提供了1 060万普特粮食。红军从自己的口粮中节约出约100万普特。据专家计算，这些措施拯救了330万人。约100万人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地区。

没收教会珍宝和反宗教活动

俄国多数居民信奉东正教。1914年有11 700万居民信教，有5万多司祭和助祭。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35 000个初级学校，58个中等宗教学校。1917年11月5日地区主教会议选举吉洪为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这是1700年彼得大帝取消大牧首之后首次恢复了大牧首的设置。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世俗国家”政策，把教会学校划归国民教

① 引自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1页。

③ Каторгин 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КПСС п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М., Мысль. 1971. С. 351, 348.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3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3页。

育部管理,取消必须讲授神学的规定。十月革命后,继续实施宗教和国家分离,并且走得更远,要建立“无神论国家”。

土地法令规定没收教会土地,从而摧毁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经济实力。1917年12月11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教会学校划归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此同时,其动产和不动产(房子、地块、图书馆、有价证券等)也转交国家。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令,规定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取消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人地位,宣布所有教会财产,包括建筑物为人民财产。

在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政治中立立场。1919年10月8日,大牧首吉洪在信中禁止教会人士站在白方一边、公开支持他们。

1919年苏维埃政权到处开展检验圣骸(圣徒的干尸)的运动。1919年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此通过专门决定。检验工作由专门委员会在神职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发现圣骸没有完整保存,就会被当作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到1920年秋一共进行了63次公开的检验。信徒和教士反抗招来的是逮捕、审判和流放。

在20年代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破坏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一项争夺群众的斗争。1922年5月托洛茨基给政治局委员的一封信说明他们对教会工作的重视。托洛茨基在信中批评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工作不积极,指出“整版整版谈论热那亚的无谓小事,与此同时却把俄罗斯人民中的深刻的精神革命刊载在报纸的边边角角上”。列宁看到托洛茨基的信,把这些句子画上了着重号批道:“对!1000次对!打倒无谓小事!”^①

1922年初,苏维埃政府决定没收教会的珍宝以“赈济”灾民,这一措施引发了教会同当局新的冲突。

爆发灾荒后,东正教教会在1921年7月已经开始救助饥民的工作。8月,东正教大牧首吉洪宣布成立全俄教会救济饥民委员会,呼吁世界人民和东正教徒援助濒临饿死的饥民。8月22日,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吉洪发布赈济饥民的呼吁书:“饥民和病人的苦难无法描述……灾难造成的牺牲无法统计——救救那些总是帮助他人的地区!”1922年2月6日,发出第二次呼吁。

^① 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 Ходяков М. В.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1. С. 161.

教会在短时间内募集到大量财物用于救济,并同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制定了东正教会参加救助饥民事业的《规章》,得到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的确认。教会代表同当局代表 A. H. 维诺库罗夫达成协议,教会捐助的救济饥民的珍宝必须不是祈祷用品。《规章》第 11 条认定,“教会对饥民的捐助还包括教会的珍品,后者要根据特别制定的条例来捐赠、清点和转交给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但后来这条被取消了。吉洪大牧首在致加里宁的信中指出,教会保存的是从远古留存下来的有着珍贵意义或历史意义的教会珍宝,我们希望为未来岁月保存它们。相反,凡不具这种意义的教会珍宝,则马上让教士们拿出来帮助饥民。^①

1922 年 2 月 2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称:

鉴于迫切需要迅速动员国内的全部资源同伏尔加流域饥荒的斗争,以及为了在该地区播种,作为对没收博物馆财产法令的补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要求各地方苏维埃在本决定公布后的一个月内在按照清单和合约交给各种宗教信仰团体使用的教会财产中没收不会严重损害祭祀利益的所有黄金、白银和宝石制成的珍宝,上缴财政人民委员部机关、有特殊使命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金库。

为实施这项工作,责成在每个省成立由省执行委员会、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和省财政局的负责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担任主席。决定规定必须吸收信徒团体的代表参加修改合约和没收珍品工作。2 月 28 日公布由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签署的没收教会珍宝细则。各省都成立了没收教会珍宝委员会。没收的珍宝上交莫斯科的国库。^②

吉洪大牧首曾提出自愿交出部分珍宝给饥民救济基金库,建议被拒绝。但到 1922 年 2 月教会还是征集了 892.6 万卢布,此外还有一批珍宝和粮食。

1922 年 2 月 15 日,大牧首吉洪在致教徒的信中写道:

在政府报纸对教会领导人进行激烈的攻击之后……为赈济饥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没收教堂的所有教会珍宝,包括圣器等教会供奉用品。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种行为是亵渎神圣……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 卷,第 495—407 页。

② 见 *Варламова С.Ф.*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голодом в начале 20-х гг. XX столетия. К 75 летию Дома Плеханова. С.-Петербург. 2003. С.177.

鉴于局势极其艰难,我们认为可以捐献教会中非圣物和非供奉用品。我们号召教徒现在捐献……但是我们不能赞同没收教堂中的祝圣用品(哪怕是自愿捐献),教规是禁止把它们用于非供奉目的的。

上沃洛乔克的教徒代表团曾向当局提出以缴纳粮食代替教会珍宝,得到的回答是:“不需要粮食,只要黄金。”1922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梵蒂冈用任何货币购买被没收的圣物的建议。

不久,政府决定撤销全俄教会救济饥民委员会,征用已募集的财物。开始了为救济饥民而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的运动。

没收教会珍宝的行动导致同各地教徒和群众的冲突。1922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没收由教徒集团所掌管的教会珍宝的办法”的法令,同日颁发实施细则。

弗拉基米尔省的舒亚城据此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开始没收当地教会的珍宝。1922年3月15日,在舒亚城大教堂广场发生人群攻击民警局和红军战士的群体事件,在驱散人群过程中有5人被打死,15人受伤住院,其中有一名红军战士。

3月19日,列宁就此写道,“鉴于舒亚发生的事件必须马上根据这方面总的斗争计划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列宁认为目前是没收教会珍宝的最佳时机,因为极为严重的饥荒可以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的情绪,“我们可以(因此也应该)用最猛烈、最无情的力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对任何对抗都进行坚决镇压”。^①列宁提出,“应枪决舒亚城中很大数量的最有势力最危险的黑帮分子”,“还要枪决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宗教中心地区的黑帮分子”。“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②

3月20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遣一个工作委员会去舒亚城。工作委员会经调查认为,该县没收珍宝的工作是正确的,但在准备工作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不够有力,建议立即结束此项工作,惩办肇事者以儆效尤。同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草案,草案经修改后通过。法案规定,宣传鼓动要具有完全是为赈济饥民进行的性质,而不是任何反

①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2—643页。

②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第645页。

宗教反教会的性质。莫斯科没收珍宝的工作不得迟于3月31日开始。

除舒亚之外,在很多地方发生了骚乱和冲突,有记录的这类事件达1414起。反对没收教会财产的神职人员和教徒遭到起诉和审判。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亚、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旧鲁萨、辛菲罗波尔等地举行了对抵制没收的神职人员的审判。在舒亚有19人被判刑,其中3名神甫被判死刑。

1922年5月8日,莫斯科法庭举行审判,在54名被告中判处11人极刑,4人监禁5年,13人监禁3年,10人监禁1年,14人释放。^①同日,加米涅夫向政治局提出撤销法庭判决问题,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意见。被判处极刑的被告人向最高法院的终审上诉部上诉,终审上诉部决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减轻对被告的判决。^②5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拒绝被告神甫赫·纳杰日金、华·索科洛夫、马·捷列金、谢·季霍米罗夫和亚·扎奥泽尔斯基的请求,维持革命法庭的原判。对其他6名被判处极刑的被告,将革命法庭的原判改为剥夺自由5年。”5月11日,加米涅夫再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赦免被告的问题,会议通过托洛茨基的建议:“中止执行判决。”5月14日,托洛茨基提交他的结论性意见,认为没有材料表明可以减轻对纳杰日金等5名被告的判决,对另外6名被告减刑的根据,“完全是考虑到尽可能少地损害判决的实质(这个判决对这11人来说是正确的),尽可能满足进步的神职人员的请求”。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同意了此结论性意见。^③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吉洪被软禁在顿斯科伊修道院,后被逮捕关押。

1922年6—7月,彼得格勒对86名僧俗人员进行审判。10人被判枪毙,中央执行委员会赦免了其中6人,以彼得格勒都主教维尼阿明为首的4人被处决。^④

对教会人士的审判遍及全俄。1922年总共有231起案件,732人被判刑。在1921—1923年间共有1万多僧俗被审判,约2000人被判处死刑。

通过没收珍宝运动共获得33普特黄金,24000普特白银,14普特珍珠,35000个琥珀和钻石,71000个其他宝石和29000卢布的金银币。^⑤

① Правда. 1922. 9 мая.

② Правда. 1922. 31 мая.

③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第794—795页。

④ 1992年维尼阿明被封为俄罗斯圣徒。

⑤ Лоскутов В.И. Уроки сталинизма. Голод. 网上资料。

实际上,没收珍宝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赈济饥民,而是充实国库。对此列宁在一封绝密信件中写道:

我们务必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金卢布(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是完全不能设想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是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我们没收珍宝的斗争必然大获全胜时保持中立。^①

在大饥荒中布尔什维克党需要作出选择:或者不顾一切地把拯救灾民放在第一位,接受国内外一切可能的救助,这就要冒国内外一向被看作敌对势力影响扩大的危险,“美帝国主义分子”、怀反革命情绪的各界人士、一直受到打压的宗教界人士会因为从事救灾活动而恢复在广大居民中的影响,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种选择就是竭尽全力缩小他们救灾的影响,甚至拒绝他们给予的帮助。苏维埃政权采取的基本上是后一种选择——对美国的救济进行严密监视和限制,到一定时候中止其援助活动,对各界名流的救灾活动不仅不予接受,反而迅速采取查禁的措施,而对教会发起的救灾活动不予承认或支持,而是采取没收其珍宝的措施,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它们通过救灾恢复在教徒和居民中影响,而且通过没收珍宝既打击了教会势力,还为国库增加大量财宝。

客观地说,在苏联发生的三次大饥荒中,20年代的这次救灾工作做得还算是好的,当局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并采取了某些救灾措施,打开了国门,接受外界包括“帝国主义美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难的致命后果。但是对“敌对势力”扩大影响的担心,对外国援助的不放心,缩小了援助的规模,影响了救济工作。而借救灾之名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虽属经济建设所要求,但此举侵犯了信仰自由,破坏了宗教文化,人为地制造了大量本来可以避免的群体事件,加剧了社会矛盾。

《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4期

^①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第643页。

1922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①

实行新经济政策,农民暴动逐渐减少,社会趋于安定。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仍然感觉到存在着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

其中的一大威胁是仍然存在、还在活动,在居民中间仍然有不小影响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

十月革命后除俄国共产党(布)外,还存在两个较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一个是与布尔什维克同根生的孟什维克,现在的正式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另一个是曾被列宁叫作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起同为第二国际成员党。这两个党一直半合法地存在和活动,不断批评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对布尔什维克党构成极大的威胁。这是苏维埃政权的心腹之患,于是在1922年进行了一场十月革命以来最大的政治审判案——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案,以彻底消除社会革命党在国内的影响。当时还准备接着审判孟什维克,但没有最后实施。

^① 关于1922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案,苏联史书很少介绍,语焉不详。虽然当时的报纸详细报道了案件的审讯情况,但一般读者已难以接触到。本世纪初出版了一批审判案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人员的介绍文章,才逐渐揭示出案件的真实过程。主要的有2002年出版的克拉西尔尼科夫等人编辑的《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Сост. С.А.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К.Н.Морозов, И.В.Чубыкин.-М.: РОССПЭН, 2002. 1007.),网上可以下载;2005年出版的莫罗佐夫的《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和狱中对抗(1922—1926):对抗的道德和策略》(Морозов К.Н.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тюрем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1922—1926): этика и тактика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М.: РОССПЭН, 2005.);1993年出版的扬申《没有审判的审判:1922年社会革命党人的公开审判案》(Янсен М. Суд без суда. 1922 год. Показа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М., 1993.)。

1922年的“社会革命党人案”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大政治案件。但是很难说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实际上这场审判是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对抗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是要给这半世纪的争论画上句号。布尔什维克党打算通过社会革命党审判案实现一箭双雕:一方面从政治舞台上排除尚存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其次是败坏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消除他们在群众中特别是农民中的影响,埋葬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另一种社会主义道路和方法。

社会革命党概况

社会革命党在俄国曾拥有巨大的影响。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捍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包括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其纲领确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即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实现土地社会化,消灭阶级和剥削,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等等。1906年曾参加国家杜马选举,获37个议席,他们向国家杜马提交了土地基本法案,要求把全部土地交给劳动者,法案征得约106个议员的签名。后来认为参加沙皇杜马的选举不合适,不再参加杜马选举,而集中精力于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和同专制制度斗争,恐怖手段在其斗争策略上占重要地位。

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进入了合法活动的舞台,曾一度是国内的主导政治力量。那时共有100万登记的党员,出版了80份日报。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历届临时政府,从第三届内阁起(9月14日,俄历9月1日),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担任了内阁总理。在后来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在703个席位中获得416个席位。在59个选区3600万选民中有2000万选民(57%)支持社会革命党。在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选举中该党到处都拥有多数,几乎所有城市的首脑都是社会革命党人。列宁曾经说过,社会革命党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

十月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曾密切合作,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两党联合夺权,此后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共事。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土地法令用的是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的方案。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以武力驱散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此退出了政府,结束了同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他们的做法同当时的普遍革命情

绪,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主张相吻合。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农民的要求,反对粮食征收制,反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同后来布尔什维克党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大体一致。他们在国内的合作社中有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列宁一谈到合作社立刻把它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联系起来,认为合作社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在农民的起义军中,普遍存在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或者有社会革命党人直接介入,或者虽然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但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主张和影响。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后转入地下,反对布尔什维克改制。不久,1917年选出的和1919年补选的全体中央委员被作为人质关进监狱。中央局的某些委员也被关进监狱。到1922年审判前有些人已经被关押4年之久。他们拥有6个地下印刷厂,出版非法的社会革命党报刊,其在俄国各地的组织仍在继续活动。社会革命党在国外设有特别代表团,其成员由在俄国的中央机关选举和批准。代表团成员(正式的和候补的)是:В.М. 切尔诺夫, Гр.И. 施雷德尔, Н.С. 鲁萨诺夫, С.П. 波斯特尼科夫(在德国), В.В. 苏霍姆林和 М.Л. 斯洛尼姆(在捷克), Е.А. 斯塔林斯基(在法国和比利时)。代表团设有常务工作机关——书记处(在柏林)。出版中央机关刊物《革命俄国》。^①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社会革命党人不仅要求经济民主化,而且要求政治民主化,这不能不对广大群众产生吸引力。

多年来关于反对党包括社会革命党灭亡的原因被解释为其“思想上破产”,其普通党员对其纲领和实践的失望。实际上应当说,社会革命党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打压下被消灭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不容异见的党,不仅不允许党外存在反对党,也不允许党内存在反对派,对反对党和反对派必除之而后快。

1922年初,肃反委员会开始改组,这时候有不少著名的党政领导人想要限制“革命的惩罚之剑”,认为既然国内战争的非常时期已经结束,其许多职能应予取消和限制。然而,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并不甘心新的地位和受限制的权力,它要向党政领导展示,在和平时期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社会革命

^① 社会革命党国外代表团致社会党国际常务局(1923年4月1日)。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П-127.

党人案给它提供了机会,它实际操作了整个案件的准备和实施,同时为审判期间的国家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

审判的准备工作

1922年1月15日,原社会革命党人、战斗队员、现俄共党员Л.В.柯诺普列娃给俄共中央送去声明,并向契卡递交关于社会革命党中央1917年底至1918年6月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从事军事、战斗和恐怖工作的情况的证词,认定社会革命党领袖联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俄国发动内战。她证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阿·拉·郭茨、Е. М. 季莫费耶夫、В. И. 李赫特尔、Л. Я. 格尔什坦、Д. Д. 顿斯科伊、М. А. 维德尼亚平等人直接领导了对沃洛达尔斯基、乌里茨基和列宁的暗杀行动。

柯诺普列娃给俄共中央的声明中说:

……我没有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我认为革命的俄国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任何条约。我产生了必须对列宁使用恐怖手段的念头……А.郭茨赞同此念头。列宁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在革命事件中出现。觉得社会革命党人屡屡失败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中央不像俄共中央那样有列宁这样的人。只有让列宁从政治舞台消失,社会革命党才有可能战胜布尔什维克……有时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中央认为不允许使用这种恐怖手段,但是它习惯于使用在复仇道路上所碰到的任何手段,——它批准了恐怖手段。

1922年2月,原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下属中央战斗队领导人Г. И. 谢苗诺夫在柏林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册子《1917—1918年间社会革命党的军事和战斗工作》。他在前言中写道,经过沉重的思想斗争,他决定谈谈社会革命党人使用奸细、破坏活动、剥夺、怠工、个人和群体恐怖来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情况。谢苗诺夫深信,从二月革命起社会革命党一直起反革命作用,使用社会主义政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方法。“我坦率地声明,我对社会革命党所犯罪行所承担的责任要比任何人都多……根据最高革命法庭的要求,我认为自己必须返回苏维埃俄国接受应得的惩罚。”

柯诺普列娃和谢苗诺夫的说法成了指控社会革命党人的重要证词。

1922年2月27日格伯乌主席团发表通告称:鉴于格伯乌所掌握的材料毫无疑问地确定社会革命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犯的罪行,将该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积极活

动家送交最高革命法庭。格伯乌号召公民谢苗诺夫以及全体参与该党活动但认识到其罪恶的反革命斗争方法的党员,在审判社会革命党时出庭。

1922年3月4日,政治局作出准备审讯社会革命党党员的决定,把全体社会革命党员,还有那些甚至现在已是俄共党员的原社会革命党员统统列入被告。^①当然,受审的首先是在押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们。

3月15日政治局任命一个由捷尔任斯基、库尔斯基和斯切克洛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社会革命党案的准备和安排。4月13日撤销捷尔任斯基、斯切克洛夫和库尔斯基小组,任命了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审判案的政治方面问题。

社会革命党人是以恐怖行动出名的,对此不得不防,审判期间整个莫斯科如临大敌。5月24日格伯乌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从5月26日起在莫斯科实施24小时昼夜巡查,成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加强警戒和预防,切断被告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对来自国外的辩护人实施严密监视,检查他们的来往信件,甚至为已婚的王德威尔得制造绯闻。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制定

1922年春,司法人民委员部着手制定刑法典,准备提交于5月12日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讨论会。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把法典草案送交在高尔克的列宁审阅。法典的6条涉及极刑(枪决)。15日列宁在旁边补充了6条,依据这6条也应予枪决,例如第69条规定:宣传和鼓动……包括号召消极抵制政府、群众性不履行兵役或纳税义务者枪决。未经批准的回国者也应予以枪决。

1922年5月15日列宁向司法人民委员解释其主要论据:

依我看,应把枪决(也可以代之以驱逐出境,见第1页下方)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一切活动;

找出适当措词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及其同我们的斗争(收买报刊代理人、准备战争等等)联系起来。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27.

他在5月17日的信中继续写道：“法院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答应这样做是自欺欺人，应该原则地、明确地、不掩饰又不夸张地说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表述应尽量广泛，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良心才能提出实际上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

列宁提出两个方案：

方案1：凡以宣传，或者鼓动，或者参加或者协助一种组织等行动（宣传和鼓动）帮助那一部分不承认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平等地位，并图谋通过武装干涉、或者封锁、或者间谍活动、或者资助报刊以及其他类似手段以暴力推翻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国际资产阶级者，处以极刑，情节较轻者，以剥夺自由或驱逐出境代之。

方案2：

凡从事客观上协助那一部分……国际资产阶级之宣传或鼓动者，凡参加或者协助进行上述活动的（其活动有上述性质的）组织或个人之罪犯，均应判处此刑。

方案2(b)协助或能够协助。^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于1922年6月1日起实施。

匆匆出台的刑法典成了对社会革命党人审判的法律基础。

三个国际代表会议关于社会革命党人案的协议

在准备社会革命党人案之际，在德国召开了三个国际代表会议。这三个国际是：共产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会议于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举行，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实际措施、筹备世界工人大会。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个人组织间实现统一行动，但是在苏俄却要审判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就不能不引发国际性的抗议。许多国际组织要求中止或者延缓审判，由三个国际代表会议来协商这个问题，找出解决的出路。第三国际的代表就此作出了两项许诺：1.对社会革命党人不适用死刑，2.苏维埃政权准许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派代表出席审判，充当辩护人。列宁对三个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86—188页。

际会议的结果很不满意,认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过他认为“不应该撕毁签了字的协议”。^①

涉案时间的认定与 1919 年的大赦令

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涉案时间的认定。一个方案是仅仅追查社会革命党 1918 年的罪行,另一个方案是追查社会革命党所有时期的罪行。1922 年 5 月 10 日俄联邦最高法院庭长克雷连柯致信政治局反对扩大审讯范围。

但中央政治局设立的“三人委员会”决定扩大范围,对社会革命党人在所有革命年代的所有活动提出控诉,而不仅仅限于 1918 年至 1919 年初。克雷连柯对此提出异议,他说此前他收到的材料只涉及 1918 年,即谢苗诺夫在其小册子中所揭露的内容。而后来(5 月 9 日)从格伯乌那里得到 9 卷材料,涉及社会革命党人在所有革命年代,即涉及坦波夫起义、喀琅施塔得、西伯利亚和乌法的起义。这些材料在审判前根本来不及研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不能在审判中要那些从 1919 年起就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为其他在 1919 年、1920 年和 1921 年还没有成为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的人的行为负责,提起控诉。在有外国辩护人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仅可笑,而且愚蠢”。此外根本就不能追究政党,因为在法庭上应当追究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党。因此克雷连柯要求“把案件限制在 1918 年的范围内,指控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和其他党员,指控他们参与恐怖行动、交结同盟国、参与剥夺和准备武装起义”。否则“我将不得不解除自己对审判案的所有责任,我不想成为使党政治上破产的罪人,请求把案件从最高法院转交给另外一个机构,或者结束我在最高法院的工作和对审判案所承担的责任”。^②

最后确定的涉案时间是 1917 年底和 1918 年。

但是这样一来审判就遇到的另一个矛盾——1919 年初苏维埃政权的大赦令。

1922 年 4 月 1 日温什利赫特致政治局的信中写道: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在审讯中拒绝递交口供,其依据是 1919 年 2 月 26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该决定赦免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所有集团,条件是放弃同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135—137 页。

^②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6.

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政策,并且赞同1919年2月8日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号召社会革命党党员去同各反动政府斗争)。上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可以被解释为赦免社会革命党各党员和集团在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时期的所有行为。即将被送交法庭审判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就是这样解释该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将按照这种精神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发言。有鉴于此,或者由司法人民委员部作出解释,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不适用于1918年参加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和剥夺活动的社会革命党党员,或者认为符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的相应决定。^①

不仅存在1919年2月26日的赦免令,而且1919年11月5日还有一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赦免所有宣布动员本党党员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党党员的决定,其中写道:

作为对大赦的补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令各地方机关从地方监狱和集中营释放所有宣布动员本组织成员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组织和政党的所有成员。^②

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就此解释说:赦免只限于对那些参加过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并已改恶从善不再斗争的那些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对那些并未放弃采取恐怖、破坏和剥夺手段的被告则不予赦免。^③

解释相当勉强,那些被告大多在1919年就被关进监狱,根本不可能再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斗争或恐怖活动。

被告——一群历经磨难的革命斗士

在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中,共有34名被告。他们分为两组,第一组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以及某些积极分子,共22人,他们是:阿·拉·郭茨、德·德·顿斯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53.

^②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55.

^③ 达·里·戈林科夫:《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下册,赵永穆等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科伊、叶·姆·季莫费耶夫、列·雅·格尔施坦、米·阿·利哈奇、叶·马·拉特涅尔、马·阿·维杰尼亚平、米·亚·亨德尔曼—格拉鲍夫斯基、尼·尼·伊万诺夫、德·菲·拉科夫、弗·菲·费多罗维奇、谢·弗·莫罗佐夫等。第二组基本上是原社会革命党战斗队员,以谢苗诺夫为首,他们脱离了社会革命党,有的已经加入俄共,这些人实质上仅仅是陪审。

1922年8月14日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局曾散发一份地下传单“审判谁?”,介绍了主要被告人的情况:

1. 阿加波夫,32岁,1909年参加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曾被流放,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3次被捕,关押近2年。

2. 阿尔腾耶夫,38岁,1903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4年,在那里因逃跑被流放到北极圈无人区,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4次被捕,被关押近3年。

3. 韦杰尼亚平,42岁,1901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2次被流放,3次被捕,被关押约7年(其中4年为苦役),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2次被捕,被关押1年半以上。

4. 亨德尔曼,41岁,1899年参加革命运动,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因参加大学生骚乱被送去参军,多次被关押和流放,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从1921年3月起被关押。

5. 格尔施坦,45岁,1898年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被关押4年半,两次被流放(2年和3年),1920年是推翻高尔察克的伊尔库茨克“政治中心”办公室主任,1921年4月起被布尔什维克关押。

6. 哥尔可夫,47岁,1902年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5次被捕,被关押5年,被流放,1920年8月起被布尔什维克关押。

7. 郭茨,40岁,1900年参加革命运动,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起是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参与针对杜尔诺沃(1889—1895年任沙俄内务大臣,1895—1903年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米恩和里曼(两人均为沙俄上校,镇压莫斯科12月起义),大臣亚基莫夫、市长舒瓦洛夫,警察局副局长拉奇科夫斯基的行动,在沙皇制度下3次被捕,流放,服8年苦役,1920年5月起被布尔什维克关押。

8. 顿斯科伊,41岁,1897年参加革命运动,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

度下因参加大学生骚乱被送去参军,3次流放西伯利亚,在狱中关了约6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关了3年。

9. 伊凡诺夫,34岁,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北方飞行战斗队成员,参加针对监狱管理总局局长马克西莫夫的恐怖行动,准备爆炸国务会议,为此被判15年苦役,后改为10年,在高尔察克下由于逃出监狱免遭枪决,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2次被捕,从1921年8月起坐牢。

10. 伊凡诺娃—伊拉诺瓦,36岁,1901年参加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参与刺杀了古季姆监狱长,是刺杀“十字”监狱长伊凡诺夫的组织者,参与执行暗杀马克西莫夫行动,1907年在准备爆炸国务会议时被捕,被判处绞刑,后改为无期苦役,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3次被捕,1921年12月起坐牢。

11. 利哈奇,34岁,1903年参加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4次被捕,监禁2年,3次流放(有两次各为期3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21年1月起坐牢。

12. 莫罗佐夫,34岁,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1905年参加社会革命党,普列斯尼亚起义参加者,7年苦役,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19年8月起坐牢。

13. 拉科夫,40岁,1902年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参加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多次被捕和流放,在高尔察克统治下曾被捕,侥幸逃过枪毙,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已被关禁3年。

14. 拉特涅尔,36岁,1903年参加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9次被捕,关押约6年(其中2年半关押在要塞),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19年12月起坐牢。

15. 季莫费耶夫,36岁,1900年参加革命运动,1902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05年被判处5年苦役,期满前因在狱中领导伊尔库茨克党组织追加10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20年5月起坐牢。

16. 费多罗维奇,43岁,1898年参加革命运动,1902年参加社会革命党,在沙皇制度下5次被捕,被流放,服苦役6年,在高尔察克统治下被捕,多亏逃跑得以躲过枪毙,曾任推翻高尔察克的伊尔库茨克“政治中心”主席,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21年3月起坐牢。^①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8—2.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被告人名单,从中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反对沙皇制度的英勇无畏的革命斗士,为此曾多次被捕、流放和服苦役。十月革命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同,不能认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因而再次遭受逮捕和坐牢的命运。

审 判

实际上,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的任务不是证明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罪行,——对此社会革命党人不仅供认不讳,而且以此为荣,也不是把他们投入监狱——他们已经被关押多年,而是要败坏社会革命党人作为革命者的声誉,证明他们是一伙勾结协约国、立宪民主党人和白卫军的革命叛徒。

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于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政治局决定由皮达可夫(代替卡尔克林)担任最高革命法庭庭长。公诉人是:尼·弗·克雷连柯、阿·弗·卢那察尔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共产国际的克·蔡特金等人。

根据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特别决议,法庭准许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派代表作为辩护人出庭,为第一组被告辩护。他们是:艾·王德威尔德、蒂·李卜克内西和库·罗津费尔德以及革命前享有盛名的律师尼·克·穆拉维也夫、阿·萨·塔格尔等。为第二组被告辩护的是:斯·勃·奇列诺夫教授、鲁·卡塔尼扬和共产国际代表费·柯恩、亚·萨杜尔、安·葛兰西等。

法庭指控社会革命党人的罪状有:

国内战争的策动者;

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机;

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

在1918年夏秋,社会革命党人“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

密谋暗杀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打算从同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爆破用的技术器材;

1918年充当协约国的间谍;

同萨文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或者

同反动大学生甚至同白军合作。

被告承认1917年至1918年进行过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但他们指出,1919年2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过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大赦令,赦免了他们此前的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的罪行。1919年11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补发了《关于赦免所有宣布动员本党党员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政党党员的决定》。

1919年初,鉴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威胁,社会革命党人取消了武装暴动的做法,从那时起就没有进行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萨马拉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曾经给布尔什维克军队打开了一段高尔察克的战线,大赦令也因此而颁布。这以后社会革命党放弃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他们承认苏维埃政权,只要求实行允许各党派自由宣传的苏维埃改造。

社会革命党的伊尔库茨克“政治中心”在逮捕高尔察克中起了重大作用。

“政治中心”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组织,1919年11月12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会议上成立,主席是社会革命党人费多罗维奇。1919年11月红军占领鄂木斯克,高尔察克政府逃往伊尔库茨克。政治中心于12月19日在切列姆霍瓦车站发动起义,1919年12月底政治中心开始控制伊尔库茨克,1920年1月6日政治中心宣告掌握政权,地方政权转入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议之手,同时宣布高尔察克及其党徒为人民敌人。1月10—11日,政治中心召开西伯利亚人民管理临时委员会,把全部权力移交给该委员会。有8名政治中心成员以及地方自治机关和合作社的代表进入委员会。1月15日,捷克军团司令部应政治中心的要求把乘火车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高尔察克及其总理佩佩里亚耶夫交给政治中心。1920年1月20日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转入其手。政治中心将高尔察克转交军事革命委员会。1月23日政治中心解散。2月7日根据列宁下达的秘密指示将高尔察克枪决。

对社会革命党在粉碎高尔察克中的作用,在审讯期间卢那察尔斯基曾予以肯定。1922年7月12日卢那察尔斯基在致俄共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目前无疑犯了某些错误。社会革命党人虽然不是理性地,仅在不大的程度上,但毕竟帮助了摧毁高尔察克……以至季莫菲耶夫有惊人之语:“我们打倒了高尔察克,拱手

送给了你们。”^①

1919年6月28—30日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九届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称：“值此一切革命成果面临……来自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其他内外反动派代表的威胁之际，考虑到现有力量对比，社会革命党第九届委员会赞同并批准所有拥有全权的党的机关通过的在目前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和代之以一般的政治斗争的决议。”^②

192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维吉尼亚平在供词中谈到社会革命党策略的变化，他们对波兰战争的支持，以及在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中的工作。他说：

1919年6月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九届委员会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策略发生了改变，放弃了同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第九届委员会之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发表致人民委员会书，其中说，社会革命党建议以全俄工人农民代表会议来解决立宪会议问题，工人农民代表会议通过直接秘密的选举选出，党将服从这样的解决办法。

1920年5月，苏俄对波兰军事行动开始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劳动者和党员全力支持红军对波兰的斗争，此前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们领导反对高尔察克的武装起义，并同苏维埃政权达成协议，以避免重新燃起国内战争，中央委员会还赞同菲里波夫斯基同邓尼金作斗争并同苏维埃政权达成协议的做法。

由于社会革命党在同波兰斗争中的立场，维吉尼亚平请求社会革命党中央准许他去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并得到了准许。1920年5月9日他会见了比岑科，谈好并在集体农庄总局（Центроколхоз）工作。但在5月11日被捕，1920年12月31日获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积极参加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维吉尼亚平为此建议出版杂志，他和顿斯科伊向俄共中央加米涅夫提出请求。俄共中央鉴于社会革命党所采取的立场及其提出的出版党的机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7—25.

^② 转引自达·里·戈林科夫：《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赵永穆、陈行慧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页。

关刊物的请求,决定成立三人小组(加米涅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克列斯廷斯基),就此进行磋商。维吉尼亚平最后获得了出版杂志的许可,只是由于纸张危机,未能实施。社会革命党手中掌握来自地方的信息,了解粮食征收制中的问题,知道如不改变没收粮食的做法,那么在乌拉尔和所有地方将会爆发起义。维吉尼亚平通过比岑科就此提出建议,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候,俄共中央书记谢列布里亚科夫曾把上访的农民奥·伊·切尔诺夫送到维吉尼亚平那里,这位农民从伊尔库茨克省的切列姆霍沃来到莫斯科,目的是说明粮食征收制的致命危害,他有大量的事实材料证明这一点。2月9日,列宁接见了切尔诺夫,根据列宁的指示《消息报》刊载了切尔诺夫的报告。^①

维吉尼亚平的供词和经历说明,从1919年初起,社会革命党确实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认可。

以停止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为标志的社会革命党的新方针还表现在:

1919年2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一项决议: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鼓动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他们还宣布,只要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对社会革命党人实行屠杀政策,就不先动手。1920年还说过: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充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么党将拿起武器。此后它并没有采取任何恐怖行动。

1921年9月,即审判前10个月,已经被关押在布蒂尔监狱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们给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他们认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而不主张用任何方式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②

第一组被告们在最后陈词中纷纷表示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主张,拒绝放弃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他们宣称,如能获得自由,将继续社会革命党的未竟事业。有的被告只承认自己的过错或罪行是1918年同布尔什维克党斗争得不够。

1922年8月1日,郭茨在辩护词中说:社会革命党人在监狱中被同人民群众和政治斗争隔离了两年多,现在我们利用法庭这个讲坛向工人阶级说明自己过去的活动、在革命危急的困难条件下难以避免的不由自主的错误,告诉他们我们所设想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II—30. 另见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1921—1923)》,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② 参见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卷,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346—362页。

的拯救革命的可能道路。“我们为此向你们表示感谢。”他说：“我不知道命运给我们的判决是什么——生还是死。如果是死，我们将作为革命者死去，勇敢地面对死亡；如果是生，我们将作为社会主义者，为工人阶级的利益竭尽全力继续斗争。”^①

被告李别洛夫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1918年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得不够。”“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向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

1922年8月4日，《消息报》刊载了第一组被告的最后陈词。当时的报道还能够较为客观地转述被告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思想和立场。下面是报道的部分内容。

第一个陈述的是女被告人叶夫根尼·拉特涅尔。她反驳布哈林的论点，断定布哈林没有能够证明社会革命党背叛了齐美尔瓦尔特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决议。社会革命党人加入的第二半国际，是齐美尔瓦尔特和昆塔尔立场的“自然”延续。拉特涅尔的发言以社会革命党人“为无产阶级的自由而斗争”的论断结束。

被告中央委员里哈奇在“最后陈词”中指出，第一组被告的罪行是曾经得到赦免的。他说，我们过去是社会主义者，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者。

庭长皮达可夫向被告说明，法庭想从被告最后陈述中听到，如果他们获释，是否还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皮达可夫同志强调，在判决时这一点对法庭极端重要。

利别罗夫指责苏维埃政权把工人变成“寄身农民身上的赘疣”。

中央委员季莫费耶夫在陈述中表示，我们将等待未来的另一个时间，那时我们将回来干我们的工作。像过去那样，我们将号召为这个未来而斗争。

叶连娜·伊凡诺娃在结束时说，如果我获得自由，我会按照我对你们的仇恨所指示的那样行动，这种仇恨是从1917年10月起就怀有的。

兹洛宾声明，根本谈不上“今后不留在社会革命党的行列之中”，他同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贝尔格发表了非常长的辩护词，赞扬民主自由并谴责苏维埃制度。他声明，如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II—75.

果获得自由,今后不会收起社会革命党的旗帜,将继续社会革命党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工作。

哥尔可夫—多布罗留波夫说:“我从来就是任何暴力的反对者。因此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是我无法接受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是民主和人民政权。我是社会革命党人,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立场。”

格尔施坦说:“我们不会放弃我所理解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革命民主社会主义不会死亡。”

伊凡诺夫声明:今后我们同你们走的也不是一条道。我们将继续为社会主义理想进行同样的斗争。

被告拉科夫说,他发表最后陈词是为了说明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和思想。他说,鉴于苏俄的国内外形势,党认为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策略是有害的。应当从党的武器库中抛弃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纲领包括:恢复农民经济,阐明和形成依靠农民的阶级方针,消除农民中间的暴动造反情绪。

被告莫罗佐夫声明,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你们的敌人。今后我还要为我过去服务过的事业服务——解放劳动者。

最后一个陈词者是郭茨。他说,我发表讲话是要回答庭长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后将如何同你们斗争。在对外政策领域我们将争取外国政府承认苏维埃政府。我们将支持苏维埃政权为俄国经济独立同西欧资本的斗争,只要这种斗争有利于劳动群众。而如果你们损害这种利益,我们将揭露你们。在内政领域我们的任务与过去一样。^①

在案件审判中控告方(共产党人)和被告方(社会革命党人)都力图向自己、向对手和全世界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对方是革命和劳动者的真正叛徒。

国际上的抗议

国际上对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的反应之强烈大大超出俄共领导人的预计。

^① Известия. 1922. 5 августа. 引自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II — 76.

早在决定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审判的时候,国际上就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抗议热潮。审判接近结束的时候,国际上再次掀起抗议,尤其是反对判处被告死刑。提出抗议的有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及其下属的政党和工会组织,还有世界各国各界名流甚至政要。

1922年3月16日全德工会的电报称:“以800万德国有组织的工人名义请求赦免被告。世界要求和解。特别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命运取决于停止以强制的形式取缔和迫害兄弟党。请帮助相互理解与和平,不要以血腥的判决妨碍俄国和德国工人已经开始的继续接近,这种判决只会引起全体自由拥护者的失望和愤慨。”^①

比利时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致电第三国际执委会,要求“在柏林召开三个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前不要结束社会革命党人案件,以便查明指控的实质。在既成事实之后再通告处死我们同志,这会对建立统一战线的事业以致命的打击”。^②

荷兰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尔柯文致电列宁,也要求“在柏林三个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了解指控的性质之前不要结束社会革命党人案”。^③

被迫寓居国外的高尔基致信苏俄领导人李可夫说,杀害社会革命党人将招致对俄国的道义封锁: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以杀人告终,这将是事先预谋的卑鄙的谋杀。恳请您把我的这一看法转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的人。希望这一看法不会使您感到惊异,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曾千百次地向苏维埃政权指出,在我们这不文明的文盲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丧失理性的犯罪行为。现在我相信,如果杀害社会革命党人,这种犯罪行为将会招致社会主义欧洲对俄国的道义封锁。

他同时向法国作家安纳托利·法朗士呼吁,希望他出面请求苏维埃当局留下社会革命党人的性命,说:“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具有对为俄罗斯人民解放事业真诚服务的人们实行公开谋杀的无耻性质。恳请您再次向苏维埃政权提出请求,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32.

②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36.

③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33.

指出不允许这种罪行，您的有分量的话语将能保护社会主义者的宝贵生命。”^①

《真理报》就此发表文章回答说，“高尔基以其在国外的政治言论危害我们的革命，并且危害严重”。

3月17日，安纳托利·法朗士自巴黎致电苏维埃政府，吁请不要迫害政敌：“为了人类和无产阶级最高（世界）利益，不要对你们的政敌采取会被解释为报复的措施。这样做你们会给全世界劳动者解放的伟大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②

1922年3月17日许多工会代表致电列宁说：“……为了人性我们要求把生命和自由还给那些在沙皇制度下把自己最美好的岁月献给工人和社会主义的人们。”^③

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工会国际领导、社会民主联盟、荷兰辛迪加代表会议等等都对审判社会革命党人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他们。

审判接近尾声的时候，由于明显要判处主犯以死刑，国际上掀起新一轮的抗议浪潮。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抗议书中写道：“我们依据人、政治和社会主义的原因坚决抗议一切死刑。我们要求保护被告社会革命党人的生命。”独立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组织在抗议信中指出：“如果布尔什维克法庭作出并实施死刑判决，这将给世界工人运动带来严重损失。这将使得在不能确定的时间内同第三国际代表的共事成为不可能。”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组织认为，这种判决将损害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德国各工会代表指出，判处死刑将会“引起西欧工人的最大愤慨，并会消灭对苏俄的最后一点好感”。^④

欧洲的一些著名学者和作家，其中包括会见过列宁的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也提出抗议和请求：“吁请苏维埃政府为了人性与普遍和解，放弃会被整个文明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8—1.

②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34. 1922年7月20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对此的回应是：“责成社会革命党人案三人小组约稿并监督刊载下列内容的文章：高尔基和法朗士的请求对苏维埃俄国没有任何意义。”（同上书。Док. № 17—34.）

③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6—37.

④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7—29, 38, 41.

世界看作报复行为的做法。”

7月30日德国共产党领导人蔡特金和布兰德勒给俄共中央写信,建议一旦判处社会革命党人死刑立即予以赦免。信中写道:

审判显然将以死刑结束。问题是死刑是否应当执行。我们觉得,在目前形势下执行判决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枪毙社会革命党人会帮我们敌人的大忙。死的社会革命党人对我们的事业将比活的要危险得多。其次,社会革命党人无疑还拥有相当多的党徒和力量,他们会用针对我们优秀领袖的恐怖行动来回答枪毙。枪毙的做法政治上不会对我们有利,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分子会成功地把此举描绘成“个人复仇”,从道义和政治上孤立苏俄。活着的社会革命党人将在你们手中,成为反对暗杀的人质,而死亡的社会革命党人则会成为敌人宣传的工具。这会在共产国际引发危机。共产国际将会向苏政府请求赦免,即请求不要执行死刑。^①

党内的不同声音

关于判决并执行死刑,党内高层也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那些对西方情况比较了解的领导人,他们担心这样做带来的抗议和麻烦。

卢那察尔斯基表示,他不反对给一些人判处极刑,但如果予以执行,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应当设法予以赦免。

1922年7月21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自柏林致电俄共中央说:各大国同情我们的人警告说,如果处决某些社会革命党人,大家都会疏远我们,而我们的露骨敌人将自由地反对我们,打开反对俄国的最具侵略性政策的大门。^②

7月26日中央委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根据对国外的观察致信政治局说,由于共产主义的报刊比其他报刊少得多,不仅非无产阶级阶层,甚至工人阶级的多数都是按照我们敌人的口味获得审判信息的。我们的这一案件政治上失败了。审判的结果如判死刑,这会是巨大的政治错误。我不认为工人阶级的多数,甚至俄国的多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7—55.

^②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7—36.

数工人,会如此渴望这样的判决。西方的多数工人肯定将反对这种判决。这种判决将把那些在热那亚会议后对我们的好感急剧增长的那些小资产阶级推离苏维埃政权。鉴于上述一切,我反对死刑,它给我们带来的坏处将大大超过好处。^①

7月31日,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致信俄共中央,警告判处死刑可能的后果。他报告了海牙之行的个人印象,说国外的广大工人群众完全不了解审判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揭露,不理解审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报刊开展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疯狂运动,把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死刑判决说成是国际内部的兄弟相残。资产阶级报刊把案件说成是缺乏正常组织的法庭的证据,利用来破坏同俄联邦的商业联系。如果把判决付诸实施就会造成一种局面,一旦社会革命党人恢复对俄国共产党领袖的恐怖行动,欧洲的非党工人将会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所有干涉集团就会得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的最热烈的拥护,实施对苏俄的封锁会容易得多。^②

俄共宣传鼓动部副部长索斯诺夫斯基致信托洛茨基,谈审判对欧洲各国舆论的影响。信中说:社会革命党人案即将结束。依我所见,它对俄国的意义比对欧洲要大得多,因为后者对它不感兴趣,即使共产主义欧洲也是如此。案件的揭露部分已经过去,而判决尚未过去。我个人还在案件开始之前在同捷尔任斯基和拉狄克谈话时就已说过,需要找一个恰当的形式声明,政府和法庭根本无意猎取社会革命党人的20颗脑袋,这些脑袋现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有更合适的时刻来处置它们。依我看这在当时是非常有益的。但现在枪毙这帮人甚至在共产主义圈子里也是有害的,特别是在工人的妥协阶层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工人们说:就算像谢德曼、诺斯克、韩德逊、托马斯这些卑鄙家伙该上绞刑架,但既然同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那么俄国的诺斯克至少应当只关在监狱里。

在欧洲可以找到很多展示人道的人:“虽然我是苏维埃的朋友,但为了人道主义等等。”法朗士、高尔基、萧伯纳等就对这一运动发出这种声调。

如果在这场运动之后减轻判决,这对我们很糟糕。最好在结束之前发表一个宣言。一般说来,需要在20日发表这个宣言以回答处极刑的要求。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7—49.

②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7—56.

如果资产阶级的和妥协主义的欧洲把兴趣仅仅集中于惩处措施上,那前景就会完全被扭曲。

因为各国的谢德曼手中有很大的力量。只要他们向任何工会(所有工会)提出口号,或者代表会议对枪毙提出抗议就够了。工会的报刊会把抗议印行几百万份。

因此我的意见是:实际判决应是驱逐他们,或者让他们再蹲一两年,以免再增加10名被王德威尔得解救出来的“蒙难者”、宣传员。不要枪毙。否则会给我们的各种困难上再增加新的不必要的困难。^①

可以看出,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在国内可以控制舆论,把被告说成是一伙反革命。但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未能走出国门多远,国外的广大工人群众几乎一无所知,而西方的舆论大多把审判看作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甚至是一种报复。所以一些了解国外情况的领导人也认为审判在国外是输了。如果判决并执行死刑,那么对苏维埃政权就更为不利。

判 决

为安抚西方的左派,苏俄政府允许国外辩护人参加审讯。社会党派出以王德威尔得(第二国际国际局主席)为首的4名辩护人。进入俄国国界时他们受到精心组织的“人民愤怒”的迎接。在法庭上他们的辩护被叫作“对审判的拙劣嘲讽”,最后不得不退出法庭。审判期间,在举行审判的圆柱大厅外不断举行群众大会,要求对被告判处死刑。

经过50天的审理,8月7日最高法庭判处14名被告死刑,其余被告判处不同的刑期。

被判处死刑的有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郭茨、顿斯科伊、格尔施坦、亨德尔曼—格拉鲍夫斯基、利哈奇、伊万诺夫、拉特涅尔—埃利金德、季莫费耶夫;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成员莫罗佐夫、阿加波夫、阿尔托夫斯基;中央战斗队成员谢苗诺夫、柯诺普列娃、伊万诺娃—伊拉诺瓦。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7—42.

10人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中央委员拉科夫、费多罗维奇、维杰尼亚平，直接参加恐怖活动的叶菲莫夫、乌索夫、祖勃科夫、费多罗夫—科兹洛夫、佩列夫、达舍夫斯基、斯塔夫斯卡娅。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审理”。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被判刑的谢苗诺夫、柯诺普列娃、叶菲莫夫、乌索夫、祖勃科夫、费多罗夫—科兹洛夫、佩列文、斯塔夫斯卡娅、达舍夫斯基和伊格纳切夫等人免刑。

暂缓执行死刑

判决公布后，1922年8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判决，同时宣布暂缓死刑的执行，条件是社会革命党停止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地下阴谋活动、恐怖活动、军事间谍活动和暴乱活动，也就是把这批社会革命党人作为反恐的人质；同时批准对谢苗诺夫、柯诺普列娃等人免于刑事处分。

采取这种一面判刑一面赦免的做法的原因是：

1. 社会革命党从根本上来讲是革命党，其党员曾经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无畏的英雄、勇士。这一点在俄国人民中是公认的。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是有共鸣的。布尔什维克党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历史功绩。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对待左派社会革命党著名领袖斯皮里多诺娃的态度，苏维埃政权曾多次判她死刑，但每一次都在判决后，声明鉴于其革命功绩予以赦免。

2. 恐怖手段是社会革命党人传统策略。他们在沙皇时期，在1918年，实施过几次有效的恐怖行动。对恐怖报复的畏惧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缓刑的原因之一，需要把判处死刑的社会革命党人作为人质，迫使他们放弃恐怖行动。1922年7月14日，格伯乌柏林站向国内报告说：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间即使没有明确的计划，无论如何也存在搞恐怖的情绪，作为对莫斯科审判以死刑结束的回答。^①

3. 国际上的强大抗议浪潮。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及其所属各种政党和工会组织、各界名流在审判前和判决后都掀起强大的抗议浪潮，著名作家高尔基也联络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7—28.

一些著名人士从国外对此提出抗议。

4. 举行审判的本意本来就不是要在押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在审判过程中领导层内部已经在准备赦免措施。审判的目的是想要消除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民中的影响。

被判刑的社会革命党人在沙皇时期有着丰富的狱中斗争经验,在苏联监狱中他们运用这些经验展开斗争,争取改善狱中条件,减免刑期。他们的斗争加上国外有关人士的声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1924年1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审议了改变惩罚措施的决定草案,14日作出决定,停止执行最高法院对郭茨、顿斯科伊、格尔施坦、亨德尔曼、利哈奇、伊万诺夫、拉特涅尔、季莫费耶夫、阿加波夫、阿尔托夫斯基、伊万诺娃的死刑判决,代之以剥夺自由5年,对其他社会革命党人将剥夺自由的期限减半。^①

1923年3月18日至23日,发起小组召集前社会革命党普通党员全俄代表大会(在格伯乌的秘密监视下),确认社会革命党已经彻底瓦解,宣布解散。

由于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案并不成功,所以也就停止了拟议中的对孟什维克的审判。在布尔什维克的强大压力下,1923—1924年间孟什维克组织也“自行解散”。

社会革命党是反抗布尔什维克时间最长的党,它和孟什维克党从苏联政治舞台消失,意味着苏联多党制的终结,俄国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消失,布尔什维克一党制的确立。

美国记者的评论

在本案开庭的时候,6月8日美国记者Ф.А.迈肯齐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电讯中说,今天开始了俄国最大的政治审判案,本案中重要的不仅是确定被告有罪无罪,还在于这是两个革命集团之间的最后搏斗。布尔什维克说:“我们希望向最缺乏觉悟的农民指出,社会革命党人毫无力量,不值得他们信任、关注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迈肯齐给《芝加哥每日新闻》发去关于审判结束的电讯。其中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18—27.

写道：

这样结束了最奇特的案件之一，甚至对革命的俄国来说也是如此：一批老同志，在持续两代时间的斗争中一起反对沙皇制度，一起坐牢，一起带着镣铐走向西伯利亚，现在作为公开的敌人互相反对，其一方依靠自己的军事和法律力量，而另一方甚至没有人敢于出来替他说话。郭茨，被拘押犯人的领袖，1917年曾经救过受到人群威胁的现任莫斯科首脑加米涅夫的命。审判案显示了双方的特殊苦涩：主要的囚犯集团没有一点忏悔的意思，他们以自己的罪行为荣。作为被告，他们利用审判大规模地宣传自己的事业。“我们知道我们会被判刑，但我们并不害怕死亡。”——首领之一亨德尔曼对法庭这样声明说。审讯中一些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曾伸出橄榄枝，建议被告们今后如采取克制的手段，同白卫侨民断绝关系，就释放他们，给予他们作为单独的政治个体以生存的可能性，但囚犯们没有给予任何回答。

整个审判进行得非常自由，使西欧的观察家都感到惊异。大量公众几乎参与了全部审讯过程。给了囚犯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行动自由，他们不断地破坏审讯的进程。^①

这家的报道比较符合实际。这是苏维埃政权下少有的比较合乎程序的审判。到了30年代，这样的审判已经不见踪影了，相形之下，这时的被告个个低头认罪，根本看不到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曾经在沙皇的法庭上勇敢无畏斗争过的痕迹！

《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1期

^①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 № II — 94, 110.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①

文化体制,准确点说,文化管理体制,是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文化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言论自由还是言禁。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书报检查制度在言禁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它历来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借助这种制度统治阶级扼杀先进文化、自由思想以及一切不利于其制度的言行,制止它所不喜欢的创新和改革等。书报检查制度是扼杀文化发展,妨碍人的自由发展的制度。言禁的极端是因言治罪,文字狱,直至肉体消灭。然而思想文化有其特殊性,人不在,思想仍然存在,甚至还可能发扬光大。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人类的优秀思想始终禁而不绝。

在现代文明社会,书报检查制度不是一个光彩的东西,因此苏联官方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不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的,只承认为了保守国家机密而采取的监督措施。1926年图书出版事务总管理局(图总)的通告中公开声明,“苏联没有书报检查”,因此使用过时的名词“书报检查官”、“书报检查”是不对的,“边疆区图管、县图管、省图管和区图管不是书报检查机关,而是监督机关”。《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苏联百科辞典》(1980年出版)只介绍西方国家和沙俄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不承认苏联存在这种制度。其“书报检查”词条写道:“为人民利益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宪法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建立国家监督是为了

^① 书报检查或书报检查制度,俄文为 цензура,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大众媒体只有书籍和报刊,因此译作“书报检查”或“书报检查制度”,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载体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传播新形式,因此后世出现的 цензура 就不仅仅是对书报的检查,检查的范围包括从广播到网络的所有媒体,也许叫作“信息检查”或“信息检查制度”较为贴切。不过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本文仍沿用“书报检查”或“书报检查制度”。

防止构成国家秘密的信息以及其他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信息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公布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①直到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回答法国《人道报》的提问时才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因此在苏联时期并不存在苏联书报检查史这门学科,直到苏联解体,有关档案解密,才出现有关苏联书报检查的专题历史论著。^②

革命的许诺——“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

早在沙俄时期已经实施书报检查制度,列宁深受其害,他的有些著作遭到书报检查官的删改或查禁,有些著作为了能够出版不得不采用“伊索寓言”的写法。所以列宁说,俄国的报刊是“戴上笼嘴”的^③,迫使人们不得不用“伊索式语言”、“奴隶的”语言写作。

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临时政府3月5日宣布取消沙皇的书报检机关——出版事务总委员会,设立出版事务委员一职。5月16日发布《临时政府公告》宣布:“出版和出版物买卖自由。不许对它们实施行政处罚。”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被列宁称作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这自由首先就是言论自由,这也是民主革命所要实施的重要措施之一。

不过苏联共产党是一个不容异见的党,它容不得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与它不同的意见和言论,更不要说反对它的言论。所以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新政权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取缔一批报刊,如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右翼孟什维克的《日

① Советская больш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3-изд., 1978. Т.28. С.489—490.

②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成为俄国学者研究的一个课题,已出现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1997年出版的由Т.М.戈里亚耶娃主编的《苏联政治书报检查史——文件和注解》(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摘录了大量苏联时期的有关文献,并附有详细的注解,其中绝大多数是新解密的档案,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2001年莫斯科出版了Г.В.日尔科夫的《19—20世纪俄国书报检查制度史》(Жирков Г.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内容涉及沙俄和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此书在网上可以下载。2002年出版了Т.М.戈里亚耶娃的《苏联政治书报检查制度:1917—1991年》(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г.г.2002)。2004年出版了由А.В.勃留姆编的《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1917—1991——文件》(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А.В.Блюм.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Г.Воловников. М., РОССПЭН. 2004),是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与政权系列丛书之一。此外俄国的一些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文章。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440页。

报》、《交易所新闻》等。

布尔什维克查封报刊的行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为应对抗议,1917年11月9日列宁签署“出版法令”,并于10日公布。法令郑重许诺,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法令全文如下:

出版法令

1917年11月10日

在政变的艰难的决定性时刻及其随后的时日,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针对不同色彩的反革命报刊的措施。立即从四面八方传来叫嚷声,说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做就违背了自己的纲领,侵犯出版自由。工农政府请居民注意,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幌子下,掩盖着有产阶级占据绝大部分报刊的自由,不受限制地毒害群众的意识、在他们的意识中制造混乱的自由。谁都知道,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新政权,工农政权刚刚巩固的危机时刻,不能把这个武器完全留在敌人手里,在这时候,其危险不亚于炸弹和机关枪。黄色和绿色报刊用这些东西来诬蔑人民刚刚取得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临时的非常措施以制止造谣诬蔑这些污水浊流的缘故。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人民委员会认为,即使在危机关头,只有在绝对的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限制出版,兹决定:

出版总则

一、应予查封的只有下列报刊:1.号召公开反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用明显歪曲事实的手段制造混乱者;3.号召采取明显的犯罪行为,即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者。

二、暂时或永久查禁报刊只能由人民委员会决定。

三、本总则具有临时性质,随着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来临将通过特别命令予以废除。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①

^① Правда. 1917. 10 ноября, 转引自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28—29.

这个法令应是新政权在文化领域的总的指导方针,其维护的基调是出版自由,其他的所有各种禁令都具有临时性质,属非常措施。它是继《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之后的第三个重要法令。

1918年1月28日成立革命出版法庭的法令,其中写道:

1. 在革命法庭下设立革命出版法庭。革命出版法庭受理的是利用出版实施反对人民的罪行和过错。

2. 利用出版实施的罪行和过错是指关于社会生活现象的虚假的或歪曲的报道,这侵犯了革命人民的利益,也违反了苏维埃政权发布的关于出版的法令。

.....

8. 革命军事法庭的决定是最终的,不得上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所属出版事务委员执行革命军事法庭的决定和判决。^①

这是把“出版法令”具体化的措施。法令规定了惩罚措施,包括罚款、剥夺自由和政治权利、没收印刷机和印刷厂的财产,等等。革命出版法庭存在到1918年5月。

出版法令也为书报检查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出版法令,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封闭或因其他原因停刊的有470家报纸,所涉及的不仅是反革命的报刊,也有不少对苏维埃政权持异议或批评态度的报刊,例如发表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系列文章的《新生活报》。

1918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这是决定言论自由的主要文件。宪法写道:“14. 为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观点的真正自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消除出版对资本的依赖,给予工人阶级和贫农出版报纸、小册子、书籍以及其它各种印刷品的技术和物质手段,并保障其在全国自由传播……”^②

由工人阶级和贫农构成的这一部分居民,在苏俄全体居民中仅占很小的少数,

^①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31.

^② Жирков Г.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2001. 引自网上电子版(http://www.media.utmn.ru/library_view_book?chapter_num=1&bid=79)。

就是说,只将言论和出版自由给与少数居民,多数居民被剥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实际上在这少数居民中能够真正享受并行使这种自由的也寥寥无几。不仅如此,1924年通过的苏联宪法竟然只字不提公民的自由权利。

军事书报检查

1917—1920年实施了军事书报检查。国内战争时期实施书报检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事保密的需要。

1918年12月23日公布由托洛茨基签署的《军事书报检查条例》,内称“为保守军事机密设立军事书报检查局”。军事书报检查局的任务是:a.事先审阅所有准备出版发行的报道军事性质的印刷品、图片、照片和电影。b.以监视的形式审阅所有a条所列的已出版发行的作品。c.事先审阅所有包含军事信息的准备公布的各种命令、官方消息等等。d.审阅国际邮件和电报,如果需要也包括国内邮件和电报。e.审阅发往国外的a条所开列的材料。f.监听城市间的电话。^①

1918年6月21日发布了《关于对报纸刊物以及所有定期出版物的文章实施军事书报检查的条例》,条例指出,军事书报检查是指事先审阅所有预定出版而含有因军事秘密而不得公布内容的出版物。军事书报检查官的职责是:审阅上述规定的印刷品,预定出版的作品应当向军事书报检查官提交手稿、条样或单印本。根据条例应经军事书报检查而未获批准擅自出版者最长可监禁6个月,或罚金2000万卢布。^②

为保守军事机密,战时实施书报检查是各国通行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检查当局的控制并不仅限于军事保密的需要。

1918年7月1日军事书报检查部有一个报告,开列了一份违反事先进行军事书报检查规定而给予相应惩罚的报纸名单,共17家报纸,有8家报纸被勒令停刊。例如说高尔基参与的《新生活报》有两条错误:1.6月12日刊登条样中被删的材料;2.没有把全部军事材料刊印在6月13日和15日供审查的条样上。对其处罚

^①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31.

^②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29—30.

是“停刊”。^①使《新生活报》被停刊的远不止这个原因,但这是最好的借口。这就是说,在国内战争时期除军事保密的需要外,还有出于政治需要的审查。

1921年8月1日,军事书报检查工作移交肃反委员会(契卡)负责。小人民委员会会议第722号记录(1921年8月1日)写道:责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从8月1日开始把军事书报检查工作移交契卡。责成契卡会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周内修订不得公布的信息目录。条例草案由契卡在5日内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②

书报检查扩大到意识形态

1919年出现书报检查集中化的过程,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通过合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出版部门,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局。1919年5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国家出版局条例。根据条例,国家出版局是国家机关,既出版图书,也管理出版事务。其编委会由人民委员会任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其局长相当于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局。国家出版局手中集中全部出版事务,拥有管理所有出版机构——苏维埃的、党的以及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出版机构的权力。除了出版事务外,还兼有对所有出版过程实施监督和书报检查的权力。

1920年12月17日起国家出版局由尼·列·美舍利亚科夫领导,他认为不能把印刷资金和纸张用来重印革命前只具有有限作用的艺术作品,不应当出版散发出资产阶级局限性气味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当时私人企业付给作者的稿酬高于国家出版社,这破坏了国家出版局的经济基础及威望,因此最好把这些私人公司统统关闭,这样就可以避免竞争,并有助于减少异端思想的蔓延。因此对私人出版社的限制变得严厉了,1919年私人和合作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占全部图书的1/5,而1920年仅为5.87%。国家出版局反对民粹派的麦穗出版社出版《纪念拉夫罗夫》文集,因为其作者中有克鲁泡特金、索罗金等人,即对苏维埃政权有反对情绪的人。还以

^①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412—413.

^②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 33.

“不适当”为由禁止出版米海伊洛夫文集,建议“把纸张用来印刷宣传性的书籍”。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和著作一概受到严格的书报检查。国家出版局禁止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的劳动之声出版社出版《巴枯宁文集》第4、5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国家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无政府状态》,等等。

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各种私人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纷纷成立。国家开始采取立法程序确定私人和合作出版社的法律地位,既给予合法存在的权利,也设置了种种限制。1921年3月16日国家出版局发表关于调节出版事务的决定,规定“所有在印刷厂的报纸和印刷品都须在国家出版局及其地方机关登记,只有获得国家出版局的批准才可开印。”“未经国家出版局的中央管理机关的批准,任何作品都不得付排……国家出版局及其地方机关有权监督印刷厂和石印厂的工作过程。”1921年12月12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私人出版社的法令,其中规定:

成立出版社需得到国家出版局或者地方相应机关的批准,并立即报告国家出版总局核定。由国家出版局及其地方分局(地方上如无分局则由省教育委员会)按照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指示发放成立出版社和刊印手稿(第9条)的许可证。每部手稿发排之前需得到第8条所规定的出版机关的准许,并在每一本出版的书上标明。对地方出版机关的决定可以向国家出版局的编委会投诉。未经批准出版的图书予以没收,交国家出版局处理,而其出版者要承担法律责任。^①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各种思潮的活跃,出现有反对派情绪的报刊。当局加强了政治书报检查制度,把书报检查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上,并在组织上予以加强。小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私人出版社”的决定,准许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国家出版局及其机关下以及在地方上成立政治部,以管理私人出版社和批准手稿出版问题。

1921年11月18日,政治局给政治部领导人下达指令:“不允许出版具有明显反动倾向的著作,包括宗教、神秘主义、反科学、政治上有害之类的书籍。”

这清楚表明,书报检查已经从针对反革命言论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唯心主

^①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34—35.

义、宗教、“反科学”、“政治上有害”的图书都在查禁之列。

书报检查的制度化、系统化和严密化

国内战争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国内开始走向稳定,到了“出版法令”所说的“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的时候了。然而,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没有兑现早先的诺言,而是加强书报检查制度,加强对舆论的控制。

1922年6月6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条例》,宣布成立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ГЛАВЛИТ,图总),接手国家出版局的书报检查职能。图总的成立不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方面的转折,而是以前政策的继续。宣布成立图书出版事务总管理局的文件写道:

铅印的文字目前具有极大的意义,它同时也是影响在我们手中或在我们敌人手中的共和国不同居民群体的强大手段。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条件,存在相当多的侨民集团,由于新经济政策我们敌人的物质资源得到增强,这就在共和国内部为他们创造了在出版物上反对我们的氛围。对我们来说书报检查是对抗资产阶级散布的影响的工具。

图书出版事务总管理局(俄共中央发起成立的)的基本任务是实施这种书报检查政策,此政策在目前条件下是最恰当的。书报检查的经验表明有两种书报检查的办法:第一种是行政和法律追究,表现为查封出版社或部分出版物,削减印数,征收罚款和把负责人提交法庭。第二种办法是,通过谈话、安排合适人选、排除无法接受的人物,从而施加巧妙的意识形态压力,影响编辑部。图书出版事务总管理局机关必须仔细监视不仅私人出版社,而且还有合作的、工会的、部门的以及其他出版社……

为统一对各种形式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特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成立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及其地方机关(属省国民教育局)。

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的任务是:

a.事先审查所有预定发表或传播的作品,包括手稿、印刷品、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物、照片、图片、地图,等等;b.给各单件作品的出版、定期和不定期出版机构发放许可证;c.编制禁止出售和传播的作品清单……

禁止出版和传播的作品有：

a.含有反苏维埃政权宣传；b.泄露共和国军事机密；c.通过散布虚假信息煽动社会舆论；d.含有色情性质。共产国际、俄共中央以及所有党的共产主义出版物，国家出版局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出版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科学院的学术著作免于书报检查。^①

图书出版事业总局接收了国家出版局的书报检查职能，基本上消除了政出多门的现象，把全国的书报检查工作集中到自己手中。

上述文件明确规定了书报检查有两种实施手段：1.行政措施和司法追究，包括查封报纸和杂志、出版社；减少发行量，罚款和审判。2.施加意识形态压力，包括同编辑部谈话，给编辑部加进“合适人选”，除去无法接受的人选。

1922年12月2日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发布指示《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及其地方机关的权力和职责》，对图总活动的内容作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图总拥有广泛的权力：“不准出版不得公布的信息（国家机密）、明显具有敌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性质的文章”、“在基本问题上（舆论、宗教、经济、民族问题、艺术领域等）敌视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作品、低俗的报刊、色情作品、不良广告等；要删除文章中“败坏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威望的最尖端的地方（事实、数字、评论）”；“在出现明显的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停止一些出版物的出版、削减发行量、查封出版社，“把负责领导人提交法庭或送交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样就把审查范围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

图总的领导起初是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出一名代表任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出一名代表。图总的中央机关1927年有86名工作人员，其中52人为党员，34人为非党员，后者主要从事技术工作。28人受过高等教育，46人为中等教育，12人为初小程度。

书报检查机关完成大量的工作。1927年3月22日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局长列别捷夫-波良斯基给中央组织局的报告提供了如下数字：

1925年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和列宁格勒省图书管理局查禁了221种图书出版。1926年对975种作品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属“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

^①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35—36.

有 448 种,依据“军事—经济清单”实施的有 527 种,禁止传播的外国报刊 4 379 期、图书 5 276 本和印刷品邮件 2 674 件。

国家安全机关也介入书报检查工作。1923 年 11 月 15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奥格伯乌)成立,它的任务也包括书报检查、话剧和电影审查,等等。

内务人民委员部是书报检查的重要力量,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保持密切联系,内务部的政治机关提供“技术支持”,以监视印刷厂、图书贸易、出版物传播、出版物的进出口,等等。根据 1922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所有出版机构实行经济核算”的法令,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弥补期刊赤字的补贴金的持有者,这就使内务部可以利用资金对某些编辑部和出版社施加压力。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同图书出版事业总局的联合,在实践上就可以对所有的印刷品进行事先和事后检查。1923 年《关于没收和分配没收图书》的指示中说:“没收公开出版的印刷品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根据书报检查机关的决定实施。”没收可以是部分,也可以是全部。没收的图书存放在全国性的图书馆。国家政治保卫局则处理不适于阅读、需销毁的图书,纸浆的收入列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预算。^①这也是沙俄的传统做法。

1924 年召开俄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各部门联席会议,讨论报刊同“反革命著作集团”斗争的问题,决定加强对各出版社的物资和经济控制,强调给出版社贷款是“政治事务”,“因此未经国家出版局政治部的批准,不得给出版社任何贷款”。“纸张供应是政治事务,因此国家出版局应当把最好的纸张供应给苏维埃和党的出版物。”^②

为加强书报检查,会议“认为必须为国家出版局政治部的工作制定准确的指令,以制止意识形态的、神秘主义的以及诸如此类有害图书的浊流,它表现在各种图书部门,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艺术、文化、戏剧等等上”。^③

1925 年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扩大了图总作为书报检查机关的权限。图

① 转引自 Жирков Г.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http://www.media.utmn.ru/library_view_book?chapter_num=1&bid=79)。

②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38.

③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40—43.

总的任务可归结为准许开办出版社、出版机构,出版定期和非定期报刊以及准备公开出版的单个著作;预先审查所有准备公布、传播和公开演出的作品,包括手稿和印刷品,编制禁止出售、传播和公开演出的印刷作品清单,公布各出版机构、出版社、公开演出场所、印刷厂、图书馆、书店所必须遵行的出版事务和剧目的规章指示。

为具体落实书报检查的各项工作,1925年俄共中央作出关于影响图书市场的措施的决定,要求图总在发放出版社和杂志的许可证时不仅以政治考虑为指导,而且也应当考虑经济和教育方面的问题,促使私人出版社符合国家的需要,而不能让出版社仅仅追求利润。决定规定了一系列禁令:

1. 在文学艺术领域,在艺术、戏剧和音乐问题上,取缔反对苏联建设的图书和大量低级趣味的图书,同时在一些场合准许那些有利于在广大市民群众中传播苏维埃影响的轻松题材的出版物。

2. 禁止有明显唯心主义倾向并且面向广大读者的哲学、社会学问题的图书,只准许发行少量印数的经典作品和科学性质的作品。

3. 禁止明显非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科学图书,只准许发行少量印数的狭隘科学的和专供有限读者群或者有利于实际工作的图书。

4. 禁止反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经济图书,只准许发行少量印数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经济图书和具有科学意义或实际意义的此类图书。

5. 青少年读物只准许出版有利于共产主义教育的图书。

6. 宗教图书中只允许出版祈祷性质的图书。此原则适用于所有教义、宗派和派别。^①

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对图书和报刊的进出口实施监督。1923年7月12日图总向有关单位发出绝密通告,把这方面的活动具体化,禁止进口如下图书:对苏维埃政权和国家有敌意的,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合和敌对的,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唯心主义的图书;宗教团体用俄文出版的书籍;包含资产阶级道德内容的儿童读物;赞扬旧习俗的作品,还有反革命分子和在反苏维埃政权斗争中死亡的作者

^①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48—50.

的作品。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书报检查的原则和规定。这时的书报检查已经不仅仅是保守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的需要,而是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其涉及的范围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然而,禁止唯心主义、非唯物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低级庸俗作品的出版和进口,其标准是很难界定的,苏联以后的实践表明,不少被禁止的图书未必就是“唯心主义”、“非唯物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就算是唯心主义、非唯物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也未必可以一禁了之。至于宗教图书,乃是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这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判断图书的是非,为以后在科学和学术上任意支持一派、压制以至消灭一派提供了依据。

当时判定好坏的标准有的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如 E.И. 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 年在外国出版)中的社会反乌托邦思想就被认为是反苏维埃的诽谤,后来此书于 1988 年在苏联公开出版。1923 年从图书馆中清除反苏维埃书籍时,竟将柏拉图、康德、列夫·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的某些著作也列入禁书清单。

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的书报检查越来越细分:报刊、儿童读物、私人和合作出版社的产品、外国著作、广告,等等。供青少年、低文化水平读者阅读的图书须经双重检查。1921 年底成立国家学术委员会,监督教材的出版及其学术水平,而图总则监视其政治和思想内容。

图总关注私人和合作出版社,担心“意识形态上有害的不良书籍”流入图书市场,采取“逐步取消”私人和合作出版社的方针,办法是限制其印数,取消纸张的计划供应。在这种方针下私人和合作出版社的数量逐年减少:1925 年 1 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共 105 家,1926 年 1 月 100 家,1927 年 95 家,1928 年 76 家,1929 年 79 家,1930 年 52 家。

各地执行书报检查的尺度并不统一,有些图书在一地被查禁,而在另一地则允许出版发行。最明显的例子是巴黎出版的爱伦堡的《贪得无厌者》(ПБАЧ)一书被俄联邦图总禁止进口,而在奥德赛却得到乌克兰书报检查机关的批准出版。乌克兰的书报检查机关抵制俄联邦图总关于不得在报刊上报导不良收成前景的消息的通报,直到通过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干预该指令才得以贯彻。因此 1927 年联共中央出版部不得不建议召开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及其地方机关会议,以统一书报检查工作。

1930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工作,作出了改组图总的决定:免除了图总的中央机关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经济角度事先审查印刷品的工作,而只从事事后的监督;把各种形式的书报检查统一起来;由驻出版社的特派员事先审阅所有印刷材料的全部工作,出版社承担特派员编制的费用,地方报纸可以任命该报主编兼任特派员。图总仍负责批准和查禁出版物和出版社。^①

图书出版事业总局的书报检查范围不断扩大,除书报之外还对戏剧、音乐、电影、雕塑、无线电广播、广告、宗教等各个领域实施书报检查。

1923年2月9日,在图书出版事业总局下成立剧目审查总委员会(剧总),任务是:1.批准戏剧、音乐、电影作品的演出。2.定期编制和公布准许和禁止公演的作品清单。未经剧总或相应的地方机关的批准,任何作品都不得上演。^②

大剧院上演的剧目中就有5个被禁演,其中有《雪姑娘》、《沙皇萨尔坦的故事》,理由是宣传皇权思想。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16%以上的电影因“思想和政治质量低下”被禁。

检查电影的机构不断增加。1923年9月4日成立人民委员会电影事务委员会,1924年6月23日成立俄共中央电影委员会,根据其决定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下成立电影事务艺术委员会,实施电影事业的思想领导、审查和批准影片生产计划、剧本等。到1925年10月1日为止,电影事务艺术委员会审阅了307个剧本,准许上演的仅147个,不到一半。

图总对音乐信息的监督拥有垄断权。1924年成立唱片曲目监督委员会。它编制和发布了“应停止销售的唱片清单”。通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监督处查禁和没收的有君主制、爱国主义、帝国主义内容、色情、侮辱妇女尊严、轻视庄稼汉等内容的唱片。1924年7月2日监督委员会通告禁止狐步舞,书报检查官认为,这是模仿性交的沙龙舞蹈。

布尔什维克是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因此特别关注教会的期

^①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54—55.

^②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39—40, 48.

刊,通过期刊宣传宗教观点等同于进行敌对意识形态的宣传。革命前的东正教的报刊被摧毁,《圣经》的发行量不断削减。1928年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制定教会出版活动的专门监督纲领,主要任务是逐步地全面地予以削减。图总还关注宗教日历的出版,禁止出版可以撕页的宗教日历,只允许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和梯比里斯出版台历。日历上必须标有革命的节日,不许使用旧历,不准增加印数。这不仅破坏了教会出版事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缩减了其影响广大群众的可能性。禁止出版教会的传单和文告。

党中央是书报检查的最高领导机构

虽然设立了书报检查机关如国家出版局、图书出版事业总局,但实际上书报检查的最高机关是共产党中央,党中央下有宣传鼓动部、出版部负责领导此项工作。由于党对书报检查的监控不断加强,发展到最后,书报检查工作已经直接由党的机关来实施了。

1924年俄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党对出版和出版社的领导》的决定,对有大量读者的出版物实施直接监督。在省委、区委下设立出版部,等等。中央出版部在总结报告中承认,如果说1924年出版活动大体上是自发的,那么在年底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根据党的任务和苏维埃制度的要求调节图书出版工作,由中央宣传鼓动部、中央出版部和中央本身监督书报检查机关,审理对书报检查和书报检查机关的投诉。

1926年联共中央发布“关于主管出版工作的苏维埃机关”的决定,规定中央出版部的工作是意识形态领导,包括书报检查,在其基本任务中有“监视(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中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实施监督以保证出版物坚守意识形态和必要的质量”。此外,出版部还要使出版社的活动和出版物的传播保持同党的任务一致:审阅编辑出版计划、处理新出版社和新期刊问题,指导大众读物的出版,包括内容、语言和价格。过去这都由图总处理,而联共中央的这一文件使党的书报检查工作扩大了。

1927年10月3日中央“关于改善党对出版的领导”的决定继续贯彻这一路线,责成各级出版部“监视各出版社工作坚持意识形态”的情况,“加强出版部对书目和报刊中的书评的领导,使之成为反对异己图书的斗争工具”,等等。

党的机关直接介入了书报检查工作。1929年1月18日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批准新杂志出版的程序”的决定,规定各种主要杂志的出版必须得到中央组织局或者中央书记处的批准,其他杂志的出版由图总批准,但需同中央宣传鼓动部和出版部协调。

1930年9月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的决定,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两周内改组图总。10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相应的决定,图总的书报检查职能被削减,撤销其中央机关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经济角度对印刷品进行事先审阅的工作。为完成这一任务建立特派员设置,由之实施对作品的事先监督,所有印刷品的事先审阅都在出版社内进行,由出版社为特派员的编制提供必要的保障。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书报检查退居第二位,党的意识形态机关以及秘密政治警察机关起了决定性作用。到30年代初,苏联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书报检查制度,这套制度一直存在到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官方一直矢口否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

《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2期

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好处

——列宁“临别赠言”之一

苏联时代有过各种各样回忆列宁的文章和文集,我国根据俄文本翻译出版了厚厚5卷本的《回忆列宁》,其中有诸如列宁亲属的较为详尽的回忆,但是与列宁相处多年的那些亲密战友的回忆却是看不到的,原因很简单,这些亲密战友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都被斯大林枪毙了,他们即使生前写过回忆列宁的文章,也不会被苏联的出版社收集出版。有一些讲到真实情况的回忆也不会被允许原封不动地刊出,必须经过书报检查官剪刀的加工。因此关于领袖的回忆录,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知情者不写或不准写,偶尔见过领袖一面的人大写特写。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被取缔,它们的党员或者遭镇压,或者逃亡国外,或者改旗易帜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者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还会被重用,如孟什维克亚·萨·马尔丁诺夫1923年加入俄共(布),旋即担任重要的《共产国际》杂志的编委,如此等等。

本文涉及的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叫尼·瓦连廷诺夫,又叫沃尔斯基,原是孟什维克,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经批判过他宣扬的马赫主义和阿芬那留斯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十月革命后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商报》任副主编(实际上是主编),后在苏联驻巴黎商务代表处工作。1930年流亡国外,这就使他得以逃脱30年代斯大林的大镇压。他是个有心人,又从事新闻工作,因此特别注意了解和记录所见所闻,他和8名孟什维克组成了一个名为“观察家联盟”的组织,跟踪研究苏联的局势。20世纪50年代他在国外写了一本很有

意思的回忆录《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其中有不少在苏联官方正史中看不到的东西。

列宁第二次中风之前，1922年11月底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到他那里做客，这一天列宁的心情非常好，并且像以前在巴黎那样，叫他“列瓦同志”。在交谈中列宁说了一段被弗拉基米罗夫叫做“临别赠言”的话，弗拉基米罗夫听后又转告给瓦连廷诺夫。由于内容极为重要，瓦连廷诺夫牢牢地记住了。“赠言”中有如下一段内容：

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了，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①

这段话在列宁的著作中是看不到的，但可以在其他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佐证。

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②

出逃的斯大林秘书（也是政治局秘书）波·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列宁的秘书格利亚谢尔和福季耶娃关于列宁最后思考的一段话，列宁曾对她们说：

当然，我们是遭到了挫败。我们本来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直就像童话一样，随便要什么就会有有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需要

^① Н. Волепт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 California, 1971. с.186.

^② 尼古拉耶夫斯基谈布哈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党不至于丧失灵魂、信心和斗志,我们必须向全党提出,作为某种暂时退却的做法,要重新采取交换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们世代所形成的生活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尝试以暴力把居民赶进新的制度,但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个全俄绞肉机中我们是否能够保住政权。^①

以上布哈林和巴让诺夫的回忆中转述的内容都与“赠言”类似。

政治家的讲话视场合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自然不能讲得太坦率、直白,他需要鼓舞群众,有些真相或者真实想法是不能说出去的。但在私人场合则不然,可以说出真实思想,可以讲述所思所虑。人不会总是板着面孔说些冠冕堂皇的话的。

列宁的“赠言”是十月革命后从痛苦的经历中得出的感受和结论,或者说教训。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采取的实际上是剥夺的政策,那时实施的粮食征收制几乎把农民所有的粮食都收走了,但是列宁还一直认为农民日子过得很好,有粮有肉吃,而城市工人却食不果腹(后来列宁承认这个估计不符合实际)。然而,实际情况是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在内战后期终于揭竿而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说“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历史,那时就有一宗暴动叫作“叉子暴动”,农民没有武器就把叉子当作战斗的武器,可以说是“揭叉而起”。农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是共产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为“打倒共产主义”,反正就是农民不要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了。那时官方把农民暴动叫作“盗匪活动”,但这并不改变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列宁承认,那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个省份。最后爆发喀琅施塔得兵变。喀琅施塔得本来是革命的堡垒,十月武装起义时著名的阿芙洛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军港开过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在革命和内战中哪儿有困难,就派水兵去支援,如今连这后院也举行暴动了,但其纲领并不反对革命,而仅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这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激流,使布尔什维克政权遭遇到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这股激流的冲击

^① 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洪刚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下,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不得不匆匆忙忙通过废除不得民心的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制度,使农民在完税后能够自由支配手中的余粮。这就是著名的新经济政策的开端。

农民的反抗使列宁看到,对广大农民来说重要的不是漂亮的口号,也不是诱人的主义,而是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正如列宁所说的,农民是不管什么人、什么样的领导在克里姆林宫统治的,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能够从城市得到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如果他们手头有余粮了,用余粮换来的工业品比过去多了,税负减轻了,他们所痛恨的鱼肉农民的警察官吏没有了,“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完全满意”。列宁根据切身体验提出警告:如果农民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最后时日,不断警告不要对农民施加暴力,不要尝试以暴力把居民赶进新制度,否则就需要想一想,在这“全俄绞肉机”中是否能够保住政权。必须采取措施,争取长期生活在和平和谐之中。

可以认为,列宁的这些话不仅仅是针对农民而言的,对工人、知识分子同样适用。社会各阶层需要不同的生态环境,例如知识分子不仅需要吃饱,还需要有自由的创作环境,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工人要有劳动权,不仅要过富裕的生活,还要真正当家作主,如此等等。列宁所说的满足农民的要求,也只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要求,现在看来,还是相当低的要求,农民自然也需要富裕幸福的生活,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们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吃饱饭。执政者的职责不是压制、剥夺他们的这些天然权利和要求,而是设法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使他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够过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好,更幸福。

在列宁的所有论述中,以如此明确、直白的语言来谈论布尔什维克政权同人民的关系,确实是罕见的,他以言简意赅的语言总结了不平坦的执政五年的经验教训,提出应当采取的执政方针。可以说,这比数千数万言的报告更能够说明问题,更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共产党必须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既然权是民众给的,那就必须做到为民所用,否则这个政权是难以维持的!列宁给弗拉基米罗夫的“赠言”,应当也是所有执政者需要牢记的“赠言”!

“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

——列宁“临别赠言”之二

列宁在同弗拉基米罗夫谈话时还提出第二个赠言，这就是谈社会主义时不要当诗人，不要说漂亮话，不要说废话。

列宁说，由于养成的习惯，我们非常经常地用革命的诗歌代替干实事。例如我们不假思索地说什么再过5—6年我们将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完全的平等和消灭阶级。列宁就此对弗拉基米罗夫说：听到这样的空话，列瓦（弗拉基米罗夫的爱称），不要不好意思，要大声叫喊：“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不要说废话！”列宁说，您能够理解我：医生自己为自己治病！我意识到，党的所有缺点我身上也有。如果随便说的话，我也会胡说，在最短期间，甚至不要十年，我们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王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不好意思，请揪住我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列宁所说的“阿尔卡季”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一个角色，屠格涅夫在书中描绘，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躺在巴扎罗夫旁边，面对飘落的树叶大发诗兴：“槭树的干叶飘落到地上；它的姿态完全像飞舞的蝴蝶。最悲惨的东西和死亡的东西却像最快乐的东西和活生生的东西。”

对此巴扎罗夫讽刺地叫道：“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关于这一点我请你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在革命的热潮中人们往往把一切都看得很容易，因而常常发出豪言壮语，什么都不在话下，易如反掌，他们立下宏伟的目标，同时保证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实现。列宁在痛斥这种大话、空话时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承认自己也有这种毛病，

“党的所有缺点我身上也有”，所以他这是“医生自己为自己治病”。

列宁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承认自己也会胡说什么最短期间，甚至不要十年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王国。在十月革命后一些人预言德国将在几天内爆发革命，不仅能够给予落后的俄国以资源，而且将引发法国、英国革命，列宁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内会爆发革命并来支援落后的俄国，事实证明，两者的估计都太乐观了，是主观想象的产物。

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粮食征收制，认为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管起来，苏俄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军事共产主义的核心政策“粮食征收制”并非布尔什维克的发明，而是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在一战期间为解决粮食问题都曾实施过的政策，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一次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予以实施的，是派征粮队用枪杆子征收的，并且被披上“共产主义”的外衣，史称“军事共产主义”。

在艰难的国内战争期间，列宁认为农民有面包吃，有肉吃，而城市工人却在挨饿，因而要农民不仅交出所谓余粮，而且交出全部粮食。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

而实际情况是，城市的工人至少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供应保障，而农村是没有人关心他们最低限度的需要的，他们几乎被收走了所有的粮食，被搞得一无所有，最后不得不为生存举行暴动，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这时候，列宁才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农民并非如自己估计的那样，他们比城市工人生活得更苦。

列宁说：“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获。”“我们承认欠了农民的债。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这种纸币就是我们常说的“白条”。而在更多的场合连“白条”也不打，是直接搜查没收的。1920年底列宁承认，战乱加旱灾已经使“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他“希望同志们告诉1000万至1500万……非党农民，决不能无止境地忍受饥寒，不然我们在下一阶段的战争中就会被打倒。”

广大农民反抗的事实粉碎了布尔什维克党借助强制、暴力和剥夺农民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列宁声明：“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

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我们准备用革命的办法改变政策……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这就是废除粮食征收制，实施新经济政策。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匆匆忙忙地通过了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的决定，并在当晚用无线电向全国播报，由此可见形势之紧迫。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开始反思过去以为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漫想法，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坚持新经济政策，需要普及文化。他说，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需要国民教师去扫除文盲，难道像沙皇时期那样到处都是文盲的国家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国家。夺取政权的斯莫尔尼时期（斯莫尔尼宫是十月武装起义指挥部、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所在地），所谓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已经过去，也许可以说，自十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以来，苏维埃政权就没有什么凯歌行进的时期，而是一直困难重重。A.托尔斯泰写过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说的是知识分子投入革命的苦难历程，实际上俄国革命本身走的也是“苦难的历程”，是不断克服苦难的历程。对这个历程不能用诗人的玫瑰色去描绘，对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也不能凭借诗人的浪漫主义去想象，开空头支票以自欺欺人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所以列宁对弗拉基米罗夫说，如果我胡说什么在最短期间，甚至不要十年，我们会进入共产主义王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不好意思，请揪住我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这是一个经历五年苦难奋斗有着大量切肤教训的领袖提出的非常宝贵的赠言。

就在提出赠言的时候，列宁向弗拉基米罗夫指出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他说，我们需要坚挺的货币，好的卢布，而不是“苏维埃纸币”那种废物。没有坚挺的货币，新经济政策就会见鬼去。作为我们金融、我们货币系统的领导人，列瓦同志，做一个守财奴吧。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的人变坏了，习惯于大量地无偿地从国库取钱，这种习惯至今没有消除。在这些人的压力下，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用坚挺的卢布取代苏维埃纸币。不要做软弱的诗人，不要听信那些向您渲染鄙视钱币的美妙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人们的废话。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向您施加压力，要求国库追加各种款项、各种拨款。列宁强调，“一切都要求厉行节约。国家预算不要支付一戈比多余的钱”。只有在一种场合下不要当吝啬鬼，这就是国民教师的奖励和薪水问题。我们在小册子和群众大会上大声

疾呼全民识字,而在我们的农村和小县城,这些文化的使者没有裤子穿,在挨饿。我们出版无数的废物,却没有纸张制作学生的练习本。不要再干这种荒唐的事了。如果为此需要所有部门厉行节约,列瓦同志,那就无情地坚决地去做。通过新经济政策我们当然能够走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也表现在教育者大军——国民教师去扫除文盲上。难道像沙皇时期那样到处都是文盲的国家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国家。列瓦同志,还要给你一句赠言: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斯莫尔尼和革命最初年代早已过去。在革命五年之后,如果我们对最重要的问题没有学会清醒地、实事求是地、实际地对待,这就是说我们是白痴或者无可救药的空谈家。

从弗拉基米罗夫 1922 年得到的赠言可以看出,这时候列宁已经不相信能很快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了。1923 年 1 月口授的《论合作社》说得非常谨慎:俄国要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列宁的赠言或者不为人知,或者听者并不以为然。列宁逝世后,他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被抛弃,斯大林在 30 年代初强制集体化,闹出了两年大饥荒(1932—1933),饿死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而在大饥荒之后,人们刚能填饱肚子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在 1936 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高唱苏联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和谐共处的社会,然而正是在这个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里,斯大林在 1937—1938 年这两年不到的短短时间了逮捕了 140 多万人,枪杀了其中的 70 多万人,平均每月约枪杀 1 000 人,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接过斯大林遗产,在 60 年代初继续发出豪言壮语,宣布 20 年进入共产主义!

建成社会主义也好,进入共产主义也好,都是空头支票。在这时候,确实应当像列宁提示的,揪住他们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空谈害民,空谈误国。本文无意贬低什么人,这里想说的是社会主义是需要用开膀子干的,而不是靠嗓子唱的,希望中国人也能够记住列宁的这一赠言——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要当实干家。

列宁为什么感到“尴尬”？

——从列宁一封信的译文谈起

1922年12月12日列宁写了一封给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内容是要他们两人协助捍卫对外贸易垄断制。

这封信首次发表在1971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第2卷。在编译中文版《列宁全集》第43卷的时候我曾建议收入此信，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的参证，可以肯定这确实是列宁的信，而非伪作，例如《列宁全集》第43卷所附列宁年表12月12日就记载了列宁用电话向人民委员会秘书福季耶娃口授给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并详细介绍了信的内容。俄文版《列宁全集》第54卷附录中“未找到的列宁信件目录”也收入了12月12日的这封信。^①托洛茨基带出国的文件中有列宁给他的此信的抄送件，而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却没有此信的原件，颇令人费解。不过读一下此信的内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封信变成了“未找到的列宁信件”。

由于此信是托洛茨基公布的，中国的版本未敢贸然收入，这也许是信不过托洛茨基，也许是怕同托洛茨基沾边。苏联解体后，这封信连同后来陆续披露的列宁文献一起收入2001年出版的中文版《列宁全集补遗》第一卷。顺便说一下，托洛茨基1929年被驱逐出国时随身带走大量党内文件，后来部分文件陆续结集出版，其中有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出版的两卷本《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俄英文对照版）和4卷本的《托洛茨基档案》（俄文版）。这些文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伪造的。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545页。

据《列宁全集补遗》的译文,这封信的头一段是这样写的:“我由于病情恶化,不得不放弃出席全会。我很清楚,这样对待你们我感到不安,甚至是很不安,可是我连作稍微像样一点的发言都办不到。”^①

信中接着详细谈到他(列宁)所要维护的有关外贸垄断的三方面的观点,转发了与列宁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给列宁的信,表示将起草一份给中央全会的声明并寄给他们两人。还告诉他们,“如果中央全会上不能达成一致,我还得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我要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宣布目前的分歧。”^②

上面所引的那句译文欠准确,因此很难理解列宁所要表达的感受。此句的俄文原文是:

В виду ухудшения своей болезни я вынужден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на пленуме. Вполне сознаю, насколько неловко и даже хуже, чем неловко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Вам, но все—равно выступить сколько—нибудь удачно не смогу.

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 *неловко*, 译者译作“不安”,但这个词并没有不安的意思。按照《大俄汉词典》的解释,*неловкость*(英文是 *embarrassingly*) 的意思是 1. 难为情,困窘,尴尬;羞涩。2. 不灵巧的动作;笨拙行为;不恰当行为,不恰当的话。列宁这里要说的不是“不安”,而是对同他们两人的关系感到“尴尬”,觉得“不恰当”,“不妥当”。因此这句话的大意应当是:

由于病情恶化,我不得不放弃出席全会。我完全意识到,在同你们的关系上我是多么尴尬,甚至比尴尬还要糟糕,但我反正无法做得像样一点。

列宁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为什么感到“尴尬”? 这要同信中所涉及的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联系起来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对外贸易垄断制。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同国外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有些领导人如斯大林、布哈林等主张取消或放松外贸垄断。1922年10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会根据外贸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通过了一个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规定暂时准许“某几类商品或某几处

①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页。

②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667页。

边境进出口”。列宁因病缺席会议，他在得知这一决定后表示反对，强烈要求暂缓执行，留待12月中央全会再议。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列宁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进行调研，了解情况，一方面同有关负责人员频繁通信，争取支持，同时对支持放松外贸垄断的中央委员作说服工作。到12月成果明显，在中央全会上列宁的主张得到通过。他在12月21日写给托洛茨基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放地拿下了阵地。”^①

弗鲁姆金时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时任苏俄驻柏林商务全权代表，弗鲁姆金也曾赞同放松外贸垄断，但这时已改变立场，和斯托莫尼亚科夫一起赞同对外贸易垄断。列宁和他们联系，商量对策，这是列宁这位俄共中央委员同两位非中央委员商量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种做法不能不使列宁感到“尴尬，甚至比尴尬还要糟糕”。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不收这封信——显然不是档案库没有这封信，而是列宁这种“有违组织原则”的做法使得编辑们不敢收入这封信。在苏联时期，列宁的著作和信件是否公开发表，是有种种政治考虑的，《列宁全集》并不全。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列宁从来不拘泥于形式和程序。也是在这时期，他建议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中央组织局的“联盟”（блок，集团）。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对此曾有记载。

1922年底列宁同托洛茨基有一次长谈，其中涉及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托洛茨基谈到不仅国家机关有官僚主义，而且党的机关也有官僚主义。“全部困难的关键就在于这两种机关的结合，在于那些聚集在党的各级书记周围的权势集团的相互包庇。”“列宁考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问道：‘就是说，您建议不仅向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开火，而且还要向中央组织局开火？’出乎意料，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组织局就是斯大林机关的核心。‘好像是这样的。’我们直言不讳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这显然使他感到满意，他继续说下去：‘那好吧，我提议和您建立联盟——反对所有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组织局。’我回答说：‘同一个好人结成一个好联盟，我深以为荣。’”^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赵弘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页。

根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党内建立“联盟”或“小集团”是非法的。可以说,列宁要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也是非法的,是违背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的。然而,列宁的“结党”非为营私,而是为了党的事业,所以列宁不怕“结党之嫌”,表示要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的“联盟”,反对组织局的官僚主义。他把个人的“尴尬”置之度外,联合非中央委员共同反对中央全会的决定。对列宁来说,党和国家的事业高于一切。他曾坦率地表示,“联盟就联盟”,没什么可怕的。当年俄共禁止派别集团,目的是保持党的统一,但是统一应当是建立在正确的方针路线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决策上出现错误,那么纠正错误就比保持表面上的统一和一致要重要得多。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屡屡祭起“统一”的大旗,利用俄共十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来压制不同意见,镇压持不同观点的个人和反对派。1928—1929年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对压制农民的“非常措施”有不同的意见,在中央全会上多次坦陈自己的观点,这是完全符合组织章程的行为,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结党组派”,斯大林还是依仗自己后来赢得的多数地位,把他们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斯大林的这种做法造成党内只有一种声音,只能高呼拥护、万岁,以至于出现严重的错误,甚至滥杀无辜,也得不到纠正。这种“统一”和“一致”显然不是列宁所需要的。

2011年3月稿

列宁在 1923

1922年3—4月,俄共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总书记是新设的职位,主要领导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不具有以后党的第一把手的地位。过去都说斯大林是列宁提名推荐的,这不符合事实,但至少列宁是同意的。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兼职过多有意见,列宁还特意替他辩护。应当说,这时候列宁对斯大林是信任的。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被迫中断工作去疗养。由于列宁不能视事,党和国家某些事务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主要有三件事:一件是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为此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让乌克兰等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主张“再建一层新楼”,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独立共和国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联盟。第二件事也与“自治化”有关。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斯大林的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的打击迫害。列宁在了解情况之后,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等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并且在十月中央全会上作出相应的决定。而列宁认为,放松垄断会造成猖狂的走私活动,不利于国家的经济。这三件事都直接涉及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和处理能力,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9月底恢复工作之后,列宁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遭到列宁的批评,不得不加以修改,但在修改后的方案的前言上却写道:原来的自治化方案“基本上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

的”。在给列宁的信中反而指责列宁“操之过急”，把列宁的主张叫作“民族自由主义”。在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就民族问题写道：“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列宁]。”^①这种情况过去是罕见的！

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列宁经过争取，从23日起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作“列宁遗嘱”或者“列宁政治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12月24日口授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但对任何一人都没有责备之意。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没有由此作出直接的结论。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231页。

小事。”^①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作“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作《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作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一、二、三、四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 1964 年出的俄文第 5 版才恢复原貌！

最后三封信

除口授文章外，这段时间列宁最关心的是民族问题，具体说，就是格鲁吉亚问题。由于反对让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职，有的调离，整个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组，甚至发展到当时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的地步。列宁在 1922 年底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 年 1 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提供材料。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十二大上使用。到 3 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0 页。

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求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次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①

在此期间列宁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

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在此之前,列宁一方面做各位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请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于12月13、15日连续写信给托洛茨基谈维护外贸垄断问题。到12月18日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为此列宁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②信是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此事被当时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的斯大林知道了,于是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5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页。

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引注)提出请求,你们是弗·伊最亲密的同志,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①

列宁是什么时候获悉此事的,不得而知。一个可能是在 1922 年底,事发后不久,这导致他在 1923 年 1 月 4 日口授给 12 月 24 日的信的补充。另一个可能是 1923 年 2—3 月,这就导致下面这封“绝交信”。这是 3 月 5 日口授的给斯大林一封亲收的绝密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信中写道: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地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 宁

1923 年 3 月 5 日^②

3 月 5 日列宁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请求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一封是要同斯大林绝交。态度截然不同!

由于问题严重,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3 月 7 日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2 卷,第 70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2 卷,第 555 页。

有,也不可能没有。”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后写道:“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①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也许斯大林在电话中说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但同样的内容可以用不同口气和态度说出来,听话人的感受也会大不相同。至于斯大林内心到底想些什么,听者肯定是明白的。当时处于核心地位的三驾马车之一加米涅夫于3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的复信十分无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满意。”^②

关于此事苏联作家贝克采访过列宁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说:我到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去,提醒她,列宁在等斯大林的答复,焦急不安。看来这个理由起作用了,她同意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我亲手转交了信件,请斯大林给列宁回信,因为他等待回复并焦急不安。斯大林当着我的面,站着读完信,面色平静。沉思了一下,缓慢,清晰,逐字地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疾病说的话。”他继续说:“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党员,做得不对,受到惩罚,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涉此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不过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准备为粗暴行为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

沃洛季切娃离开斯大林后去了加米涅夫家里。她带去了斯大林当时口授的短信(这封短信不像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上引的斯大林亲笔信)。加米涅夫读了信,还给她,说信可以转交。访问加米涅夫之后,她回到秘书处。但信没有转交,因为为时已晚:列宁状况不好。她认为不能准确地说列宁是否知道斯大林的答复。^③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像街坊吵架,你侮辱了我老婆,我要同你绝交。实际上,这涉及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列宁坚决反对,最后列宁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为此,列宁向斯大林的手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顿,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怒气撒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显然是发泄一种不满。而列宁的感觉是他的政治行为受到干涉,他遭到封锁孤立,因为在此之前,列宁一直是通过书写或口授信件同外界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的。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3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4页。

^③ 《莫斯科新闻》1989年4月23日。

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多次提到列宁的这封“绝交信”。例如,1926年在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这一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不是直接引用斯大林的“道歉信”,而是引用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给全会主席团的信,说“斯大林道了歉”。而如果直接展示这封“道歉信”,斯大林大概很难再扮演“列宁的忠实学生”的角色了。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使列宁不安和激动,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

健康在恢复中

列宁凭借着坚强的机体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搏斗。5月上半月列宁病情略有好转,5月15日用汽车把列宁送到乡间别墅哥尔克疗养。在这里,列宁每天做恢复语言的练习,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是6月23日后至7月上半月,病情再次恶化。从7月下旬起又逐步好转,睡眠和胃口恢复正常,情绪很好,开始用左手练习写字功能。他还努力锻炼恢复走路、说话、阅读的能力。先是坐轮椅,后来改由人搀扶着走路,以后不要人扶,只用手杖,自己上下楼。常常到院子和花园散步,到树林采蘑菇,甚至乘爬犁到林中打猎。8月8日,列宁请求给他报纸,从8月10日起列宁每天阅读《真理报》,后来又增加《消息报》和其他报刊。这些报纸列宁先浏览一下,划出要看的材料,然后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她回忆说:“我按照他的指示给他读电讯、社论、文章。他很快就把握报纸的内容,不让放过任何重要的东西。”有时克鲁普斯卡娅怕列宁激动,有意避开一些材料,但列宁常常一一给她指出来。

8月,撤销医生的昼夜值班,9月停止了护士值班。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尔斯特和多博罗加耶夫在9月表示相信,列宁能逐渐恢复语言功能。10月7日在县委书记训练班上通报了列宁的健康状况:“今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极为严重。这几个月为列宁同志治病的医生和党中央都很担心。但最近两个月无疑大有好转……列宁同志关心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早先已经得到医生的允许,开始读报。列宁同志独立行动和活动能力得到发展,我们希望不久能完

全康复。”^①

最后一次回莫斯科

1923年10月18—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对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呆了2—3小时。最后,才承认列宁在18—19日回过莫斯科。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1934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写道:“10月……有一次他坐车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的房间里去看了一看。在归途中他又在那正在筹备中的农业展览会停车看了一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了。”^②

60年代出版的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是这样记述的:“1923年秋,列宁常常乘汽车出游,而10月18日则从哥尔克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图书室挑走了一些书,10月19日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并在返回哥尔克的途中参观了1923年8月就已经开幕的农业展览会。”^③

而按照90年代出版的沃尔科戈诺夫《列宁》一书中的描述,行程是这样的:10月18日下午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服务人员已经在等待他。列宁很费劲地上到自己的住所,好奇地看看自己的东西、周围环境、书籍,不久就躺下休息。第二天来到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进入空荡荡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室,然后到了院子里。从自己的图书室取了一些书之后,列宁表示想游览莫斯科,去了农业展览会。但大雨妨碍了参观。回到克里姆林宫取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④

《列宁年谱》的说法是:18日乘车到莫斯科,回住所,到人民委员会会议室、办公室。19日乘车游览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街道、农业展览会,然后返回克里姆林宫,从图书室取走一些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⑤

① 《真理报》1923年10月9日。

② 普·凯尔任采夫:《列宁传》,三联书店版,第298页。

③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69页。

④ РЦХИДНИ, ф.4, оп.1, л.142, л.406—407.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列宁》,第356页。

⑤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716页;《列宁年谱》,莫斯科1982年版,第12卷。

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 B. H. 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为: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什么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他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秩序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陪同列宁去莫斯科的玛·乌里扬诺娃对大夫(据说是克拉梅尔)说,在寻找所需要的东西以前,列宁一直很好,东西没有找到才开始激动、气愤,然后突然宣布,他的东西被盗了。他开始抽搐,完全失去了讲话的能力。

几天以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大夫叫去,以很不满意的口气说,乌里扬诺娃告诉他的事情不准确:“弗拉基米尔有病,他会以某种歪曲的形式想象某些现象。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话不能信。我不希望传出似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什么文件、手稿、书信被盗的流言。这种流言只会带来很大的不愉快,制造完全不必要的谈资和怀疑。请把玛丽亚·伊里尼施娜告诉您的一切都忘了。她本人也请您这样做,因此不必同她谈此事。”^①

这是一段已无从查考的逸闻。瓦连廷诺夫的记述是否纯属无稽之谈呢?瓦连廷诺夫提供的莫斯科之行的顺序比较符合后来公布的材料,可见他听说的情况并非空穴来风。列宁文件泄密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列宁明确交代是绝密的,不得交给任何人看,当然也包括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信到12月底,已经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关心列宁文件的人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是否会去光顾列

^① 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斯坦福1971年版,第62—63页。

宁的办公室,很难说。

有一个事实是,在1923年10月下旬,列宁已开始好转的病情又恶化了。1924年以后在列宁研究院工作的弗·戈·索凌1927年1月在《真理报》上写道:“这次行程之后好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50年代末出版的《列宁传》承认,“1923年10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又有恶化的症状”。^①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或者说,莫斯科之行结束后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党内争论和列宁逝世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党内多数派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列宁年谱》记载,不早于11月7日至12月,列宁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新方针”的争论,谴责托洛茨基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会议还决定公布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第7条,此条规定对搞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可以降为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出党。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②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当时在场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为感冒正在哥尔克休息。然而,几天之后,1月30日《真理报》刊登的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俄国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却写道:“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哥尔克逝去的伊里奇身边: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

^① 《列宁传》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40页。

^② 《列宁年谱》,第622页。

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不能给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荣誉！在 1937 年的 2—3 月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当着克鲁普斯卡娅的面指责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说法是撒谎！

从列宁的突然逝世，我们可以看到与莫斯科之行类似的时间和逻辑关系。党内争论和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就争论作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联盟”的人。第三，关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 7 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①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克鲁普斯卡娅要向列宁解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她不可能说得更清楚了），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人们不难感觉到其中的内在逻辑联系。

1924 年 1 月 29 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值得注意的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②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 1902 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认为有必要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88、97 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6 卷，第 30 页。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而能够使列宁激动的只有党国大事,他的生命不能离开党国大事,因此注定要为党国大事激动,或喜或悲。脱离党国大事,列宁的生命也就无法存在。1922年7月7日列宁针对医生禁止他进行“政治性探视”写信给斯大林说:“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①而斯大林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介绍了他同列宁的谈话,说:“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②这对列宁的生命来说是一个悖论,从治病来说,脱离政治避免激动,他可以平静地活下去,但作为党的领袖,作为思想家,脱离政治,他又无法活下去,他是为政治而活的人。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他要干预,他要奋斗,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他手中无权,身患重病,完全失去控制局势的力量了。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

《南方周末》2005年3月24日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22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10页。

列宁索取毒药之谜

——一个没有付诸实施的列宁嘱托

20世纪60年代,我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中读到,1923年2月底斯大林曾告诉他,重病中的列宁向他索取毒药,以备不时之需。

托洛茨基是这样说的: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经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格季耶[为列宁看病的医生]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

“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

那时我对托洛茨基记述的这一情节是怀疑的。因为列宁在去世之前还听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据《列宁年谱》记载:1923年1月18或19日列宁听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一个饥饿的人同一匹饥饿的狼对峙的旅程,而最后人的求生愿望和生命力终于战胜了严酷的自然,也战胜了饥饿的狼。这是对生命力的一曲赞歌。有兴趣听这样的故事的人是不会屈服于命运,索取毒药的。当时托洛茨基也对此表示怀疑,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列宁不可能把这样的任务委托给他已经不信任的人。他写道:当时极其

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凉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因为他有直接的兴趣来这样做。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专烧辣菜的大厨”到底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①

不过后来看到一些资料，令人不得不相信托洛茨基的记述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个插曲。

1967年3月20日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贝克采访了列宁的女秘书福季耶娃。福季耶娃(1881—1975)从1918年起就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又是列宁的秘书，从1938年起在列宁博物馆工作。贝克是苏联著名作家，著有《恐惧与无畏》、《别列日科夫的一生》等小说，据说非常善于同采访对象交谈。福季耶娃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在采访中所说的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但都为后来解密的档案所证实。

在交谈中，福季耶娃主动谈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情。她说：

那个时候我两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过。第一次是为毒药事。但此事不能写。第二次去是转交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先谈毒药。这是在夏天(1922年)的哥尔克，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弄来毒药——氰化钾。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事情发展到失语，那我就服毒。我想手头拥有毒药。”斯大林同意了，说：“好的。”然而，列宁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知道了这次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她说，这种病常会有各种转机，即使失语也是能够恢复的。总而言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得到毒药。但又一次中风后，他再次派我去到斯大林那里取毒药。我打了电话，到他家里。斯大林听我说后表示：

——费尔斯特教授给我写道：“我没有根据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恢复工作能力。”既然有这种诊断，我不能提供毒药。

我什么也没有拿到就回到弗拉基米尔身边，转告了同斯大林的话。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89—491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发脾气，怒骂起来。生病期间他往往为小事发脾气：例如电梯坏了。（他从小就爱发脾气，但一直设法克制。）

他大喊大叫道：你们的费尔斯特是招摇撞骗分子。用支吾搪塞的话来敷衍我。

我还记得列宁说的话：

——他写了什么？您亲眼看见了？

——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看见。

最后，他对我喝了一声：

——滚吧！

我走了，但最后还是顶了一句：

——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而是世界著名学者。

数小时后，列宁给我打电话。他平静下来了，但很郁闷。

——对不起，我发火了。当然，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我是在气头上说的。^①

据《苏共中央通报》的资料，列宁是在1922年12月22日把她叫去的。福季耶娃在笔记本中记道：

12月22日晚6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并口授如下：“如果瘫痪发展到语言，不要忘记采取一切措施以取得和提供氰化钾，作为一种人道措施和效法拉法格……”他还补充说：“这一札记不算日记。您理解吗？而我希望您能执行此事。”前面删节的话我已无法记起。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因为说得很轻。我再问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嘱咐绝密保存。^②

同贝克的谈话是凭记忆的，而笔记是当时纪录的，所以后面提供的时间应当比较准确，不过这也可能是另一次。

到了90年代，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宁政治肖像》，其中也提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其中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解密的档案文献。

① 《莫斯科新闻》1989年4月23日。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

有确切记载的是 1989 年 12 月公布的玛·伊·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的纪事。其中写道:

1920—1921 年,1921—1922 年两个冬天弗·伊·身体都不好。头痛,丧失工作能力,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我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弗·伊·对斯大林说,他也许会瘫痪,求斯大林答应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帮他搞些氰化钾来。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果断、心如铁石、毫无温情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求其办这种事的人了。

玛·伊·乌里扬诺娃接着写道:

弗·伊·在 1922 年 5 月即第一次中风之后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弗·伊·当时认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斯大林叫到身边呆一会儿。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那里确实呆了不到 5 分钟。斯大林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要求他去弄毒药,说是因为已经到了履行以前的诺言的时候了。斯大林答应了。他同弗·伊·告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身边。他告诉弗·伊·,他同医生交换了意见,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还没有到满足其请求的时候。当时弗·伊·露出愉快的神情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尽管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道。^①

沃尔科戈诺夫直接引用了两份档案文件来证实此事。第一份是 1923 年 3 月 21 日斯大林致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

绝密

致政治局委员们

星期六,3 月 17 日乌里扬诺娃同志(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斯大林”,要我,斯大林,负责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在同我谈话时,娜·康还说,“弗·伊里奇遭受

^① РЦХИДНИ, ф.14, оп.1, д.398, л.3—6. 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 卷,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3 页。

极大的痛苦”，“难以继续活下去”，她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也鉴于弗·伊·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谈话期间，弗·伊·两次把娜·康·叫来，并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无法予以拒绝，就说：“请弗·伊里奇放心并相信，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确实放心了。

不过我要声明，我没有力量执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它多么人道和必要，谨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

信上有政治局委员们的批语：

阅。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正确的。需要严格限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交换意见。书记（事务性的）不参加。托姆斯基

阅。格·季诺维也夫
莫洛托夫

阅。尼·布哈林
托洛茨基
加米涅夫^①

此前，斯大林给当时实际掌权的“三驾马车”的另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便条没有署日期，但可以推定是1923年3月17日。

绝密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刚刚给我来电话，秘密地告诉我，伊里奇的状况“非常糟糕”，他病情发作，“不想、不能继续活下去，要求氰化钾，一定要”。她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因此要求“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

^① АПРФ, ф.3, оп.22, л.307, л.1—2.转引自德·沃尔科戈诺夫：《列宁》第2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347页。

收信人对此写了批语：

决不能这样做。费尔斯特提供希望——怎么可以呢？就算没有这种希望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格·季诺维也夫

列·加米涅夫^①

这两封信标示的日期比福季耶娃和玛·乌里扬诺娃所说的日期晚好几个月，并且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第一，1923年3月17日列宁已经失语，他是通过什么办法让斯大林明白需要氰化钾的，并且从斯大林的信可以看出，有时候是斯大林同列宁单独“交谈”的。第二，列宁在1923年初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3月5日又致信斯大林，提出断绝私人关系，此后又没有看到斯大林的道歉表示。（斯大林写了道歉信，但因为列宁病倒，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怎么可能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所不信任的人去办！第三，斯大林信中说，“她（克鲁普斯卡娅）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给人的印象，好像克鲁普斯卡娅手头已经拥有氰化钾。但另一封信中又说，列宁要求斯大林“弄到并交给弗·伊里奇一份氰化钾”，可见当时列宁或克鲁普斯卡娅手头都没有氰化钾。这是相互矛盾的。

不过，从当事人的回忆和解密档案，可以肯定几点：

1. 列宁在中风后曾多次索取过毒药，第一次大约在1922年5月。
2. 列宁的要求是通过秘书福季耶娃、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或妹妹乌里扬诺娃提出的。
3. 委托斯大林弄来毒药并执行。

不同资料提供的时间差异较大，比较可信的说法似乎是1922年列宁第一次或第二次中风之后，因为这时候列宁可以用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且这时候委托斯大林去办也比较合乎逻辑。当然，由于列宁曾多次提出过毒药的要求，也可能1923年3月17日是最后一次向斯大林索取，由于是旧事重提，可以不费口舌。在斯大林原信的复印件上，日期是清楚的，不像是捏造的东西，并且也没有捏造的必要。

^① АПРФ, ф.3, оп.22, л.307, л.1—2.转引自德·沃尔科戈诺夫：《列宁》第2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347页。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发病后才萌生的，他在同福季耶娃的谈话中提到“效法拉法格夫妇”。

这指的是保尔·拉法格和妻子劳拉(马克思的女儿)自杀一事。1911年11月他俩服氰化钾自杀。拉法格在遗书中写道：

趁现在智力健全，记忆良好的时候自杀，以免无情的衰老接二连三地夺去我的生命中的全部欢乐和满足，摧毁我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能力，瓦解我的精力和意志，使我成为他人和自己的负担。

列宁曾经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上发表演说。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道，他们的死亡给弗拉基米尔留下强烈的印象。列宁说：“如果你不能继续为党服务，就应当面对现实，像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①

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类问题的看法。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非常悲伤。他在悼词中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②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恩格斯认为，猝然逝去的结局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安慰，马克思不会愿意像废人那样活着，苟延残喘，去为医学增光。1883年3月15日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的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它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对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守着想去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③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的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

① 《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776页。

③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但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时，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了。

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①

恩格斯和列宁的思路是一致的。对这些为革命而生的人来说,活着的意义就是为革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一旦丧失这种可能,就失去生存的价值,不能容忍“无能为力地活着”,“慢慢死去”。这就是革命者的生命价值观!

不过在列宁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事情并不是已经毫无希望。从第一次提出请求起,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给我们留下了整整一卷书(《列宁全集》第43卷),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探索,对党的建设留下重要指示。即使在1923年3月病倒之后,在1923年夏秋有一段时间健康情况还是有所好转,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顽强地进行恢复锻炼,学习说话,医生也寄予希望。如果不是出现一些导致列宁激动的刺激的话,逐步康复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2005年3月5日稿
《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0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59—460页。

列宁给斯大林“绝交”信的前前后后

1923年列宁曾经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绝交”信。此事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同“列宁遗嘱”一起悄悄传开。但官方对此严格保密，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也只是道听途说，所以他在30年代末写的《斯大林政治评传》中无法准确引用原信中话，而只是笼统地说，1923年3月5日至6日，“列宁口授了他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同他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①

“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说明托洛茨基没有看到过这封信。实际上倒不如说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斯大林作出选择——道歉还是断绝关系。

这是一封给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全文如下：

致斯大林同志

绝密

亲启

副本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62页。

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①

1956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首次全文引用,然后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

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是什么促使列宁给斯大林发出这种“最后通牒”的呢?

令列宁不安的三件事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由于办事干练,意志坚强,给列宁的印象是不错的。所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党的总书记。过去都说是列宁推荐的,实际上是加米涅夫提名的。总书记在当时还不等于党的第一把手,只是书记处的头,当然,拥有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被迫中断工作去疗养。偏偏在此期间党和国家某些事务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主要是三件事:一件是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为此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让乌克兰等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主张“再建一层新楼”,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独立共和国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联盟。第二件事与“自治化”有关。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自治化”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的打击迫害。列宁在了解情况之后,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并于十月中央全会上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列宁生病后,斯大林对病情极为关注,看医学书籍,找医生打听情况。正是斯大林在党内领导层内最早作出“列宁完蛋了”^②的结论。也许因为有这个底数,他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② 瓦列廷诺夫:《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斯坦福1971年俄文版,第186页。

对列宁的某些主张采取了阳奉阴违甚至直接顶撞的态度。例如，他的“自治化”方案遭到列宁的批评，不得不加以修改，但在修改后的方案的前言上却写道：原来的自治化方案“基本上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不仅如此，在给列宁的信中反而指责列宁“操之过急”，把列宁的主张叫作“民族自由主义”。在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就民族问题写道：“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列宁]。”^①这种情况过去是罕见的！

以上三个问题引发列宁同斯大林的冲突，而其中的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直接导致列宁给斯大林写那封所谓“绝交”信。

克鲁普斯卡娅遭无端辱骂

1922年10月俄共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这以后，列宁一方面做各位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接连写信给托洛茨基谈维护外贸垄断问题，请他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在12月15日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列宁特意指出：

如果有人担心这个问题会使我感到不安，甚至会使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拖而不决将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完全稳定不下来，这就更会使我一万倍地感到不安。^②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在到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

列宁对此自然非常高兴，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

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为此要通过一项提案，即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对外贸易的措施问题。这件事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宣布。我希望您不会表示异议，也不会拒绝向党团作报告。^③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23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页。

信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她还写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费尔斯特教授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信给您。”接着补充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请您给他回电话。”^①

此事被斯大林知道了，于是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克鲁普斯卡娅，并威胁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斯大林叫她（克鲁普斯卡娅）接电话，用相当尖锐的口气指示她，要她不同弗·伊谈论各种事务，否则他会把她告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对这次谈话极端激动：她完全变了个样，嚎啕痛哭，在地上打滚，等等。”^②

斯大林是怎么谩骂克鲁普斯卡娅的，未见记载。不过莫洛托夫的回忆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中略有提及。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大发雷霆：‘怎么着，我得去巴结她？跟列宁睡觉并不等于弄通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对我大致是这样说的：‘怎么啦，就因为她和列宁同用一个厕所，我就该像尊重列宁那样去尊重她？’”

可以想见，当时斯大林在电话上使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粗话，连莫洛托夫也说“太粗鲁了！”^③

克鲁普斯卡娅不敢向病人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你们是弗·伊·最亲密的同志，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1页。

② РЦХИДНИ，ф.14，оп.1，л.398，л.4—5。转引自沃科戈诺夫：《列宁政治肖像》第2卷，莫斯科1997年版，第342页。

③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①

此前,列宁于12月15日深夜病情突然恶化,所以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让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医疗制度,但并无明文规定。12月24日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三人通过具体决定:

1.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具有通信的性质,列宁也不应指望答复。禁止会见。2.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应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提供引起他思索和激动的材料。^②

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列宁强烈要求允许他每天口授一些东西,否则他就拒绝治疗。另一方面,发生了斯大林同克鲁普斯卡娅的冲突,而列宁在23日实际上已经开始口授他给代表大会的信,并且斯大林当天就看到了此信。他们知道,禁也禁不住。

绝密文件的泄密

列宁在23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③之后,记录此信的助理秘书沃洛季切娃问秘书福季耶娃如何处理。后者回答送交斯大林。沃洛季切娃到斯大林家时看到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妻子阿里路耶娃也在那里,斯大林拿了信和朋友们到另一个房间,然后面色阴沉地回来,把信交给沃洛季切娃,让它烧掉。她当场执行了命令,把它烧了。不过在列宁那里还保留了4份同样的文件,这点她没有告诉斯大林。

24日沃洛季切娃到列宁处。列宁对她说:

沃洛季切娃同志,昨天完全忘记告诉您了,所有我已经向您口授的和今天要向您口授的东西,都是绝密的。对中央委员们也是绝密的。

沃洛季切娃听后由于惊慌,手中的铅笔都掉了,几乎想向列宁坦白,斯大林已经看到信了。但她及时想起克鲁普斯卡娅的严格吩咐:不要用任何小事让列宁激动。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3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71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7—338页。

——您有什么话要说？

——没有，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继续口授。然后问：

——您在哪儿、怎样打印速记记录？您绝对需要单独一人来做。建议在我的办公室打印。原稿立即销毁。打印5份。一份给我，装订在专门的卷宗里，一份放在秘书处（严格保密！），另外三份放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处。这几份放在信封里，用火漆封口并写上：只许列宁开拆，而他死后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①

斯大林是通过福季耶娃得知列宁在12月29日以前口授的全部信件内容的。知道的还有另一些政治局委员。福季耶娃在1922年12月29日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为自己的“疏忽”辩解说，沃洛季切娃没有告诉她必须严格保密。这种遁词未必能够成立，因为在《列宁值班秘书日志》上12月24日沃洛季切娃清楚地写道：“他（列宁）提醒说，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这一点。要求把他口授的一切当作绝密文件保存在有专人负责专门地方。”^②作为秘书班子的头，福季耶娃不可能不会看到如此重要的指示。

最后的操心事——格鲁吉亚事件

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关心并不是从1923年开始的。早在1922年10月他就否定并批评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表示“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12月底，值苏联正式成立之际，列宁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不仅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且要求处分在这一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

由于处于“隔离”状态，1923年1月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进行格鲁吉亚问题的调查，并要求他们写出报告，供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使用。1月23日，列宁叫福季耶娃去向捷尔任斯基或者斯大林索取格鲁吉亚事件委员会的材料，还对她说“在我发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对我谈了委员会的工作和‘事件’，这对我有严重影响”。5天以后斯大林给福季耶娃去电话，声明不经政治局同意不能提交材料。

① 《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的对抗》，莫斯科1994年版，第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463页。

同时还询问,福季耶娃是否向列宁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从哪儿了解日常事务的。

然而列宁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政治局只好同意给予材料。斯大林提出辞去监督列宁的医疗制度的全权,以示不满。

然而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了。3月初,列宁眼看自己无法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是采取补救措施。

3月5日列宁致信托洛茨基说: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转交给托洛茨基。

3月6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

“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①

斯大林的“道歉”

与此同时,列宁对斯大林辱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作出了反应。

列宁是什么时候获悉此事的,是谁告诉他的,无明确的历史记载。估计1923年2—3月的可能性较大。照《列宁政治肖像》的作者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是克鲁普斯卡娅按捺不住,把此事告诉丈夫的。不过从各种情况看来,克鲁普斯卡娅不大可能做这种事。因为正如她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所说的,“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她不可能拿列宁的生命冒险!何况她还表示过“同意忘记”斯大林说过的话。最有可能的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除秘书外,只有这两人知道此事——克鲁普斯卡娅给他们写信,列宁“绝交”信的副本也是抄送给他们的。

这就导致了列宁在3月5日口授给斯大林的上述短信,要求斯大林作出选择:是同意收回说过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两人之间的关系。

3月6日,列宁把信重读了一遍,要求沃洛季切娃亲手交给斯大林并取得回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556页。

信是由秘书沃洛季切娃记录的。当她在旁边的房间解译速记并打印的时候，列宁的妹妹玛丽亚进来问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状况不好。他向您口授了什么？她从惊慌不安的沃洛季切娃那里拿过信来。

这时进来的克鲁普斯卡娅也读了这封信，然而列宁并不想让她知道。据玛丽亚回忆，列宁要求给斯大林信一事“不要告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纳”，把装进信封的副本交给玛丽亚。

克鲁普斯卡娅读完信后要求沃洛季切娃不要转交，由她自己去同斯大林谈谈，让他道歉。沃洛季切娃为此一夜没有合眼。

3月7日上午，沃洛季切娃去找克鲁普斯卡娅，告诉她不能再拖了，信必须交给斯大林，因为列宁在等回信，否则不利于病人的健康。克鲁普斯卡娅这才同意把信送出。

信由沃洛季切娃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斯大林致列宁

亲启

列宁同志：

大约5个星期前我同娜·康斯坦丁诺夫娜谈过一次话，在我看来，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党内的一位老同志，当时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了大致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

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及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因为除了愿您尽早康复之外，我别无他求。此外，我把监督制度的执行视为自己的职责。我同娜·康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约·斯大林^①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3页。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并且行文也不礼貌。列宁给斯大林的信中两次使用了敬语,而斯大林的回信中连一句敬语都没有。当时处于核心地位的加米涅夫于3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的复信十分无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满意。”^①幸好,这封信没有送达列宁,据说是因为列宁病倒了。

关于此事的经过,苏联作家贝克采访过玛·阿·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说,我亲手转交了信件,请斯大林给列宁回信,因为他等待回复并焦急不安。斯大林当着我的面,站着读完信,面色平静。沉思了一下,缓慢,清晰,逐字地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疾病说的话。”他继续说:“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党员,做得不对,受到惩罚,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涉此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不过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准备为粗暴行为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②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像街坊吵架,你侮辱了我的什么人,我要同你绝交。实际上,这涉及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列宁坚决反对,最后列宁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为此,列宁在得到医生允许的情况下向斯大林的手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顿,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怒气撒到笔者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显然是发泄一种不满。而列宁的感受是他的政治行为受到干涉,他遭到封锁孤立,因为病中的列宁一直是通过书写或口授信件同外界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的,而在这中间克鲁普斯卡娅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斯大林长期保存着列宁的这封信和自己的答复。文件装在人民委员会管理局的正式信封里,上面写道:“弗·伊 1923 年 3 月 5 日的信(两份)和弗·伊·列[宁]未读的斯[大林]同志的答复。仅存的几件。”^③

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多次提及列宁的这封“绝交信”。例如,1926年在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这一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不是直接引用斯大林的“道歉信”,而是引用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给全会主席团的信,说“斯大林道了歉”。不难想象,如果直接展示这封“道歉信”,斯大林大概很难继续扮演“列宁的忠实学生”的角色了。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4页。

② 《莫斯科新闻》1989年4月23日。

③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3页。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使列宁不安和激动,1923年3月6日深夜,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

《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8月5日

列宁和斯大林关系的历史真相

关于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斯大林时代制造了大量谎言,至今仍被一些人用来证明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刘书林等著《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以下简称“刘书”)中就到处充斥此类谎言,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举数例予以辨证。

是列宁提名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十月革命后公认的天才组织家是斯维尔德洛夫,他在1919年流感大流行中不幸逝世,列宁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的工作,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弥补于万一。所以他担任的工作被分解,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农民出身的加里宁接替,党的组织工作由新成立的组织局和书记处负责,这时身兼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是斯塔索娃,后来加上克列斯廷斯基,没有斯大林。直到1922年4月,斯大林才首次进入书记处,并担任总书记。

《刘书》断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是“列宁的建议和提名”的。^①

此事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认为是季诺维也夫推荐的。^②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认为是主持中央全会的列·加米涅夫建议的。^③参加全会工作的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则认为是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

① 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页。

③ Медведев Р.А. 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 New York. 1974. С.49.

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①无论如何,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是列宁推荐的。

实际情况是,此前在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代表大会作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自1922年4月1日起任总书记。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②

为当上总书记,斯大林玩了一个花样,违背程序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选票上,在他的名字后标明“总书记”的字样。^③这就迫使代表大会的投票者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同时选举总书记,而总书记一职本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提名的。

说斯大林是列宁提名担任总书记的,目的是证明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不要说列宁没有提名,就是提名了也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书记处仅仅是负责执行政治局和组织局决定和处理日常党务的机构,总书记并非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而只是书记处的头。列宁作为最高领导人担任的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其党内职务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1922年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有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瞿鲁巴,列宁还曾建议托洛茨基担任副主席。政治局在列宁缺席的时候,由加米涅夫主持会议。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时候斯大林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还相当远,好几个人都排在他的前面。正因为如此,在列宁病休期间,斯大林必须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手组成“三驾马车”,才能操纵政局。

列宁为什么给斯大林写“绝交信”?

《刘书》断言,“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

① 巴让诺夫·波:《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②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8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2页。

③ 罗·亚·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另一种说法是,“总书记”字样是直接印在中央委员的选票上的,见瓦·萨哈罗夫:《苏联政治体系中的俄共(布)中央总书记职位》,《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4期。

的关系决定的”，“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①这是把一个严肃的话题变成克鲁普斯卡娅同斯大林的私人吵架了。

列宁知人善任，经过多年的共事，他对斯大林的性格了如指掌，知道他性格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所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②

“不能容忍”，“爱报复”，可以说，列宁把斯大林看透了。当然，这个人是有能力的，可以发挥他的作用，对这一点列宁也不否认。

列宁同斯大林矛盾是怎么产生和激化的呢？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需要不断休养。就在这期间，在斯大林主管的事务中接连出现失误。一个大问题是成立苏维埃联盟（苏联）问题，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乌克兰等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个方案明显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遭到列宁的反对。“自治化”方案被否定后，斯大林仍不甘心，千方百计打击带头反对此方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酿成“格鲁吉亚事件”。此事成为列宁病中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外贸垄断制问题。1922年10月举行中央全会，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全会通过决议，放松外贸垄断。斯大林是放松的主张者之一。列宁得知此决定后，深为不安，一方面建议中央暂缓执行决定，另一方面找一些中央委员谈话，做他们的工作。同时，写信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在12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捍卫外贸垄断制：“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③

由于列宁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12月中央全会撤销了10月全会的决定，重申保持和加强外贸垄断的绝对必要性。

① 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② 福法诺娃：《回忆录》，转引自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48页。

12月21日,列宁高兴地给托洛茨基去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废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①

这封信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记录的,她在列宁信上加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引注):费尔斯特教授(给列宁看病的医生。——引注)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给您的信。”^②

这是一封得到医生许可后口授的短信,它宣布斯大林失败并表示要继续进攻。斯大林对此严重不满,于是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斯大林给克鲁普斯卡娅打了电话,在电话中把她大骂一通,并以诉诸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威胁。骂得相当粗暴,以至于克鲁普斯卡娅气得浑身发抖。斯大林是怎么骂的,克氏没有说,但是莫洛托夫后来提到过:“斯大林对我大致是这样说的:‘怎么啦,就因为她跟列宁同用一个厕所,我就该像尊重列宁那样去尊重她?’”“斯大林大发雷霆:‘怎么着,我得巴结她?跟列宁睡觉并不等于弄通了列宁主义!’”

看来克鲁普斯卡娅受到的就是这样的辱骂。连莫洛托夫都说:“太粗鲁了。”^③

克氏挨骂后不敢告诉列宁,只好于12月23日向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写信求救:“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她说:“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④

大概在1923年3月初,列宁获悉了谩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于是在3月5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全文如下: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1页。

③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9页;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之间的关系。顺致敬意！

列 宁

1923年3月5日^①

列宁说反对我的妻子也就是反对我，这是因为他明白归根结底斯大林反对的是他列宁的主张(坚持外贸垄断,反对“自治化”方案,等等),是他列宁同托洛茨基的关系。

列宁对斯大林的反击打的是组合拳,就在3月5日和6日两天,他还就格鲁吉亚问题接连给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写了两封短信,这是列宁生前口授的最后信件,表明了列宁反对斯大林的决心。

3月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②

3月6日,列宁给受到打击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写信说:

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③

三封信的矛头都是指向斯大林的,并且涉及的都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此前,1923年1月4日列宁所写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明确提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写这个补充的时候,列宁还不知道斯大林辱骂克鲁普斯卡娅的事,能把这么一个重大的决策归结为克鲁普斯卡娅同斯大林的私人关系吗?

斯大林对列宁的绝交信持什么态度呢?他在给列宁的草草回复中说:“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④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6页。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页。

斯大林没有任何道歉的诚意,幸好列宁没有看到这封信,否则真不知道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列宁“遗嘱”的遭遇^①

1922年12月,列宁在病中冲破“封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被笼统叫作“列宁遗嘱”,不过被特指为“遗嘱”的是12月23、24日口授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先后担任多项职务:党内是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党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由于在党中央身兼三要职,因此他拥有列宁所说的“无限权力”。

1917年俄国革命前,斯大林同列宁的关系并不密切。1915年11月,列宁曾给维·阿·卡尔宾斯基写信:“恳请打听一下(向斯捷普科或米哈等人)‘柯巴’的姓氏(约瑟夫·朱……?我们忘了)。”^②“柯巴”即斯大林。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看出两人关系相当生疏。

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被分配担任了两个当时并不起眼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③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④民族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作用,但他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列宁“遗嘱”中谈了六位领导人的优缺点,但提出组织处理建议的只涉及一人,即斯大林,明确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理由很简单,即此人“太粗暴”。列宁对粗暴是采取有区别的分析的态度的,认为这在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是可

^① 参看《列宁“遗嘱”考》,见郑异凡:《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41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2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6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以容忍的,但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总书记来说,则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说,像粗暴之类的个人性格特点作为一般党员来说关系不大,但是作为领导人来说,则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种性格特点是会影响全局的,所以列宁在结尾中特意强调,“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①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论点,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种“小事”导致了千百万人头落地。

斯大林是最早看到“列宁遗嘱”的人,部分政治局委员也先后看到过,所以在严格意义上,对他们来说并非“遗嘱”,并且列宁本人也没有把这些信件当作“遗嘱”,而是准备送交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并且他本人还指望能够出席此次代表大会。1923年3月中旬,列宁最后病倒失语,对这些信件没有能够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仅其中部分文件送达大会。1924年1月列宁逝世,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病中口授的全部文件“正式”移交中央。这时面临的已经是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照理这些信件应当按照列宁的意愿原原本本地向大会传达,但事实不然。

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决定,不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信,而是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文件不得复制,不得记录。这样规定是因为代表团人数较少,可以防止有人偷偷记录,并且宣读者可以对“遗嘱”作自由解释。例如,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他们三人这时已经组成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解释说,列宁只说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的可能性,而不是调开的办法。宣读后,没有进行讨论,就草草结束。《刘书》说,列宁的信件是“仅供中央委员们参阅的”,“但并不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是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看的!不能不说是奇谈怪论。

对这么一个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是非常不够的,应当让与会者手头拥有文本,进行认真的阅读和思考,领会列宁的意图,然后进行充分的自由讨论,作出决定。而由“三驾马车”一手操纵的传达办法,目的就是要让与会者在没有领会列宁本意的情况下,以轻信的态度让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三驾马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斯大林在十三大后继续担任总书记。此后,“列宁遗嘱”就处于保密状态。一般党员、党的中低级干部,甚至后来当选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者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只能通过小道消息知道点情况。

由于“遗嘱”对斯大林明显不利,有把他撤职的内容,所以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反对派一直要求公布“遗嘱”,而斯大林一方则千方百计地为遗嘱保密,私自拥有“遗嘱”就构成犯罪,“遗嘱”经常是对反对派抄家搜查的重要内容。虽然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曾一致决定“公布被称之为‘遗嘱’的那封信”。但决议并未付诸实施,“遗嘱”仅在代表大会公报第30号上发表,并没有按规定在会后出版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和《列宁文集》中公布。在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三、四版中都没有提到《列宁遗嘱》一事。直到1956年召开苏共二十大,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才正式公开。

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吗?

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可以写一大本书,限于篇幅,这里只提几点。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认真的和长期的”政策。但是到1929年,斯大林在战胜各个反对派之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项政策仅存在8年就被斯大林断送了。

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大力提倡国内和平,或曰“公民和谐”,为此他提出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进行改革,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和平的组织工作,转向“文化主义”。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公式,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在国内实施大规模的清洗镇压。例如:俄共十一大后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3名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除列宁病逝,正式委员和布哈林均被斯大林杀害,只剩下听话的加里宁和亲信莫洛托夫,就是对这两人斯大林也不放心,他们的妻子被关押起来成为人质。说斯大林消灭了列宁的近卫军,一点也不过分。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对农民让步,废除引起农民严重不满和反抗的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这成为著名的“农民的布列斯特”。列宁清楚地意识到,对付千百万农民的暴动是布尔什维克力所不及的,应当并且能够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斯大林无视列

宁的教导,以偷天换日的手法,用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取代列宁的自愿合作化设想,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让农民交纳一种“额外税”即“贡款”,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即用剥夺农民的办法进行积累,搞他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列宁主张国内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由各民族共和国组成平等的联盟,而斯大林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实行“自治化”。在以后执行的民族政策中处处贯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甚至以“通敌”和“可能通敌”为由,把许多民族从其祖居地强制迁移到荒凉的边远地区。斯大林造成的民族矛盾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突破口。

清除谎言,还原真相,非常必要。

《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

探索天才的奥秘——对列宁大脑的研究

埋葬还是保存？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对列宁逝世，俄共部分领导人事先已经酝酿了身后的处理办法，但没有公开讨论。列宁逝世后，为组织列宁的葬礼，1月22日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治丧委员会。23日列宁遗体运回莫斯科，灵柩安放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供各界瞻仰和告别。为满足广大群众瞻仰列宁遗容并同遗体告别的强烈要求，24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把列宁的灵柩保存在临时搭建的陵墓内。陵墓建造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无名烈士墓中间。当时并没有准备保存列宁遗体，所以时任俄共中央监委书记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月26日发表的文章中还说：“亲爱的列宁！你的已死亡的躯体，我们把它埋入地下，而你的事业，你的思想仍然与我们同在。”那时列宁遗体由阿布里科索夫教授作了一般的防腐处理，目的是保存几天以供告别之需。

不过在列宁逝世之前党内高层就有人主张保存遗体。早在1923年10月底，6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加里宁、斯大林和李可夫曾非正式聚会，议论列宁的后事问题。

斯大林通知说，列宁的健康突然恶化，有死亡的危险。加里宁就此发表看法说，这给党提出了如何安葬这一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要搞得措手不及。葬仪的盛大应当是世上空前的。

斯大林完全支持加里宁。据当时在莫斯科的瓦连廷诺夫（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商报》副总编）记述，斯大林是这么说的：确实需要事先把一切都考虑

到,以免在极其悲痛的时刻出现任何张皇失措。据我所知,这一问题也使我们的某些外省同志极为焦急不安。他们说,列宁是俄罗斯人,应当以相应的方式安葬。例如,他们坚决反对火葬,把列宁遗体焚化。照他们的看法,火化遗体完全不符合俄罗斯人对先人的敬爱情绪。这种做法甚至会是对他的怀念的一种侮辱。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火化、消灭和抛洒骨灰总是被看作是对被处死者的最后裁判。某些同志认为,现代科学有可能借助防腐剂长期保存先人的遗体,至少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使得我们的意识能适应列宁不在我们中间了这一思想。

据说,有三个人是持反对态度的。托洛茨基说:斯大林同志讲完话以后,我这才明白,说列宁是俄罗斯人,应当按照俄罗斯方式安葬的意思是什么。照俄罗斯方式,照俄罗斯东正教的教规,圣徒是要制成干尸的。看来是要建议我们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这种方式行事——保存列宁的遗体。过去有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和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干尸,而现在想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干尸去取代他们。我倒很想知道,这些外省同志都是些谁,据斯大林说,他们建议借助现代科学给列宁遗体涂上防腐剂,把它制成干尸。我想对他们说,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毫无共同之处。布哈林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把列宁的遗体变成涂上防腐剂的木乃伊是对他的怀念的严重侮辱,是同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不相容的,连提都不应提。这是想以牺牲思想的崇高性去推崇身体的遗骸。“这真是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加米涅夫也以同样的精神表示反对。他提出,有人建议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这种显示列宁在十月革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做法,加上出版几千万册他的著作,是对列宁的真正敬仰和纪念。至于保存列宁遗体,那是列宁在其哲学著作中曾予以痛斥的那种“僧侣主义”的特殊的和怪异的余音。

列宁的亲属如克鲁普斯卡娅是反对保存遗体的,列宁陵墓建成后她很少去看望。

看来在列宁遗体处理上当时存在两种主张是毫无疑问的。一种是按照俄罗斯习惯,或者说,按照东正教教规,保存遗体,另一种是认为保存遗体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主张埋葬,而用出版列宁的著作等等来纪念伟大领袖。

最后还是保留遗体的主张占了上风。哈尔科夫大学的沃罗比也夫教授承当了遗体的防腐保存工作。不过实际上保存的仅仅是躯壳,在做防腐处理的时候,内脏

和大脑等器官都被摘除。这就出现了对列宁大脑进行研究的问题。

列宁大脑研究的开端

根据由克拉默、米诺尔、阿勃里科索夫、德申、布纳克和谢马什柯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对列宁的大脑进行研究。当时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也缺乏必要的设备,决定邀请德国的著名专家、柏林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奥·福格特教授来苏联领导这项研究工作。早在1924—1925年,奥·福格特及其夫人就已为对列宁大脑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技术准备工作。由于苏联没有研究大脑显微结构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还从柏林大脑研究所聘请了福格特教授的助手沃尔凯、黑塞和罗特来苏联工作。福格特认为,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将大脑切成一系列切片(30.000片),把大脑移送柏林作进一步研究,期限约为一年。他说,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大脑在近期内就会失去染色的可能性,而染色是开展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不染色对大脑的研究便无法进行。福格特还建议派2—3名俄国青年学者到柏林参与大脑研究,以便以后切片运回俄国后能够继续这种研究。

1925年2月17日一批专家和福格特教授在列宁研究所开会。列宁研究所所长助理、斯大林的秘书托夫斯图哈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主席魏斯勃罗德教授受列宁研究所的委托,提出下列问题请与与会者发表意见。

1. 细胞构造研究能否对列宁的天才提供物质上的论证?

福格特和全体与会者一致发表了肯定的意见。初步研究的结果已表明细胞构造的特殊性;但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一次性的观察,随着染色技术和科学的发展,需重复研究新的切片。同时对这些切片的研究应该与其他人的大脑切片以及(精神分析)心理研究进行比较。

2. 这项研究的技术规格是什么样的?

大脑应该切成厚度为1.8毫米的薄片,作石蜡包埋,然后制作成薄薄的切片,以便进行病理学研究和拍照。

3. 为什么必须在国外进行研究?

柏林的神经生理研究所拥有经验异常丰富的人员,他们在世界唯一的专家福格特教授的指导下工作,那里拥有全套专门仪器。

4. 在莫斯科工作有哪些障碍,哪些障碍可以克服?

标本应该尽快作石蜡包埋,否则它仍然置于液体之中,不能吸收染色物质,从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能性。这一工作的紧迫性使它不能在莫斯科完成,因为这里缺乏富有经验的标本专家,也没有全套仪器。从国外订购仪器需要时间,标本在此期间可能坏掉。

无论如何,大脑的切片包埋都应该尽快进行,并在福格特教授的领导下由有经验的标本专家进行,使用良好的仪器,这在莫斯科未必能够完成。

石蜡包埋以后,便可以放心了,大脑的组织对于未来进行细胞构造研究就不会坏掉。

5. 在莫斯科开展工作的条件下,能够收到哪些成果?

由于莫斯科缺少这些条件,而工作又很急迫,特别是涉及包埋标本,福格特教授不能长期进行直接的观察和研究,在莫斯科进行细胞构造研究工作的结果也就值得怀疑。不得不局限于人类形态学研究,而这在当代科学状况下是不完整的,不够的。

这个意见报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否决了把大脑送出国研究的建议,决定在国内建立研究机构,开展研究。为此派遣四名苏联年轻的学者(萨尔基索夫、萨皮尔、波波夫、切尔内舍夫)到柏林研究所进修。

1927年,福格特曾在小范围内向政府成员通报了研究列宁大脑切片中获得的数字,拟定了下一步工作的计划。同年,政府决定把列宁研究所的实验室移到新楼里并且扩展成为大脑研究所,福格特被任命为所长。给研究所提出的近期任务的是:培训干部;为进行细胞结构学研究搜集尽可能广泛的材料,其中包括苏联已故的杰出活动家的大脑。福格特定期来苏联,他对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持续到1929年。

苏联学者的议论

对任命德国人福格特来领导研究,苏联国内有学者持不同意见。

1928年1月1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委员拉姆金就科研人员对列宁大脑研究的看法给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

对福格特教授领导列宁大脑的研究,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议论纷纷:

1. 认为福格特学派同更有科学价值的现代研究大脑的方法是对立的。
2. 刊物上发表的福格特的著作似乎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对问题缺乏全面

阐释。

3. 还有一些人提意见,为什么在研究大脑的工作中不使用我们苏联学者,就学识而论,他们并不逊于福格特。

4. 福格特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推荐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神经病理学家多伊尼科夫博士出任莫斯科大脑研究所的实际所长(福格特为名誉所长)。多伊尼科夫博士是福格特从前的助教和大脑研究的著名学者。但他拒绝接受研究所所长的职务,理由之一是他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方向有些不同。实际上,他认为福格特学派如今已经不能够提供采用别的研究方法所能够和应该取得的全部成就。

这些学者的议论是在很小的专家的圈子里进行的,对国外科学的代表人物也不无“嫉妒”。但他们对福格特及其研究方法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

《真理报》1929 年的报道

1929 年,大脑研究所并入高级神经活动研究所,成为该所的形态学科。与福格特教授的联系中断了,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也停止了。

1929 年 11 月 26 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对列宁大脑的研究》的文章,介绍了研究概况。这是我在 60 年代初翻阅《真理报》时偶然看到的,可能是苏联时期唯一的一篇公开报道列宁大脑研究情况的文章。

文章说,福格特教授从 1927 年下半年开始列宁大脑的研究。他利用了研究所制作的标本的大量显微照片,在(大脑)皮质的第三层、这一层的最深部位以及许多(皮质)区发现巨大的锥形细胞,这样巨大的体积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大家知道,锥形细胞是联想细胞,这种细胞把刺激传到皮质的另一区去。福格特教授说,正如强健发达的肌肉是大力士的特征一样,也可以把列宁看作是联想活动的大力士。这些巨大的细胞向我们解释了列宁的异常迅速的反应能力和异常敏捷的思维,也解释了他的思维的丰富内容,换言之,即他对现实的非凡理解。

福格特的研究表明,列宁的个性无疑能够通过细胞结构从解剖生理方面进行研究。剩下的是着手更详细的工作,它不仅要详细分析 200 多(皮质)区及所有大脑皮层下细胞构成物的结构,以便详细了解列宁大脑的结构特点,而且要把这些特点同列宁的非凡的创造才能进行对比。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应当找出列宁个性的形态学基础和人种特征。

解决这一任务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现在一般说来我们关于其他人的大脑结构和各种构造的机能知道得太少。为了研究列宁的大脑需要做好复杂的准备工作,包括搜集材料和进行科学考察。第一部分已做了好多工作。已故的别赫特列夫教授关于建立大脑收藏库的想法在大脑研究所已经实现,它拥有 13 位名人的大脑以及各种人种代表的 39 个大脑。为准备详细研究列宁大脑而进行的工作分为方法论和科学考察本身。研究所进行的方法论考察涉及测量的方法和制定死者的个性调查表。科学考察本身涉及结构学和性格学的考察,由研究所副所长菲利莫诺夫副教授和波波夫、萨皮尔、萨尔基索夫博士等进行。

福格特教授指出,所有这些研究列宁大脑的考察和准备工作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它们无疑将丰富我们关于人种形态学的知识,查清不同人种,首先是发达人种的大脑有什么样的功能。^①

可以把这篇文章看作是当时初步研究成果的总结。此后,研究情况长期保密,苏联的报刊上再也没有看到有关文章或资料。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把有关档案公布在《史料》杂志 1994 年第一期上。

出现的问题

研究所所长福格特教授从 1928 年起就不再到莫斯科来了,事实上与研究所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 1928 年他从谢马什柯那里得到列宁大脑的一个切片,把这个切片带回德国,在讲课和发表的文章中广泛使用这个切片的幻灯片。这时候列宁在苏联早已成为“圣人”,成为膜拜的对象,但对福格特来说,列宁不是神,而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因此把他的大脑与一个“女犯人”的大脑进行了比较研究。福格特根据对列宁大脑进行的解剖学分析,提出一种被苏联学者认定为机械论的天才论:有大量锥体细胞并且排列独特是列宁天才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德国出版的《精神病手册》中,施皮尔麦耶尔教授却断言,这种大锥体细胞弱智者也有。资产阶级报刊据此刊登了一系列有关列宁的恶意文章。而福格特既不驳斥这些文章,也不反驳施皮尔麦耶尔教授的言论。此外,在柏林还有一个由福格特主编的杂志,被当作莫斯科大脑研究所与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合办的机关刊物,而大脑研究所与

^① 《真理报》1929 年 11 月 26 日。

该刊事实上毫无关系。

这种情况引起苏联有关方面的不满,于是提出了列宁大脑研究的今后方向以及同福格特的关系问题。

1932年初,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协会办公室和心理神经病学研究所就上述问题致信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阿·斯捷茨基,要求明确关系,并从福格特那里取回列宁大脑的切片、幻灯片和照片。他们建议:

1. 在找到研究列宁大脑其他方法之前,暂停对列宁大脑的研究,把全部材料都移交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并存放于列宁墓。
2. 派两人赴德与福格特交涉,取回大脑的切片、幻灯片和照片,商谈停止展示列宁的大脑切片等事宜。

1932年1月10日,斯捷茨基据此就列宁大脑的研究状况给斯大林写了一个报告。

报告说,大脑的研究工作目前没有进行,目前列宁大脑的保存状况不良,大脑保存在大脑研究所的保险柜里。保存的条件总体上没有得到保证,缺乏应有的安全措施。

斯捷茨基认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1)把列宁的大脑放在可靠的保管处——可以放到列宁墓里,责成叶努基泽负责。(2)中断与福格特教授的关系,派人赴柏林从他那里取回列宁的大脑切片和幻灯片,从而结束资产阶级教授们利用这些标本玩弄卑鄙的伎俩。斯大林批示同意斯捷茨基的建议。

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大脑研究所的独立地位,并把它移交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管辖,仍由福格特任所长;萨尔基索夫被派往柏林与福格特商谈恢复他在苏联的工作。福格特接受了关于进一步合作的建议,还给莫洛托夫回了一封感谢信。

希特勒上台以后,福格特的处境异常困难,怀疑他与苏联的关系,他的住宅受到多次搜查。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党(民社党)窃听他的电话,暗中检查他的信件。后来福格特被解除了柏林大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留任代理所长)。

福格特接受莫斯科大脑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在柏林出版由他主编的杂志,形式上仍然是柏林和莫斯科大脑研究所的机关刊物。福格特保证,只要他还担任主编,就决不允许杂志里出现维护和宣传任何法西斯理论的文章。

研究的初步结果

大脑研究所在其存在的几年间,培养出一批专家和科技人员,其中有萨尔基索夫、H.C.波波夫、莫诺夫、斯坦凯维奇、切尔内舍夫、波利亚科夫、勃林科夫、科诺诺娃、列兹尼科夫、库德里亚舍夫、弗拉基米罗娃、霍赫洛娃、康多尔斯卡娅、巴什基罗娃、萨尔吉娜。研究所建立了大脑库,收集和研究了下列著名活动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大脑:明仁斯基^①、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②、片山潜^③、卢那察斯基、蔡特金^④、波格丹诺夫^⑤、昂利·巴比塞^⑥、马雅可夫斯基、米丘林、齐奥尔科夫斯基^⑦、索比诺夫、苏克等。对这些人脑的研究,成为研究列宁大脑的参照系。

到30年代中期,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1936年2月5日萨尔基索夫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伊·阿库洛夫写信,报告了研究的初步结论。1936年2月7日阿库洛夫据此给斯大林写了报告。

1936年5月大脑研究所代理所长萨尔基索夫向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列宁大脑研究结果的报告《列宁大脑的研究》。

报告说,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已经形成一份庞大的材料,有文字说明并配有插图(共有153页文字和15册图片集,每册50幅显微照片)。

根据一系列涉及大脑外部形体的特征——脑沟和脑回,可以说,列宁的大脑具有异常高级的组织结构。这些特征涉及的正是列宁的大脑下述区域,根据中枢神

① 维·鲁·明仁斯基(1874—193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财政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等职。

②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870—1928)——苏联党政领导人,著作家,《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其他一些著作的译者,曾任列宁研究院院长。

③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2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④ 克·蔡特金(1857—1933)——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9年参与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当选中央委员。1921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选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兼妇女书记处书记。

⑤ 亚·亚·波格丹诺夫(1873—1928)——俄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20世纪初曾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任中央委员。是“前进”集团的领袖,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队伍。十月革命后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鼓吹者。1926年创办输血研究所,不幸在自身作输血实验中牺牲。

⑥ 昂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⑦ 康·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苏联航空和火箭动力学以及飞机和飞船理论方面的学者和发明家,现代宇航学的奠基者。

经系统当代形态学和生理学的资料,这些区域与特别高级的功能——精神集中、注意力、言语过程、认知和行动过程、要求转换具有极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与高级神经活动的特别高级的功能联系在一起。

上述特征的确认,是把列宁的大脑与一系列属于中等水平以及在某一方面杰出的人的大脑进行比较的结果。为此目的,研究所对 10 个中等人物的大脑半球和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马雅可夫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大脑(6 个大脑半球)从结构学上进行了研究。

报告介绍了为进行结构学研究而对列宁大脑所做的准备工作。

把大脑用福尔马林和酒精固定,切成块并用石蜡包埋。这些块分成 30953 个切片,全都保存在研究所里,制作了 690 张放大五倍的幻灯片,制作了一些大脑皮质各个结构区域的显微照片,总数约为 700 张。大脑皮质分成细胞结构区域和部位。在记录中对它们做了说明。对各个区域进行了测量,确定了它们的表面面积、部位表面和整个半球的面积。

计算出每个区域和每个部位与整个半球表面的百分比和每个区域与该部位表面的百分比。根据获得的数据,画出放大五倍的示意图,展示出右半球各个区域和部位的大小以及它们的面积对应关系。

左半球有严重的损坏,确定了保存下来的各个部分属于哪个结构区域。在大脑的显微照片上画出了两个半球各个区域和部位的界限。画出了示意图,展示出细胞结构部位表面的数量对应关系,还画出了表面和脑沟里面的各结构区域之间的百分比示意图。找到的数据表明了左半球保存下来的各个部位大小与右半球对应的部位大小比例。

关于对列宁大脑的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结论。

对大脑皮质各个部位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分别作详细记录,进行对比之后,得出如下的基本结果:

(1) 众所周知,前额叶对于特别高级的功能,尤其是对于精神集中,对于注意力具有巨大意义,下前额叶对于言语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测量前额叶的脑沟和其他部分的脑沟,发现列宁的大脑中前额叶的脑沟与在这个方面研究的所有其他人[古比雪夫、卢那察尔斯基、明仁斯基、波格丹诺夫、米丘林、马雅可夫斯基、巴甫洛夫院士、克拉拉·蔡特金、古列维奇(院士)、齐奥尔科夫斯基]相比较,百分

比最高。

脑回也非常丰富,同时,下前顶叶也与中等类型有极大的不同。这个部位对于高级功能,特别是对于认识和行动过程,具有重大意义。颞叶也具有很丰富的脑沟,特别是中下部颞叶的脑沟分成众多的弧状,走向各不相同,尤以横向为多。

(2) 研究了其他 16 个人的大脑半球,其中有 6 个杰出人物的大脑半球,发现通常从一个区域往另一个区域过渡,或者有明显的界限,或者有明显的所谓缓冲适应现象;在该区域范围内向着邻近区域的方向,存在着结构的变化,使它与邻近区域有某种相似的结构。福格特认为这种变化的发展导致新的结构区域的形成。这样,它就显示了大脑组织的高度完善。

不同于上述其他人的大脑,列宁的这种结构特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前额、下顶和颞叶的许多区域里。这样,在前额叶中,缓冲适应与整个皮质表面的百分比为 2.06%,而与前额区域表面的百分比为 8.07%。波格丹诺夫的大脑相应的数字是 1.3%和 5.3%,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为 1%和 4.1%,马雅可夫斯基为 1.1%和 4.7%。

(3) 列宁的大脑的精细构造特点也证明其构造的高度完善,其一是在前额(特别是第 10、46 和 47 区域)和下顶叶发现的细胞成分的高度密集,比马雅可夫斯基、波格丹诺夫和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大脑的相应部位更密集。细胞成分的丰富是同可能转换的丰富性以及相应的功能的极大的多样性相当的。

(4) 大脑皮质的基本部分分为六层。根据现代细胞科学的资料,三层主要为联想系统提供起动因素,这个系统对于高级神经活动和特别高级的功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列宁的大脑中,在前额叶,特别是在第 10 和第 46 区域里,在下顶叶,上颞叶和处于第 19 区域邻界的颞—顶—后脑部位,在后中心部位(第 70 区域,尤其是第 71 区域),正是在第三层中可见到特别的大细胞。例如,第 71 区域第三层细胞的大小有的地方达到了 56—60 微米,列宁的这个区域平均为 32.7 微米,而其他人的大脑分别为 24.3 微米(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27.1 微米(马雅可夫斯基)和 28.2 微米(波格丹诺夫)。

(5) 把列宁的前额和颞叶及其构成的各个区域表面的大小与其他人的大脑相应部位进行比较,其所得结果对于判断列宁的大脑的高级组织特别重要。列宁的前额部位占整个表面的 25.5%,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占 24%,波格丹

诺夫占 13.9%，马雅可夫斯基占 13.5%。列宁的前额叶比重大，主要是因为与这个部位特别强的分析功能相联系着的那些区域大。例如，第 10 区域是种类发展过程中最新的结构组成之一，在列宁那里占整个大脑皮质的 6.3%，而在波格丹诺夫那里占 6%，在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那里占 5.8%，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里占 4.2%。

(6) 列宁的大脑左半球受到很大损坏，但是在功能高度分化的部位把它与列宁患病期间所拥有的巨大高级功能相比较，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使在患病期间，列宁仍然拥有高级的组织，虽然大脑受到很大损坏，但在功能上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然而，研究所认为，完成对列宁大脑皮质的研究，并未穷尽大脑的研究工作。第一，研究所研究了一系列杰出人物的大脑，积累了大量比较资料，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进一步详尽地弄清列宁大脑构造的更细微的特点。第二，对列宁大脑皮层下部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第三，对其他杰出活动家的大脑的研究结果，只有与对列宁大脑的更精细研究所得的结果相比较，才能作出应有的评价。

对列宁大脑的研究为研究所提出一系列问题。为了正确评价对列宁大脑的研究结果，必须进一步了解大脑的各个部位，而且要使用大量材料。研究所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研究了 30 个大脑半球，其中 10 个半球是属于杰出人物的。研究所根据这些资料得到了具体的结果，获得了一系列数据，能够说明单个的区域和部位的最大量和最小量，也能说明中等量、变数等。这些结果除了重大的理论意义之外，对于认识损伤部位和治疗大脑皮质疾病都有意义。

第二组问题是由对列宁大脑的研究，试图理解其大脑构造的特点引起的，这涉及大脑发展的过程。为了全面理解能够说明成年状态的机体的复杂形态关系，必须了解个体(个体发育)和种类(种系发育)的这些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对于研究像大脑皮质这样复杂机体中的形态关系的结构学来说，这种状况自然获得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唯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完全理解纯描述性的方法为我们提供的那些资料。研究所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定了神经科学中一系列新的事实和规律。例如，研究所的研究确定了虽然大脑皮质分成多个层次，并且在出生时总体上已经定型，但是单个层次的细胞分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在胚胎后期阶段才发生。可以理解，这种状况对于弄清解剖发展与功能发展之间相互关系能够开辟

如何广阔的前景:不仅可以把解剖发展与难以观察到的功能发展在胚胎阶段进行比较,而且在出生以后也能很容易地观察功能的发展。

研究所在研究大脑皮质的种类发展或种系发育方面的工作也具有不小的意义。活组织的带电现象问题是当代生理学最迫切的问题之一。研究所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特点是:把对生物电的研究与结构关系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所还提出了大脑生物化学的研究课题。

这样,对列宁大脑的研究也给研究所提出一系列当代神经病学的问题,这首先要求积累特别丰富的解剖学资料。研究所掌握大量系统制作的成人大脑标本(每个大脑 10,000 个切片,切片的厚度为 20 微米),其中包括苏联一系列杰出的政治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大脑标本,同时,还搜集了每位活动家性格和生平资料。研究所还掌握有丰富的胚胎学资料——130 个作了系统加工的各种年龄的大脑。

根据这个报告,联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如下决定:

1. 听取了大脑研究所对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决定成立对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评估委员会,其成员为阿勃里科索夫教授、克罗利院士、萨尔基索夫教授、奥尔别利院士和沃罗比约夫院士。

2. 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脑研究所设专门的场所和安装相应的设备用以保存与研究列宁大脑有关的切片、标本和一切文字与图片资料,建议大脑研究所把与研究列宁大脑有关的标本、文字和图片资料复制四份,分别保存于(1)联共(布)中央,(2)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和(4)大脑研究所。

3. 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大脑研究所设专门场所和安装相应的装备以保存苏联已故杰出活动家的大脑标本、图片和科研资料。

不公开发表

过了 30 多年,1969 年 10 月 20 日苏联卫生部部长彼特罗夫斯基就列宁大脑研究工作状况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苏联卫生部委托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审查苏联医学科学院大脑研究所对列宁大脑研究的结果。卫生部得出结论,认为有众多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集体多年

来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这项工作成了我国研究中枢神经系统中细胞结构学方向的基础。

查清了列宁大脑构造的细胞结构的一些特点,证明了它的高级组织和有根据地指出了列宁在第一次发病以后中枢神经系统的高度补偿能力。

苏联卫生部认为尽管对列宁大脑的细胞结构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但是不宜发表,因为目前还不具备作出最后结论的可能性,不可能把研究所获得的资料与关于人的大脑构造的可变性的说明种群总体特征的统计学上可靠的资料相比较。应该把杰出人物的大脑构造特点与之进行比较。此外,大脑结构与其活动水平的许多解剖生理学上的平行关系还是有争议的。

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还建议苏联医学科学院大脑研究所在描述研究列宁大脑平行研究 26 个大脑标本的成果时把它与对一系列杰出的文化科学活动家的大脑细胞结构研究相比较。特别是必须完成对以前用细胞结构方法进行的对伊·波·巴甫洛夫、弗·弗·马雅可夫斯基、阿·马·高尔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和伊·弗·米丘林的大脑半球的研究的分析和文字加工。

要求编写一部专著,除了描绘每个大脑的个体特点之外,还应该把天才人物的大脑的特点与其他一些人已经被研究清楚的某些质与量的指标相比较。这样的专著可以公开发表。

为更好地保存列宁大脑的标本,卫生部批准在列宁陵墓所属新的实验大楼里设计 100 平方米的用房,专门用于长期保存列宁大脑的标本。

苏联卫生部认为研究列宁大脑的细胞结构的科学劳动随着关于人的大脑的细胞结构的科学发展,要求进一步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

未竟之业

“不宜发表”一语旁边有米·苏斯洛夫、阿·基里连科和尼·波德戈尔内等领导人的签名。这个决定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对列宁大脑的研究也许是人类对大脑进行深入研究的开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也由于脑科学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在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人类基因、DNA 等尚一无所知,并且列宁大脑的左半球严重损坏,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正常的大脑作为研究对象,因此研究并没有能够揭示出形成列宁思维特点的大脑的物质特征,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完成“从物质上论证

列宁天才”的任务。但是,研究列宁大脑本身,以及因研究列宁大脑而开展的对某些杰出人物大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至少为人类大脑研究积累了资料,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脑科学研究直到近年才开始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在神经活动的分子、细胞机制,在脑的整合性高级功能等方面,成果迭出,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对脑和神经系统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大脑的研究,也是对认识主体、主观世界的探索。对列宁大脑的研究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一意义重大的课题。

现在人类脑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在 20 世纪末美国宣布 20 世纪 90 年代为脑的十年。世界各国科学家参加了这项研究。

美国的人类脑科学计划第一个五年可行性计划的目标,是探索各种方案的可行性,开发先进的、与复杂数据相适应的信息工具。目前,这项可行性计划已成功完成,进入了脑计划的第二阶段,目标是要提供先进的信息工具使神经科学家能够将脑的各个结构功能在各个层次上整合起来,“绘制”出相应的“图谱”,从而对脑结构和功能有更深刻和完整的认识。

看来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也许有朝一日能够揭示出列宁大脑与众不同的特点,可惜的是苏联剧变不能不影响到对列宁大脑的研究,这项工作在我国是否还在继续,能不能够维持下去,人们不得而知。

《万象》2011 年第 5 期

苏联 20 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是逐步形成的。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时社会主义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才是工人的运动。^①直到《哥达纲领批判》,才把共产主义区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这两个阶段对应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③这是在十月革命前夕,那时还不存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作更具体的划分的客观需要。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发生的,这里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农民占居民的多数,保留着大量的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对这样的国情,在十月革命之初国家领导人注意得很不够,曾经企图通过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分配的军事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在国内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这项政策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在形势的逼迫下,俄共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同时对过去实行的政策措施进行反思。俄国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讨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自己的设想。较有代表性的是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的两位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既没有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5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90—91页。

也没有农民阶级,更没有资产阶级,在这里不存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关系。然而,与此相反,新经济政策下的俄国存在多种经济,多个阶级,还在运用商品市场关系,这就要求对这种社会的性质作出新的解释。

布哈林对当时俄国的社会提出了几个概念大致不同的说法。他认为,就社会主义的类型而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落后型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而就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言,与这种社会主义相适应,俄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24 年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①他说,俄国在革命前是落后的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既有在外国资本影响下形成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也存在着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落后经济,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构成它的所谓‘民族面貌’”。^②据此布哈林认为,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大工业,这些工业在国有化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构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经济命脉,因此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物质保证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俄国的经济技术极端落后,所以,俄国要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长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或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③

他在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中说:“无产阶级在一切国家中夺取了政权以后的最初发展阶段,也将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我们可以完全公开地说,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相比,将具有亚细亚的形式。我们能够实现国有化的东西和不能实现国有化的东西之间的比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等等——我国经济发展的所有这一切落后的特点,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落后的形式中表现出来。”^④

在布哈林看来,这种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吸引广大农民来参加建设事业。1925 年布哈林在同“新反对派”争论时声明:“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阶级差别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灭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5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75 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4 页,上册,第 64 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64 页。

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①布哈林解释说,我们建设的将是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对此我们丝毫也不应当感到难为情。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俄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②他引列宁的话告诫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要既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③

针对社会主义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布哈林提出了仍存在阶级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начальная фаза социализма)的概念。1922年他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指出,“在发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生产的指挥者。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还存在阶级的等级制,但它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的是无产阶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④

当时的经济学界思想相当活跃,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在另一名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中也出现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социализм в его первой стадии)的用语,^⑤甚至还有“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товарн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хозяйства)的词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如果不预先说明,所说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处于什么时期,什么发展状况,那么,要具体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是极为困难的。他指出,自从列宁不再对我国整个经济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以来,我们的制度一直“在没有名称地游荡着”,现在是决定名称的时候了。他建议把整个制度称为“过渡性的商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俄国落后的国情的要求。在欧洲,社会主义如果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因素一开始就会在各方面占统治地位,对这样的经济就不必使用“商品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术语。

① 《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3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50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75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97页。

④ 布哈林《进攻》(文集),第197页。见《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3页。

⑤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0页。

他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我们当前要研究的大概不完全是典型的，可能甚至是完全不典型的，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的、有史以来第一次试行的、具体的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①他认为，“我们的经济整个来说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体系”。^②在这种体系下，国营经济和价值规律仍起作用的私有经济并存。这是“计划因素在经济已有的组织程度所决定的界限内同时起作用，价值规律及其外部强制的作用力量也同时存在的经济制度”。^③

“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特点是：“在它的范围内，两种具有完全对立趋向的规律同时在起作用。”^④这就是计划规律或叫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他对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持否定的态度的，认为第一种规律表现了我们的未来经济的趋势，而第二种规律则反映了我们的过去，极力迫使我们停留在现阶段，并且使历史的车轮倒退。“在价值规律上集中了我们经济中的商品成分和商品资本主义成分趋势的总和，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总和。”^⑤

他把这种经济制度等同于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他写道，新经济政策包含三层意思：“(1) 新经济政策；(2) 我们整个的混合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3) 我们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因素。”^⑥

同布哈林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⑦他自称把马克思和列宁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两个阶段的历史划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前将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下存在着‘旧的残余’，这首先是指生产工具公有化过程没有完成，这也就是说，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残余，即存在着工人和农民这两个经济，虽然前者占据巨大优势”。^⑧

从 20 年代苏联经济学家的议论可以看出，布哈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是针对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现实的，其针对性是反对那些急于向社会主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 页。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91 页。

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3 页。

④⑤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00 页。

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84 页。

⑦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60 页。

⑧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245 页。

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的,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布哈林对初级阶段的特点作了某些概括,如过渡时期较长,发展速度较慢,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还需要运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他希望利用市场关系去建设社会主义。但他没有能够对这一阶段作系统的、展开的阐述,多半是在论述某个问题时顺便提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斯大林在1929年底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因此,布哈林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贯彻。

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因为国内还存在商品货币和市场等当时被看作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因素。他的目标不是利用市场关系去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设想利用计划因素尽快消灭市场关系,中止价值规律的作用。初级阶段在他看来是一个短暂的阶段。

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确实是对后人有所启发的。但是在当时仅仅是个别理论家的看法,没有能形成全党的共识,更没有能够以某种立法的形式把它肯定下来。所以随着布哈林在党内斗争中失败,斯大林能够很容易地不仅把这些提法彻底抛弃,而且也可以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深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得到发展的。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回顾苏联20年代的这段历史,对比我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十五大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用纲领的形式把这一重要理论肯定下来,使之成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确实是第一次,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项有巨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伟大创举!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1期

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

——苏俄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

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统治了苏联将近半个世纪。

从30年代到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出版物,大多的是宣传性的小册子,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为进攻所作的暂时退却,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材料是党的文献和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苏共二十大后,开放了部分档案资料,放宽了言禁,有的学者依据新材料写出了专著,例如埃·鲍·根基娜的《列宁的国务活动》(1969)^①就有不少涉及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材料。

真正掀起研究新经济政策热潮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时倡导“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的“空白点”,试图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改革的方案和依据。与此同时给一批遭到镇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平反,陆续开放保密档案,主客观条件使新经济政策成为热门课题。苏联解体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历史学家们有了较多的研究和发表观点的自由,

^①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1921—1923)》,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开始出现不少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和著作,许多有关俄国 20 世纪历史的专著中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新经济政策。^①出版了许多有关苏联史的论文集,及时传达了历史学家们的新观点、新成果以及新资料。^②

出现一些有关 20 年代的专著,如希施金的《政权,政治,经济。革命后的俄国(1917—1928)》,别拉乌索夫的《20 世纪俄国经济史》,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有较为系统的叙述。^③巴甫洛娃的《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罗戈文的《是否有选择? 托洛茨基主义:多年后的观点》、《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特鲁坎的《1928—1929 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和《通向极权之路(1917—1929)》等,就某些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④

从 1980 年下半年起至今,许多历史档案陆续开放,一些历史学家放下研究工作,投身于档案的发掘整理工作,报刊上不断披露专题档案材料,陆续出版专题解密档案集,由 А.Н.雅柯夫列夫院士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俄国文件汇编”是一部规模庞大的档案文件集,其中直接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有《1921 年的喀琅施塔得》、《新经

① *Дмитренко В.П.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АСТ, 1996; 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9; 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С., Ходяков М. В.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 Лань, 2001; Мунчаев Ш.М., Устин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ОРМА, 2002; Пихоя Р.Г. (общ. ре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 Москва: РАГС, 2005.*

② *Никаноров Е.Б. и Разумов А.Я. (сост.)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88. Л., Лениздат (1989; Никаноров Е.Б. и Разумов А.Я. (сост.)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89. Л., Лениздат; 1990; Лельчук В.С. (ред.) Историки порят. Тринадцать бесед.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Искендерова А.А. (общ. ред.) 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страниц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Иванов В.А. Переписка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емы. Диалог ведет читатель.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Журавлева В.В. (ред.) 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Пойск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обытия и факт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Шишкин В.И. (отв. ред.)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уро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2.*

③ *Шишкин В.А.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1917—1928). С-Петербург.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7;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II.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ю к нэпу.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2000.*

④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н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3; Роговин В. Была л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Троцкизм”: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годы.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1992; Роговин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п. Москва. 1995; Трукан Г.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искуссия 1928—1929 гг. о путях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Москва. Знание, 1990. Трукан Г.А. Путь к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у.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济政策是怎样被打断的》(5卷本)。^①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带走了大量十月革命到20年代末的档案资料,2卷本的《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和4卷本的《托洛茨基档案》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20年代有关。^②20年代关于政策方针的争论主要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进行的,因此联共(俄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速记记录是研究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手重要文献。^③1990年以来出版了一些历史文件选集,集中提供了一些基本文献和新文献。^④

中国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著作有:杨承训、余大章合著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沈志华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等。^⑤郑异凡的《布哈林论》、《天鹅之歌》和论文集《不惑集》、《史海探索》,^⑥柳植(杨存堂)的《世纪的实践》,徐天新的《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叶书宗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中有不少写于80年代以来的涉及新经济政策的论文。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苏联史学者研究的新成果。^⑦资料方面,80年代以来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布哈林文选》、《李可夫文选》、《托洛茨基言论》等,收有当事人的有关文章和资料。^⑧2002年出版的

① Кронштадт 1921.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в Кронштадте весной 1921 г.,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7;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В 5-ти томов.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2000.

② *The Trotsky papers*. T.2. 1920—1922. Mouton; The Harue-Paris, 1971;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Ю. (ред. и сост.) 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1923—1927). В 4-х тт.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1990.

③ 《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部分教师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Киселев А. Ф., Щагин Э. М. (ред.)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14—1945). Москв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6; Главацко М. Е.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40.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3.

⑤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 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 柳植、徐天新和叶书宗的论文集均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布哈林文选》(3卷本),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版;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李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

34 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约有 10 卷收有新经济政策的 20 年代的档案材料。^①王丽华主编的《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收集了 90 年代以来俄国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很有参考价值。^②

一、新经济政策的产生

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③,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纯粹出于军事的需要,或者说战争所迫。早在 1917 年 9 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④可见,革命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粮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实行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引发广大农民的不满,反对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这是导致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做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通常被译作“余粮收集制”,不确切。本文一律用“粮食征收制”。

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302—303 页。

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作“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作“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暴动,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引发各地暴动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行动有纲领的农民暴动,其纲领叫做“劳动农民联盟纲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这是一支农民军队,其建制和红军类似,也设有政委,在士兵和农民中开展政治工作。有25%—30%的居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参加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把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骑马的军事匪帮”活动的结果,这指的是当时的征粮队。暴动最后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部队平定。

农民暴动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导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1920—1921年冬,虽然战事基本结束,但彼得格勒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引起工人的严重不满,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厂举行集会和罢工,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转厂自由。罢工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出现传单,批评禁止集会的做法,要求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

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采取了加剧矛盾的措施,关闭这些工厂,其工人只发给一半口粮,继而宣布实行戒严。季诺维也夫声称,现在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肃反委员会开始大规模逮捕罢工工人。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罢工的消息传到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水兵决定派

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全体船员作了报告。全体船员会议通过决议,声援罢工者。3月1日在亚科尔纳广场召开大会,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参加,听取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代表的报告。与会者对彼得格勒当局反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为表示愤慨,他们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官僚。他们赞同上述两舰的决议,此决议包含整个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最低纲领,要点如下: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所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均等。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己(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①

喀琅施塔得约有16000名守军,暴动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并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庞大军力进攻这个海军要塞,平定了叛乱。一部分暴动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②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③

喀琅施塔得暴动中有几点值得注意:1.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甚至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2.他们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

^① 1921年3月3日《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喀琅施塔得),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24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4页。

等等。3. 暴动者齐心协力, 顽强地同布尔什维克军队战斗, 宁死不屈。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政权垮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执政根基。1917年10月26日, 武装起义胜利之后, 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 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 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 然而政府所采取……一切措施, 都是反农民的, 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①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暴动的问题。

对农民来说, 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 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 1917年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 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 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 继续反对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 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 反对这个党的专政, 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虽然是当时保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需的措施, 但对广大农民的暴力掠夺导致对执政党信任度的丧失。

十月革命后, 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 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支持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 然而遭到了失败。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 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对农民暴动的镇压, 对水兵暴动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 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 维持社会的稳定, 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寻找出路

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收制都是战争的需要, 所不同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这一制度的时候, 加进了“共产主义”因素, 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系, 把全国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管理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 这就使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 第17页。

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暴动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过反对意见。1919年7月17日,孟什维克中央建议,取消现行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1.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构、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2.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3.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干预消费公社的法令。^①

社会革命党人 B.K. 沃尔斯基指出:“劳动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活的,显然,任何强制措施,任何警察机关都不可能使政治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必须用实物税代替农产品征集制。^②

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 IO. 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党的领导接受。

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

①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

②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第289页。

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建议：1.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进所得实物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2.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缴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照农户计算。^①

这个建议以 11 票对 4 票被否决。这就是说，当时的最高领导的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现行政策的必要性，认识落后于现实。

1920 年 9 月 5 日奥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业下降的原因是粮食政策，他提出一个后来在俄共十大上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活下去。

1920 年 12 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表达了农民的要求，建议在交纳了严格规定的国家赋税之后，农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应的价格进行自愿的商品交换。

因为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 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实行了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 6 月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粮食运动”在 9 月 1 日开始，在 10 月 1 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实行“小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地方苏维埃有许多孟什维克，当时的粮食委员是孟什维克 М.П.雅库波维奇。他们对省的管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在粮食政策上得到了反映。9 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②

这时列宁的态度还没有改变。1920 年 9 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③

1921 年 1 月，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暴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决定改变方针。

① Троцкий Л. Новый курс. Москва: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1924. с.57—58.

② ЦПАИМЛ, ф.2, оп.1, д.15337, л.3, 引自 Журавлев В.В. (ред.) 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55.

③ 《列宁全集补遗》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44 页。

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1. 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2. 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3. 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4. 如果农民能迅速交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1921年3月8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高潮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这时候国内经济崩溃,供应短缺,粮食定量削减,实际工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广大居民的不满,示威游行、罢工、骚乱,甚至暴动震撼了整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尤其致命的是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业工人数1917年为242.88万,1920—1921年为118.86万,即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再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处境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②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初预定在1921年2月6日召开,后推迟到3月6日,最后在3月8日召开。如果在2月初召开,及时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有可能防止的。

3月8日大会开幕。大会派遣了300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暴动。列宁评论说,这“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原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③

令人不解的是大会并没有立即讨论改变粮食征收制度问题,先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党史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民族问题报告,党的建设的报告,工会问题的报告,等等。3月15日大会选举了中央委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9页。

员会,在这以后才讨论“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用一个上午时间完成这项议程。

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主报告,瞿鲁巴作了副报告。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①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

事先登记了 11 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言。为节约时间,限定 6 人,所以讨论是非常不充分的,有关粮食税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发言者都表示支持实行粮食税,但对“周转自由”,即放弃粮食贸易的国家垄断的恰当性,提出疑问。有两个担心:首先是担心农户收入分化加强,另一个是不相信在新的条件下居民粮食供应方面不会出现新的困难。发言者都赞同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有人主张不放弃强制和垄断,主张把粮食税的实施时间推迟到下一经济年度。

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为强制辩护,认为不动用强制就不可能得到粮食。副粮食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同意必须改变粮食政策,但主张保持垄断,不过要改变实施垄断的方法。同农民的交换只能由国家或者国家委托的机构来做。但他认为,垄断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实施垄断措施是出于特殊的经济条件。^②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米柳亭发言说,不仅在政治上,并且在经济上我们必须同农民妥协,这是因为粮食征收制已经进入经济的死胡同。他反对保留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50—65 页。

②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3, с.431—434.

垄断,认为不转向地方自由周转,这实际上同粮食征收制无异。如果我们想作让步,那就应当作真正的让步,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效果。继续实行征收制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征收遇到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浪潮,他们用武装的手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①

列宁在总结发言中不点名地回答弗鲁姆金说:“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对实行这一点的经济条件作出估计和检查。”^②

列宁认为,农民纳税后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剩余粮食的自由经济流转是适当的,但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影响增长。这时候列宁对合作社是不放心的,他采取了灵活的表述:自由的小经济流转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他提出一个改革的重要方针——“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成立委员会来研究积累的经验。^③

大会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结束了实行粮食税问题的讨论。提供表决的有两个草案,一个是列宁代表中央提出的草案,一个是弗鲁姆金的草案。弗鲁姆金说:不同点在于他的草案中的第6条,这条说的“不是流转,而是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用品和经营用品”。^④

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写道:

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决议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的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

①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434—436.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7页。

④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445.第6条全文:“农民纳税后所有留在他们手中的粮食、饲料和原料储备可以由他们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提高个人的消费,或者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品和经营用品。”

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①由于形势紧迫,列宁提出:“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②

两个月后,5月26—28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新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在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死气沉沉,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对发展农业不感兴趣,结果是我们失去了经济基础。现在的任务不是去研究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③

代表会议认定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其基本手段是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要把商品交换集中到合作社手里,但决不排除正常的自由贸易。会议还大致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向,其中表示支持中小企业(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允许把国营企业租赁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赋予地方经济机关自行决定租赁关系的具体问题。还修改了大工业的计划,加强日用品和农民用品的生产。扩大每一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质资源中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会议赞同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④不久,此委托书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地方。它要求采取措施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且不要限制地方流转的范围,在可能的地方转向货币交换形式。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概念。代表会议决议写道:“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5—10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99—300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20—122页。

政策。”^①

1921年6月11日彼得·波格丹诺夫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是新经济政策的纲领性基础,它提出了恢复市场、货币机制,改变工业的管理方针。建议取消无偿劳动,提高工资,把对工人的供应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同企业的工人人数挂钩。使经济政策的整个基础立足于经济核算之上,同时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对中小手工业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发展合作社,把企业交付租赁,等等。6月16日,政治局会议基本上通过此提纲。

这样,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纲领在内容上和具体化上都得到了丰富。

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粮食税的初步措施

粮食税的实施首先要取信于民,让广大农民相信这一措施的真实性和长期性。

俄共十大后不久,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告农民书》说:“今后……粮食征收制废除,代替它的是对农产品的实物税。实物税会少于粮食征收制的数额。它应当在春播之前规定下来……粮食税的征收不应当实行连环保,就是说,应当落到单个的农户头上,使勤劳的业主不必为同村的懒汉交税。农民完税后剩下的东西完全由他自己支配……他可以用它们通过合作社和在地方市场集市上交换所需要的产品。”^②

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原料征收制的决定》,为执行这一决定,人民委员会于29日颁布《关于1921—1922年实物税的决定》和《关于在已完成征收余粮任务的各省实行粮食、饲料、马铃薯和干草自由交换的法令》。自4月21日起,人民委员会还陆续通过确定粮食、马铃薯、油料和其他农产品的实物税的多项决定,把俄共十大的决定法律化并予以具体贯彻。

根据新的规定,1921—1922年粮食税额不超过24000万普特,撤销原来按照粮食征收制征收42300万普特指标的法令。16000万普特的缺额将通过商品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27页。

^② Глазго М.Е.(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40. Хрестоматия., с.141—142. 前面已经引用过。

换取得。

粮食税的实施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新经济政策客观上要求放弃许多已经习惯但过时的观念,如对农民(小生产)的态度,对商业、金融和货币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包括具体政策、配套措施、理论观点以及人的观念并没有解决。

起初,农民没有表现出向当局缴纳粮食税的愿望,他们不相信不会再征收补充税额的保证,因此征收头一批粮食税不比实行粮食征收制时征收粮食轻松。1921年5月下旬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表示:“粮食税的征收一方面要完成得彻底,另一方面时间又要尽可能短。”为了使支配余粮的自由真正像自由,必须迅速征税,使征税人不致长时间地同农民纠缠。为此还免不了要采取强制手段。^①

为实施粮食税动员了1100名共产党人下乡,但力量仍然不够。1921年7月9日政治局认为必须派遣尽量多的党员实施粮食运动,甚至不惜为此关闭某些机关和一些人民委员部。组织局决定,派遣24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征收粮食税的工作。各地组织也派大量的干部从事这一工作。

农民对征税进行了反抗。在乌克兰隐瞒征税土地达40%—50%,其他地区也隐瞒土地和牲口数。当局发现有隐瞒情节就增加税额,如果找不到隐瞒耕地的所有者,就把税额摊到富裕农民身上,而土地收归村有。到1922年1月在44个省份共发现300万俄亩隐瞒的土地。此类行为被看作是富农和反苏俄分子的反抗,目的是破坏恢复工作,以打击苏维埃国家。这就是说,拒交粮食税不是被看作经济犯罪或者一般刑事罪,而是政治罪,是反革命行为。

“背口袋的人”继续被看作敌人,虽然在多年食品不足、闹饥荒的情况下,“背口袋”是群众自我保障的一种办法。据《真理报》报道,到1921年8月初“背口袋的人”从农村运往城市的粮食多于国家收购的。

1921年9月全俄仅收到3150万普特粮食。只有两个省完成任务,10个省完成60%,10个省完成35%—60%。下年度的播种任务没有完成。1921年谷物播种面积为7980万俄亩,而1922年为6620万。不过,1921—1922年度征收了23300万普特粮食,1922—1923年度为36100万普特,最终消除了1921年的饥荒后果。农民相信了税收的稳定性。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08页。

1922年3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1922—1923经济年度实行统一实物税的法令(按照统一的重量单位——普特小麦或者燕麦)。这刺激了粮食生产,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同实物税的形式发生矛盾。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定征收统一的农业货币税。从这时起农民可以较为灵活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包括减少谷物的生产,通过经济作物的生产来缴纳赋税。

在国家缺乏商品的情况下允许买卖剩余粮食促使国家采取如下措施:开放小私人企业和非国有化的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留在国家手中的企业不得从平均主义的政策转向按劳动支付报酬。

1921年4月7日通过“关于调节个人劳动报酬”的决定,根本改变了工资制度。取消了对计件工资的限制,对重要工业企业临时实施实物奖励。1921年9月10日公布的“关于工资问题的基本条例”中强调把提高工资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品量的增加联系起来。

1921年10月1日通过关于物资、货币和粮食供应的国家计划。由于粮食储备继续减少,计划大大低于实际需求。只好削减国家供应企业的数量,以便保存国家特别需要的工业部门。削减一直持续到1922年新的收割季节。结果由国家供应的工人不到半数。

没有列入基本企业的那些企业可以租给合作社和其他联合体以及私人。取消国家供应而又没有出租的企业必须关闭,工人分配到开工的企业。

农民恢复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

实施粮食税以后,农民暴动减少,以至基本上消除,但军事共产主义的后果并没有立即消除。

1922年召开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大会。大会的一个任务是建立新的能够发挥作用的机制,首先是恢复平衡的货币和金融体制。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首次列入金融政策问题,报告人是索柯里尼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此后开始了货币改革,发行新的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有固定的汇率,甚至有黄金的保证。

从“产品交换”到“商品买卖”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政策体系,而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中是否允许引进市场机制。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 1918 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 1918 年春已经确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 年春实行的政策同 1918 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 1921 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 年）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①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②

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结为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跃进。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在商品货币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贸易自由”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看作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1920 年 11 月 30 日列宁致谢·叶·丘茨卡耶夫的信中写道：“从货币向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是毫无疑问的。为使这一过渡胜利完成，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③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问题。实施粮食税之后，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还把“贸易自由”看作是“反革命”的口号，“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起初设想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做买卖的合法的，还是停留在“产品交换”上。他曾这样解释过：“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④

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221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 39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0 卷，第 35—36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268 页。

交换,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作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用布哈林的说法,这是“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制度”,是一种寿命极短的“经济的蜉蝣”,是通向正常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一小步。但是人为的限制是行不通的。“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在自己的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结果出现了多少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也就是说,先开放一半,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然后再开放另一半,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①

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②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③

经济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然允许农民纳税以后拥有剩余农产品,他们就应当拥有自行处理这些产品的权利,有出售和用它交换所需产品的权利,要想人为地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地方的范围之内,限制在仅仅同国营工业产品的交换之内,是不现实的。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在报告中说:“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5—356页。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63页。

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①列宁认为还需要后退,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②

但是即使如此,列宁还是把目标定位在恢复“正常的产品交换”上。他在总结发言中说:“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③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一些传统的提法也作了修改,例如关于“投机倒把”的提法。长期以来,苏维埃政权一直把农民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行为宣布为投机倒把,甚至视为反革命行为而予以惩办。现在既然允许农民完税以后拥有余粮,那么他们处置自己的农产品的行为就不能再叫做投机倒把了。1921年3月3日列宁在致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就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出售一事写道:依我看,应当允许带得更多。你们对投机倒把怕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们单个地换粮食,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东西带进贫困的俄罗斯应当给与鼓励,而不应当加以阻挠。^④1921年4月21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明确指出:“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他主张“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这样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须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⑤这样就逐步承认了农民的商业行为的正当性,不能当作投机倒把论处。

新经济政策表现在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资本让步。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但成为党的纲领任务,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了市场关系的作用,它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另见第506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22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3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52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24页。

可以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以下一系列措施：

1. 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2. 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3. 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工业的非国有化。
4. 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5. 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6. 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中的自由,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7. 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
8. 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所作的中央政治报告中的数字,1922年的农产量达到战前的3/4,1922—1923年度农业总产量为战前的78%。播种面积也增加了,1924年达到1916年水平的90%,是1913年的80%。^①数字表明,无论是到恢复时期结束,还是此后时期,农业生产的这两个指标都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到1925—1926年度末,农业生产水平达到战前的92%,播种面积到1928年仍比战前约少10%。^②谷物的播种面积直到1927年才达到战前指标,而这时候经济作物和马铃薯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左右。

恢复时期农业上还有两个特点:1.植物和动物养殖业的商品性增长,2.农民的收入增加。根据国家计委的统计,谷物的商品粮为6.5亿—7亿普特,占全部收成的14%—15%。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还要高一些,为15%—20%,因为这是城乡主要食品。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农产品首先是粮食的出口。在长期停顿之后,1922年秋开始恢复谷物的出口,从当年的收获中出口了4000万普特,1924年初从1923年收获中出口了1亿多普特谷物。^③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3页。

② Шихкин В.А.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с.184.

③ Шихкин В.А.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с.184—185.

实行粮食税后,农村播种面积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土地仍属国有,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虽然有某些限制,但同意使用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动。

实行粮食税后,起初征收的是实物税,1923年改为统一的货币农业税,这就给与农民更大的经营自由,种植较能盈利的作物。在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瞿鲁巴引用了一组数字说明农民税负的减轻:战前每个农村居民的各种税款总数为10.37卢布,而苏维埃时期只有1920—1921年度接近此数,为10.30卢布,此后逐年下降:1921—1922年度为6.11卢布,1922—1923年度为3.98卢布,1923—1924年度为3.06卢布,1924—1925年度为3.96卢布。就直接税和间接税而言,以1912年为100,则1920—1921年度到1925—1926年度分别为97、78、60、68、44。就总支出而言,则下降得还要多,因为战前除税负外还有非税负支出,如租金等。以1912年为100,相应的数字为60、48、37、42和27。^①

与此同时,农民的货币收入增加。1924—1925年度他们从出售粮食中获得27700万卢布,1925—1926年度已经是47000万卢布。除谷物以外,1923—1924年度农民从出售亚麻、凝皮、油料子、黄油、鸡蛋、羊毛等中获得3亿卢布。1925—1926年度收入增至58000万卢布。这意味着农户的货币收入,包括农村内部的流通,在1925—1926年度超过10亿卢布。

国营工业的初步改革

工业的管理朝非集中化的方向进行改组。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有成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法改变其工作方法,如运用“盈利”、“经济或商业计算”、“产品成本”范畴,等等。另一方面,在一定界限内在工业和商业中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私人租赁国家企业,外国租让企业,在生产尤其是商业流转中成立有外国资本参加的混合公司。

工业的改组是在整个国有化工业之内进行的。1921年5月17日人民委员会撤销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超过5名工人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决定,但没有取消5月17日以前实施的国有化,此前的国有化企业仍留在国家手中。

^①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25, с.60.

改革主要是取消垂直的部门行政结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特有的总局和各种中心,实施企业的非军事化,逐步从实物支付过渡到货币支付,等等。

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有权支配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负责,独立使用自己的利润和弥补损失,即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商业和“资本主义”原则。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变成协调中心,无权干预企业和托拉斯的日常活动。其以往所属的50多个总局和中心改组后只剩下16个。办事机关大大缩减。职员人数减少了一半,为91000人。约有2/3的企业不归中央管理了。

按照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和1921年8月1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恢复大工业、振兴和发展生产的办法要点”进行国有工业管理的改组工作。建立了新的国有工业的管理形式——托拉斯,全部工业实行经济核算。托拉斯化同生产的集中化并行,尽量关闭不盈利的企业,让技术和装备良好的企业开工,这表现在1921年5月11日政治局根据列宁的草案通过的决定。^①

在国营成分中分出燃料和原料较有保证、效益良好的大型企业,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余企业则出租。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联合成托拉斯。1921年夏开始取消国家对企业的供应,自己到市场去采购资料,其活动严格建立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经济独立的原则之上。亏损和不盈利的企业(主要是前几年同生产军工产品有关的)则关闭或暂时停业。这项工作到1922年秋完成。托拉斯达到459个,其中130个属中央。虽然直属中央的托拉斯只占40%,但占工人总数的84%(一个托拉斯平均480人)。托拉斯不少于20%的利润用来形成后备资本(不久降为10%),后备资本用来支持扩大生产,补偿经营损失。

开始出现辛迪加—托拉斯在合作制原则上的自愿联合,从事销售、供应、信贷。到1922年底,80%的托拉斯化工业已经实现辛迪加化,到1928年共有23个辛迪加,在几乎所有工业部门活动,掌握批发商业的基本部分。

但经济核算的实施往往不按商业规则办事,有时政治领导认为,只要用半军事命令,以逮捕和长期剥夺自由相威胁,就足以实施经济核算了。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型工业企业和托拉斯的资助也破坏了经济核算制,结果以商业原则对生产领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50页。

的调节没有得到发展。经济核算、收支相抵、盈利、价格形成等机制的实施采用的仍然是强制的办法。

托洛茨基认为,市场规律可以用于一部分工业,但不适用于重工业的基本部门,重工业应当处于新经济政策建立的新的工业管理体制之外。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托洛茨基说:“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我们中间某些人,尤其是经济工作者,给与市场以过分的期望。然而,我们有重工业,我们的市场只能逐步推行。我们的冶金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只能逐步地从它们的干船坞——军事共产主义放进市场的大海之中,逐步地和缓慢地。如果我们让重工业从事市场的自由游戏,它必然搁浅,因为我们的重工业的状态优于现在的市场。我们应当使我们的重工业立足于千斤顶之上,使它不至于瓦解和沉没在市场的水洼之中。”^①依他的看法,重工业只能立足于计划之上。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党的机关对工业工作的干预,以保证“阶级的纯洁性”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

托拉斯化只是表面上接受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它们看起来仍然是工业中的异体。建立的托拉斯在许多方面是表面上的,通过把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总管理局分解成若干部分而成。多数托拉斯在技术上是亏损的,往往把相应的生产工作交给各企业,而自身变成商业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严重依附于私人中介。产品的成本非常高:战前1普特生铁成本为60戈比,现在是4卢布,战前1普特铁4卢布,而现在为6卢布。商业采购活动水平极低。托拉斯采购大量其生产用不上,但系“缺门”的东西,而不采购确实需要的产品和物资。例如,莫斯科印刷厂购买了砖头、木板、水泥、玻璃(5亿),而拒绝购买其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如颜料、干性油、呢绒,相反地,把这些东西出卖给其他企业。私人中介是国营企业之间商业关系中的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手完成大量交易,收取高额佣金。

1927年关于托拉斯的法令取消了作为托拉斯经济核算活动主要目标的赢利的概念,这就使托拉斯回到国营企业的地位,生产效益、盈利、成本等概念在这里已经不起什么重大作用,而从属于政治任务 and 该行业或企业对整个计划经济的作用。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Бюллетень.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 1923, с.244.

国营工业中的新经济政策使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得以复苏。1921年工业生产达战前的33%,1922年的40%,1923年的50%。^①新经济政策和运用市场关系导致国内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发展。轻工业接近农业原料,符合群众消费的需要(首先是农民),因此在新经济政策下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而重工业仅仅处于恢复的初始阶段,是亏损运行的。

国家保留对国营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控制而不松手,因为这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党的阶级支柱。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经济的这一领域真正建立了市场关系: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提供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工业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在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疑虑,对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是新经济政策又要求运用市场商业原则,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于是国家控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就发生难以解决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争论和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业的决议》中都有所反映。这次大会的特点是所谓“经济工作者”同“党的纯粹著作家、政论家”的尖锐冲突。后者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原则的纯洁性,而不是合理组织工业生产。

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观点是:托拉斯是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的国家机构。”^②“党专政”的概念完全可以用于此类经济机关的工作,应当全力加强党在托拉斯选拔和形成党的核心、共产主义核心中的作用。他在报告中提到,古比雪夫委员会考察了28个托拉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党对经济事务干预得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强调党专政,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持党干预经济工作,经济工作占了全部工作的十分之九。”^③

① Шшикин В.А.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с.195.

②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 1923, с.24.

③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1、32.

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对商业、市场观念的改变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发展了有效的市场机制,通过商业来组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正常交换。

但是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交换并不是通过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进行的。1921年安排工业品同农民手头拥有的粮食的直接交换,谷物和马铃薯进城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其一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征收的新的农业税,如果可能的话,用工业品去交换食品。但两者都未能做到。1921年国家总共得到23300万普特谷物,为战前的64%。较为活跃的是第二条渠道——“背口袋的买卖”(мешочничество)。这是非常特殊的同农村进行产品交换的大众形式,它的特点是灵活。1921年春公布了“关于自由交换”的法令之后有大量的劳动集体、私人商贩、家庭“采购员”的代表从中部和西北部工业地区来到产粮省份,用各种金属制品交换面粉、麦粒、谷物和马铃薯。村民对这种产品交换的需求也比较高。

“背口袋的人”在竞争中战胜了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他们采购的粮食比它们多。但他们不能解决整个粮食问题。所以1921年秋决定转向同农民进行市场商品交换,1922年开始了这种转变。这时候市场上出现了托拉斯、辛迪加、银行、大中型商店,还有千百万小商人。仅在1922年下半年领得经商许可证的就有85300摊贩、191000各种小铺的所有者、93100小店主,结果商业点迅速增加。

在商业发展中国营成分起决定性的作用,其1925—1926年度上半年的商品流转量比1921—1922年度下半年增长24.6倍,而私人商业仅1.8倍。商业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1922年下半年私商(主要是原“背口袋的人”)的分量几乎占商品流转的73%,国营商业约占18%,合作社占9.5%。三年半以后,商业中私人成分的比重降为25%,国营上升为57%,合作社为18%。私商主要把资本用于零售商业,国营企业主要是批发,而合作社则两者兼有。

困难很多,货币系统的健全化进展缓慢,到处可以感觉到周转资金的缺乏,而信贷系统刚刚开始形成。商业的分支机构特别薄弱,特别是在农村。在城乡贸易中存在大规模破坏商业交换规则的“剪刀差”。

1922年秋出现工业品销售危机。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工业托拉斯为追逐利润继续提高价格,造成销售的严重困难。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走向截然不同,形成托洛茨基所说的“剪刀差”,结果引发了1923年9—10月的“销售危机”。不得不

通过行政程序把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压低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以消除“剪刀差”。

在批发商业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占据优势地位。托拉斯联合起来的国营工业是市场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1922年为组织工业品的销售和生产企业的原料供应,开始建立由各托拉斯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以协调各托拉斯的商业和供应工作。股份公司在批发商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建立股份公司的最初目的是吸收本国和外国私人资本。同时也建立纯粹的国营股份公司。1924年10月1日已经有82个股份公司在活动,27个公司在筹备。开展业务的股份公司有固定资本1.18亿卢布,其中国营组织占86.2%,合作社和社会组织占1.9%,私人资本占11.9%。

辛迪加、托拉斯和股份公司执行了第一道的大批发职能,但是由于缺乏广泛的仓库分支网,它们无法把商品送到各地零售网点,尤其是农村。执行这一职能的下一个环节是消费合作社,它们的批发流转额1922—1923年度为3.47亿切尔文,1925—1926年达30.9亿切尔文。但合作社的工作存在严重缺点,不能很快适应市场条件,因而削弱了与地方市场的联系。

正因为国营和合作社的商业机构运行不灵活,私商占据了工业品销售的大量阵地。一种形式是经纪业务,私商无需具备大量自有资金,只转卖国营企业的产品,而国营商业组织也需要私人经纪人向各地销售产品并采购原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业组织和商业组织的流转额中,1922年1—4月私人占22.7%,5—8月占35.8%。有的部门,如食盐辛迪加甚至占47.3%。它们往往获得交易额的10%—15%的利润。

政府对私人资本采取的是排挤的方针。1923年1月2日,人民委员会法令规定,各国营组织之间的交易禁止私人经纪人参加。排挤措施包括减少或停止对私人的贷款,规定批发商营业执照税的高税率,采用所得财产税累进制,等等。在3年内批发商业中的私营商业减少了一半左右。

与批发商业不同,在零售商业中,私商的零售网点占绝对的优势。1922年下半年发给私人的商业营业执照共54.71万张,其中肩贩商业占25.9%,售货摊棚占52.8%,商店只占21.3%。国营商业有0.93万个零售商业企业,合作社商业有2.26万个零售商业企业,它们在商店和小铺中占优势。私营商业在整个零售商品流转

额中占主要地位,1922—1923年度它在全国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比重为75.3%。^①

私营商业网点主要设在农村,它们为城乡交流和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商业网点的恢复主要是在城市,农村的网点恢复得十分缓慢。1925—1926年度农村平均每1000多居民只有一个零售商业企业,而1912年每550人就有一个。这样私营商业就大量往农村转移,填补这方面的空缺。1923—1924年度私人商业在农村有8.27万个固定零售企业,占城乡全部私营零售企业的25.5%,到恢复时期末,农村私营零售企业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达15.58万。1925—1926年度,在私营零售企业总量中农村网点占36.7%。^②

到1926年,零售商品流转额才接近1913年的水平。

与批发商业一样,在零售商业中苏维埃政权也竭力排挤私营商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部零售商业流转额中公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由1922—1923年度的24.7%上升到1926年的59.3%,而私营商业则从75.3%下降到40.7%。

实际上,当时的迫切问题不是排挤农村中的私商,而是在农村继续发展为广大农村居民服务的零售商业网点。1926年在全国居民总数中农村居民占82%,而1925—1926年度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农村只占25.8%。这就说明,这时候农村需要的是发展国营、合作社和私营的零售网点,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来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财政金融改革的成就

1920年市场关系几等于零。货币体系经不起纸币的超量发行,同市场、批发市场、零售商店以及大量的小店铺一起崩溃。合作社处于休克状态。银行和信贷系统不再发挥职能。食品的定量配给制度不足以保证起码的生活。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布尔什维克仍然坚持消灭货币的方针,企图以实物交换防止使用货币的买卖交易。苏维埃纸币继续起着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从十月革命到1921年3月,苏维埃政府发行了纸币2 327 586.7百万卢布。1921年下半年和1922年全年发行新版纸币1 999 117 289百万卢布。直到1921年下半年实物交换失败,不得不用商品买卖来取代“商品交换”,这才开始设法考虑运用商品货币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96—198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95—197页。

关系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把消灭财政赤字,实行币制改革问题提上日程。

1921年10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称:为了促进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了使货币周转集中起来并贯彻其他旨在建立正确的货币流通的措施,决定成立国家银行。^①11月16日俄联邦国家银行成立。国家银行的任务是促进信贷和其他银行业务,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周转,还有集中货币周转以及实施其他旨在建立正常的货币流转的措施。

为了缩减国家的实际开支,1922年间政府削减了各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机关一半以上的开支,几乎削减了9/10的武装力量(同1920年相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紧急集中工业于技术装备最好的企业,把技术装备不良的企业和小企业租让出去或者出租。同外国企业主和公司签订了第一批租让合同。1922年底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工业托拉斯已经上缴国家纯利润21 274百万金卢布。

通过一系列严厉措施预算赤字逐季减少:1922年7—9月收入为142百万金卢布,而开支为262百万,10—12月收入为178百万,开支为209百万,1923年1—3月收入为236百万,开支为243百万。^②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苏维埃纸币的稳定问题,因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继续上涨。

为取消数量巨大的纸币,1921年11月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指令决定发行新版货币。指令称,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有必要改组货币流通体系,为居民和工商业周转提供较为正常的经济核算基础和简化货币计算。为此宣布发行1922年版的货币,1个新卢布等于1万旧卢布,新旧卢布同时流通。此外,人民委员会决定严格限制1922年按黄金计算的纸币数量。这些措施,保证了卢布汇率的逐步改善。1921年12月28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经济工作的指令,指示财政人民委员部“全力以赴尽快减少并进而停止发行纸币,恢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正常的货币流通。应当坚持不懈、毫不因循拖拉地以税收代替纸币发行”。^③

币制改革的基本做法是,一方面继续保留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的苏维埃纸币,同时由国家银行发行价值10卢布的银行券切尔文。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小于10卢布的国库券,包括银币和铜币,最后停止苏维埃纸币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281页。

②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с.103.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311页。

的流通。实行两种币制并存的办法,是为了用大量发行不断贬值的苏维埃纸币去弥补财政赤字,同时保持同黄金挂钩的切尔文的稳定,逐步用切尔文取代苏维埃纸币。

1922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授权国家银行发行银行券,即切尔文,用黄金和外汇保证,法定1切尔文兑换7.742克黄金。可以用切尔文按照稳定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英镑以及其他外币。1922年11月27日开始发行。在一年半时间里切尔文同苏维埃纸币并存。

1923年1月9日财政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银行券(切尔文)“……在交易所的开价几乎同英国的英镑处于同样的水平……它很快就会在国家的经济中占重大的地位,其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坚决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把银行券用于预算目的,用来弥补预算赤字”。^①

1923年2月15日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确定并通过人民委员会实施关于外汇业务的法令,除在国外的企业,禁止以外汇支付,同时禁止以沙皇时期铸造的金币支付。这些措施是防止影响银行券(切尔文)的信誉。

1923年2月1日国家银行发行193万切尔文(1930万金卢布),以信贷的形式供托拉斯和辛迪加恢复国营工业的固定资本和周转资本之用。国营工业利用新货币按照金卢布来计算价格以及其他生产因素。为了把切尔文推广到国内商品周转,财政人民委员部责成国家银行确定切尔文对苏维埃纸币的牌价,每日公布。但国家银行不进行苏维埃纸币兑换切尔文的业务,以保持两种货币同时并存。银行也不进行切尔文兑换黄金的业务,虽然切尔文上面标有含金量。

1924年1月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给俄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于2月中旬结束。发行新的国库券用于预算和切尔文的兑换(按1切尔文兑换10卢布国库券的比率)。国库券的发行起初完全,以后主要通过信贷机构。先发行5卢布面额的,然后是3卢布的,最后为1卢布的。接着,国库券再发行银币:高成色的1卢布和50戈比,低成色的20、15、10戈比。提供的白银数量应当满足银币流通的需要,发挥的作用不小于战前,即达到全部货币流通量的12%—

^① ЦПА ИМЛ, ф.17, оп.84, д.438, л.194.转引自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4—105.

15%。银币的这种发行量目的应是加强对货币改革的信任。”^①

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的完成货币改革的计划得到 1924 年 1 月 14—15 日召开的俄共中央全会的批准。货币的发行量降低到商业流通所必须的限度。1924 年 2 月切尔文的发行量为 2 730 万卢布, 3 月为 760 万卢布, 4 月 690 万卢布。^②用切尔文更换苏维埃纸币的工作在 1924 年 2—3 月完成, 但决定性步骤是在 1923 年完成的, 那时切尔文已经几乎占货币流通的 70%, 苏维埃纸币仅占 19.1%, 中央金库的债券占 11.1%。1924 年 1 月 1 日流通中的苏维埃纸币总共只有 5 800 万卢布, 而银行券已经达到 28 000 万卢布。因此, 4/5 的货币周转立足于稳定的货币, 只有 1/5 是不稳定的货币。

1924 年 2 月 14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 完全停止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从 2 月 11 日起开始发行各种面额的卢布纸币, 从 7 月 1 日起完全停止使用旧苏维埃纸币。3 月 7 日人民委员会规定切尔文的牌价: 新版国库券 1 卢布等于 1923 年版卢布 5 万或者 1921 年版卢布 5 000 万。苏维埃纸币将按照此牌价兑换新的国库券。全苏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 “货币流通系统已近乎健全”, 切尔文已经获得国家“基本货币”的地位。

整个说来, 1922—1924 年的金融改革不仅恢复和整顿了货币流通, 消除了金融经济中的混乱状态, 而且停止了货币的大量发行, 为制定 1923—1924 年度正常的预算创造了条件, 恢复和整顿了税收制度, 促进了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大工业、交通运输、银行信贷)运行机制的改造。

执行中的危机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 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执行过程中问题不少, 危机不断。主要有两次较大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 1923 年夏秋出现的工业品的销售危机。托拉斯和工业企业追求高额利润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重工业长期处于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之下, 许多工厂和托拉斯靠挪用流通资本生存。为使工业摆脱这种状况, 1923 年 7 月 16 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发布第 394 号命令, 赋予托拉斯和辛迪加

① ЦПА ИМЛ, ф.17, оп.84, д.659, л.54—55.转引自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8.

② ЦПА ИМЛ, ф.17, оп.84, д.660, л.115.转引自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9.

以保障最高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全权。“最近时期企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活动的总的指导原则是作为任务的利润和作为方法的平衡表”，根据这项命令，托拉斯猛烈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使农村根本无法承受。

农民经过7年战争终于获得一个不坏的收成，有可能用不多的钱去部分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然而他们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及轻工业所需的原料被压低价格，而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却一直上涨。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走向截然不同，一个下降，一个上扬，形成“剪刀差”，结果引发了1923年9—10月的“销售危机”。根据统计局提供的批发价，以1913年指数为100(用切尔文表示)，农产品1922年10月为101，1923年9月为90，而相应的工业品分别为140和273，相差1.39和3.05倍。按照财政部的零售价，农产品1922年10月为111，1923年9月为93，工业品分别为174和269，相差为1.57和2.89倍。^①

农产品的低价，使得农民缺乏购买工业品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导致产量并不高的工业品的大量积压，商品和资金的正常周转遭到破坏。出现协作单位之间无法支付，工厂拖延工资的发放。连续几个月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紧张。1923年7—8月一些城市，包括莫斯科、哈尔科夫，发生工潮。仅在1923年4—9月间就发生5611起工人同行政当局的冲突，而且有191起伴随着罢工，参加人数达8万人。^②在高加索地区“剪刀差”导致格鲁吉亚爆发反苏维埃起义。这次起义在1924年席卷了格鲁吉亚1/3的县，在共产党内部称之为“第二个喀琅施塔得”。根据国家保卫总局的看法，这种起义还有可能在其他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发生。

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通过行政程序把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压低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指数，以1913年价格为100，1923年10月1日为88.8，到1924年10月1日则为136。在此期间，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缩小到1.46；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减一半以上。^③1924年春，剪刀差已经大为缩小，4—6月已等于零。

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

①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II.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ю к нэпу.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2000, с.351.

② 见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第203页。

③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80页。

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1925—1926年冬还出现过粮食收购“危机”,导致粮食出口计划完不成,并相应地减少进口。为此不得不削减商品的进口,从而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1926年的谷物收购困难,摆脱危机的办法是“取消”流通领域的新经济政策。

第二次大危机是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与经济作物相比粮价不合理,农民(而不仅仅是“富农”)拒不出售谷物。以战前价格为100,1924—1925年度谷物价格为129,畜产品和经济作物为135,1927—1928年度相应为109和151。^①谷物价格逐年下降,而经济作物和畜产品则不断上涨,农业内部的“剪刀差”不断扩大。这样农民宁可把粮食留下来用来饲养牲畜,用牲畜及其他经济作物换钱,去交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税收也不利于谷物。大田作物在农民的纯收入中占39.5%,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却达66.59%,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27.8%,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5.2%。此外,工业品供应不足,也影响农民出售粮食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本来应当有针对性地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调整谷物同畜牧产品以及技术作物的价格,调整税收,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对不上号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5条和第107条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把行政命令措施推向极端。

在实施非常措施并同“右倾”斗争的过程中,斯大林公开提出“贡款”论,认为农民不仅应当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应当缴纳一种“贡款”,即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品,使已经被否定的“剪刀差”合法化。同时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②这个“理论”为以后大规模镇压,包括消灭“富农”和镇压党内的异议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虽然简捷有效,在短短时间内征购了大量的粮食,但此法只可用于一时,不能反复长期使用,数月以后斯大林再次实行非常措施就不灵了。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1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依据“非常措施”的强制思路,不久斯大林就强制实施了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

20年代的几次危机提出了走市场道路还是行政命令的计划化道路问题,然而它们没有促使苏联走向市场经济,从解决办法到当权领导人的思路,走的都是行政命令的强制道路。斯大林的最后胜利意味着苏联走市场经济的最后一点可能性的消失。

三、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

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新经济政策的通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意见。所以列宁一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一致通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对意见。通过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货币关系,建设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被看作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其次,新经济政策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出台的,而是以实施粮食税为开端逐步充实完善的。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机制。这就出现如何对待随之出现的私商(耐普曼)、“富农”、私人贸易,如何看待市场关系等问题。

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在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有人“出于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削弱各国革命运动。在俄国共产党内怀有这种情绪的人就更多了。

原工人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耐普”(НЭП)一词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Новая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其缩写词与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词相同)。他们说,耐普使财富在一极积累,而另一极贫困,使工人更加贫困。也许在某个地方工业和商业会得到发展,但工人阶级会落入深渊,矛盾将发展,其结果将是内部爆炸。^①

抛开这种极端的看法不论,在党内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8.

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回归还是创新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①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②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粮食征收制的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给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斯大林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写道:

……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①

当时许多领导人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一种暂时退却,对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的任务可能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其次,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早在1922年夏天列宁卧病哥尔克的时候,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就发布打击耐普的支柱——粮食自由贸易的指令。由斯大林签发的1922年8月24日的密码电报写道:

1.认为在完成粮食税之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关于禁止自由买卖粮食的法令(这说明这时候存在这样的禁令——引注),并且严格限定仅适用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3页。

于那些蓄意拒绝纳税的个别机关。2. 执行降低粮食价格的政策, 因为粮食的昂贵价格将减少国家的粮食库存和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①

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 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 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注), 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 退却是全面的, “在国际政策舞台, 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②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 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 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 “同样很明显, 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③

在这一点上, 季诺维也夫要胜过斯大林, 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新经济政策, 其标题分别为: 第11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 第12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虽然分出专门的章节来论述新经济政策, 但从副标题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所关注的重点, 他的论点始终围绕阶级斗争、退却和进攻、国家资本主义展开。^④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 “列宁说得完全对, 说新经济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 实行这种制度首先是为了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真正的结合。我重读了1921年出版的列宁的《论粮食税》。他列举了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租让制——第一种成分, 合作社(把它叫作社会主义是白费劲, 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租赁企业——数量不多。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 “在这一领域无需寻找更多的新东西, 我们应当坚持1921—

① ПАНУ, ф.1, оп.2, д.266, л.31.转引自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уро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2, с.102.

②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5, 7.

③ 《斯大林全集》第8卷, 第11页。

④ 见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 郑异凡等译, 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1922年所坚持的东西。”^①

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发展经济是要有利于资本主义，还是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呢？谁战胜谁？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长入何方？”“蜕化的问题是存在的，资产阶级不相称的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②

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说法，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排除出新经济政策之外了。列宁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并多次指出过。在季诺维也夫书写《列宁主义》一书的时候（1924年）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其次，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而后者归根结底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只讲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完全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面，大大缩小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也大大贬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③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④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9.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6、8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页。

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①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②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③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虽然不是相对的,而仅仅是绝对的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④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9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196页。

④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郑异凡、郑桥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21页。

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作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①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②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2页。

致的”。^①

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认为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发展变化。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直接交换的立场上。他一方面说,税收不要拿得过多,另一方面却宣布1922年不能少收,要收取得更多,粮食的价格要规定得“非常低”。^②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这种做法实施的就是该规律的精神。加米涅夫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得不同意伏龙芝的说法,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粮食数量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显然,我们越出了政治上所不能允许的经济界限。”他承认向农民增收高额粮食税是不合理的,说:“我们应当修改我们同农民现有的协定,改善这个协定,应当在政治上关心农民。诚然,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何等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农民为支持整个国家大厦所支付的那一部分?”^③当时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但这一措施并没有改变通过征收直接和间接税的办法剥削农民的相当多的劳动以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增长的总的战略方针。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5、366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③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325、

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①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②又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③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④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对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指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⑤

早在党的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议论。

季诺维也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应当区分名词耐普(НЭП)和新经济政策。说到耐普的时候,向你们描绘的是耐普曼及其不良特点。我们常常说‘战胜耐普’。我不久前读到拉柯夫斯基在乌克兰的讲话,他说:‘我们振兴了制糖工业,这是对耐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1—363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41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

⑤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普的最好胜利！’为什么这是对耐普的胜利？我不是在指责拉科夫斯基同志，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说。这是因为我们把耐普同耐普曼混淆了，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因此我们也许最好是约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耐普。”“一批或一小批被派到耐普阵营的经济工作者在那里沾染上了耐普的(нэповские)观点，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严肃的经济工作者是不会感到委屈的。”^①

不少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斯米尔加在发言中说：“什么是战胜耐普？战胜耐普就是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战胜新经济政策。”^②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们实行新政策是为了在其基础上和在很大程度上用其方法战胜它。怎样战胜？善于利用市场规律的作用，依靠这些规律，在其机制中输入国营生产原则，不断扩大计划原则。最后我们把这种计划原则运用到整个市场，从而吃掉和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自动接近其消灭，用最新经济政策取代之，这最新的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③

托洛茨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他在十二大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说：总体上，新经济政策是“工人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手段和机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渡。”^④他认为拉柯夫斯基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拉柯夫斯基同志就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说道：“但我们在制糖工业中取得成绩，生产得更多更好，这就是对耐普的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是对耐普的打击。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打击耐普？”不过，同志们，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但不是永远的。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在其基础上战胜它。如何战胜它？在市场规律的协助下，依靠市场规律，把我们国营生产的强大机器引入这个规律，扩大计划原则。依靠我们国家财富，此计划原则应当扩大到整个市场，吃掉它，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成就接近或者应当接近取消它，用最新经济政策取代它，此政策将是社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4、32.

②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27.

③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13.

④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82、286.

会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权说,我们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胜利,并且是借助新经济政策自己的方法取得胜利的。^①

加米涅夫认为,“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上的泡沫,而新经济政策还不是我们共产主义的全部,不是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工具之一,共产主义的迂回运动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妥协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的萌芽。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对政治就一窍不通。^②

这么多的领袖挺身为“战胜新经济政策”辩护,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需要的是宣传和推广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与“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相配合的还有“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

1924年5月23—31日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作中央政治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中央组织报告,这是列宁去世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出现拉林提出的新名词“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拉林在讨论中央的总结报告时,敏感地捕捉到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情绪发生变化,他援引季诺维也夫报告中“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计划”等,把它概括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私人商业资本施压的开始。

季诺维也夫在总结报告中说:“新的商业政策和新的合作社政策,是当前两项主要课题”,“当然,所谓新政策是有条件的”。^③资产阶级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我们的任务是“为限制他们而斗争”,“在一定限度内为我们所保留的、有调节的、有序的、明文规定并加以监督的贸易自由,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础”。他建议“把私人商业纳入应有的轨道”,改变它对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现在是1:2),“随同这些措施还要把耐普曼驱逐出莫斯科、国营商业制定严格的规则、制定新的条例让格伯乌便宜行事”。关于富农问题应该注意别在对富农的让步方面搞过头。在农村兴起的有一般的耐普曼——高利贷者、小店主、酿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49—250.

^②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17、118. 这里的记录是“耐普”,而不是“耐普曼”,看来是记录错误所致,后来斯大林借此作文章,攻击加米涅夫。

^③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9页。

私酒者和批发商人。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商业和合作化政策,那么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将长入社会主义。^①

拉林由此得出结论,出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解,“原则没有变。什么变了呢?那就是我们变富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摆脱战后即三年前的那种贫困,因此我们更加坚决地贯彻我们原则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合作化政策’等等的意义也就在于这种可能性的增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概括为,我们从旧的、习惯的、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我们这里将要做的一切的含义是,我们并不改变原则,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实施我们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所无法实施的那条路线的可能性。”^②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加米涅夫不接受“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手中有法律、税收以及各种管理机关,足以限制新经济政策,没有必要另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主张对资本主义成分(从租让企业到私人零售商业)实行不调和的正面进攻。

古比雪夫说:“说的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斗争双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相互关系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要使商业流通领域出现有利于国营和合作社资本的影响增长。问题就在这里,问题也只能这样提。”^③

加里宁在农村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农村商品经济在助长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认为“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关系,意味着私人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他提出,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沿着对我们最为有利的轨道并在我们严密的全面监督之下发展。^④

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呼声,就是要千方百计压缩以至取消商品经济,打击以至消灭私商,使社会主义迅速压倒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5月29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发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1—91页。

②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77、198页。

③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48—349页。

④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28页。

言,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农民问题对我党来说有着根本的意义。我们是否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否取消新经济政策,是否能够维持苏维埃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状况。”他说,有私商和小铺的农村,要比既没有国营商业也没有合作社商业,刚刚开始准备组织这种商业的地区好得多。“既然那里没有合作社,它建立的速度又很慢,那么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工人,有私商比没有任何商业自然要有利一些。”“如果我们用压缩市场作为代价,以国家资本取代私人商业资本,这会是极大的错误,对党极为有害,会推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

李可夫说:“不久前我曾经请求为我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报纸。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文章,这是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农民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40%,国家有100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4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而在我们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时候说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是极大的错误。只有当我们在工人的数量上、同农村的商品联系的数量上超过战前的水平时,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李可夫认为:我们有半数以上的农村是同城市隔绝的,几乎从城市得不到任何商品,因为70%的工厂产品都被我们分配给城市了,只有30%的产品运往农村。这就是说,农村是通过各类手工业和家庭式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这也是生长资产阶级的基础啊!富农阶级不能不成为这种与城市隔绝的农业生产的中心组织。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城市商品输入农村,这是同在这种土壤中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个方面。^①

李可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商品粮的生产角度看,富农经济无疑生产得更多,从而购买得也更多,在城市里扩大了商品流转。诚然,以富农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阶层在发展,但富农的范畴至今还不明确,经常同中农,有时还同文明的贫农混为一谈。加里宁在报告中也指出富农概念不清的问题,他引用列宁的观点说,“不知道这个农户的经营史就说他是或者不是富农是不行的”。财产多少还不能说明就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69—570页。

是富农,要分析这些财产是怎样积累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积累的?财产所有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最后,经济地理上所造成的特点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的农民在正常的情况下要比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富得多,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更接近富农。当时商业的现实情况是国营商业占 1/3,私人商业占 2/3。这不是主观愿望问题,而是现实力量问题。国营商业只能供应这么多,特别是在农村主要靠私人商业满足居民的需要,私商在满足居民的需要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限制甚至消灭私商,纯属空想。

大会决议中一方面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经济的振兴,“党现在没有任何根据来修改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认为“当前的任务是不断加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党中央委员会清楚地看到在目前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有所发展,并由此采取一切相应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①

“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 1923 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尽管在以后的 3—4 年里新经济政策表面上还被当作健全的正常的政策,尽管在 1925 年布哈林等人曾经大声疾呼地要求把新经济政策推行到农村去,但其历史命运已经无法改变。

四、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

被迫实施的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在农民暴动,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威胁下,苏维埃政权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被迫实施的。那时候全党面对的是要么改革,要么苏维埃政权灭亡,别无选择。所以列宁多次说过,实行粮食税在党的十大上是一致通过的。农民由于实施粮食税,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感到满意,因而武装反抗的浪潮消退,国内形势转入稳定。

不过一年后威胁消除之后,党的领导核心以至普通党员中有许多人认为退却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转入进攻。在这强烈要求下,连列宁也顶不住,在党的十一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411 页。

大上,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仅仅1年以后,宣布停止退却,转入进攻。在此后的年代里,这股要求进攻的呼声不但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强烈。并且正是这种“左”的代表人物执掌政权,主导政策,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多数人对新经济政策心存疑虑,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用行政手段来限制新经济政策,甚至发布与新经济政策精神相违背的法令指示,缩小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和范围。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①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的年代里,实施新经济政策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恶”,苏维埃政权依然敌视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例如1926年8月23日中央组织局决定,禁止共产党员在租让和私人企业担任行政职务。^②

经济核算制度被看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能够推广到所有工厂企业。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它们拥有有限的出售产品的权利。但1922年9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允许所属企业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停止这种过渡。向其他人民委员部说明,不赋予它们把所属企业转入经济核算之权”。^③经济核算仅到托拉斯一级,没有普及到企业。托拉斯受上级党政机关的指令的控制。按照1923年4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按照商业核算原则活动的国营工业企业(托拉斯)”的命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其计划管理,包括发放拥有建筑物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的许可证,出让、抵押和出租固定资产,任命和调动托拉斯的理事会和稽核委员会,批准生产计划、工作报告和平衡表,年度利润的分配,批准参加工商联合体,等等。这样,留给托拉斯的自主性就非常有限了。

国家保留对国营的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强大控制而不松手,因为这是社会主

① ПАНО, ф.1, оп.2, д.266, л.31.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3, с.208.

② ПАНО, ф.2, оп.2, д.116, л.3.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8.

③ ПАНО, ф.1, оп.1, д.927, л.24.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1.

义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建立了市场关系的真正空间: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党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工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与此同时,逐步地并且越来越利害地从国营企业间的供应、买卖中排挤私人商业中介。

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对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存在疑虑,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都有怀疑。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声称:“托拉斯只是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国家机构,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①1924年3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机构和企业的自由,规定它们至少把60%的后备资金用来购置息票。1927年6月2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的新条例规定托拉斯完全服从国家的计划任务,取消了托拉斯提取利润这一条。

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处境非常不稳定。1923年10月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高收入人群中强制摊派国家6%有奖公债。逃避购买等同于逃避税赋。^②1924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1923年12月底一直进行到1924年1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他们的家庭成员,除公务员外,一律迁出莫斯科,并禁止居留在各共和国首都和人口稠密的工商业中心。住房被查封,与其他屋内财产一起交付莫斯科不动产管理局处理。^③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年4月24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社的决定,其中规定:1.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2.着手制定商业条例,制定条例时须有国营商业代表参加并处领导地位。3.研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44—45.

② ЦГАОП, ф. 1235, оп. 101, д. 4, л. 93.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2.

③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84, д. 485, л. 8.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2.

究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等。由于商品荒,1925年11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斗争的专门决定:“加强对那些因出售和倒卖日常用品而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合作社工作人员的镇压,迅速审理此类案件,并举行一系列的示范审判……规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关最多在两周期间完成上述案件的初步调查……侦察要在最短期间完成。”^①

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②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拔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左倾”激进思潮的对抗

苏俄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无先例可循的创举,只能摸索前进。在这过程中有人从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观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人死守传统观念不放,总想走回头路,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宁是前者的代表,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实践,列宁由否定商业到承认商业,从试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到允许在全

^① ПАНУ, ф.20, оп.2, д.57, л.4—6.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3.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8页。

国范围内进行交换,从只允许产品交换到承认商品买卖,最后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做生意。列宁的这个号召实际上意味着要全党学会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市场机制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列宁过早逝世,他的继任者多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并不理解,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看作是1918年春政策的回归,不承认它同以往的政策有质的差别。政策不稳定,受政治气候、党内斗争的影响甚深。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对耐普曼和富农的政策,经常是党内争论的对象,党内除布哈林等少数人,一个比一个激进,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在骨子里他比托洛茨基还要激进。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政策的不稳定导致居民心态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没有人愿意把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在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①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与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与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多少严格的概念。1923年10月15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批评政治局的政策时指出:“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性决议。”^②党的领导也不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策略路线,而只是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牌,在整个20年代悄悄地破坏和扼杀新经济政策的根基。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平等观念与先富起来群体之间的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社会出现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一方面出现大量失业人群,另一方面出现一个富裕阶层,这个富裕阶层被官方定性为“新资产阶级”,采取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3—306页。

^② Правда, 3 января, 1923.

了限制、压制和不断打击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怀平均主义心态的群众的拥护，他们拥护“劫富济贫”的做法，在农村定期重分土地，剥夺“富农”或者富裕农民的财产。在城市，工人和市民对因新经济政策获利发家的耐普曼也心怀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剥削发家的。正因为如此，官方“转入进攻”、“打击富农”的方针能够得到城乡劳动者的拥护和欢迎。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斯大林派都担心农村的分化，都打“反富农”的牌。但是谁是富农，在整个 20 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曾经批评过乱划富农的现象，说被当作富农特征的有：“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住宅，制作并向本村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有的地区规定有 2—3 头奶牛或 2 头役畜者为富农，甚至连经常或临时出租住房者也算作富农。在许多场合被列入“富农”的是从事集约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种植高产作物、把农业劳动同辅助性手工业结合起来的农民。^①1929 年 5 月，人民委员会曾规定过富农的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磨坊、油坊、碾米厂、梳羊毛机、弹毛机、烘干房或其他有机动力的企业，等等。^②而这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小的乡镇企业主。剥夺富农前夕，为便于操作，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编制了“确定”富农的标准：每人的年收入高于 300 卢布（但全家至少 1 500 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拥有磨坊、油坊，等等。^③在这些特征中，只要具备一个，就可以定为富农。但在这些特征中缺乏社会标准，即关于剥削的界定。把这些人当作“富农”打击甚至消灭，谁还会去努力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呢？

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形成一种仇富的气氛，以穷为荣，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干部把穷人当作唯一的依靠对象，以至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批评“左派”糊涂虫的观点，说“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④斯大林说这话的时候已经

① 李可夫：《1928 年中央 11 月全会总结》，《李可夫文选》，第 395 页。

② 见 Данилов В. П. и Ивницко Н. А. (ред)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ревни накануне и в ходе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Москва, 1989, с.221—222.

③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 1 卷，第 309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18 页。

是公元 1934 年了！可见“把穷人理想化”，“依靠穷人”的观念是多么牢固地扎根在各级干部的脑海之中。然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这些“左派”。

行政命令措施下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经济学家布哈林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也只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需要价值规律，而这以后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而代之以“劳动消耗规律”。

20 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作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 年 12 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①1926 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②

1923 年夏秋的销售危机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 394 号命令引发的，它要求国营托拉斯和辛迪加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竭力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严重的“剪刀差”，酿成所谓销售危机。而实际上当时工业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农民没有钱来购买，形成积压。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①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8.

② 转引自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下册，晨曦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73 页。

1924年10月28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通告,地方领导人可以根据政治因素或者经济需要加强镇压,以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经济困难。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Р.И.艾赫1925年初就是这样做的。他指示格伯乌西伯利亚特派员采取措施逮捕最主要的私人粮食采购商和磨坊主。结果逮捕了5名大采购商,理由是他们高于限价收购粮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有规定,在俄联邦的某些区,格伯乌机关有权把从事粮食投机的人关进劳改营。^①

1925年农村有一个短暂的开放时期。但1925年下半年由于出现新的危机迹象,党的高层的情绪又发生变化,地方上重新开始向私人采购商发起进攻。交通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特派员帕弗卢诺夫斯基命令遵照条例行事,据此条例不保存和接受未列入名单的收购商(首先是私商)运往西伯利亚以外的面粉。1925年10月29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决定采取措施使市场正常化,限制把车皮拨给私商。这种做法显然是同新经济政策相矛盾的。

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并不是农村没有粮食,而是粮价不合理造成的,本来应当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调整谷物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刑法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

税收政策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20年代不断减免贫农户的农业税,增加富裕农民的税负。1923—1924年占农户9.5%的富裕农民和“富农”缴纳了29.2%的税额,以后他们的税负比重继续增加。富裕阶层想通过分散的办法减轻税负,结果20年代农户分散化的速度比革命前快一倍,这种现象不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当然也有受益者,居民群众利用新经济政策给与的商机和自由,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的开始发家致富。在城市有耐普曼,他们在零售商业中占据巨大的份额,弥补了尾大不掉的国营商业的不足。耐普曼在活跃城乡流通,城乡交流,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部分善于经营的人士,他们的经营活动远远没有达到形成资产阶级的程度,并且由于

^① ПАНУ, ф. 1, оп. 2, д. 53, л. 13.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16.

大型批发业务都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耐普曼的活动受到严密的控制和约束,对整个国民经济并不构成威胁。

在农村从新经济政策得到好处的是善于经营的勤劳的农民。沙俄时代的富农经过国内战争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已经基本被消灭,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被剥夺,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富农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在农村兴起的是那些善于经营耕作的勤勉的农民,他们利用缴纳粮食税后的剩余来改善和扩大生产,逐渐成为农村的富裕阶层,当时叫作“富裕农民”,以区别于所谓“富农”。但是他们的日子总的说来并不好过。按照过去村社的传统农村定期重分土地,这很不利于土地的改良,农民对过去富农的盘剥仍记忆犹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在农村就对“富农”实施剥夺,没收他们的土地、住宅和财产。

在农民写给报社的信函中有大量的申诉,对此表示不满。1925年阿穆尔州的农妇马秀拉给《农民报》写信说:“共产党好像竭力要使所有的农民变穷,只鼓励贫农,不是帮助他,而是鼓励他穷,如果一个农民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经营,那他就会从贫农队伍中除名,在他头上贴上富农的标签,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可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改善自己的经营,这就在党的眼中成为富农。换句话说,这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①

新经济政策本身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自身包含许多矛盾,例如近期任务与长期共产主义目标的矛盾。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当时领导人对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一看见生产有所增长,“资本主义成分”有所增加,就忍不住把这一切同共产主义目标对立起来,要求消灭耐普曼、“富农”等“资本主义成分”。希望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比行政命令要慢。用一个命令就可以把“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甚至肉体消灭,通过命令可以制定和批准五年计划,按照规定的速度发展重工业,而通过市场,则费时费力,因为培育市场是需要时间的。为了发展经济允许合法经营者发财致富,列宁说过,发财吧,但是请你们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宣传和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要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第532页。

消灭剥削,消灭剥削阶级以至所有的阶级,取消商品货币等“资产阶级”机制。军事共产主义被否定了,但是共产主义仍然是理想和奋斗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不但存在,还要加强。允许资产阶级存在甚至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哪怕加上一个限制词“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在当时的观念下不能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发生矛盾,而绝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动辄挥舞专政之剑来对付“阶级敌人”。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达成经济上的妥协,首先是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妥协,防止农民造反。党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同农民或者各资产阶级阶层作政治妥协。列宁说得相当明确,虽然我们允许资本主义,但这是在农民的需要的范围内,不允许任何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的法院应当懂得这一点。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承认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什么。^①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农民需要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那我们应该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②“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③目前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④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初说的这些话明确告诉全党,在经济问题上可以作让步,但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是不作任何让步的。

在准备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时,列宁确定了向农民作经济让步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方针问题。关于经济让步方面,报告提纲承认“经济上满足农民”的必要性并确定了一系列措施——流转自由,贸易自由,为此弄到商品,等等,但他把这种自由等用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意义”在提纲中被看作是“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问题”,并且认定“这样的反革命已在反对我们”。因此对待农民的政策是“可以把‘绳子’放松一些,不要弄断它,‘松开’一些”。这就是说拴农民的绳子还是要的,只是松开一些而已。把农民问题看作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6—1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07页。

“农民的反革命问题”显然太露骨，所以列宁在旁边注上：“在报刊上缓和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①

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上，俄共十大的一些代表同样持强硬的态度。例如十大代表 K.Г.扎维亚诺娃说：粮食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是确实必要的让步。但另一种让步，“违背共产党原则的实质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是不应当的。共产党在这里应当保持其本色，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它才会是强有力的”。^②

这一时期出现了允许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扩大了选举权，允许开办私人出版社，出版非党杂志，实行司法改革，设检察官和律师。1924年宪法赋予最高法院宪法监督权，等等。但所有这些民主变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善大多是表面的。其中多数表现的还是阶级原则和党性原则，一点也没有改变俄国居民基本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地位。

工业化需要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决定了需要增加长期投资。但外来资金短缺，而内部资金又受到政府“反资本主义”政策的抵制。一国社会主义搞闭关锁国，切断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在偿还革命前债务、赔偿被国有化的财产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妨碍了外资的流入，租让制没有得到发展。工业生产能力的全部开工要求大量的投资以更新机器设备，建立新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这里涉及的是投资大，而投资回收周期长的重工业部门。资金的严重不足，加强了集中分配和对经济实行政干预的倾向。工业的增长要求农业增加商品率，以向城市提供粮食，保障工业的原料，加强出口以换回设备，用农产品去换取国外的装备，这就需要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然而，越是剥夺农民，农业发展就越缓慢，越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农村个体大商品农户的发展受到了压制。本来扩大农村市场，通过农民的积累，通过节约，可以得到工业化的资金，但这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斯大林没有这个耐性。

缺乏政治体制保障的经济改革

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

^①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 1963. с.625—626.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365—366页。

^②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268.

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私人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目标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他没有对这种改变作出明确的解释,像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指示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与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发展拉大距离的社会。

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应当是公平民主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这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障,要求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但是,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而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相反地,正因为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列宁逝世后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权力向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问题,缓和专政的问题,然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是加紧控制的进程。

一个是禁止其他政党。1922年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接着,开展反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把原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部分移交革命法庭,另一些流放。1923年6月4日俄共向党的省委和区委下达由莫洛托夫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同孟什维克斗争的措施”的通告,规定一律解雇在工会、消费合作社、托拉斯、工业企业、保险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孟什维克。^①

^① ПАНУ, ф.1, оп.2, д.245, л.192,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н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9—210.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些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措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历史表明它们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后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同它们的思路大体一致。这是一种党外的监督力量,但被排除出政治之外。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取消党内民主,禁止各种派别,甚至异议。然而,党内少数领导人却悄悄建立不合法的“三驾马车”、“七人小组”,夺取并控制党政大权,取消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逐渐形成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一言堂”。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补充以政治自由。民主化进程既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更没有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没有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成为一个缺乏政治监督的社会,无法无天的社会。

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①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作出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②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时代。

新经济政策终于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了”。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俄文原文为:“Мы её отбросим к чорту”,全集的译文为“我们就把它抛开”,直译应是“我们让它见鬼去”。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3页。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20世纪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直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一、新经济政策在1918年春已经存在

一种诠释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对军事共产主义而言,是一种新的政策,实际上是回归1918年春天的政策。列宁曾持此观点,他的举证是,早在1918年春天,他已经指出当时的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里,主要的斗争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在1921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重申了这一观点,主张社会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联手反对其余的经济成分。1921年4月的《论粮食税》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

这一说法被斯大林紧紧抓住。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及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

“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①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他说：

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②

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所以，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诞生的日期定在实行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之时，而不是实施粮食税的时候。

二、“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各地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粮食征收制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起因时很少谈及，通常只提喀琅施塔得暴动，这可能是因为农民暴动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不过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中写道：

……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1页。

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①

当时许多领导人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一种退却,是对农民的让步,以拯救苏维埃政权。

这也是实施粮食税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但是,这样理解是不够的。有退却,就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略为减轻之后,停止退却、发动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逼得列宁一年之后,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开始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可能出于两种考虑:第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第二,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在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有待进一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与中农问题并列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道:

“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②

在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要胜过斯大林,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新经济政策,其标题分别为:第11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页。

和国家资本主义”；第12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这两章都有副标题，从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关注的重点。

季诺维也夫的论点始终围绕阶级斗争、退却和进攻、国家资本主义展开。他写道，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主义经过最广泛的深思远虑的退却运动”。“这是其历史意义迄今尚非所有人都清楚的退却。”“我们现在应当清楚明确地跟着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个退却。”^①退到哪儿去呢？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新经济政策等于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简单地消除“军事共产主义的极端性，不，我们做的不是这件事——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经济政策。我们根本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社会主义，而是退向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这是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还问道，“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哪一点上比“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好听一些呢？^②

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说法，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排除出新经济政策之外了。列宁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在实践上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并多次指出过。在季诺维也夫书写《列宁主义》一书的时候（1924年）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其次，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而后者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只讲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完全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面，大大缩小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也大大贬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

①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4页。

②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9、205页。

基础。”^①

斯大林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②一年后斯大林已经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③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④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⑤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谈阶级斗争。他强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⑥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的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92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196页。

⑥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21页。

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运用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这是苏联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长期以来,列宁对小生产是不放心的,把小生产看作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和源头。1921年3月列宁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今天是同谁进行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唯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同我们自己家里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斗争。”^①

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以后,列宁重申:“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②

列宁放弃了“最后的斗争”的提法没有呢?没有看到正式说法。不过我们在《论合作社》中看到,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过渡到新制度的机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合作社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不再是同农民进行“最后的斗争”了。

有两个人的回忆涉及列宁对农民问题的最后看法。

1922年列宁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弗拉基米罗夫说过,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同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什么。他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生活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2页。

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长期生活在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①列宁去世前在同布哈林的谈话中总结出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达到社会主义。^②

布哈林记住了这一点。在1928年7月全会上,布哈林在谈到非常措施引发的各地农民风潮时提出警告说: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这样你们就会遇到庄稼汉的起义,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结果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你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③

三、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经济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行粮食税对农民作出让步,以拯救苏维埃政权。但任何政策都不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限制在地方范围的实物交换(当时也叫“商品交换”)恰如“蜉蝣”(布哈林语),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先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④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一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

① 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和列宁逝世后的党内危机》,斯坦福1971年俄文版,第186页。

② 《国际共运史研究》(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列宁对合作社的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把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打算以国家资本主义去对付分散的无法控制的小生产。直到在新经济政策中引入市场商品经济成分之后,列宁才彻底改变了对合作社的看法,认为这是可以使农民的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机构,是可以通过农民对利益的关注而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机构。列宁强调,正是由于有了新经济政策,才使合作社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像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①。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②。“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③

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承认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④

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6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363页。

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①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②“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③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本文所引他在俄共十四大上对新经济政策所下的定义就是如此。

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④但是这时候实施他采取的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9年底,斯大林终于抛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新提法”。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宣布:“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⑤这新提法是什么呢?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⑥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作出了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⑦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

①② 《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7页。

⑥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0—151页。

⑦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3页。

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从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不同理解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任何一种政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需要在执行中根据具体情况、群众的反馈,不断完善和修正。列宁当年就是遵循这一原则办事的。在列宁的领导下,新经济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

列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对新经济政策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侧重面,同时由于列宁领导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总共不到两年,不可能提供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的所有答案,这就给各种不同的理解提供了所需要的根据。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退却和进攻的说法、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市场机制的说法,统统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根据,得到支持。这就需要对列宁的各种不同的说法联系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分析,找到本质的东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

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的问题之一是领导层对这一政策没有取得共识,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谁执掌最高权力,就按照谁的主张办。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同步,经济体制得不到政治体制的保障。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状态下,斯大林一旦大权在握,就在他信誓旦旦要坚持新经济政策、把取消新经济政策斥为“反革命谣言”后不久,就凭他个人一句话,轻轻松松地送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

决定苏联发展方向的二十年代

——《苏联史》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的特色

如果说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到国内战争胜利这三年时期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站稳脚跟的时期,那么20年代就是决定苏联今后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时期。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本是一条可能引导苏联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在党内斗争中随着布哈林的失败而被中断了。托洛茨基坚持的世界革命道路也随着他的失败而被抛弃。随着各个反对派的被击败斯大林模式成了以后几十年苏联的唯一模式,这一模式虽然促使苏联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但导致苏联整个经济平衡失调,除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外,涉及国计民生的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滞后状态,50年代的粮食产量甚至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赫鲁晓夫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而未果。苏联后来出现的各种弊病都与20年代的斗争有关联。因此书写一部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20年代历史,为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寻根溯源就非常必要,从中可以看到斯大林的政策方针不是在30年代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早在20年代,甚至夺取政权后不久就可以看到种种端倪,例如内战时期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斯大林模式的雏形,诸如计划经济、公社和集体农庄、书报检查、不容异见、打压知识分子、压制教会、集中营机制等,在20年代的历史中都可以看到。当然斯大林对此种种均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且多数场合是变本加厉,推向极端。例如斯大林的大镇压无论从人数、规模和范围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苏联史》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有不少新东西,是俄国和中国出版的苏联史书中回避或很少涉及的。择其要简介如下。

1921年初列宁说,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实际上国内战争后期,农民因对粮食征收制不满而纷纷举行暴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城市,广大工人也因为生活每况愈下而不满,举行罢工游行,民众的情绪也影响到军队,酿成喀琅施塔得兵变。农民暴动在官方的文件中是看不到的,在列宁著作只看到“盗匪活动”的说法。实际上,当时的农民暴动已经遍及全国所有省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迅速采取措施中止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所以本书在谈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用一定的篇幅描绘当时国内农民暴动的情景。

兼并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这段历史是迄今为止俄国出版的史书都回避不写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允许波兰、芬兰以至乌克兰独立,列宁认为,实行民族自决权,允许民族自决直至分离,反而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他说过,可以允许乌克兰试试独立,也允许它加入俄联邦,或者再退出。但是自波兰和芬兰独立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不许国内任何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权口号只针对外国,例如支持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苏维埃政权继承的是沙俄的地缘政治,恢复沙俄的版图是苏维埃政权所追求的目标。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宣告独立,成立民主共和国,由孟什维克领导。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格鲁吉亚共和国有双重不满,一是不能让它独立,要使之回归俄国,二是更不能容忍由政治对手孟什维克来领导这个国家,必欲灭之而后快。1920年5月俄联邦同格鲁吉亚共和国曾正式签订相互承认的条约。但是过不多久,1921年2月,红军就入侵格鲁吉亚,占领梯弗利斯,把格鲁吉亚并入俄联邦。其实,布尔什维克如果大度一些,允许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继续执政,实施他们的理论方针,进行另一种社会主义实验,也许会为世界留下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未必不是好事。这段历史即使现在出版的苏联史书也是几乎不提的,然而这是一段确实存在的历史,应当写入史书。

新经济政策对农民作了让步,允许农民缴纳一定的粮食税之后自由支配余粮。这样就导致粮食的自由买卖,于是布尔什维克从禁止自由贸易转变为承认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实施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经济改革,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民暴动基本上被消除了,财政币制改革尤为成功。然而在政治领域,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弥补对农民所作的让步,在政治领域反而加强控制。这在三个方面表现得

非常突出：

(1) 打击宗教势力,特别是东正教。俄国居民 80%以上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在居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布尔什维克需要同东正教争夺社会影响。1921 年俄国发生严重的饥荒,政府和各界开展了赈济灾民的工作。高尔基发起由一批名人成立赈济饥民委员会,东正教也成立全俄教会救济饥民委员会,不仅在信徒中间募捐,而且决定把教会所拥有的非宗教用品的金银珍宝捐献出来。但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非常担心这两股势力影响的扩大,取缔了这两个救灾组织。在劝高尔基出国后,逮捕了该救灾组织的领导人。对东正教则以救灾为名决定没收其包括祭祀用品在内的所有珍宝,对反抗者实施直接的镇压。布尔什维克政权借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打击东正教,同时为国库增加一大笔财富。以后又扶植革新教会来取代传统教会,开展大规模的反教会的无神论宣传活动,限制和禁止宗教图书的出版,炸毁各种教堂。

(2) 驱逐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制造“哲学船事件”。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广大知识分子处境悲惨,他们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在文化、教育等领域不时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经过一番准备,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了数百名文化领域的知名知识分子,把他们送上轮船,驱逐出境。被驱逐的知识分子一般并无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只是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或者措施。哲学船事件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丧失了一批顶尖的学者和科学家,影响了苏联文化、科学的发展,但无意中也使这批人士逃过了 30 年代的大镇压。驱逐知识分子是杀鸡给猴子看的威慑措施,布尔什维克政权想借此迫使知识分子心服口服地归顺苏维埃政权。托洛茨基曾经为驱逐知识分子的措施辩护,但不幸的是到 20 年代末他自己也遭受了这种驱逐,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3) 镇压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沙俄统治时期,俄国存在两大社会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前者后来分裂成两个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和孟什维克党(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者也分裂成两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政党都是社会主义政党,都是第二国际成员党。他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是方法道路上存在分歧。十月革命前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度同布尔什维克党紧密合作,后来因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分歧,中止了这种合作,社会革命党人曾武装反抗布尔

什维克政权,但1919年停止了这种武装斗争并获得苏维埃政权的大赦。虽然其多数领袖已被投入监狱,但他们在居民中尤其是农村仍存在广泛的影响。为消除他们的影响,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公审,把其中的某些领导人判处死刑。虽然由于国际上的强烈抗议以及畏惧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复暗杀(他们有实施恐怖暗杀的传统和能力),不久对被判刑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实行减刑和赦免,但布尔什维克达到了打击和消灭社会革命党,同时打击孟什维克的目的,使苏联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党专政”的国家。

以上三项措施充分说明,布尔什维克在对农民做了让步之后,再也不想在其他方面后退让步了,他们要把在对农民让步的损失在其他领域找补回来,加强对其他领域的控制,当然其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是强制、暴力和专政。这种做法预示了30年代的镇压,是30年代大规模镇压的先声。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致力于建设一个前无古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按照一定的理论设计建设的,因此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对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解就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因为如此,本书把对列宁思想演变和发展的考察放在重要位置,用一章的篇幅来记叙列宁的探索和思考。

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执行三年的结果表明这种直接过渡的做法并不符合落后俄国的实际,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终于酿成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好在列宁并不是一个死守某一模式的人,此路不通就另寻出路,于是有了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政策后允许农民自行处理余粮,列宁的思想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从坚决反对自由贸易,到试图把自由贸易限制在地方范围,到允许在全国范围实行自由贸易,终于承认了商品货币市场的合法存在。对农民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把他们看作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可怕力量,而是把他们看作工人阶级的盟友,不再把合作社看作产生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而是看作能够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认为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据社会发生的变化,列宁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宣布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重要论断。列宁在最后时日特别关注党内状况,提出党的改革问题,要求加强对党的领导层包括政治局的监督,为提高国家监督机关的威望,提议把工农检察院同党的中央监察

委员会合并,以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采取措施防止党的分裂,防止滥用权力,因担心斯大林拥有无限权力而又行事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等等。本书相当系统地考察了列宁最后时日的探索和思想。列宁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虽然在以后的岁月没有能够得到实施,但这是列宁留下的一笔重要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党内斗争对苏联前途有重大影响。关于党内斗争我国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很少谈及,俄国出版的苏联史著作,谈得也不深入。联共党内的斗争事关苏联以后的命运,决定了苏联的以后的发展方向,所以根据解密档案,尤其是当年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速记记录以及一些人士的回忆录,尽量复原当年的斗争的情景,展示出20年代苏联复杂多变,各种派别集团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图景。在20年代苏联有过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集团,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托季联盟(联合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斯大林多数派等派别集团,对他们的主张,他们的目标不应当回避。这里既有权力斗争,也有理论斗争,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之争,世界革命方针之争,并不能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归结为一批反对派,一伙外国间谍内奸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的斗争。

托洛茨基1923年秋发动的围绕“新方针”的争论是一场规模甚大的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1928—1929年布哈林等反对“非常措施”的斗争,是反对在国内和党内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的斗争。可惜都遭到了失败。

1921年俄共十大曾经通过实行“工人民主”的决定,决定用选举制取代任命制,用工人民主制取代民主集中制。然而与此同时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其第七条还规定中央委员会可以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出党。连列宁也认为,这是一条反民主的决定,因为中央委员会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它自身无权开除中央委员。不过这一条后来成了斯大林在党内频繁使用的撒手锏。斯大林通过逐个击败各种反对派,获得最终的胜利,从而建立了他个人的一统天下。本书对这一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和评析。20年代党内斗争的结局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发展:

1. 党内不再有反对派,不再有不同的声音了。领袖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变成一个人,可以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了。从1929年底斯大林50大寿起,对他的个人崇

拜有增无减,斯大林完成了由人变神的过程。

2. 党内的监督被消除了。斯大林借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之机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在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能够发挥客观公正的监督作用,在党内斗争中频繁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只是为了形成斯大林的多数,以多压少。到30年代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被取消,于是党的会议上只能听到清一色的欢呼声、万岁声。

3. 斯大林模式的三个基本点: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重工业化、为大规模镇压制造根据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被堵死了,苏联经济走上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

关于苏联文化有两项以往的苏联史书很少涉及。一个是“无产阶级文化派”这个文化领域的极左派别,否定传统文化,要在“空白地”上制造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思潮在20年代的苏联影响极大,对中国也有影响,其历史教训不应当被遗忘。二是书报检查制度。本书在苏联史的著作中首次详细记叙了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书报检查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极力予以谴责的制度,这种制度扼杀人的创造性,在文化领域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由于这是一个并不光彩的政策,所以长期以来苏联当局矢口否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宣称这一制度只存在于西方国家,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才公开承认其在苏联的存在,并予以废止。本世纪以来俄国公布了大量有关书报检查制度的档案文件,本书依据这些解密档案,对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做了详细的记叙。这样,在苏联20年代的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由于主要领导人曾长期流亡西方,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也由于历史的惯性的作用以及青年作家的努力,20年代的文化呈现各种流派林立、各种风格并存的生动局面,同时也看到书报检查和意识形态控制对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消极现象,连当时文化的“总督”卢那察尔斯基也身受其害。检查制度的逐步加强为30年代及以后年代对文化的全面控制,实施文化专制主义以及对文化人的镇压准备了条件。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存在70多年中三次改革中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另两次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20年代的苏联处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按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走下去有可能走向市场经济,可惜到20年代末这条路被打断了,走上了高度集中并且逐步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不归路。

从主观原因来说,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根本上说,那时的领导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经济,即使主张运用市场机制的布哈林也认为最终目标还是计划经济,利用价值规律是为了最后消灭价值规律,其他领导人就更不必说了。在苏联这样高度集权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领导人的认识往往决定国家发展的走向,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而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权选择领导人的。

本书竭力揭示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它的运行机制和积极作用,同时探寻其不足之处,它夭折的原因。本书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揭示了20年代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政治体制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改革,使得经济体制得不到政治体制的有效保护,能够促使经济发展的措施处处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和阻碍,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蓬勃发展,这是新经济政策最后被打发去“见鬼”的根本原因。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4期